

K25/1-2

青年自学丛书

中国近代简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 编著
中国近代史教研组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88066



上海人民出版社

688066

编辑说明

《青年自学丛书》是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学习政治、科学、文化的迫切需要而编写的。内容包括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我们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有助于广大青年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理论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这套丛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工出版。对于本丛中已出版的部分，将修订后重版。

这套丛书得到有关单位和作者的大力支持，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意见和批评，以便改进。

《青年自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第一章 鸦片战争	1
一 罪恶的鸦片贸易	1
二 虎门销烟和广州之战	11
三 三元里的怒吼	20
四 炮口下的条约	26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	35
一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35
二 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	43
三 群众性的反孔斗争	52
四 《天朝田亩制度》	56
五 维护民族尊严的外交	61
第三章 英法联军的侵略	66
一 “亚罗”号事件	66
二 大沽失陷与《天津条约》	74
三 圆明园浩劫	78
四 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88
第四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英勇斗争	97
一 天京上空的乌云	97
二 巩固天京的战斗	103
三 痛打外国侵略者	109
四 扑不灭的革命烈火	116

第五章	洋务“新政”与边疆危机	125
一	如此洋务“新政”.....	125
二	边疆烽火.....	133
三	中法战争.....	140
四	反洋教斗争.....	149
五	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新阶级出现.....	156
第六章	甲午中日战争	165
一	日本的对外扩张.....	165
二	日军侵入朝鲜和中国.....	168
三	《马关条约》.....	176
四	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战.....	181
第七章	戊戌维新	188
一	瓜分狂潮.....	188
二	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	195
三	“公车上书”.....	201
四	维新与守旧的斗争.....	209
五	走不通的道路.....	214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	223
一	反帝风暴席卷全国.....	223
二	八国联军的进攻.....	230
三	奋勇抗击侵略者.....	237
四	反对沙俄强占东北.....	246
五	屈辱的《辛丑条约》.....	252
六	义和团的历史功勋.....	256
第九章	辛亥革命	260
一	孙中山与兴中会.....	260
二	民主革命潮流的奔腾.....	265
三	同盟会的成立.....	272

四	从两条战线上出击	278
五	抵制革命的假立宪	284
六	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288
七	武昌起义, 各省响应	295
八	胜利果实被窃取	304
第十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314
一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	314
二	帝制丑剧与护国运动	323
三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333
四	新时代的曙光	340
附 录	351
	大事年表	351

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 罪恶的鸦片贸易

一八四〇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野心勃勃的英国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①“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②毛主席的论断，科学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是我们学习中国近代历史的总纲。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一个王朝。这个王朝到嘉庆年间（一七九六——一八二〇年）已经危机四伏、日趋没落，正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横排本（下同），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②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二页。

如《红楼梦》中有句话说的的那样，“外面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

封建社会以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经济基础。清朝统治时期，由于满、汉地主阶级的残酷掠夺，土地和财富愈来愈集中到皇帝、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手里。皇帝是全国最大的地主，据一八一二年（嘉庆十七年）统计：光是被皇帝直接间接掌握的土地，就多达八十三万顷（每顷一百亩），几乎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十一。其他大地主大官僚也占有大量土地，如河北“怀柔郝氏，膏腴（yú 愉）万顷”；道光年间大官僚琦善，占地二百五十六万亩；江南“田地多属富家大户之产”，“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土地兼并、集中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破产贫困的过程。广大无地、少地农民，被迫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在日益加重的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剥削下，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

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清王朝，是一个君主专制政权。在它走向最后崩溃的过程中，政治日益腐败，上下贿赂公行。朝廷充斥着“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外不知人材为何物”的腐朽官僚。当时，民间广泛流传着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深刻揭露了封建官僚无官不贪的反动本性。嘉庆朝初年，权臣和珅（shēn 身）被抄家，其财产竟值八亿两白银，相当于那时二十年的国库收入，从中更可以看出官场贪污勒索的严重性。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军队，也逐渐瘫痪。以刀、矛、弓箭、短剑、藤牌、甲冑（zhòu 宙）和少量火绳枪、滑膛炮装备起来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近九十万，但军备废弛、军器朽烂，武官忙于克粮冒饷，不管营务，士兵纪律败坏，操练如逢场作戏。沿海水师，不仅军器残缺，而且战船都是“薄

板旧钉，遇击即破”。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劫财，实际上已失去了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

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等级统治，清王朝更大力宣扬反动的孔孟之道，提倡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程朱理学，用这套精神枷锁来禁锢人民，强化地主阶级专政。清朝统治者给孔子加上了一个“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的阔头衔，规定以孔孟之道作为科举取士的内容，借以牢笼知识分子，培养为清朝尽忠效劳的奴才。清朝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①对“伦理纲常”的任何微弱反抗，都被看作大逆不道，甚而遭杀身之祸。鸦片战争前夜，笼罩着清朝思想政治领域的，就是这么一片“万马齐喑(yīn 因)”的沉闷空气。

清代进步思想家和著名文学家龚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年），字璩(sè 色)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当时就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出发，大声疾呼，要求变革。龚自珍当时一面猛烈抨击清王朝的黑暗统治，认为这个封建社会已处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阶段，痛斥封建统治者对人民的大肆搜括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一面尖锐地指出，改革是历史的必然，“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并以“乱将不远”来警告清王朝，要它赶快“更法”、“改图”、“变功令”。

然而，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地主阶级决不会对农民阶级发善心，农民阶级也决不会停止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一八三九年，龚自珍曾经写下这样一首诗，典型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①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八八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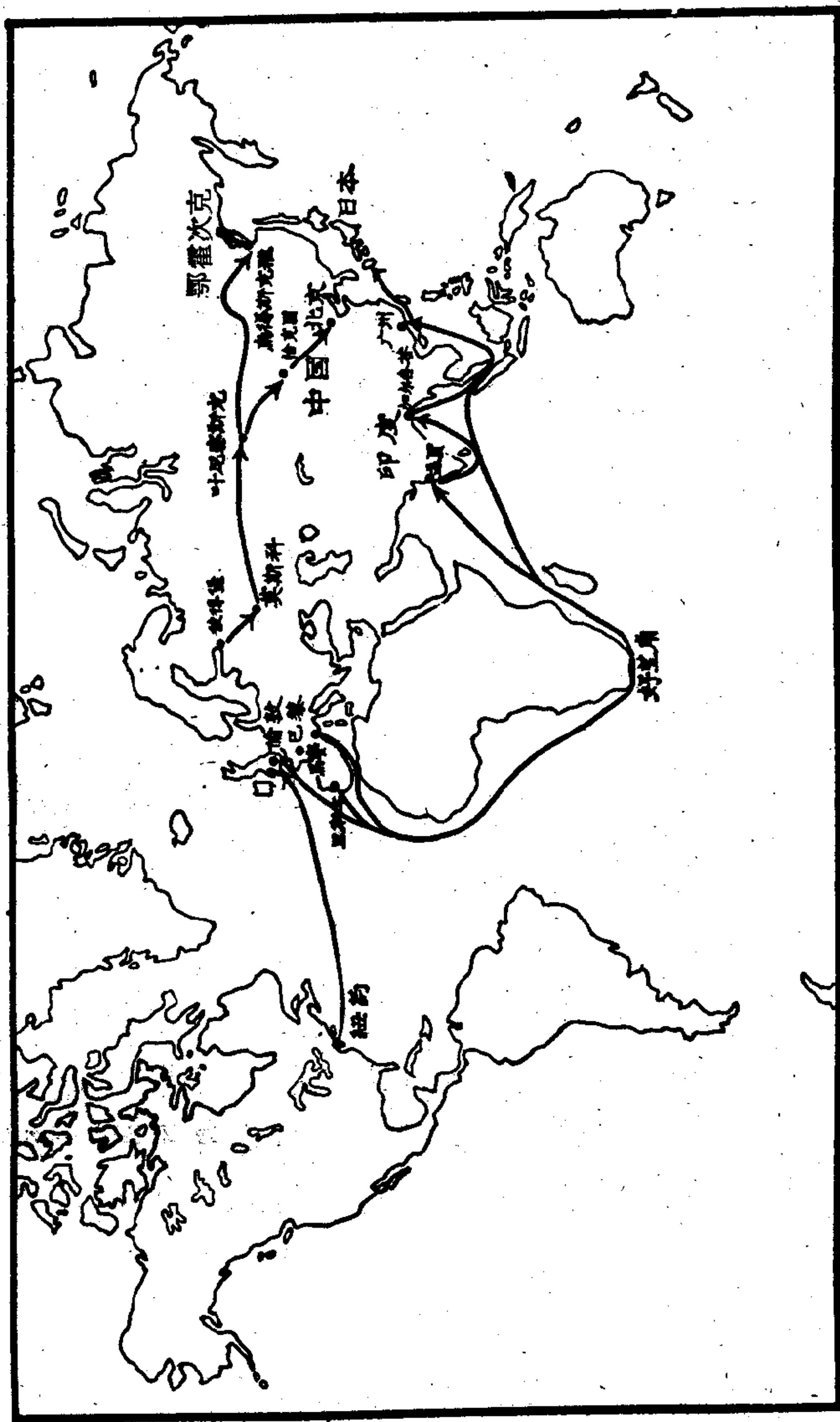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意思是说，清朝封建统治者既不讲求盐铁生产，又不兴修河工水利，只知榨取东南各省财富。按规定该纳赋税三升的，经过官吏层层盘剥，人民竟要缴米一斗。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还不如把耕牛宰了另找出路！阶级矛盾一天天激化，从嘉庆朝开始，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前，农民不断举行武装起义，北方以白莲教为主，南方以天地会为主，前仆后继，反抗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给予清朝封建统治以有力的打击。

正当清朝国势江河日下之时，英、法、美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经过十八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代替工场手工业，生产飞快增长，迫切要求开辟新的更大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号称“海上霸王”的英国，驾着炮舰横冲直撞，到处寻找和掠夺殖民地。沙皇俄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虽然比较落后，但是侵略中国的野心却很大。从十七世纪中叶起，它就侵入黑龙江流域，成为从陆路觊觎(jì yú 计余)中国领土的恶魔。

在罪恶的殖民事业中，英国资产阶级历来是海盗与商人，一身而二任。一六三七年，英国商船第一次到达广东时，就炮击珠江口的虎门炮台，抢劫江面船只，还强登要塞，掳走大炮，放火烧了一个村庄。一八〇八年，英国军舰十三艘，一度攻掠澳门，侵犯虎门，在虎门被中国水师击退，不得不具稟认罪。清政府为了防范反清势力在沿海活动，并对付从海上来的外国侵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了封关禁海的“闭关政策”，除留下广州一处和外国通商贸易外，封闭了沿海所有港口。十



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东来图

七、十八世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的“炮舰政策”,都还没有能轰破中国的大门。英国政府在玩弄“炮舰政策”的同时,曾于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一六年,先后派马戛(jiá 夹)尔尼和阿美士德为使节,到北京向清政府提出开放天津、宁波、舟山为通商口岸,割让舟山附近岛屿,裁减关税等侵略要求,也被清政府拒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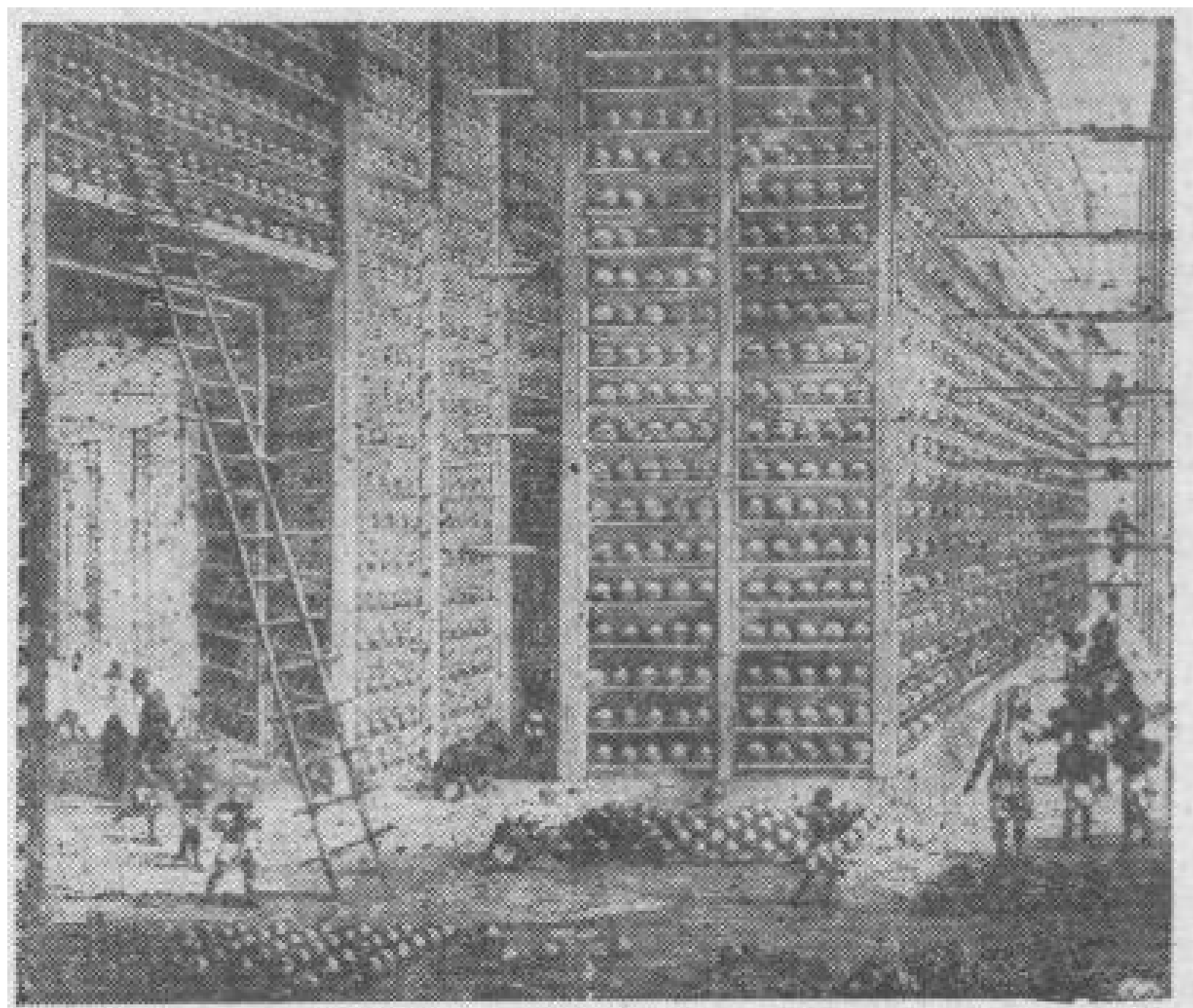
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①特别当英国用火与剑巩固了自己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并于一八一九年占领新加坡之后,打开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市场,掠夺廉价的工业原料,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的欲望,更加迫切。他们垂涎三尺地设想:如果中国的市场打开了,英国货在那儿的销量,将比世界其他地方的总销量还要大。然而,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实际销售情况,却使老板们大失所望。他们远涉重洋贩来的棉纺织品和呢绒之类,在中国很少销路,甚至蚀本。因为,当时中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广大农民,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既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又从事家庭手工业劳动,如纺纱、织布、织麻等,过着“男耕女织”,“晴事耕耘,雨勤织绩”的生活,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对外来商品有顽强的抵抗力。那时,劳动人民穿的是自己织的结实的土布,官僚士绅爱的是绸缎绫罗,洋布、呢绒当然找不到倾销的门路。

^①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九七二年五月第一版(下同),第一卷,第二五四页。

相反,中国出口的茶叶、生丝以及陶瓷、药材等,在西方倒是销路畅通,很受欢迎。这样,直到十九世纪初年,中国在对外贸易中,还一直保持着出超的有利地位。从广州流入的白银,当时每年在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之间。不少外国商船到中国来做生意,所带货物不多,大量带的倒是银元。

马克思早就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①英国资产阶级用一般商品打不开中国市场,为了追逐利润,最大限度地掠夺中国人民,竟求助于罪恶的鸦片贸易;一八四〇年六月,更为了维护鸦片贸易,发动了可耻的鸦片战争。

鸦片是从罌(yīng 嬰)粟中提炼的,俗称大烟,原产于印度、小亚细亚等地。鸦片含有大量毒素,一抽上瘾,就会使人慢慢骨瘦如柴、精神萎靡。英国殖民政府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罌粟,给予东印度公司(英国在东方的殖民机构)专卖和制造鸦片的特权,并制定了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的侵略政策。一八〇〇年,输入中国的鸦片为四千五百七十



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储藏库

^①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页。

箱；一八三八年，增加到四万零二百箱。也就是说，输入中国的鸦片，在十九世纪的前四十年里，增加了将近八倍。在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的罪恶勾当中，美国资产阶级也是一个重要角色。他们从土耳其和波斯贩来鸦片，到中国榨取高额利润。美国传教士甚至可耻地宣传：“鸦片无害于中国人，象酒的无害于美国人一样。”

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从一七九六年起，三番五次下令禁止鸦片输入，但是并没有什么成效。掠夺成性的英国鸦片贩子，将二十几艘趸(dǔn 吨)船长期停泊在珠江口外的伶仃洋面，作为贩运站。外国商船在进口前，先将鸦片卸入趸船，然后，名为“快蟹”“扒龙”的走私船只，来往不断地由趸船运走鸦片，转卖到全国各地。为了走私，美商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还专门建造了许多速度快、又装备着武器的“飞剪船”，武装偷运鸦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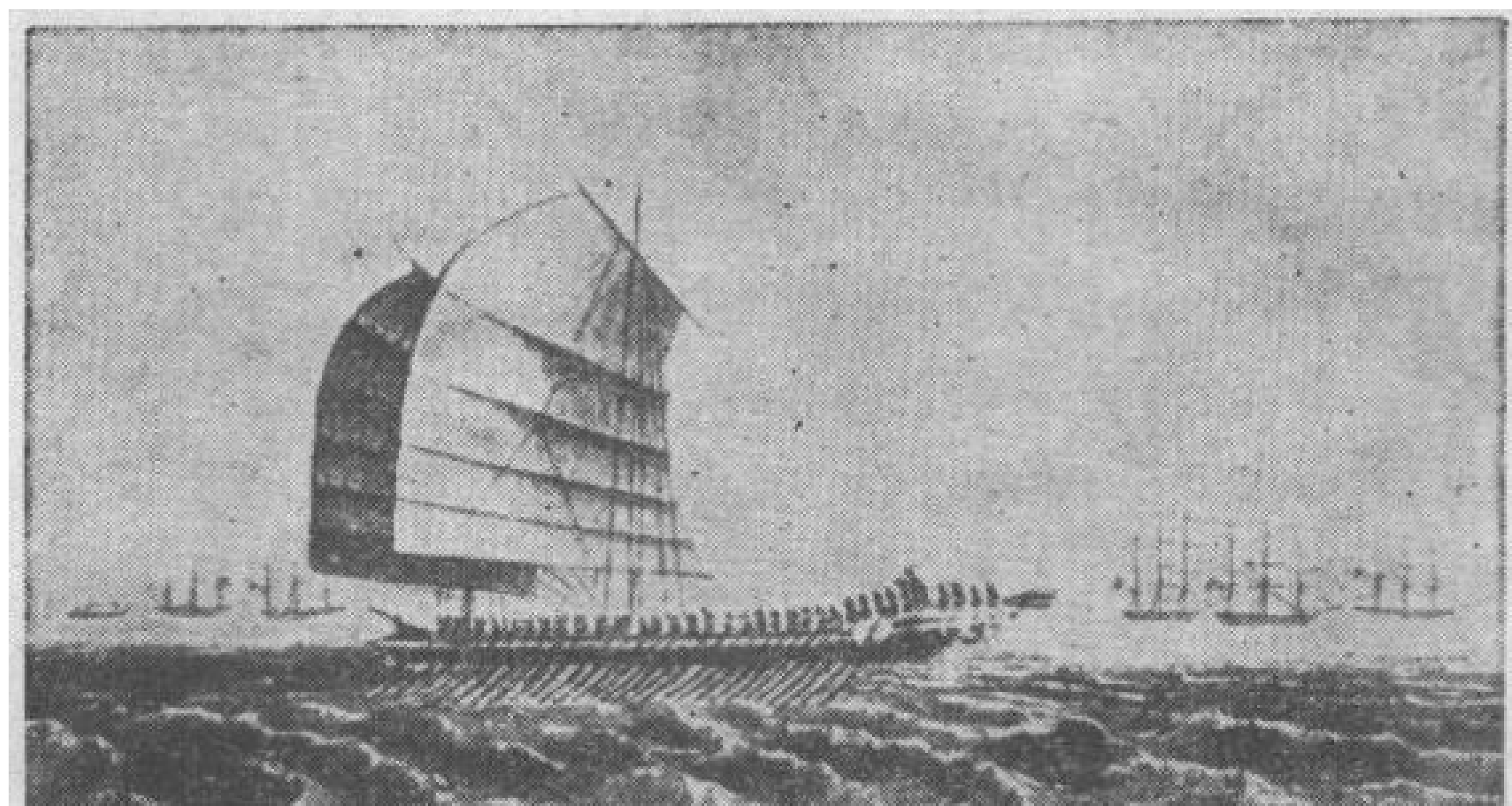
鸦片走私所以那样猖獗，和清政府的腐败也是分不开的。清朝官员明里在颁发禁令，暗地在收纳贿赂，对鸦片走私大开方便之门。广州是当时唯一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但在一八二六年，专门缉私的巡船，竟每月受贿三万六千两银，“放私入口”。大量烟土由插着“粤海关”或高级官员旗帜的船只，从伶仃洋面的趸船，堂而皇之地运到岸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①

外国侵略者走私与行贿并用，鸦片象一股汹涌的黑色毒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六页。

流,向中国大地倾泻而来。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十倍于成本的惊人利润。以一八一三年为例,一箱上等的印度鸦片,市场拍卖价格是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而它的成本不过二百三十七卢比。鸦片贩子从印度将它转运到中国销售,又赚取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暴利。



英国贩运鸦片的走私船只

罪恶的鸦片贸易,又是英国资产阶级对华贸易由入超转为出超的主要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把纺织品运到印度,换取毒品鸦片,然后将鸦片偷运进中国,赚取大量白银和中国的出口商品。一八三七年七月至一八三八年六月,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鸦片一项就占了三百三十七万英镑,抵销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三百十四万英镑还有余。难怪英国资产阶级恬不知耻地赞颂鸦片贸易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

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造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省的田赋总额。”

罪恶的鸦片贸易，更是英、美侵略者毒害中国人肌体和精神的杀人不见血的特种武器。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①

广大劳动人民十分痛恨鸦片烟。然而，过着荒淫无耻的剥削生活的地主官僚阶级，却很需要这一类刺激品，来弥补精神上的空虚。随着英国鸦片侵略的扩大，烟毒泛滥于全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祸害。

据一八三五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二百万以上，地区遍及十几省。抽鸦片烟的，起初只是些贵族、官僚、地主和大商人，后来，连依附于他们的各色寄生虫，甚至军营里的一些兵丁，也都抽上了瘾。这个反动的腐朽的寄生的社会势力，不仅更加敲骨吸髓地剥削劳动人民，而且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禁烟。

鸦片象潮水一样涌进来，白银象潮水一样流出去。据估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二十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至少在一亿元以上，相当于银币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由白银外流引起的银贵钱贱，又直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十八世纪末，白银一两可换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七、八百文，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竟可换制钱一千六、七百文。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少量产品时，得到的是制钱，但在完粮纳税时，

①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四页。

都要折算成银两，这样，他们的实际赋税负担，无形中增加了一倍以上。不仅如此，鸦片的大量输入和白银的源源外流，也使清政府财政拮据，国库空虚，统治危机更加严重。

以英、美资产阶级为罪魁祸首的鸦片侵略，成了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广大人民群众把罂粟叫做“妖花”，把鸦片看作“毒蛇”，将走私船骂为“鬼船”，愤怒控诉英、美侵略者“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不下数百万众，耗民财何止数千万金！”中国人民强烈要求禁烟，坚决反对罪恶的鸦片贸易，他们是禁烟斗争的动力和主力。

二 虎门销烟和广州之战

围绕着禁烟问题，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激烈争论。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主张严厉禁烟，鸦片战争爆发后，坚决主张抵抗；一派以道光帝（一八二一——一八五〇年在位）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直隶总督琦（qí 骑）善为代表，反对和破坏禁烟，战争发生后，又竭力主张向外国侵略者投降。

抵抗派的立足点，当然是维护封建王朝利益；但在民族利益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主张抗击外来侵略、彻底消灭烟毒，在这一点上，和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投降派代表着受贿集团的利益，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势力，盘根错节，他们实际上是英、美侵略者在中国的代理人。

一八三八年六月，清朝官员黄爵（jué 决）滋上书道光帝，从白银大量外漏的严重情况出发，力主禁烟。同年十月，林则徐给道光帝上了一道奏折，说鸦片为害极大，非严禁不可，如果

再马马虎虎下去，只怕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兵和饷是统治阶级的命根子，“无兵”可用、“无银”充饷，那还了得！道光帝惊于问题之严重，采纳了林则徐的主张。十二月，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指挥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一七八五——一八五〇年），字少穆，福建侯官人。当他离开北京前往广东时，好友龚自珍写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痛斥鸦片为“食妖”，激励林则徐坚决禁绝鸦片，决不要“游移万一”；对破坏禁烟的官吏商绅，“宜杀一

儆(jǐng 警)百”；对英国侵略者，“宜以重兵自随”，“修整军器”，狠狠给予打击。

早在林则徐到达广州之前，当地人民群众反对英、美侵略者私贩鸦片的斗争，已经十分高涨。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十二日，英、美鸦片贩子捣乱刑场，阻止清朝官员在广州商馆前的广场处决中国烟贩，暴徒们还以棍棒行



林则徐画像

凶，“逢人就打”。这一严重侵犯主权的暴行，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顷刻之间，就有上万群众包围商馆，以石头、瓦块作武器，反击外国侵略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群众反侵略斗争的高昂情绪，增强了林则徐的禁烟决心。一八三九年三月十日，林则徐到达广州。十八日，限令所有外国人在三天之内，将存在趸船上的鸦片全部交出，并书面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夹带鸦片，如有违反，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蛮横抗拒禁烟。他一面唆使英商拒绝交出鸦片，布置大鸦片贩子颠地连夜逃跑，一面发出狂妄的战争叫嚣。林则徐当机立断，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派兵封锁商馆，断绝商馆和趸船间的交通往来，并撤退商馆的中国雇员。义律无可奈何，最后只得命令英商缴烟。

林则徐在广东收缴的鸦片，共计二万多箱（其中一千五百四十箱属于美国鸦片贩子，每箱约重一百二十斤），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从六月三日起到二十五日止，全部在虎门滩上当众销毁。

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虎门海滩挤满了前往观看的人群。只见海滩边挖好了两个销烟池，搬运工和兵丁们，先将鸦片和食盐倒进水池，然后抛进石灰，以铁锄木耙翻搅。霎时间，石灰溶化，池水沸滚，浓烟腾天。鸦片被销毁了，人群中响起一片欢呼声！外国侵略者原先诬蔑“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即使烧烟，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但是，在铁的事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这次销毁鸦片的“细心和忠实程度”，远出于他们的“臆(yì 艺)想”。

禁烟运动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正义行动。虎门销烟，

以实际行动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犯罪行为，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无畏斗志。中国人民解放后，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战斗场面。

义律被迫缴烟后，不断向中国发动武装挑衅。林则徐在坚持禁烟的同时，加紧战备。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zhēn 贞)和水师提督关天培，切实整顿军队，认真进行操练；在珠江口狭窄处，安置了两道木排、铁链，珠江两岸增添了二、三百门大炮，以阻击敌舰；招募渔民和但户(世代住在船上的贫民)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以增强抵抗力量。林则徐还发布告示：“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但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既定政策，是以大炮保护鸦片贸易。一八三九年四月，义律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就把中国方面正义的禁烟运动，说成是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最好理由”和“最有希望的机会”，叫嚷“使用足够的武力”，给中国“迅速而沉重的打击”；并建议先封锁珠江，再占领舟山群岛，最后到天津白河口，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dié 蝶)，迫使清政府接受英国的侵略要求。八月底，伦敦收到上述报告，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发出一片狂热的战争喧嚣，外交大臣帕麦斯顿气势汹汹地说：对待中国人，必须“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乘战胜之余威，提出自己的条件，强迫中国接受”。海盗嘴脸暴露无遗！

蓄谋已久的鸦片战争，是英国对华侵略的必然步骤。早在一八三二年，英国侵略者就派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刺探中国沿海军事、政治、经济情报，测量港湾河道，绘制航海图，并于一八三五年制订了对华侵略的具体作战方案。

一八三九年十月，英国内阁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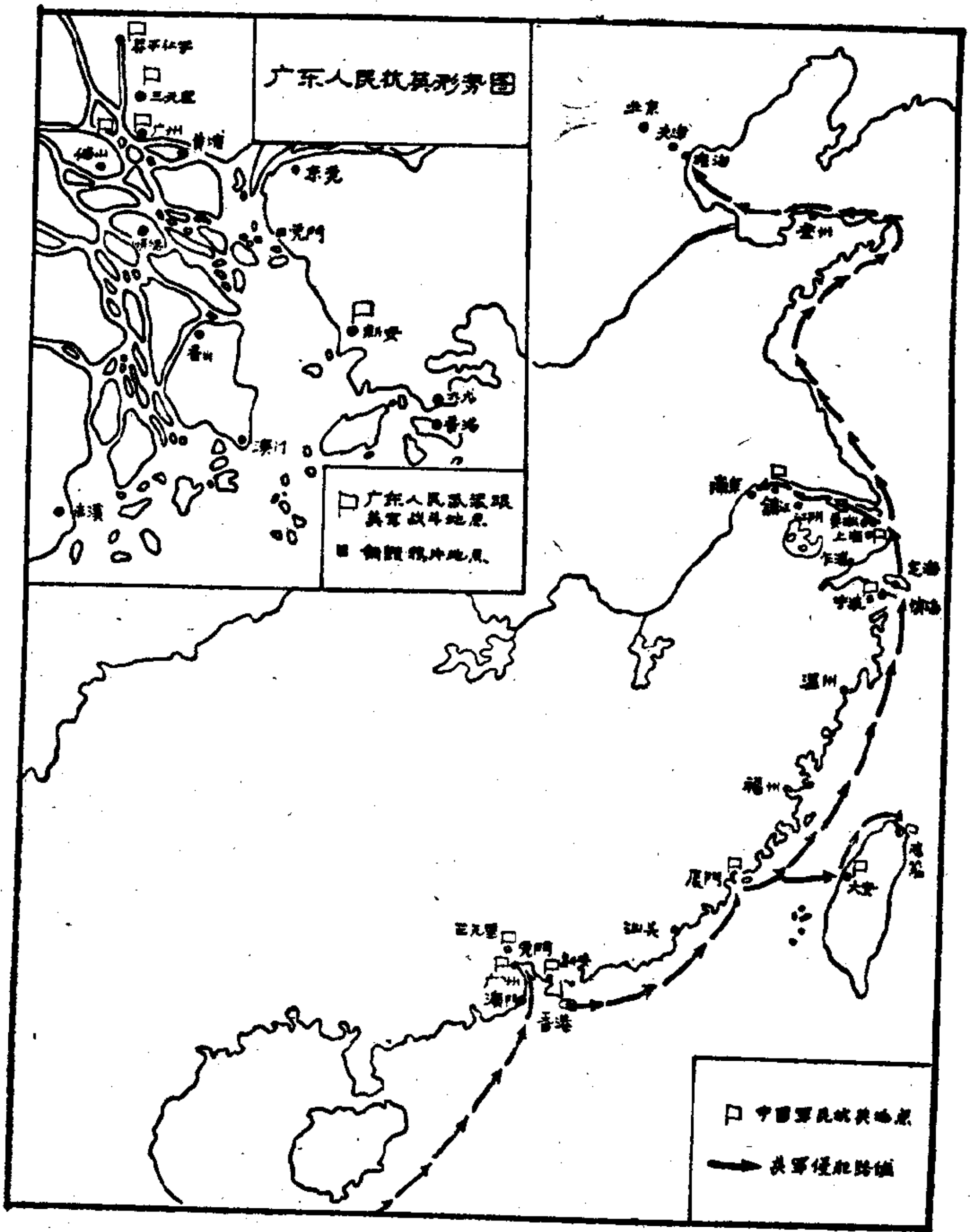
一八四〇年二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yì意)律为侵略军总司令和谈判全权代表，义律为副。六月，由英国军舰十六艘、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八艘以及五百四十门大炮和四千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陆续到达广东海面，进行武装侵略，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马克思指出：这是英国“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①

英军企图侵犯广州，但因林则徐严密设防，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按原定侵略步骤，封锁珠江。六月三十日，侵略军转攻福建厦门，也被早有戒备的水师击退。但其余各省督抚，或是投降派（如直隶总督琦善、两江总督伊里布），或是腐败官僚，因此从浙江到直隶，各海口几乎毫无抵抗准备。

七月五日，沿海北犯的英国侵略军，攻陷浙江定海。他们一爬上中国土地，就进行疯狂的屠杀抢掠。一个英国军官自供说：“军队登了岸，英国旗就展开，从这一分钟起，可怕的抢劫情景就呈现在眼前。暴力地闯入每一幢房子，劫掠每一只箱篋，……一切都被席卷而去，剩下来的只是被无情的炮火击毙、击伤的死尸和伤员。”不仅在定海如此，整个鸦片战争过程，都充满了英国侵略军这种令人发指的海盗行为。

八月，英国兵船八艘闯到天津海口，直接向清朝中央政府施加军事压力。懿律在递交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提出了鸦片贸易合法化、割地、赔偿等一系列侵略要求。道光帝这下子慌了手脚，投降派趁机大放厥词，有的说，英军“船坚炮利”，难以取胜，今年即使打退，明年仍可再来，如果战端一开，仗就打个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八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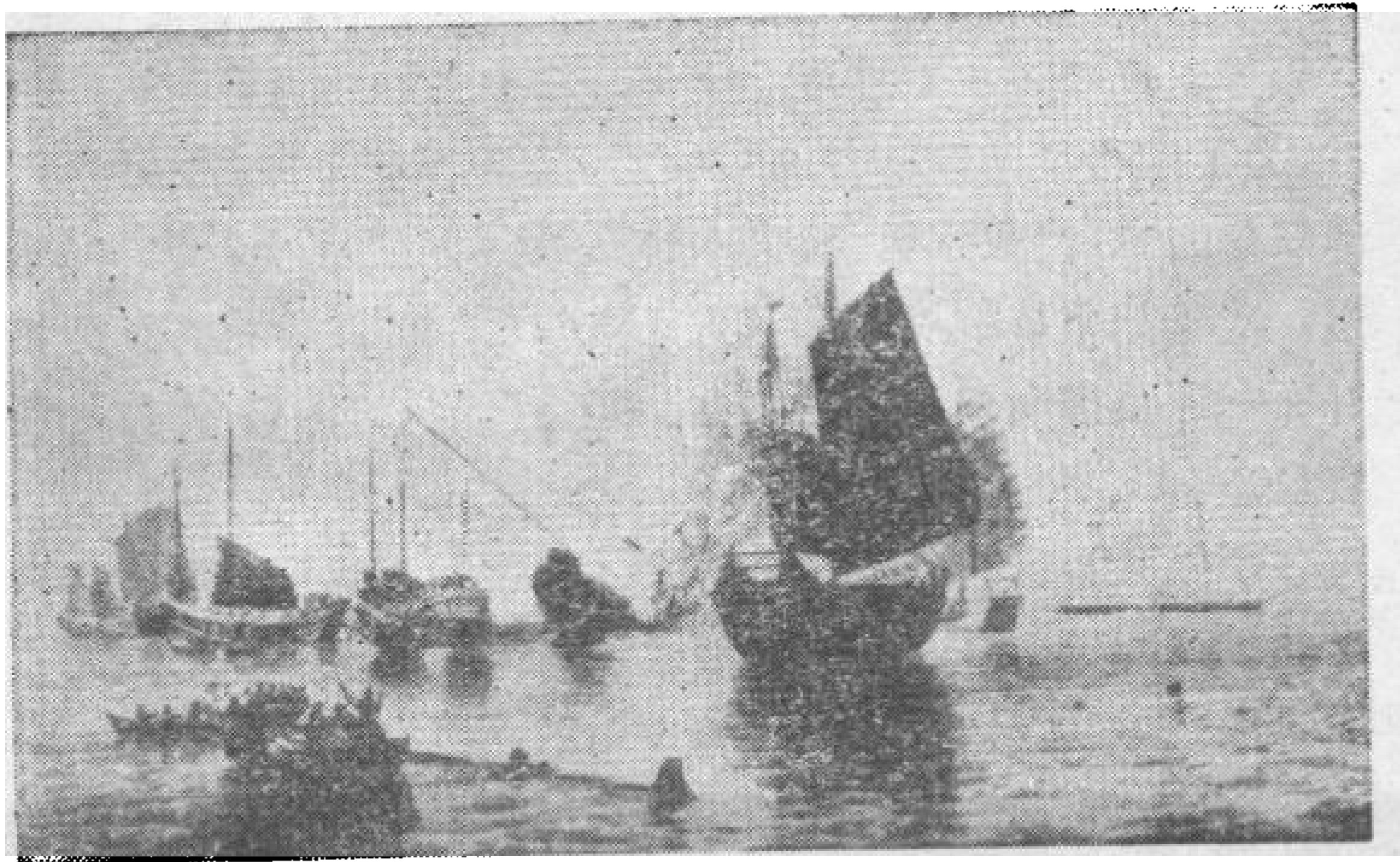
第一次鸦片战争形势图

没完；有的说，“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攻击林则徐“措置不当”，惹下大祸。

侵略者的大炮和投降派的谰言，使本来对禁烟就不坚决的道光帝，很快转到妥协的立场。他指责林则徐“办理不善”，派琦善与英军谈判。奴颜婢膝的琦善，在谈判中将一切推为林则徐的“罪过”，保证要“重治其罪”，还私下对懿律表示，只要英军退回广东，一切问题都可以在广州谈判中获得满意的解决。

英国侵略者的要求有了着落，于是，从九月开始，由天津海口南撤。昏庸的道光帝，竟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九月十七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到广州继续和英军谈判。十月三日，更将林则徐、邓廷桢撤职查办。

林则徐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派的首领，是当时清朝官员中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和投降派以及顽固守旧的封建官僚



清朝水师与英舰在广州海面交战

不同，林则徐主张严禁鸦片而不反对正当的中外贸易，要求抵抗侵略而不排斥学习外国“船坚炮利”的长处，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为了“探访夷情，知其虚实”，以“定控制之方”，林则徐注意“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还主持编译了一部《四洲志》，叙述各国历史、疆域、政治等情况。和林则徐私交甚密的魏源，就以《四洲志》为基础，增补中外资料，扩编成《海国图志》。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是与龚自珍齐名的进步思想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愤怒揭露鸦片战争的侵略本质，抨击清政府的投降卖国，谴责头脑锢蔽的儒生们如井底之蛙，“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闭塞到了极点。魏源从反侵略的爱国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主张学习西方制造战舰、火器以及养兵、练兵之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达到“以甲兵止甲兵”的目的。

林则徐受罚，抵抗派受挫，禁烟运动夭折；琦善得宠，投降派得势，侵略者步步进逼。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到达广州后，为了求得英国侵略者的“欢心”，竟在军事上撤防，裁减水师三分之二，遣散水勇，拆去木排、铁链，听任英军探测内河水道。琦善把坚持抗战的广东人民看作“汉奸”，而将真正的汉奸——原英国大烟贩子的买办、“通晓夷语”的鲍鹏，当作心腹要员。

十二月初，琦善和义律开始谈判（这时懿律已生病回国）。义律蛮横地提出一系列侵略要求，琦善几乎全部接受，只对割让香港，表示不敢作主，但也答应向道光皇帝代为“请求”。

可是，义律却没有这份耐心。琦善越怕打仗，义律越要“战而后商”。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义律派兵突然袭击珠江

口大角、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等力战牺牲。侵略军直扑虎门，关天培发炮抵抗，并派专人向广州城求援。卖国贼琦善对抗战置之不理，偷偷派鲍鹏到穿鼻洋向义律求降。一月二十五日，琦善和义律秘密签订了《穿鼻草约》，私许割让香港、开放广州、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指银元，下同）等条款。

道光帝原以为惩办林、邓，开放烟禁，英国就会交还定海，“终兵息战”。然而事态的发展，远出他意料之外。一月二十七日，当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道光帝大为恼火，决定对英宣战，并派皇侄奕（yì 亦）山为靖（jìng 竟）逆将军，调集各省绿营兵一万七千名，前往广州作战。二月，琦善私立《穿鼻草约》的罪行被揭发后，道光感到既失地又赔款，严重损伤了“天朝皇威”，气得大骂琦善“辜恩误国”，下令立即逮捕进京，没收全部家产；同时，严令奕山迅速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

道光帝对英宣战，目的仅在“示以声威”。但是，义律一知情况有变，立即先下手为强，二月二十五日，率领军舰十八艘进攻虎门炮台。关天培身先士卒，率兵死战，多次击退英军。二十六日下午三点多钟，侵略军又发动猛烈进攻，集中数百门大炮，疯狂轰击炮台。弹片四溅，砂石乱飞，关天培负伤多处，仍然镇定指挥，还亲自燃放大炮杀伤敌人。士兵们奋不顾身，坚守阵地，同敌人血战到底。但是，琦善却一直不发救兵。战斗坚持到当天晚上，终因寡不敌众，关天培和部下官兵四百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英军占领虎门炮台后，乘胜闯入内河，广州的门户完全敞开了。

腐朽不堪的奕山，四月十四日才到达广州。奕山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即使对从各省调来的绿营兵，奕山也不放心，

将他们“互调分配，各离营伍”，以致“兵不见将，将不见兵”，平时全无纪律，打起仗来乱成一团。

日夜饮酒作乐的奕山，为了开销军费和报功领赏，居然急于一战，企图侥幸取胜。五月二十一日，奕山及其亲信草率地决定，分兵三路冒险夜袭英军。开头取得小胜，接着就被侵略军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逃回城内。城郊重要据点泥城、四方炮台，不战而陷。英国侵略军居高临下，由四方炮台炮轰城中，昼夜不息。二十六日，更集中炮火，猛轰城东南魁(kuí 葵)星阁奕山一伙的住所。奕山等人吓得丧魂落魄，急忙在城头竖起白旗，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向义律乞降。这位知府大老爷平时对人民作威作福，这时却卑躬屈膝，向侵略者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一八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奕山接受义律提出的五项条件，签订了可耻的《广州和约》。和约规定：一周内交付英军赎城费六百万元、商馆损失三十万元，奕山率清军退驻广州城外六十里的地方；赎金交清后，英军退出虎门。

这一仗，前后只打了七天。奕山领兵一万七千名，对付不了二千四百名英军的入侵，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和投降派的卑怯。

“城上旌(jīng 晶)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声。”奕山莽莽撞撞地出战，低声下气地求降，儿戏式的广州战役告一段落。投降派跪倒在侵略者脚下，但人民举起了愤怒的铁拳！

三 三元里的怒吼

在凶恶的外国侵略者面前，是战还是降？中国人民一开

始就和清朝统治者走着相反的道路。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①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光辉事迹，千古不朽，气势磅礴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就是第一场战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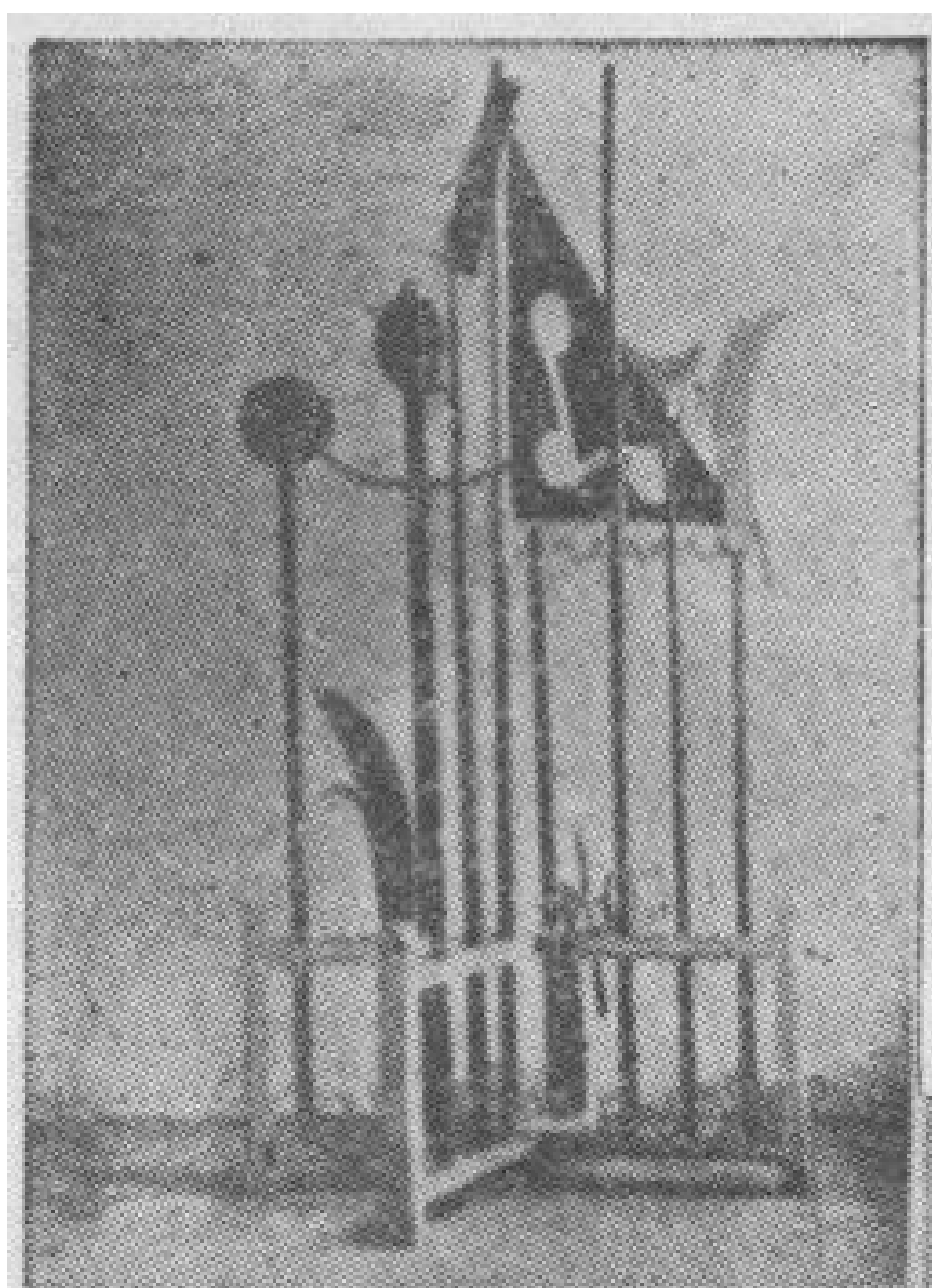
三元里位于广州城北五里，贴近泥城、四方炮台，是一个有几百户居民的村落。五月二十七日《广州和约》签订后，义律、卧乌古纵容英国侵略军，带着武器在这一带横冲直撞。他们到处奸淫虏掠，杀人放火，又抢粮食，又宰猪牛，甚至盗掘坟墓，从棺材里抢陪葬品。城北一带乡村，顿时鬼蜮(yù 玉)横行。

侵略者的暴行，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五月二十九日，当一队英国侵略军来三元里抢劫并污辱妇女时，人民奋不顾身地围上去，当场打死八、九个敌人。侵略者见势不妙，狼狈而逃。

三元里人民料定侵略者一定要来报复，决心团结起来，迎接更大的战斗。全村男女立即在村北三元古庙前集会，推举菜农韦绍光为领袖，并以黑底白边的三星旗作令旗，庄严起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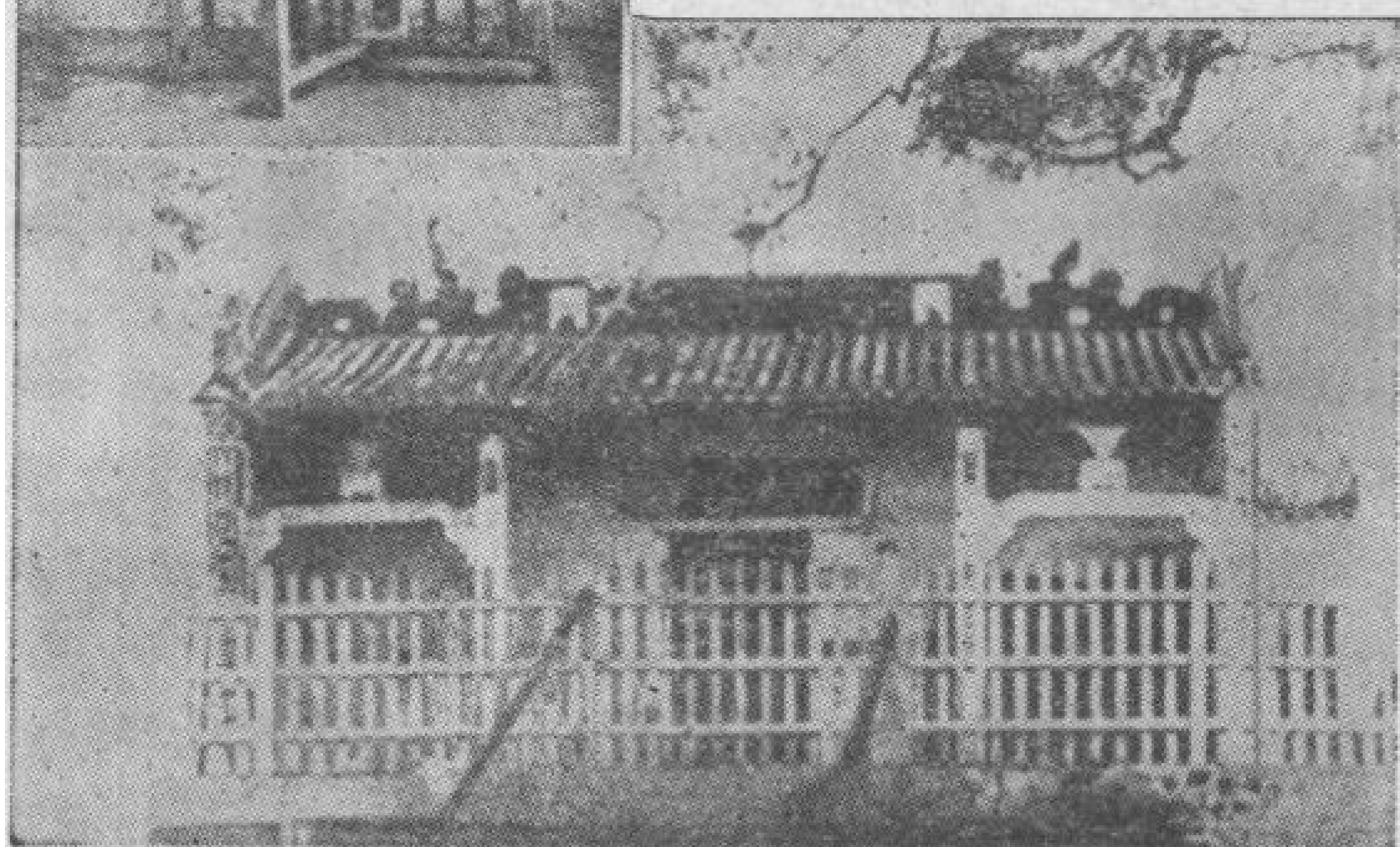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整个三元里沸腾起来了，人人摩拳擦掌，要和敌人血战一场。三元里人民清楚地知道，要打败英国侵略军，粉碎敌人的骚扰，决不是一、两个村子的力量所能做到。因此，韦绍光派代表到附近各村联络，广州城北各乡群众迅速组成浩浩荡荡的抗英武装力量。这支队伍中有贫苦农民，有手工业工人，有渔民，也有爱国士绅，而以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页。



农民人数最多，成了斗争的主力军。

当天下午，一百零三乡代表在城北十二里的牛栏冈集会，商讨战斗部署。一致决定：一，以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作战单位，备大旗一面，举领队一



三星旗和三元古庙

人，指挥作战；二，鸣锣为号，一乡鸣锣，众乡皆出；三，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子，一律出动；四，诱敌深入，以丘陵起伏、宜于埋伏的牛栏冈，作为聚歼敌人的地点。

一八四一年五月三十日清晨，三元里一带人民集合了成千人的队伍，向英国侵略军营地——四方炮台挺进。正在早餐的英军，突然听到杀声震天，伸头一望，只见手里拿着大刀、

长矛、盾牌、火绳枪的武装群众，打着鲜艳的旗帜，漫山遍野而来。英军司令卧乌古，赶快下令吹号集合，出动近二千名侵略军，带着当时最新式的武器，气势汹汹地从高地直扑群众。

武装群众并不和英国侵略军正面对仗，而是按原定计划迅速向三元里以北撤退，诱敌深入。骄狂不可一世的英国侵略者，以为中国人民软弱可欺，穷追不舍。路越追越远，稻田间的路径又那么窄，侵略军只能把队伍拉成单行，笨重的武器也不能随军前进。这样，侵略者追得越起劲，形势对他们就越不利。一直追到牛栏冈，武装群众在这里整队以待。狡猾的卧乌古知道中计，立即下令后撤，可是，已经晚了！

一声锣响，杀喊声顿时震荡山谷。埋伏在牛栏冈的七、八千名武装群众一跃而起，以排山倒海之势，猛冲英军。侵略者慌了，急忙开枪射击，但挡不住武装群众的洪流。大刀，向侵略者头上砍去！长矛，朝侵略者身上猛戳！卧乌古指挥部下分两路突围，向四方炮台撤退。武装群众当即从两翼包围英军后队，并趁他们渡河和单列行进的有利时机，冲上前去肉搏。

下午一时，电光闪闪，雷声隆隆，大雨倾盆而下。暴风雨更增添战斗豪情，三元里附近一百零三乡人民，披蓑(suō 缩)衣，戴斗笠，精神抖擞，愈战愈勇。侵略者却因火药受潮、枪炮失灵而士气低落、胆战心惊。田间小路被暴雨淹没，稻田成了一片汪洋。穿着长统皮靴的侵略军，在泥地上高一脚低一脚，又滑又重，寸步难行。三元里人民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用长矛猛烈刺杀。侵略者妄图以刺刀抵挡，然而他们不能不哀叹：“刺刀之于中国人的长矛，只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防御物罢了。”

这时，原来规定要撤退的妇女老弱，都挥着锄头、铁耙前

来助战，连十六岁以下的青少年，也来喊杀助威。没有上阵的妇女，自动把饭做好，送上前方。“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无穷威力！狼狽不堪的侵略军，有的在锄头、长矛下丧了命，有的跌倒在水田里，举手投降。

下午四点钟，卧乌古带着部下慌忙逃回四方炮台。这时，他才发现三十七团的第三连“失踪”了。原来，第三连在撤退中被三元里人民截住。他们为了逃命，一个挨一个结成方阵，一步步向后撤退，以为这样就可以逃脱被歼灭的命运。英勇机智的中国人民，巧妙地用带钩的长矛，从方阵里将敌人钩出来，然后锄头、铁耙齐下，狠狠打击侵略者。

三元里一仗，战果辉煌，打死英国侵略军二百名以上，打伤更多，还活捉了十几名俘虏，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胜利捷报传四方，人民斗志更昂扬。第二天上午十点，广州城郊各村群众数万人，包围四方炮台，旗帜招展，刀矛如林。龟缩在炮台里的侵略军，再也不敢出来耀武扬威。

正在两军对峙的紧张时刻，八千多名全副武装的清军，偃(yǎn 掩)旗息鼓，从城里撤向《广州和约》规定的金山地区。他们经过四方炮台，对这里发生的火热斗争却视而不见。抵抗路线和投降路线，如此泾渭分明！这一切，老奸巨猾的侵略者都看在眼里，卧乌古立即派汉奸混出重围，带信给广州知府余保纯说：清政府必须负责立即解散群众队伍，否则英军将解除和约，“向前攻城，烧掉附近每个村镇”。实际上，卧乌古当时哪里谈得上什么“向前攻城”，无非是要吓人战术罢了。

然而，奕山之类的软骨虫，却被这封信吓得魂不附体，马上派余保纯出城为英军解围。

余保纯打躬作揖，小心翼翼地央求群众撤围。可是群众恨透了他，当面骂他是通夷卖国的无耻汉奸。余保纯无所施其伎，就转过头来找地主、士绅，要他们设法解散群众，并且威胁说：事情是你们和乡民一起搞的，如果乡民不退，将来出了事，一切由你们负责，六百万元赎城费也要你们赔。士绅们害怕了，他们参与抗英斗争，本来是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财产。现在经过余保纯一吓一压，有的丢下群众，滑脚溜走，有的掉转身子，讨好“父母官”，帮助“劝散”群众。斗争被卖国的清朝官员和动摇的地主士绅破坏了。

四方炮台解围后，英国侵略军如惊弓之鸟，不敢再多作停留。六月一日，悄悄离开高地，撤出了虎门。

群众队伍是暂时分散了，但抗英烽火并没有熄灭。六月七日，当义律出告示为侵略军的惨败辩解，恫吓中国人民“以后不许再犯”时，广东人民立即在商馆门前贴出布告加以痛斥，斩钉截铁地警告侵略者说：你们如敢再来，中国人民一定要“自己出力，杀尽尔等”！广东人民还向英国侵略者约期再战，但色厉内荏的义律、卧乌古，已经不敢接受这个挑战了。

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三元里战斗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个光辉范例，它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人民赢得了战斗，战斗教育了人民：“官兵不可恃”，“鬼子不足怕”，只要敢于斗争，就一定能打败外国侵略者！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四 炮口下的条约

人民以鲜血、头颅与侵略者抗争，夺取胜利；清朝统治者却以谎言编造“胜利”。

广州战役结束后，奕山在给道光的奏报中，将大败而逃改作“大挫其锋”，将丧胆求降改作“义律乞抚”，将付出赔款改作“代还商欠”。于是，道光帝批准投降就变成了“准令通商”，并下令各省撤防。一群骗子、懦夫、卖国贼，居然在纸面上大获“胜利”。

清朝统治者陶醉于虚幻的胜利，欲壑(hè 贺)无底的英国侵略者，却不满足于《穿鼻草约》上已经抢到手的果实。英国政府认为义律在战胜的情况下，勒索到的东西太少，召回义律，改派在印度干了四十年侵略活动的殖民老手璞(pú 蒲)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决定扩大战争，用大炮从清政府手里夺取更大的权益。

一八四一年八月，璞鼎查到达中国，率领海军司令巴尔克少将、陆军司令卧乌古少将，以及军舰二十六艘、陆军三千五百人北犯。

八月二十五日，英军突袭厦门，清军激烈抵抗。次日，鼓浪屿、厦门相继失陷。

九月二十五日，英军再攻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率五千守军坚决抵抗，与英国侵略者血战六昼夜，壮烈牺牲。史称“定海三总兵”。十月一日，定海再陷。接着，英军进攻镇海。浙江提督余步云贪生怕死，不战而逃，两江总督裕谦力战不支，投河而死。十月十日，镇海失陷。十三日，浙江

省最富庶的商业中心——宁波，也被侵占。英国侵略者仅在宁波府库中，就抢走价值十二万元的现金和纹银，可供侵略军两年之用的粮食，以及大量丝绸和瓷器。此外，还向市民勒索了一百二十万元“犒(kào靠)军费”。

在侵犯闽、浙沿海的同时，英国侵略军还两次分兵窜犯台湾。台湾总兵达洪阿和道员姚莹(yíng 营)，率军民奋勇抗战，先后打死打伤英国侵略军约二百名，挫败了他们妄图霸占台湾的野心。

浙东连失定海、镇海、宁波三城，清朝统治者指望的“太平”又成泡影。十月十八日，道光帝任命另一个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文蔚、特依顺为参赞大臣，牛鉴为两江总督，调集内地数省军队，前往浙江应战。

奕经跟奕山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货色。这个纨(wán 完)袴子弟，从北京去浙江，一路上游山玩水，沉迷于酒色歌舞之中。十二月初到达苏州后，借口筹备军务，成天鬼混，民族安危早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次年一月二十五日，奕经忽然作了一个梦，梦见“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文蔚说，他也作了一个同样的梦。昏庸的将军和参赞大臣，迷信这个好“兆头”，决定马上进兵。

一八四二年二月，奕经、文蔚进驻绍兴。三月八日，分兵三路，企图同时收复宁波、镇海、定海。奕经以为三城都已布置内应，收复不成问题，严令各军不许携带火器，只准用刀矛短兵。英军事先听到风声，因此早有布置。清军进入宁波城后，遭到英军猛烈夹击，死伤过半，仓皇退出。其他两路也因指挥错乱，同时溃败。英军乘机攻陷慈溪。奕经等逃往杭州，不敢再战。奕经踏着奕山的失败主义老路，经过轻举妄动、一

触即溃、丧胆求降的三部曲，结束了浙江战事。广州之战和浙江之战，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对抗英国侵略用兵最多的两次战役。道光皇帝固然想保住“大清”一统，维护“天朝皇威”，并为此而对英宣战，派奕山、奕经去“靖逆”、“扬威”。但在战争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不仅不敢依靠和组织人民的力量，反而“防民甚于防寇”，敌视、限制和破坏人民的抗英斗争。清朝封建统治者和人民大众的这种尖锐对立，决定了它在对外战争中的必然失败。

奕经在浙江惨败之后，道光帝一意求降，下令沿海各省“不许进兵”，不许捉拿侵略者，谁杀了一个侵略者，不但本人要砍头，上面官员也要治罪；同时，派遣满洲贵族耆（qí 骑）英和伊里布，赶赴浙江求降。

清政府越是叩头求降，侵略者越是气焰嚣张。为了进行更大的军事讹诈，英军准备攻南京。他们知道，长江下游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南京控制着长江、运河两大水道，江南的大量漕米（税粮）和税银，都要汇集南京，由镇江经运河水运北京。如果占领南京，就等于掐住了清政府的咽喉。因此，璞鼎查拒绝议和，决定入侵长江，切断运河，直扑南京，胁迫清政府接受全部侵略要求。

五月十七日，英国侵略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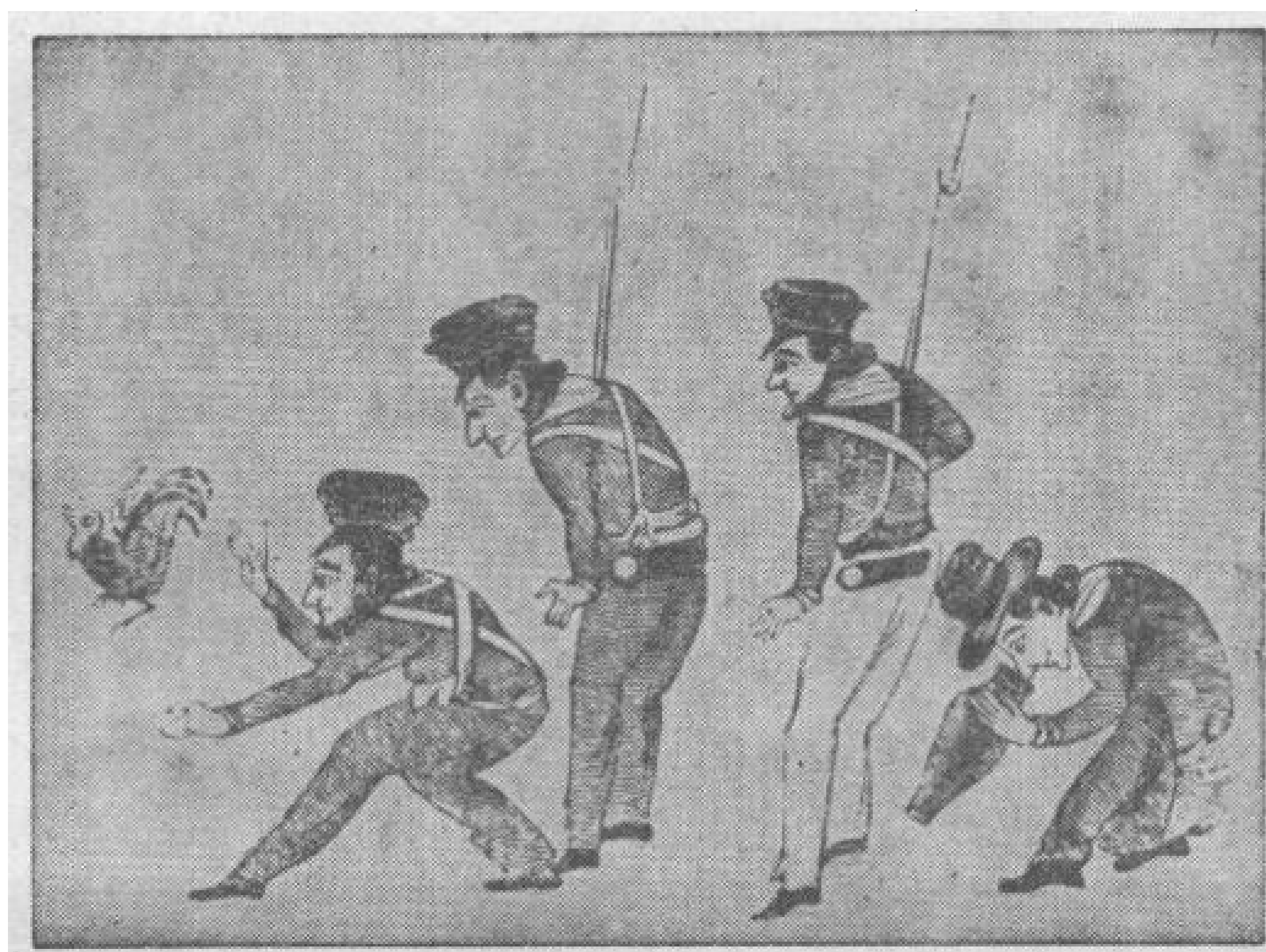
六月中，英国从印度派来增援的大小船只百余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开到中国。璞鼎查有了这支援军，立即进犯长江。

吴淞位于长江口，面临东海，是长江的门户。吴淞口筑有东西两炮台，年近七十的江南提督陈化成，“亲驻炮台，昼夜防守”，激励将士痛击侵略者。六月十六日，英国侵略军进攻吴

淞。陈化成请两江总督牛鉴率军三千余人驻宝山作后援，自己则坚守西炮台，手执令旗，冒着敌人的密集炮火，指挥士兵猛烈还击。炮战连续两个半小时，英军旗舰“皋华丽”号、以及“布朗底”号、“西索斯底斯”号和其他舰船，多次被击中。英军死伤颇重，不敢正面登陆。

牛鉴听说陈化成击伤英舰多艘，从宝山带兵前来增援，想以此揽功。这个腐朽官僚，竟在敌人炮口下排列总督仪仗，招摇过市。结果，引来了敌舰的密集炮火。这时，牛鉴吓得面无人色，赶紧下轿，混在士兵中逃命，造成全军大乱。侵略军乘势水陆夹攻西炮台，陈化成腹背受敌，最后七处负伤，流血而死。守台官兵也都誓死不退，壮烈牺牲。宝山、上海先后失陷。

英国侵略军占领上海六天，除了向上海人民勒索赎城费



英国侵略军掠夺中国人民财物

五十万银元外，又在城内和四郊大肆抢劫。已经是初夏季节了，他们竟穿上从典当仓库里抢来的“镶着高贵毛皮的绸子和缎子的外衣，手里拿着绣花的扇子”，酗酒作乐，丑态百出。

七月十五日，英军舰队侵入镇江江面。二十一日，全力攻城。侵略军用炸药轰开西门，以云梯攀登城墙。驻防旗兵步步为营，节节抵抗。参与攻城的一个英国侵略军军官记载说：“在这里，满兵作了一次最顽强的抵抗，他们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相接而攻陷的。”革命导师恩格斯曾热烈赞扬镇江守军的英勇战斗，他说：“驻防旗兵虽然不通兵法，可是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驻防旗兵总共只有1500人，但却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军损失了185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①

中国人民是不畏强暴的，福建、浙江以及长江下游各地人民，和广东人民一样，对英国侵略军进行了大无畏的战斗。哪里有英国侵略军的足迹，哪里就有炽烈的抗英烽火。除了镇海、宁波地区人民组织的“黑水党”，和各地人民自发的抗英斗争外，从一八四二年六月至八月，仅长江下游沿岸的人民抗英武装力量，就发展到十几万人以上。靖江人民以锄头、石块打退了侵略军的骚扰；瓜州、仪征一带的盐民也组织起来，袭击侵略者；镇江失陷前后，沿江人民更不断在夜间顺风施放火筏、火船，焚烧英船、袭击敌人，使侵略军不得安宁，哀叹夜袭是他们“最伤脑筋的事情”。

^① 《英人对华的新远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一八九—一九〇页。

但是，清政府执行的是一条对内敌视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卖国路线，它不仅不敢组织和依靠人民的力量，反而限制和破坏人民的抗英斗争，虽然被迫对英作战，却没有抵抗到底的决心，因此，尽管有人民群众、下层士兵以及少数将领的英勇抵抗，也无法挽救战争失败的局面。特别是，当清政府感到“内乱”比外患更威胁自己的统治时，它宁可选择向外国侵略者投降的可耻道路。

一八四二年八月上旬，英军舰船七、八十艘侵入南京江面。投降派首领穆彰阿公开叫嚷：仗打了三年，花了那么多钱，用了那么多兵，什么成效都没有，还是停战议和为好。侵略军耀武扬威地摆开阵势，架列大炮，宣称要开炮攻城。伊里布急忙派人上英国军舰，捧出道光帝“永定和好”的上谕，告诉璞鼎查说：钦差大臣耆英即日可到，恳请英军暂勿开炮。

八月十一日，耆英赶到南京。璞鼎查为了进一步吓唬和控制耆英等人，使他们在谈判中服服贴贴，不敢讨价还价，特意邀请他们上英国侵略军的旗舰“参观访问”。这一着果然有效，耆英心怯胆裂地奏报道光帝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

虚骄的道光帝，至此完全被吓倒，可耻地接受“城下之盟”，发出了“所求无不准允”的“圣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耆英、伊里布在下关江面的英舰“皋华丽”号上，按照英国侵略者提出的条件，一字不改地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次年，耆英又在广东与璞鼎查先后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

中、英《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个条约“是在炮口的威逼下订立的”。^①

通过《南京条约》及其补充条约，英国侵略者攫取了如下侵略权益：

一、强占香港。英国早就想在中国沿海占领岛屿一处，《穿鼻草约》订立不久，即强占香港。《南京条约》签订后，英国在香港建立殖民统治，此后一百多年，香港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基地。

二、五口通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从此，中国东南沿海各省门户大开，资本主义商品汹涌而来，通商口岸成了外国资本主义插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吸血管。《虎门条约》还准许英国人在五口租地建屋，永久居住。以后，外国侵略者故意曲解这一点，利用各种机会，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租界，并以租界为据点，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对中国的控制。

三、勒索巨款。中国赔偿英国军费、鸦片费、商欠共二千一百万银元（广州赎城费六百万元不包括在内）。这笔巨款，相当于那时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掠夺。

四、协定关税。中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征收英国商品的进出口税率，必须与英国侵略者共同议定。《五口通商章程》更规定“值百抽五”的低税率。这就大大便利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五、领事裁判权。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犯了罪，中国官

^① 《英中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二卷，第六〇〇页。

员无权依法判处,而要由英国领事根据英国法律进行审判。中国的司法主权被严重破坏,从此,外国侵略者可以在中国无恶不作,而不用担心受中国法律的惩办。

六、片面的最惠国待遇。《虎门条约》规定:中国将来如“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就是说,以后不管中国给予其他国家任何特权,英国都可以同样享受。后来,中美、中法条约也都有同样规定。这样,各国侵略者利害相关,无形中结成了共同侵略中国的伙伴关系。

鸦片问题虽然在条约上只字未提,但实际上达成了允许免税大量输入的默契。

在鸦片战争中,美国侵略者一直是英国侵略者的帮凶。《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侵略者接踵(zhōng 肿)而来。美国专使顾盛以战争相恫吓,声称“本国政府或有使中国再尝战祸之必要”,胁迫清政府于一八四四年七月签订中、美《望厦条约》。美国在这个条约中,不仅获得了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攫取的一切特权,并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进一步剥夺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规定美国兵船可以自由闯入中国领海,到各港口“巡查贸易”,以及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条约的最末一款,还规定十二年后修约,为日后对中国的进一步敲诈,预埋伏笔。《望厦条约》的这些条款,是对《南京条约》的扩展,因而也就更加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独立。

此后,法国侵略者于一八四四年十月,强迫清政府订立中、法《黄埔条约》,除取得中英、中美各约的全部特权外,又特别规定了天主教的传教特权,不准中国人“触犯毁坏”教堂,违则“严拘重惩”。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纷至沓来,要求“共同分享”侵略权益。清政府抱定“一视同仁”的卖国政策,

统统给予满足。

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使中国社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上独立的封建国家；战后，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遭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战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战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日益解体，逐渐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毛主席明确指出：“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①“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②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此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反帝反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了。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

② 同上书，第五九三页。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

一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不仅在中国肆无忌惮地贩卖鸦片，走私，洗劫商船，掠卖华工，进行赤裸裸的暴力掠夺，而且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穷凶极恶地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使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固有的阶级矛盾更加激化。马克思指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生产的破坏，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就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捐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①

战后十年，人民的税捐负担，比过去增加了一倍以上，“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人民缴纳不起，官府死命催逼，“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藉”。一份起义告示尖锐地指出：“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在“无道昏君”统治下，“富贵者纵恶不究，贫贱者有冤莫伸”。“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广大农民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地主的统治，再也不能照

^①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页。

旧生活下去了！

身受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中国人民，掀起了猛烈的反抗斗争。以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为代表的抗英怒潮，蓬勃高涨；各地区各民族人民的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四九年，有记载的就有一百一十起。农民起义的烽火遍及全国，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斗争尤为激烈。

抗英怒潮和反清起义互相激荡，推动着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风暴，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席卷中国大地的。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①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就是其中最早的一个。

洪秀全，一八一四年一月一日诞生于广东花县官禄埗村的一个中农家庭。这个村子离广州城约九十里。洪秀全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八页。

家境清寒，童年时，家里节衣缩食，让他入学读书。十六岁因贫失学，在家帮父兄耕田看牛。十八岁起，受聘为本村塾师。从小在农村生活和劳动，长期的乡村教师工作，使洪秀全同贫苦农民呼吸相通，深切地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愿望，加强了他跟贫苦农民的血肉联系。社会的黑暗，人民的苦难，个人的愤懑(mèn 闷)，在洪秀全心里激起反抗的波澜。

青少年时期，洪秀全受封建教育的影响，曾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于科举功名。但是，四次到广州去考秀才，都名落孙山。一八三六年，洪秀全第二次去广州应考时，见到一个外国人和一个中国人在街头传教，他得到一部梁发编的基督教传道书——《劝世良言》。洪秀全将这部书带回家，翻阅了一下，就丢开了。第二年再试落选后，洪秀全在一场延续四十多天的热病中，梦见各种幻象。他不时指斥“妖魔作怪”，大呼“斩妖，斩妖”！还吟作了“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的豪放诗句。这首诗，字句铿锵(kēng qiāng 坑枪)，气势磅礴，展示了一位未来的农民领袖，立志斩妖除魔、解救人民的革命风貌。

此后六年，洪秀全仍在乡下教书。一八四三年，他最后一次参加科举考试。这时，鸦片战争失败不久，清政府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腐败暴露无遗。在和族弟洪仁玕(gān 杆)讨论时势的时候，洪秀全拍着桌子，慷慨激昂地说：清朝统治者“每年花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华民之脂膏数百万回满洲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守法？”清朝统治者的溃烂和风起云涌的反清起义，外国侵略者的残暴和广东人民的抗英怒潮，促使这位农民出身的知识分子，终于死了科举功名的心，走上推翻清朝统

治的革命道路。

怀着要革命、要造反的意愿，洪秀全研究了那部搁置已久的《劝世良言》，感到有些新颖，从中得到启发。于是，附会书中词句和梦中幻境，自称是天父上帝的第二个儿子，以宗教为形式，以革命为内容，在一八四三年六月创立了拜上帝会。最早受洗入教的，是同乡同学又同为塾师的冯云山，以及族弟洪仁玕。洪秀全定制了一柄“斩妖剑”，豪情满怀地写道：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guǐ 轨)落天罗。

从这首《吟剑诗》中，更可以看出洪秀全的政治目标，是要用三尺宝剑去开辟江山，消灭“妖邪”“奸宄”，即一切恶势力，以建立一个“四海为家”、友好往来的“太平一统”世界。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后，第一个实际行动就是和冯云山在一起，以大无畏的精神，砸碎村塾中供奉的孔子牌位，视孔丘为邪神，向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圣先师”挑战。此后，为了启发农民群众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洪秀全还精心构拟了一个神话故事，借“皇上帝”的权威，严斥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把人都“教坏了”。孔丘想和“妖魔头”一起私逃下天，被“皇上帝”命令天使抓了回来，痛加鞭挞，打得他跪地“再三讨饶”、“哀求不已”。这个神话，典型地表现了革命农民对孔丘的无情批判。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从打破精神枷锁起步，引导农民群众踏上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征途。

洪秀全因为砸孔叛经的革命行动，遭到封建卫道士们的严重迫害。村塾停办，洪秀全和冯云山丢了饭碗。但他们全不在意，决心走到更贫苦的广大农民中去。一八四四年四月，

洪秀全、冯云山以传教形式，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宣传革命，组织力量。一路上，他们借贩卖笔墨贴补费用，克服重重困难。后来进入广西桂平、贵县一带，在贵县赐谷村附近，努力工作了几个月，吸收了拜上帝会信徒一百多人，并率领会众击毁了当地的“六乌妖神”。这是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播下的第一批革命种子。同年初冬，洪秀全返回广东，冯云山则深入桂平县紫荆山，从事革命活动。

这半年多的革命实践，使洪秀全更多地接触了社会生活，更深地感受到人民的苦难，更抑制不住对现实世界的满腔愤恨。洪秀全回家以后，一面教书，一面集中力量进行拜上帝会的理论创造。一八四五到一八四六年间，洪秀全先后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等文献，从农民革命的平等要求出发，吸取西方早期基督教义中的某些平等、互助思想，对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说教，进行严厉批判，创造和阐发了拜上帝教的根本教义，为太平天国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

《原道救世歌》贯串了政治上的平等思想，鲜明地指出：“天父上帝人人共，天下一家自古传”，“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皇帝可以自称“天子”，封建卫道者更是鼓吹“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贵贱有别、等级有差。洪秀全公然否定这套鬼话，这就猛烈地反对了封建制度的等级观念和君主专制思想。

《原道醒世训》灌输经济上的平等思想，热情地宣传：“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洪秀全谴责了由于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那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的黑暗现实，表

达了广大人民要求摆脱封建压迫，重新分配财产，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的迫切愿望。

《原道觉世训》向人民指出战斗目标。洪秀全无所畏惧地将神仙菩萨、孔孟先儒以及清朝皇帝痛斥为“阎罗妖”，把人间一切官吏、地主和民贼，都看作“阎罗妖之妖徒鬼卒”，号召天下兄弟姊妹共同起来将它们“击灭”。被洪秀全抽象为宗教语言的“皇上帝”和“阎罗妖”的对立斗争，实际上恰恰是人世间农民和地主之间阶级斗争的反映。

列宁说：“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农奴制的不平等现象的斗争”。^①伟大的斗争造就伟大的人物，洪秀全正是在当时的斗争实践中，以通俗的语言或顺口的韵文，将农民阶级朴素的平等思想集中起来，装在一种外来的宗教形式里，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思想武器。

“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②利用宗教作为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工具，反抗封建主义统治，这固然反映了旧式农民战争的局限性，但也是世界各民族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共有的现象。恩格斯曾经指出：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和城市平民的最初起义，“总是穿着宗教的外衣，……但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③揭开神秘的宗教外衣，可以清楚地看到，拜上帝会实质上是洪秀

① 《社会民主党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列宁全集》第一三卷，第二一七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页。

③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五二六页。

全发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宣传工具和组织形式。

《劝世良言》劝人崇拜的是“独一真神”和“造物主”上帝，要人相信的是“地上实无福，天上才有福”的谎言，还用“爱你的仇人”，来取消人们对黑暗势力的抗争。但是，洪秀全从农民革命的要求出发，继承和发展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等贵贱，均贫富”的思想传统，指责基督教那些“过于忍耐或谦卑”的说教，对外来的上帝作了一番改造。他认为：既然“皇上帝”是“独一真神”，那么其他被人们崇拜的偶像——从天上的神仙、菩萨，到人间的皇帝，就都是妖魔，都应该打倒；既然一切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那么苦难的农民，就有权起来为自己被剥夺的平等权利而斗争，在凡间“开创天国”。拜上帝会所揭示的斗争哲学，同基督教逆来顺受的反动说教，完全背道而驰。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曾经评论太平天国的宗教，说洪秀全“是把他们可笑的宗教抱负，服务于他们的政治目的的”。这一点，他倒是说对了！

一八四七年八月，洪秀全去广西桂平县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紫荆山纵横数十里，山峦起伏，南麓(山麓)金田村，是入山要道。这是一个贫瘠的山区，人民除种地外，多以砍柴烧炭为业，受苦很深。冯云山在这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为了宣传革命和组织群众，他在山区各处流动，挑泥，捡粪，做短工，什么都干，后来在一家姓曾的人家当塾师。三年的战斗生活，使冯云山渐渐取得了贫苦农民的信任，他经常在夜间翻山越岭，到各村落宣讲拜上帝会的道理。由于冯云山坚毅而热情的工作，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两、三千会众的革命组织。

广西被地主阶级诬蔑为“多盗之都”。洪秀全到达紫荆山，

正是广西农民起义如火如荼(tú 途)的时候。看到冯云山打下的这个革命基础，洪秀全十分高兴。为了进一步发展革命事业，洪秀全和冯云山在紫荆山设立拜上帝会机关，共同制订拜上帝会的宗教仪式和“十款天条”(如崇拜皇上帝，不好杀人害人，不好奸邪淫乱，不好偷窃劫抢，不好讲谎话等)。“天条”平时作为信徒的生活戒律，战时就发展成为严格的军事纪律。

随着拜上帝会力量的日益扩大，洪秀全和冯云山秘密蓄发，聚集会众准备起义。他们带领群众，破坏偶像、捣毁神庙，激励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在这类斗争中，最著名的一次是捣毁甘王庙。相传甘王是一个凶神，象州人都很怕他。十月二十八日，洪秀全和冯云山率领会众前往象州甘王庙，宣布了甘王的十大罪状，当场将“甘妖”砸得稀烂。捣毁甘王庙的斗争，使洪秀全声名大振，拜上帝会组织迅速发展。

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愈来愈尖锐，地主、士绅认为拜上帝会“聚众谋反”，凭借团练进行镇压，并于一八四八年初将冯云山抓进桂平县监狱。洪秀全得知情况后，赴广州设法营救。

拜上帝会受到突然袭击，一时主持无人，会众发生动摇，出现了组织涣散的现象。在这紧要关头，杨秀清和萧朝贵用当地流行的神灵附体的方式，假托“天父”、“天兄”(耶稣)下凡，以天父、天兄代言人的身分发号施令，巩固了组织，安定了人心。经过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努力，拜上帝会组织继续发展。冯云山在狱中经过坚贞不屈的斗争，也于十月被释放出狱。一八四九年六月，洪秀全和冯云山一道，又回到了革命根据地紫荆山。

在斗争中，拜上帝会逐步形成自己的领导核心，除洪秀全和冯云山之外，还有杨秀清(广西桂平人，以烧炭种山为

生)、萧朝贵(广西武宣县贫苦农民)、韦昌辉(桂平县金田村人,地主兼典当商,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石达开(广西贵县客家人,地主家庭出身,因受土著地主排挤,被迫加入拜上帝会)。

拜上帝会迅速发展起来,到一八五〇年,以紫荆山为中心,在东至平南、藤县,南至博白、陆川及广东信宜,西至贵县,北至武宣、象州的村落和山岭里,到处都有拜上帝会的革命势力。贫苦农民是革命的主干力量,烧炭工、矿工、运输工、手工业者以及会党群众,也都积极投入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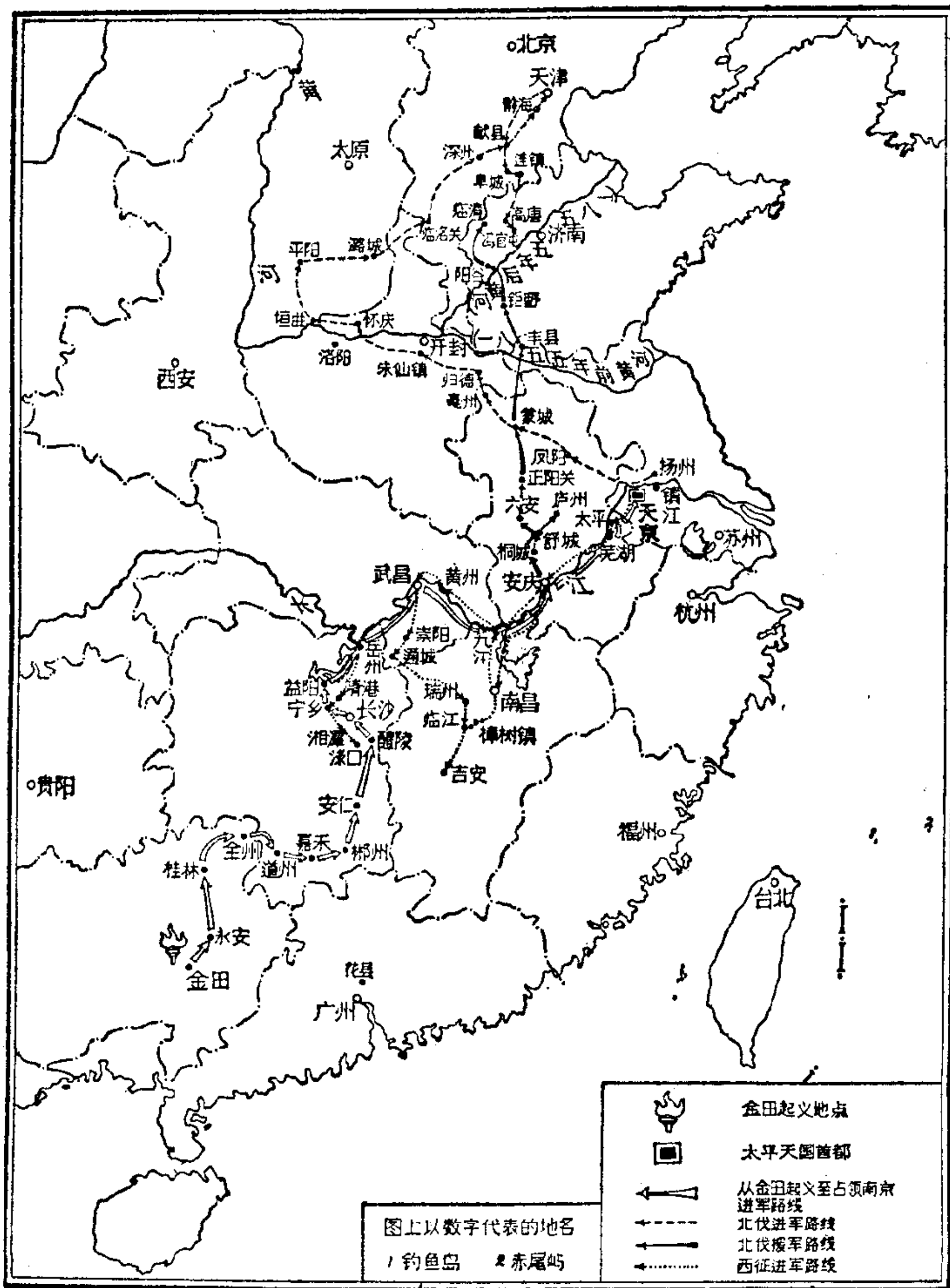
斗争愈演愈烈,“联合一体,共御公敌”,成为拜上帝会会众的共同愿望。一八五〇年,广西又遇到大饥荒,饥民纷起暴动,局势更加动荡。武装起义的时机成熟了。七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要拜上帝会成员在十一月四日前到金田村集中。各地会众一万余人,不分男女老幼,满怀战斗激情,齐赴金田村“团营”。在领导核心的统一指挥下,起义群众一面将变卖家产所得之现金,全部交给“圣库”(公库),各人开支再由“圣库”平均供给,过着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平均主义生活;一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编制营伍,赶造兵器,和清军对仗。经过长期酝酿准备,洪秀全在金田村举起了农民革命的火炬。

二 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

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领导太平军,决心为推翻清朝封建统治而战。太平军“同心合力”、“同打江山”,开始了

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

太平天国的旗帜，在中国南方上空升起，各地起义农民闻



太平天国前期革命形势图

风响应。天地会(反清秘密结社)首领罗大纲等,率领起义队伍,加入了太平军。

三月二十三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即位,称天王。

金田起义后的七、八个月里,太平军转战桂平、武宣、象州、平南等地,多次打破清军反革命围攻。清政府被太平天国的革命烽火吓得手忙脚乱,派去镇压的钦差大臣接连换了两个——李星沅吃了几次败仗,一筹莫展,在前线忧郁而死;大学士赛尚阿督领重兵,也对付不了机动灵活、斗志昂扬的太平军。九月,冯云山、萧朝贵在平南县官村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清军广西提督向荣所部,营盘还没扎定,就被突然出击的太平军杀得丢盔弃甲,全军崩溃。太平军乘胜追击,九月二十五日占领永安城。

永安是一座险要的山城,东、北、西三面都是崇山峻岭,涪江及其支流夹城南下。在永安,洪秀全发布了许多诏令,整顿军政组织,订立各种制度,使太平天国政权粗具规模。

太平军一开始就过着平等互助、艰苦朴素的生活,全军团结一心、士气高昂。为了严明军纪,洪秀全诏令全体将士,“各宜为公莫为私”,将攻城杀敌时的一切缴获上交“圣库”,并一再教育官兵遵守天条(特别是不好奸邪淫乱),如有违反,一经查出,立即斩首示众。还制定了赏功罚罪的具体办法,鼓励将士奋勇杀敌。严格的纪律,既加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又使军队更加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洪秀全派人下乡宣讲太平天国的政策,说明天兵入境,专为杀妖,希望百姓各安生业,愿意参加太平军的,有吃有穿。太平军在永安狠狠打击地主阶级,没收浮财,勒令捐献,如有抗拒,就发动群众抄家,还禁止地主收租。

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天王洪秀全分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所封各王，都受东王节制。此外，秦日纲、胡以晃都按新定官制任为丞相，罗大纲任为总制。这样，就逐步组成了革命的领导机构。但是，由于杨秀清拥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地位（当他扮演“上帝附身”时，连洪秀全也要跪地听命），以及掌握军政实权，造成领导体制的二元化，埋下了日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的暗礁。

在太平军驻守永安的半年多时间里，清军不断加强围城力量，妄图以反革命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扼杀新生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于山城之中。

一八五二年四月初，城中粮尽。洪秀全下令突围，号召“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太平军突围而出，攻破古苏冲清军防地，但后队遭到袭击，清军南路统帅乌兰泰得意忘形，跟踪紧追。太平军在龙寮（liáo 辽）口大洞山埋伏重兵，从两路杀出，大败乌兰泰追兵。清军死伤累累，四个总兵一齐送命，乌兰泰也被杀得滚下崖涧，幸免于死。

接着，太平军猛攻广西反革命中心桂林。桂林城坚池固，向荣率兵死守，不敢出战。太平军驾云梯猛攻，妇女上阵助战，儿童呐喊助威。双方相持一个多月，反革命军队陆续赶来救援。五月十九日，太平军撤围北上，六月三日一举攻下广西全州，乘胜进入湖南。南王冯云山在全州身受重伤，至蓑衣渡（地名）不幸牺牲，太平天国丧失了一位埋头苦干的优秀领导者。

金田起义前后，湖南天地会的反清起义特别活跃。太平军进入湖南，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名义，发布《奉天诛妖

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xí 习)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讨清檄文。这些文告象一把把锋利的尖刀，剖露了清朝统治阶级和封建制度的黑暗残暴，痛斥清政府是“富儿当权”，“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文告宣称：太平天国起兵是“替天诛妖”，号召人民“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沿路，太平军不仅诛杀官僚、豪绅、地主，焚烧衙(yá 牙)门、粮册、地契、借券，而且烧毁道州、郴(chēn 琛)州等地的孔庙和大量《四书》《五经》，向孔孟之道进攻。人民群众欢欣鼓舞、扬眉吐气。

成千上万的湖南人民，踊跃参加太平军，“同心同力以灭清”。不过两、三个月时间，太平军连同广西的老兄弟，已扩充为十万大军。其中在道州、郴州一带加入的数千名挖煤工，另立土营，成了以后开挖地道、爆破城墙的有力队伍。

九月十一日，萧朝贵率领太平军先行部队到达长沙郊外。太平军炮击长沙，萧朝贵身先士卒，骑马挥刀，猛攻南门，不幸中炮牺牲。洪秀全闻讯大怒，率领全队围攻长沙。土营挖地道攻城，三次轰崩城墙，战斗十分激烈。围城战延续了两个月，杨秀清决定避实就虚，趁清军麇(qún 群)集长沙的机会，突然撤围，绕过长沙，轻取益阳，从容北渡洞庭湖。十二月，不战而下岳州。在益阳、岳州，太平军获得大量船只和枪炮器械，又有许多船户、纤(qiàn 欠)夫参军，立为“水营”，为进军江南增加了新的战斗力。

太平军经过短期休整，从岳州沿江而下。“千船健将，两岸雄兵”，一派胜利进军的雄伟景象。十二月下旬，太平军连克汉阳、汉口。接着，以铁索系船，横江架设浮桥，由汉阳渡长

江,进攻武昌。武昌城郊人民积极提供情报、充当向导。太平军尽知城内虚实,采用声东击西战术,掩护土营挖掘地道。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二日清晨,太平军用地雷轰塌文昌门城墙,八名太平军战士从缺口突破,大队一拥而上,占领了这座湖北省城。太平军入城后,“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还在城内宣讲革命道理。武昌人民积极参军,“红巾复首”,革命热情空前高涨。

武昌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地主阶级的总头子咸丰皇帝(一八五一——一八六一年在位),连称“愧恨”、“焦急”,面对太平天国疾风暴雨式的胜利进军,感到吃饭睡觉都不安宁,赶紧派两江总督陆建瀛(yíng 营)为钦差大臣,督兵防守江苏、安徽,妄图堵截太平军,挽回节节败退的危局。

一八五三年二月八日,洪秀全指挥五十万大军,从武汉水陆并进,直捣南京。水师船只一万艘,风帆蔽江,载运粮食军器顺流东下;陆路大军,旌旗招展,夹江前进。太平军势如破竹,连克九江、安庆、芜湖、太平。沿途群众大量参军,水陆发展到号称百万。三月八日,太平军兵临南京城下。蜷缩在南京城内的清军惊恐万状。清政府下令惩处陆建瀛,要他戴罪立功,企图以此重振士气,但是哪里挡得住革命洪流。三月十九日,太平军在大将林凤祥等指挥下,轰塌仪凤门,攻破外城,杀陆建瀛;次日,攻克内城,斩江宁将军祥厚,占领南京。太平军蓄长发,戴红巾,身穿短衣,手持刀矛,二十五人一队,威武雄壮地进入南京城。

洪秀全改南京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建立了与清朝地主政权相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

“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



天王府

群众队伍的扩大。”^①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时，太平军只有一万多人；不过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太平军就从广西打到了南京，迅速扩展为数十万大军。太平军的节节胜利，充分说明太平天国革命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推翻清王朝的迫切愿望，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什么力量也无法阻挡。

太平天国革命，推动了各地农民起义的蓬勃兴起。福建有小刀会起义和红钱会起义，上海有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义，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等省的天地会相继起义，安徽、河南有捻军起义。愤怒的人民举起刀枪，各地起义互相激荡，形成为焚烧清王朝的群众斗争的火海。

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一八五三年曾热情洋溢地歌颂太平天国革命，他说：“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延续了十年之久，现在已经汇合成一个强大的革命”。^②

① 《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一〇四页。

②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页。

清政府虽然焦头烂额，但是决不愿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一八五三年三、四月间，钦差大臣向荣所部一万七千多人，尾追太平军至南京，在城东孝陵卫一带，建立江南大营；钦差大臣琦善和内阁学士胜保，领兵驻屯扬州城外，建立江北大营。这两座反革命营垒，象两只凶恶的魔爪，时时准备攫取天京。各地豪绅地主也纷纷举办团练，与太平军为敌。

针对当时形势，太平天国领导者决定，在天京严密设防的同时，进一步开展军事斗争，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为了直捣北京、消灭清朝，必须乘胜北伐；为了控制长江上游、屏障天京，必须沿江西征。

一八五三年五月，以林凤祥、李开芳两员猛将为首的太平军精锐部队二万余人，从扬州出师北伐，洪秀全指示他们要乘虚而入，直趋北京。在北方人民大力支持下，太平军一路突破清军优势兵力的阻击，跨皖北，战河南，飞渡黄河，挺进山西，直插河北。十月十三日，前锋迫近保定。十月底打到了天津以南的静海、独流。清廷大震，北京宣布戒严，城内官绅纷纷逃窜，咸丰皇帝也吓得准备逃往热河。

太平军北伐战士长驱六省，威震京、津，但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第二年二月，只得南撤待援。天京曾两次派军北援，都因清军堵截，没有接上。五月，林凤祥、李开芳率全体北伐军自阜城突围后，分别被清军围困于河北连镇和山东高唐州。在严重的形势面前，太平军将士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一八五五年三月，林凤祥手执大刀，一马当先，率领固守连镇的太平军战士奋勇突围，不幸手臂中箭，刀落被俘。十五日，林凤祥在北京英勇就义，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革命气节。五月，李开芳率太平军自高唐州突围，退驻在(chí 池)平县冯官

屯，清军统帅僧格林沁下令掘开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的最后一批将士壮烈牺牲，太平天国直捣清政府巢穴的战略计划失败了。

在派军北伐的同时，太平天国任命胡以晃、赖汉英，率领战船千余艘，溯江西征。六月占安庆，九月克九江，十月攻下汉口、汉阳。一八五四年春，西征军进入湖南。在湖南，太平军遇到曾国藩(fān 番)湘军的竭力抵抗。

曾国藩是湖南湘乡的大地主、清朝礼部侍郎，一八五三年居丧在家。这个地主阶级的死硬派、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受咸丰帝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他以孔孟之道为精神支柱，通过宗法关系和乡土观念，纠集了一支反革命的地主武装。

一八五四年二月，湘军练成水陆两军一万七千人。在向太平军动刀之先，曾国藩祭起“尊孔”黑旗，发布《讨粤匪檄》，恶毒攻击太平天国革命，大造反革命舆论。四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亲自出马，率领湘军窜犯洞庭湖畔的靖港。太平军用炮火猛烈轰击湘军船只，派战士乘风放火，砍断纤绳，水师顿时大乱；陆路湘军也在太平军打击下，狂奔逃命。这一仗，太平军大败湘军，曾国藩急得跳水寻死，被随从捞起。但与靖港战役同时，湘军水陆进攻湘潭，太平军失利北撤，退出湖南、湖北。第二年初湖口、九江之战，太平军诱敌深入，以少胜多，打得湘军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哀叹“呼救无从”，“魂梦屡惊”，又演了一出投水自杀的丑剧。太平军趁胜反击，再度攻占汉阳、武昌。

经过三年反复斗争，太平天国在长江流域取得重大胜利，湖北东部及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土地，都在它控制之下。

一八五六年上半年，太平军在东战场也取得辉煌战绩，攻破清军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解除了敌人对天京的威胁。

从金田起义到天京建都，从北伐、西征到攻破江北、江南大营，这是太平天国的战略进攻时期和军事胜利的最高点。

三 群众性的反孔斗争

洪秀全不仅指挥太平天国将士用武器同旧世界作斗争，而且一开始就在文化思想战线上，向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孔孟之道发动攻击。

洪秀全的反孔思想，来源于农民的平等要求，在斗争过程中，迅速为农民群众所接受。在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途中，太平军烧了湖南道州、郴州的孔庙，焚了山东临清文庙的大成殿，劈了安徽潜山文庙的孔丘牌位，还把江宁学宫改为“宰夫衙”，用来宰牛屠狗，“以狗血尽淋孔孟之头”。农民革命的烈火，还烧了封建统治阶级视为金科玉律的《四书》《五经》，地主阶级暴跳如雷，咒骂太平天国“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

以咸丰帝和曾国藩为代表的清朝封建统治势力，一手紧握屠刀，对太平天国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一手挥舞“尊孔”黑旗，对太平天国实行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咸丰皇帝亲自出马，下令儒臣编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宣扬孔孟之道；还亲临文庙祭孔，召集满、汉官员，讲解《中庸》，要他的奴才、走狗们，“以祖宗之心为心，以祖宗之政为政”，同心协力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大刽子手曾国藩则在臭名昭著的《讨粤匪檄》中，竭力维护孔孟之道和封建纲常名教，叫嚣“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

救世主天兄基督統衆天使咸集

天父皇上帝大發聖旨凡高天人有跟隨妖魔
頭走者個個要捉回凡有奸心幫妖者及
一切偷闖之妖魔仔個個要驅逐下去又
推勘妖魔作怪之由總追究孔丘教人之
書多錯

答他主亦斥孔丘曰爾作出這樣書教人
爾這樣會作書乎孔丘見高天人人歸咎
他他便私逃下天欲與妖魔頭偕走
天父皇上帝即差主同天使追孔丘將孔丘捆
綁解見

天父皇上帝

天父皇上帝怒甚命天使鞭撻他孔丘跪在

天兄基督前再三討饒鞭撻甚多孔丘哀求不已

《太平天日》对孔丘罪行的批判

置”；攻击太平天国“焚郴州之学宫（即孔庙），毁宣圣（即孔丘）之木主”，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惊呼太平天国反孔斗争，“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使孔、孟“痛哭于九原”。曾国藩号召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扑灭反孔烈火，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

太平天国革命战士烧毁孔庙、孔像，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则在各地重修孔庙；太平天国革命烧毁大量《四

书》《五经》，曾国藩则设局重刻儒家典籍；太平天国革命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孔、孟“邪说”，曾国藩则号召“抱道君子”们，“卧薪尝胆，殄(tiǎn 舔)此凶逆”。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随着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斗争形势的高涨，反孔斗争也继续发展。在一八五三年以后颁行的《太平诏书》重刻本中，洪秀全将奠都天京前刊行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作了重要修改，删除其中引用的孔孟之说。洪秀全早期撰写的《百正歌》，因儒学色彩浓厚，全文被抛弃。

针对封建统治阶级以孔孟之道毒害人民、反对革命的罪行，太平天国从法律上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一个目击太平天国在天京搜禁“妖书”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又恨又怕地写道：“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hùn 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

不仅如此，在洪秀全亲自主持下，太平天国还成立了“删书衙”和“镌(juān 捐)书衙”。一面删改《四书》《五经》，“将其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严禁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命题，给予儒家典籍以无情打击；一面大量刻印宣传太平天国革命道理、颂扬革命历史的新书。太平天国在金田起义后不久，编印了自己的《幼学诗》。接着，又在一八五三年编印了《三字经》，一八五四年编印了《御制千字诏》。这些课本把对青少年的识字教育和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热情宣传崇敬“皇上帝”、打倒“阎罗妖”的革命道理，大力提倡平等思想，并以“十款天条”为道德准则，以太平军的光荣战绩为榜

样,注意从小就培养青少年热爱太平天国。

此外,太平天国还以通俗易懂的神话故事形式,在人民群众中揭露和批判孔丘。太平天国莫都天京不久,城内便流传着各式各样的神话故事,或直呼孔丘之名,斥为“不通秀才”,说他每次考试都列为“四等”;或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帮着妖魔作怪,因而在天上受到严厉谴责;或说孔丘“变妖惑人”,激起上帝愤怒,被抓到天上痛加鞭打、“罚种菜园”去了。这些神话故事,粗看似乎离奇,但却有深刻的政治含意,表现了革命人民对孔丘的藐视和践踏!

太平天国反孔浪潮,有力地冲击了束缚人心的封建教条。在群众性的反孔斗争影响下,广大农民的精神世界逐渐发生变化。一个专门为清政府搜集情报的反动文人张德坚,咬牙切齿地说:凡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较深的群众,“出言妄诞”,“于(孔、孟)伦常义理……询之皆如隔世”,对清朝官吏“毫无敬畏之意”。这实在是一件好事!

太平天国反孔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上层建筑,这在中国农民战争史和劳动人民反孔斗争史上,都是很光辉的一页。

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革命英雄们,不可能用科学的世界观,彻底揭露孔孟之道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因此,在洪秀全的著作和太平天国一系列文献、文告中,出现某些孔孟观念或这样那样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就不足为奇了。太平天国革命冲击了“孔家店”,然而,靠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终究是打不倒“孔家店”的;靠单纯的行政命令,也清除不了孔孟之道对人们思想的毒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

这种哲学”。^① 打倒“孔家店”、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只有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四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除了在军事上继续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斗争，在文化思想上开展群众性的反孔斗争外，还制定了各项革命法制，推行社会改革，努力巩固和建设新政权。

一八五三年冬，经洪秀全批准，太平天国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革命反封建斗争的结晶，是农民英雄们提出的建立人间理想“天国”的总纲领。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而以土地问题为整个纲领的核心。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重新分配土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根本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它的社会理想是：“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从上述根本思想出发，《天朝田亩制度》将土地分为九等：田一亩，早晚两熟可收一千二百斤的，是上上田，产量低一百斤的降一等，依此类推，年产四百斤的，是下下田。然后计口授田，按农户人口平均分配：人多则多分，人少则少分，男女不论，十六岁以上授田，十五岁以下减半，田有好丑，搭配各半。

^①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二一九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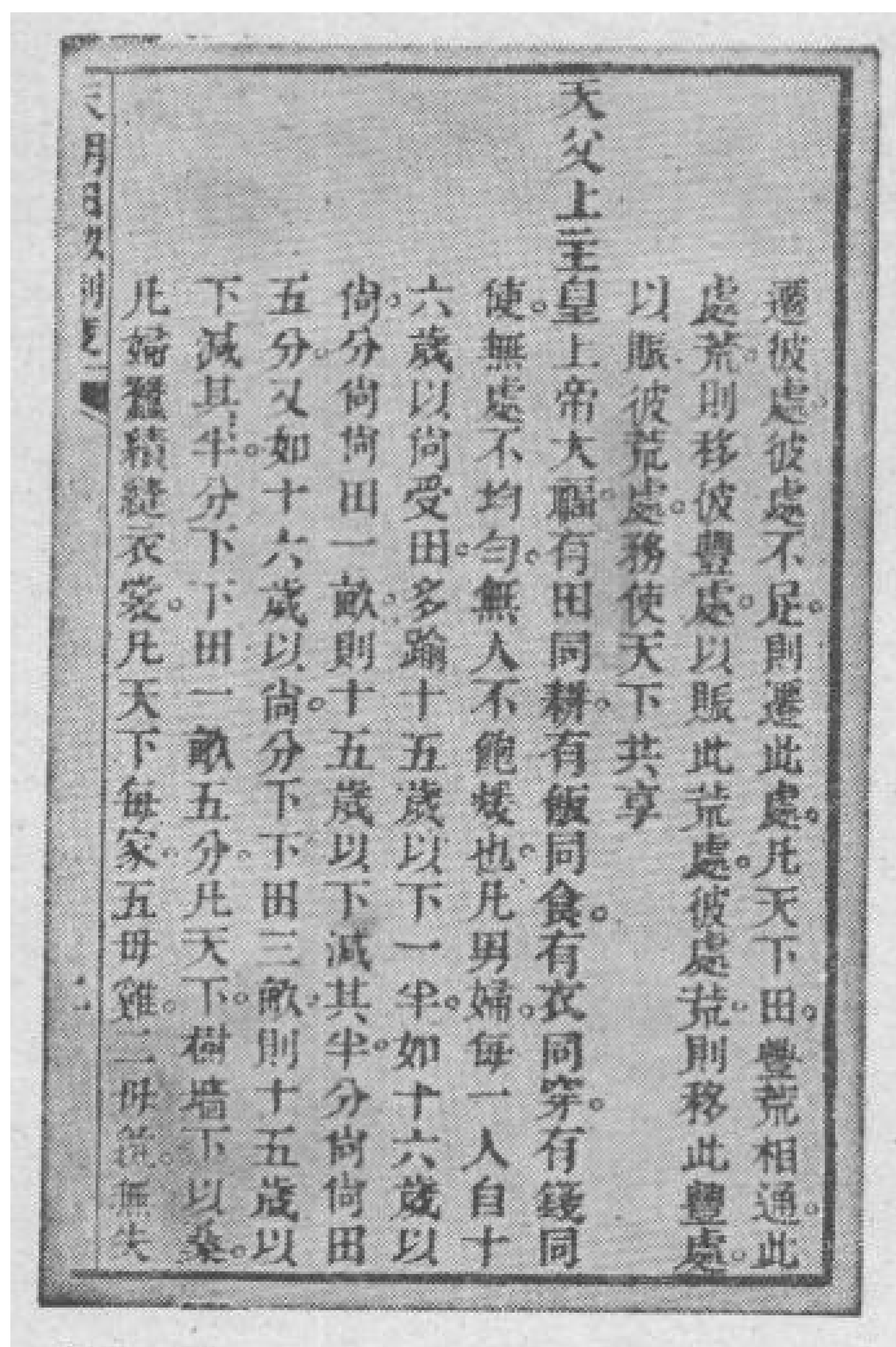
在绝对平分土地的基础上,《天朝田亩制度》还规定了“通天下皆一式”的自给自足生活。每家农户要种几株桑树,养点蚕,织点布,喂五只母鸡,养两口母猪。《天朝田亩制度》又按照太平军“圣库”制度的办法,规定了国库制度。每年收获所得,除生活必需外,其余一律归公,缴入国库;如有婚娶吉喜等事,由国库

按定额开支。遇到荒年,则丰荒相通,彼此互助。通过这些详尽而又细致的规定,想使每个农民,都能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永远保持一份平均的财产,达到“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的理想境界。

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基础,是农民受剥削的根源;把土地夺回到自己手里,摆脱封建剥削,是千百年来广大农民的迫切要求。《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均分配土地和建立国库制度的规定,集中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废除封建剥削、摆脱贫困生活、建立一个“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天朝田亩制度》图一



《天朝田亩制度》图二

的平等世界的善良愿望。作为封建制度的对立面,《天朝田亩制度》具有非常强烈的革命性,它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历代农民革命“均田”、“均贫富”等战斗口号,是两千多年来农民斗争历史上最光辉的革命纲领。

《天朝田亩制度》,又是在中国已经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颁布的。

因此,它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任何冲击、破坏,客观上都是在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历代农民革命的口号,又是不相同的。

但是,太平天国领导者,企图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平均一切社会财富,建立某种程度的公有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农业空想社会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幻想。毛主席说过:“我们赞助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是为了便于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迅速地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度,并非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谁要

是提倡绝对的平均主义,那就是错误的。”^① 如果按照《天朝田亩制度》的规定,使每家农户绝对平均地保有一份土地和财产,每年收获所得又只能留下仅够维持生活的份额,那么,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向前发展,只能永远停滞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水平上,甚至倒退。

太平天国革命的时代,还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政党的正确领导,因此,农民英雄们受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的影响,从主观要求出发,提出绝对平均主义的土地纲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天朝田亩制度》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空想性的一面。《天朝田亩制度》关于平分土地和国库制度的规定,虽然没有能实现,但在实际斗争中,它的革命精神曾经引导和鼓舞广大农民,给予封建土地所有制以猛烈冲击和破坏。这表现在:

一、太平军严厉镇压清政府各级官员,无情扫荡地主团练,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地主阶级,而且迫使更多的地主分子向上海和其他地方逃亡,大量土地自然地归于农民。许多庙宇被毁后,它的田产也落到了农民手里。农民成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的主人,除了向革命政权交纳钱粮,再也不必给地主交租。在扬州,就出现了“三年贡赋未输租”的情况。太平天国革命后,江南地区自耕农大量增加,也是出于这种情况。

二、有些地方,太平天国给佃农颁发“田凭”,“领凭后租田概作自产”,不许地主“挂名收租”,这就从法律上否定了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实际上实行了耕者有其田。地主看到丰年景象,哀叹“于我无分”。

^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二〇九页。

三、在太平军影响和支持下，贫苦农民开展减租抗租斗争。有的地区，地主向佃户收租时，佃户愿给就给一点，不愿给就根本不理；有的佃户只交原租额百分之五十。地主即使收到一点租，还要给革命政权交纳田赋。至于用“进贡”、“打先锋”等名目，勒令地主交出粮食和金银一类浮财，更是太平天国打击地主阶级经常采用的方式。

当然，各地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革命影响比较薄弱、农民发动不够充分的地区，封建土地所有制受到的打击就比较小。

《天朝田亩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乡官制度。它企图按照太平军的编制体系，建立起寓兵于农的地方基层政权。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县以下设立各级乡官，编制和军队一样，五家为伍，设伍长；五伍为两，设两司马；四两为卒，设卒长；五卒为旅，设旅帅；五旅为师，设师帅；五师为军，设军帅。一个军帅，管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每家出一人为兵，组成一军，有事作战，没事务农，各级乡官也就是各级军官。每二十五家组成的“两”，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在这里，设一个国库和一个礼拜堂，均由“两司马”主持。

各级乡官，原则上由地方公举，这是一项具有民主精神的政治措施。广大劳动群众热烈拥护乡官制度，多数乡官由贫苦群众担任。过去被压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掌了权，地主分子除了破口大骂外，也奈何不得。在紧张而激烈的战争条件下，作为基层政权的乡官制度，在催征钱粮、供应军需，配合太平军作战、维持地方治安，以及督修河堤、救济灾民、禁吸鸦片等方面，都起了很好的作用。江西各地农民在乡官组织下，积极投身革命战争，“每战动辄数万人”，对这一点，刽子手曾国藩

就感到十分“震惊”。

《天朝田亩制度》在妇女解放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革命精神。太平天国领导者，根据“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理论，主张男女平等。《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经济地位一律平等；“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废除封建的买卖婚姻。此外，太平军内有女军，天朝内有女官、女状元，女营参加各项生产劳动，还发布了解放缠足令，不准买卖奴婢，取缔娼妓。这一切男女平等和保护妇女的措施，对反动的孔孟之道、对吃人的封建礼教和男尊女卑观念，是大胆的否定和猛烈的冲击。一个外国人访问天京后写道：“在街上行走时，所见到妇女在路上者之众多，确是一种新现象。她们衣服装饰大都甚好，其外观十分可敬。许多骑马往来驰骋于路上，其他则徒步而行，大多数是大脚的。……比较旧制度、旧礼教，这是新的现象。”显然，妇女解放政策，是太平天国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五 维护民族尊严的外交

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锋芒是对准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但是，也勇敢地进行了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斗争。

金田起义前，洪秀全曾对族弟洪仁玕说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各国各自保管其自有之产业，而不侵害别人所有”；“彼此有交谊，互通真理及知识，而各以礼相接。”依据这个思想，太平天国在对外关系方面，坚持独立自主、反对侵略的革命立场，维护了民族尊严。

一八五一年十月、十一月，当太平军还没有打出广西时，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就两次向沙皇政府表示：“中国发生的任何革命对我国贸易以及我国全部对华关系都有害无利”，建议给清政府以必要的“援助”，支持它“平定叛乱”。当太平军向长江流域进军时，外国侵略者惴惴不安，准备公开支持清政府，与中国人民为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一八五三年一月十五日，英国在上海出版的《北华捷报》露骨地叫嚷：“清廷的瓦解，对我们只有坏处而无好处。”与此同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在给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文翰的几封密信中，建议由英国或英、法、美三国联合起来，派舰队立刻占领镇江，封锁长江和运河，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把（清朝）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文翰采纳了阿礼国的建议，二月，立即调集军舰从香港赶往上海，准备在和两江总督陆建瀛谈妥“报酬”条件之后，向太平天国革命下毒手。

但是，太平天国疾风暴雨式的胜利进军，打乱了外国侵略者的步骤。文翰还没到上海，太平军就攻克了南京，很快又占领了镇江。这就使外国侵略者不得不改变策略，由露骨的干涉政策，变成虚伪的“中立”政策，以便窥测时机，绞杀革命。

一八五三年四月以后，英、法、美三国先后扯起“中立”的破旗，并在一年多时间里，四次派公使“访问”天京，摸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底”。

四月二十七日，英国公使文翰由上海驶抵天京。当他的座舰“何木斯”号擅自闯入太平天国水域时，太平军镇江炮台立即开炮警告。这一炮打得好，充分表现了太平天国反对外国侵略、维护领土主权的革命精神。英舰被迫停驶，直到说明

西行目的,并表示“绝对保守中立”之后,才被允许通过。英舰行至天京附近,又碰到和镇江同样的情形。文翰到达天京后,派翻译官密迪乐向太平天国官员声明:“绝对保守中立,不助满人”。太平天国官员则充满自信地回答说:“你们如果帮助满人,真是大错,但即令助之,亦是无用的。”这个答复义正辞严,对侵略者是极大的藐视和当头一棒。

外国侵略者到天京活动,有一个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就是企图强迫太平天国接受不平等条约。文翰向太平天国递交了《南京条约》的中文本,公然威胁说:“敝国与中国政府曾签订条约,……如贵军或其他人等,在任何形式之下,对于英侨生命财产有所侵害,英国亦必采取与十年前抵拒各种侵害之同样手段。”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如果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英国就要出动炮舰,占领镇江、南京,重演一次鸦片战争,强迫中国接受屈辱的城下之盟。同年十二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访问天京;第二年五月,美国公使麦莲访问天京。他们都向太平天国提出所谓“庄严的条约之保证”,要太平天国承认不平等条约,“尊重”他们的侵略特权。对于外国侵略者的这种无理要求和战争讹诈,太平天国根本不予理睬。

文翰刺探革命政府对英侨行动的态度,太平天国的答复是:准许英国人“自由出入”境内,“照常经营商业”,但是不许再卖鸦片。布尔布隆无中生有地提出所谓保护天主教的要求,秦日纲在接见时严正声明,太平天国未曾压迫天主教,断然驳斥法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太平天国还正告美国:“通商者务要凛遵天令。”明确表示了对“领事裁判权”的否定,申明了中国主权的不容侵犯。

特别是一八五四年六月,英国新任公使包令派人访问天

京时，太平天国在一份以东王杨秀清名义答复英国的文件中，第一条就说明：“平定时，不惟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天下之内兄弟也。立埠之事，候后方定。害人之物为禁。”它明确地指出了太平天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点：一，打倒清政府之后，欢迎各国来华通商，以兄弟之礼相待；二，所谓“立埠之事”，即开辟通商口岸问题，也要等革命成功后再定，根本不承认清政府以前和外国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三，严禁鸦片毒物输入。

英、法、美三国公使访问天京后，感到“人民大众普遍地拥戴”太平天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们的胜利”。沙俄政府甚至一度考虑，在太平天国取胜的情况下，派官员“同中国新政府进行会谈”，诱使太平天国承认它在中国的侵略权益，并让俄国势力伸入中国沿海各口。因而，四国决定在一个时期内采取观望态度，表示“中立”，以便看风使舵：如果太平天国北伐胜利，可以同太平天国拉关系；如果太平天国北伐失败，就同清政府讨价还价。

文翰在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按：指太平天国）成功，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因此，“多等一些时候，如果不是唯一的政策，也是最聪明的政策。”文翰的主张，得到了英国外交部的正式批准。这不仅是英国政府，也是法、美、俄政府，打起“中立”幌子的真实原因。

毛主席指出：“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①所谓“中立”，不过是外国侵略者的一个假面具，需要时，

^①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〇八一页。

把它往脸上一戴，用不着时，就露出了杀气腾腾的狰狞面目。

麦莲访问天京后，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这个中华帝国的主人之后，是不是会承认清政府与英、美、法三国已签订的条约义务呢？”他自己下结论说：“这是极不可能的。”侵略者经过一段时间的观望和刺探，越来越感觉到：从坚持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尊严的太平天国政权手里，他们捞不到任何便宜。因此，麦莲狂妄提出：联合英、法两国，武装干涉太平天国革命。后来，英国公使包令也建议政府放弃“中立”，沙俄政府则表示愿意“代平叛乱”，都想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从清政府手里攫取更多新的侵略权益。

扶持摇摇欲坠的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已经成了外国侵略者处心积虑的基本政策。但是，太平天国革命这时还处在蓬勃发展的时期，外国侵略者和清王朝之间，还存在一些矛盾需要解决，无耻的主权买卖尚未最后成交。一句话，武装干涉的时机还没有成熟。因此，侵略者只得继续伪装“中立”。直到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外反动势力才完全勾结在一起。

太平天国革命的领导者，虽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缺乏认识和警惕，甚至将一些披着羊皮的狼，误认为同是信奉“上帝”的“洋兄弟”，但在前期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国侵略，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难能可贵的。和清朝反动政府的卖国外交，恰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到了后期，太平天国英雄们更拿起武器，和侵略者对阵，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进行了可歌可泣的伟大斗争。

第三章 英法联军的侵略

一 “亚罗”号事件

一八五六年十月，英国向中国发动又一次海盗式的战争，第二年，扩大为英法联军的侵略。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挑起“这场极端不义的战争”，^① 目的在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加速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实质上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在战争过程中，美国充当帮凶，积极支持和参与了英、法的侵略活动；沙皇俄国趁火打劫，不仅猎取了和英、法、美同等的侵略特权，还霸占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早在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资产阶级曾经欣喜若狂，以为这下子打开了世界上最广阔的中国市场。他们手舞足蹈地说：“只消中国人每人每年需用一顶棉织睡帽，不必更多，那英格兰现有的工厂，就已经供给不上了。”但是，黄金梦，全落空。从一八四三到一八五五年，英国每年对华输出的工业品总值，始终徘徊于一百万至二百五十万英镑之间，没有多大进展。面临着一八五七年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英国急于向中国倾销它的“过剩”商品。同时期，英国对华鸦片输出却急剧增长，一八

^① 《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一四页。

四三至一八四五年间，平均每年三万七千箱，到一八五三至一八五五年间，平均每年增加为七万三千箱（总值五、六百万英镑）。显然，鸦片卷走了中国大量白银，“中国人不能同时既购买商品又购买毒品；……而增加鸦片贸易是和发展合法贸易不相容的”。^①

对于上述贸易情况，英国政府是了解的。但是，鸦片给资产阶级带来惊人的利润，所以英国政府的政策是：既要尽量扩大鸦片贸易，又要大力倾销工业产品。在他们看来，只要能在中国南北海疆及长江多开通商口岸，能在北京派驻公使直接控制清政府，就能推进工业品的销售。而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采取战争手段。当时，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露骨地叫嚷，“为了使他们听话，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狠狠地揍一顿”。

《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英国资产阶级便不断叫嚣发动新的侵略战争，向中国勒索“进一步深入内地的权利”，以便“进入初级市场”，把吸血管直接插入中国的内地和农村。但是，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怒潮，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英国侵略者。尤其是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的胜利，更表现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伟大战斗力量。《南京条约》规定开广州为商埠，然而并没有规定允许英国侵略者进入广州城。从一八四六至一八四九年，英国侵略者先后三次企图闯入广州城，都被广州人民的抗英武装力量（社学）顶住了。在一八四六年的反入城斗争中，社学发布反英告示，宣称“倘夷入城，鸣鼓攻之”；几千名愤怒的群众打进知府衙门，痛骂与英军密定进城日期的广州知府刘浚（xùn 巡）为走狗，烧毁他的朝珠官服，吓得刘

^① 《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四页。

得从后院翻墙逃走。一八四九年四月，英国公使文翰率领舰队闯入珠江，硬要进入广州城。社学群众大为激愤，十万人守卫珠江两岸，刀枪林立，“呼声震天”，准备战斗，拒绝英国侵略者入城。文翰只得退出珠江，“罢兵修好”。实际上，“罢兵修好”是假，他在给帕麦斯顿的报告中提出：“我们非用极大的武力，不能达到目的。”这才是真。就是说，英国蓄谋以更狂暴的海盗式战争，来达到罪恶的侵略目的。

从一八五一到一八五六年，太平天国革命正以雷霆万钧之势，磅礴于中国大地。外国侵略者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一打一拉，使清政府成为更加驯服的工具，以便互相勾结，共同绞杀坚持民族独立的太平天国革命。

一八五四年，《南京条约》签订满十二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援引中美《望厦条约》关于十二年后可以修约的条款，联合美、法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条约的要求。内容包括：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准许掠卖华工出口，废除进出口货物通过内地的子口税，外国公使进驻北京等等，并以帮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作为钓饵。清政府觉得外国侵略者要价太高，同时，还不相信洋人会真心帮助镇压革命，甚至怀疑他们进入长江后会同太平军联合，因此不肯同意。包令在交涉失败后，就报请英国政府动用武力进行勒索。但是，当时英、法正和沙俄为争夺土耳其而进行克里米亚战争，抽不出兵力；加以太平军北伐、西征节节胜利，清王朝朝不虑夕，修约交涉也就暂时搁置下来。

一八五六年，《望厦条约》签订满十二年，美国在英、法支持下，又提出修约要求。咸丰帝表示：可以“稍为变通”，不能

“大段更改”，再次拒绝全面修约。同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决定调转兵力，用战争来攫取侵略特权。

对华战争已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所谓“亚罗”号事件、马神甫事件，不过是英、法侵略者挑起战争的借口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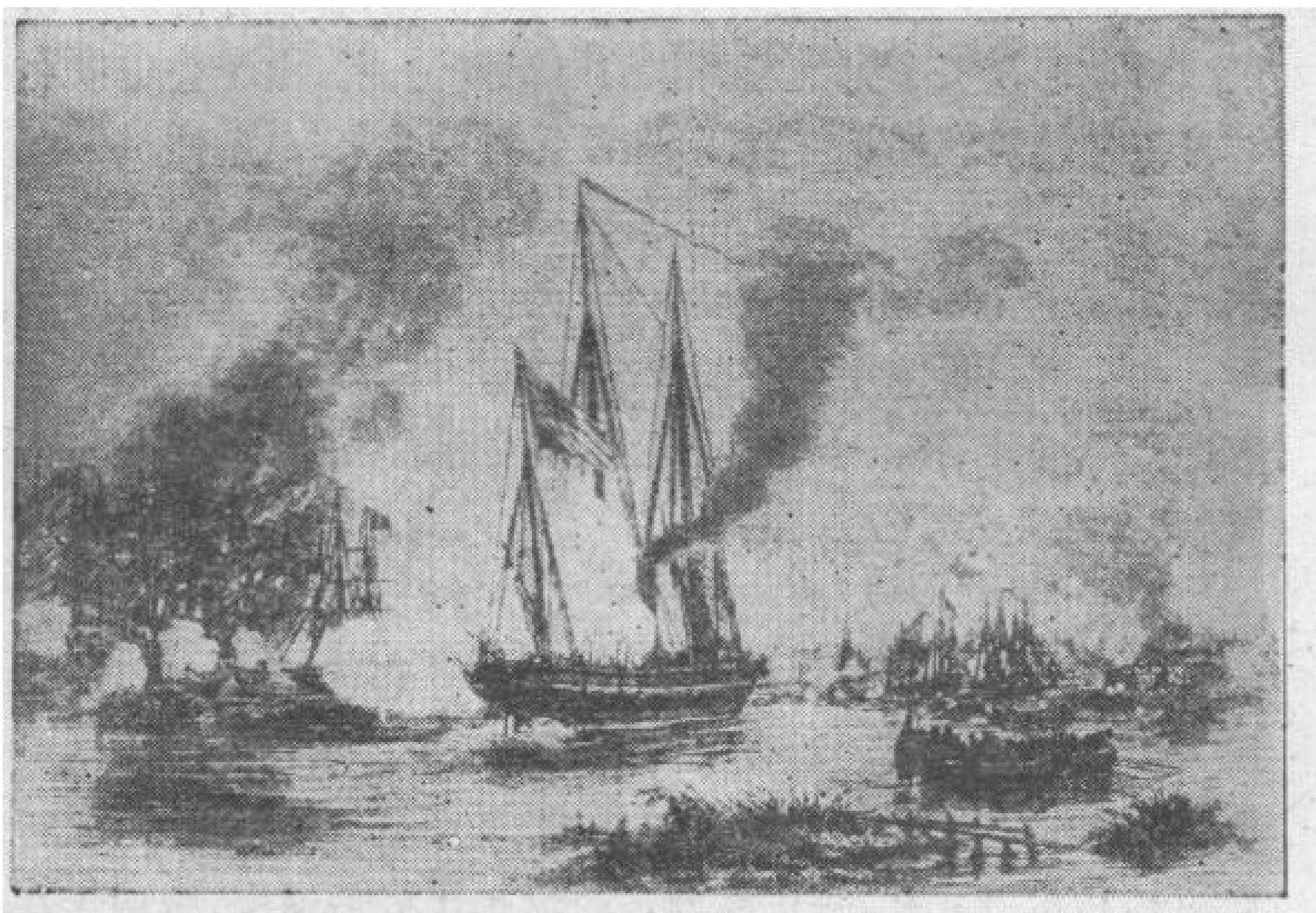
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广东水师搜查停泊在珠江炮台附近的“亚罗”号走私船，逮捕了隐藏在这艘船上的两名海盗和其他十名水手。“亚罗”号是中国商人方亚明的船，船上水手全是中国人，为了便于鸦片走私和海盗活动，曾在香港英国殖民政府注册，买了张为期一年的船籍登记证。由于登记证在九月下旬已经满期，“亚罗”号在被搜查前六天，已不挂英国旗了。但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中国水师上船捕人，是违反中英《虎门条约》。还无中生有地捏造中国官员扯下了船上的英国国旗，侮辱了英国。强硬要求两广总督叶名琛(chēn 郴)，立即释放所捕人犯、赔偿和向英国“谢罪”。

包令明知“亚罗”号的登记证已经过期，然而在给帕麦斯顿的报告中却卑鄙地说：“船当时不在我们保护之下，可是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看在上帝面上，千万不要把这一点告诉他们。”更有甚者，包令还将“亚罗”号事件当作“踏脚石”，横行霸道地指示巴夏礼，进一步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内作到，否则英国海军将采取行动。

两广总督叶名琛是一个昏愦(kuì 愧)、顽固的封建官僚。对人民，他极端残暴；对外国侵略者，他色厉内荏。巴夏礼挑衅寻事，他爱理不理，行若无事；英国提出最后通牒，他又手忙脚乱，赶紧送还人犯，结果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

巴夏礼拒不接受叶名琛送来的复照和人犯。一八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英军悍然进犯广州,挑起了罪恶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美国侵略者在表示“中立”的同时,派遣海军陆战队协助英军攻城。

十月二十九日,英国侵略军攻入广州城,在广州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连总督衙门也被洗劫一空。以叶名琛为首的清朝官员,吓得东躲西藏;广州人民和部分士兵却拿起刀枪,奋勇抵抗。侵略军兵力不足,当晚被迫退出。



中国帆船、小艇与英国军舰激烈交战

对英国侵略者怀有深仇大恨的广州人民,同仇敌忾(kài 凯),誓与入侵之敌战斗到底。英舰停泊之处,时而飞来火药瓶,时而出现水雷船,夜间常有中国小艇迫近袭击。侵略者处处挨打,昼夜不宁,包令首先偷偷溜回香港。十二月十五日,愤怒

的广州人民，放火烧毁被英国侵略军盘踞的洋楼，“风大火烈，愈救愈焚”。英军陆上巢穴被烧毁，只得“尽栖船上”。一八五七年一月，广州人民的抗英怒潮更加高涨，侵略军二千人被迫退居虎门，等待从英国发来的救兵。

“亚罗”号事件传到伦敦，英国政府进一步煽动战争狂热。帕麦斯顿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声嘶力竭地鼓噪：“我国同胞在地球上遥远的地方遭到了种种侮辱、强迫和虐待，对此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泰晤士报》露骨地叫嚷：“英国营业精神（按：应读作殖民侵略）的伸张，已与闭关自守的中国社会的结构相冲突。这种行为是否合法，那种行为是否适宜，这些琐细地方都用不着提起。”侵略者为了奴役和掠夺中国，没有借口可以制造借口，没有道理可以强词夺理，他们挂在嘴边的什么“法律”、“正义”，都是骗人的东西。“强权即公理”，这才是侵略者信奉的“真理”。

一八五七年春，英国政府照会法国、美国、沙皇俄国，提议联合出兵，压迫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

法国对中国的宗教侵略，一向十分猖獗。天主教神甫马赖，因违约潜入广西省西林县，以传教为名进行侦察活动，行凶作恶，于一八五六年二月被当地官府逮捕处死。这时，法国路易·波拿巴政府决定抓住马神甫事件作借口，打起“保护圣教”的旗号，和英国联合行动，组成侵略联军，向中国大举兴兵。

一八五七年七月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十月法国全权大臣葛罗，率领英、法海陆军，先后到达香港。十一月底，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维廉和沙俄公使普提雅廷，也赶到香港。经过四国侵略头目的紧张策划，在美国、沙俄支持下，英法联军五

千六百人，于十二月再次扑向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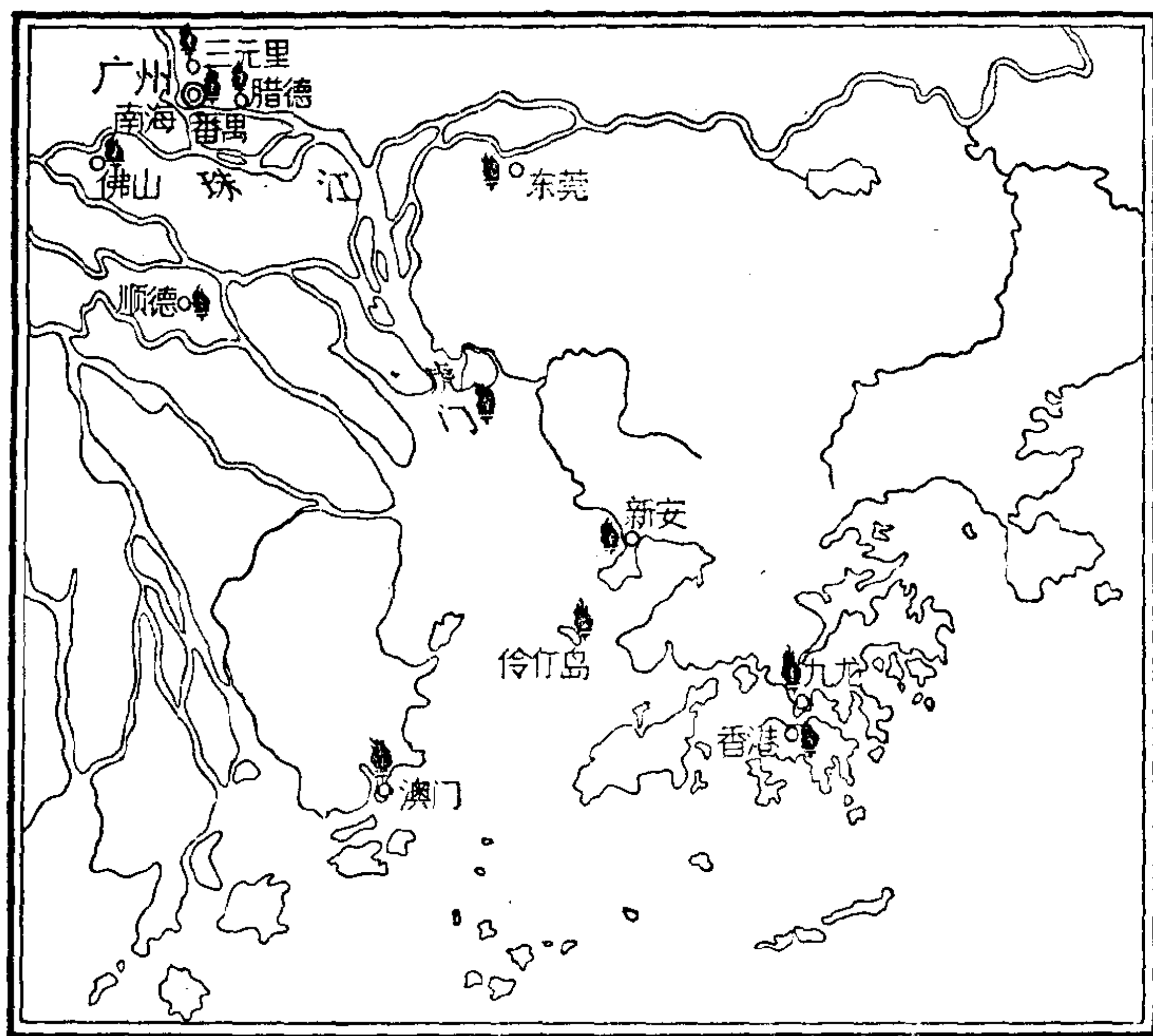
奸诈的英、法侵略者，在攻城前玩了一套“先礼后兵”的把戏。十二月十二日，照会叶名琛，要求入城、修约和赔款，限十日内答复。敌人已经摆好了阵势，但叶名琛一笑置之，说是“彼故作战势来吓我耳”，“我不与和，彼穷蹙(cù 促)甚矣”。二十六日，英法联军提出最后通牒，限令叶名琛四十八小时内交出广州，否则即以武力进攻。部将以战祸迫在眉睫，请求添兵设防，侦察敌情，准备还击。叶名琛抱定宗旨不抵抗，怒气冲冲地说：“谁添兵，谁给饷。”“敢有赴敌船者，按军法处置！”甚至命令“敌船入内”，也“不可放炮还击”。这个愚顽的封建官僚，寄幻想于神明保佑，迷信“仙人”的乩(jī 基)语，说是“过十五日（即阳历十二月三十日），必无事。”

由于叶名琛的不抵抗政策，英法联军迅速进抵广州城下，从十二月二十八日拂晓开始，向广州城连续发炮二十七小时。守城爱国官兵冒着敌人的炮火顽强狙击。二十九日，广州终于沦陷。广东巡抚柏贵、将军穆克德讷无耻投敌，在以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三人委员会严密控制下，继续任职，充当敌人的走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制造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叶名琛被英、法侵略军俘获后，送往印度加尔各答，一八五九年在囚禁中死去。

在英法联军蹂躏(róu lìn 柔淋)下，广州又遭到了一次严重的灾难。居民遭惨杀，民房被焚毁，妇女受淫辱，侵略者大肆劫掠，库银二十二万七千两全部被抢。

具有反侵略斗争光荣传统的广东人民，立即组织起来，拿起武器，同外国侵略者及其走狗展开英勇的战斗。一八五八年二月，广州三元里九十六村人民，联合南海、番禺(pān yú 潘

鱼) 两县人民,在佛山成立团练局,组织义兵数万人,决议各乡“坚壁清野,禁绝汉奸”,侵略者胆敢来犯,“登时格杀勿论”。四月,团练局又发动香港大罢工和大罢市,不到一个月,两万多人罢工离港,使香港商务活动完全陷于停顿。广州城郊人民,每到夜间,不断向内城施放火箭,惊扰敌人;城内人民,经常三五成群,埋伏路边,对侵略军突然袭击。六月初,东莞(guǎn 管)人民伏击侵略军,一举歼敌数百,巴夏礼掉下马背,差一点被活捉。到处都设下了陷阱、窝箭,侵略军防不胜防,提心吊胆。额尔金的秘书俄理范,后来还心有余悸地写道:“要认出谁是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图

人而谁不是，那确实很困难。山野间到处是人，注视着我们的行动。自然可以设想，每个村民在心理上都是敌人。”

革命导师恩格斯高度评价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他说：“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①

二 大沽失陷与《天津条约》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小部分留守，大部分北上。一八五八年二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游历、赔偿军费等侵略要求，通知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清政府在三月间的答复是：英、法、美公使应折回广东，和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谈判，沙俄公使应去黑龙江，同奕山商办。

四国公使没有达到在上海与清政府谈判的目的，决定立即北上京、津。英、法以交战国的身份，在京、津一带直接施加军事压力，胁迫清政府“解决一切争执事宜”；俄、美公使则以“调停者”姿态从中掩护，趁火打劫。

四月，英舰十多艘、法舰六艘、俄舰一艘，陆续到达天津白河口。二十四日，英、法公使发出强硬照会，要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大沽谈判，扬言“万一不能满足所提出的要求，必定采取断然行动”。俄、美公使假扮和事佬，劝告清政府接受谈判建议，“缓和”紧张局势。四个侵略者，两个叫打，两个唱和，

^①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〇——二一页。

演出一幕肮脏的双簧戏。当时，清政府正在南方大举用兵，血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咸丰帝感到“中原未靖”，“外患”又起，慌作一团。他不甘心接受英、法的无理要求，但在军事上又不认真备战，却把希望寄托在“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幻想上。面对着英、法侵略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似战非战、要降未降，步调异常混乱。

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日，英法联军重新燃起战火，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进攻。大沽炮台虽然武器陈旧，防御工事简陋，但是，守台爱国官兵奋起抵抗，与侵略军炮战两小时。当英军逼近炮台时，中国士兵从炮台跳下，冲进敌群厮杀；几十名法军刚占领一座炮台，中国士兵就舍身炸毁炮台，和敌军同归于尽。士兵们的勇敢战斗精神，吓得侵略军目瞪口呆。主持军政的清朝大官，却“一闻炮声，心胆先怯”，而带头乘轿西逃的，就是直隶总督谭廷襄。

大沽炮台失陷，英、法侵略军溯白河西上，不到一个星期，直抵天津城下。

谭廷襄借口“郡城残破，内无一日之水，又无隔宿之粮”，实行“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抚”的投降方针，弃守天津。天津人民斗志昂扬，准备组织团练，“尽歼丑类”，谭廷襄大肆污蔑，横加阻拦；英法联军占领天津城外望海楼一带，他却指派大盐商张锦文，设立“支应局”，供应牛、羊、鸡、鸭，安排住所，奴颜媚骨地向侵略军献殷勤。

五月二十六日，英、法侵略者通知清政府派两名一品大臣，迅速前来天津谈判，否则就要攻陷天津、进军北京，还不时探测北运河水道，摆出一副进攻北京的架势。咸丰帝大惊失色，急忙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六月二

日赶到天津议和。

天津谈判过程中，沙俄公使普提雅廷软硬兼施，一面以英、法将发动新的武装进攻相要挟，一面装出同情清政府的样子，表示愿意从中调停，诱迫清政府在六月十三日最先订立中、俄《天津条约》。十八日，美国也以同样的手法，和清政府订立中、美《天津条约》。“手携篮筐，站在树下，静待树上的同伴将果实摇落，甚至还奉命当树上的两个人和果木园主发生纠纷时，出面调解。”——连美国国务院的历史顾问丹涅特后来也不得不承认，美国驻华公使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种“可耻的角色”。

与俄、美两国的“笑面虎”姿态不同，英、法两国代表自始至终态度凶悍横暴。额尔金、葛罗拒不出面，只派翻译李泰国和威妥玛参加会谈。这两个家伙气焰嚣张、“言语狂悖（bèi 倍）”，逼令清政府接受全部侵略条款，不仅在项目上不许讨价还价，而且一个字不许更改，甚至连条约的中文译本也得由他们决定。英、法侵略者动辄以战争相威胁，一再宣称要中断谈判，带兵攻打北京。

桂良、花沙纳之流，被侵略者的军事讹诈吓破了胆，他们急忙报告咸丰帝说：洋兵“枪炮迅利”，“若抵都门，祸恐难测”。又说：“天津民情汹汹，数日不和，必将内变。”一句话，除了投降，别无出路。对外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对内敌视人民，这历来是投降主义者的共同特征。一八五八年六月二十六、二十七日，清政府接受了侵略者的全部要求，先后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在中国近代史上，《南京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的开始，《天津条约》则是不平等条约的扩大和加强。

《天津条约》主要条款的内容是：

一、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原先，外国公使只能在香港、广州或上海活动，和清朝地方官吏打交道，而不能直接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在“修约”过程中，咸丰帝最“寒心”的也就是外国公使驻京后，“动受挟制”。这时，通过这一条款，外国侵略者就能直接控制清朝中央政府，加强它在中国的殖民侵略活动。

二、开放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外国人可以在开放口岸自由居住、租赁房屋、购买土地、建造礼拜堂和医院，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继《南京条约》之后，中国沿海、沿江又有许多城市，成了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经济、政治和文化侵略的据点。

三、外国侵略者的军舰和商船，有权驶入长江和各个通商口岸。这样，中国的江防、海防被严重削弱，清政府进一步丧失军事独立，外国侵略者的军舰竟能直接深入内河，镇压和残杀中国人民。

四、扩大了领事裁判权。不仅外国人之间的纠纷以及他们的一切犯罪行为，中国官员无权过问，而且，涉及中外的民事案件，也要在外国领事官的监督下，由中外双方官员“会同审办”。有了这张“护身符”，中国便成了殖民者的“天堂”、冒险家的乐园。

五、对英赔款四百万两，对法赔款二百万两。

条约规定，以一年为期，双方在北京交换正式批准的约文。

条约还规定修改海关税则。一八五八年十一月，桂良、花沙纳在上海与英、法、美代表举行关税会议，订立新税则。规

定：一，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改名“洋药”，每担收税银三十两；二，外国人用品免征进口税，其他进出口货物，照新定税则纳税。据统计，英国棉纺织品进口税率，比一八四三年又低了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六十五；三，洋货运销内地或输出土货，按时价抽百分之二点五子口税后，不再征税；四，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海关从此落入外国侵略者手中。关税是一个主权国家抵抗外国商品侵略、保障民族经济的重要武器，又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新税则”为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中国的旧式手工业受到大破坏，新式工业的发展受到大阻碍，民族经济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三 圆明园浩劫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陆续退出大沽海口。当时，马克思曾断言：“从政治观点看来，这个条约不仅不能巩固和平，反而使战争必然重起”。^①

事实果然如此。外国侵略者的欲望永无止境，《天津条约》墨迹未干，英国资产阶级的《每日电讯》报就得寸进尺地叫嚷：“条约中有关商务的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为了迫使清政府更加俯首帖耳地兑现《天津条约》，并攫取新的殖民特权，英、法侵略者决心以进京“换约”为借口，派遣“强大的兵力”，集中“足够的炮舰”，“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他们狂妄地宣称：“《天津条约》是在枪炮威胁之下迫使清政府接受的，也只有暴力之下，才能使它付诸实施。”咸丰帝对《天津条

^① 《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一页。

约》也耿耿于怀，认为公使驻京“为患最巨”，严重损害了他的统治“威信”。他一面下令桂良、花沙纳在上海谈判中“力图补救”，一面决定整顿天津防务，修复并加强大沽炮台，充实守备兵力，还在白河口设置障碍，打下大量木桩、铁钎(qiàng 枪去声)，以防侵略者“贪得无厌，去而复返”。

一八五九年，英、法、美新任驻华公使卜罗斯、布尔布隆、华若翰乘船北上，赴京换约。英国海军上将何伯，率领一支由十六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以及法、美军舰多艘随行。六月十七日，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作了又一次“威风凛凛的武力表现”。清政府慑于炮舰淫威，又软了下来，再三表示：换约决不食言，还指派专人接待，但要求英、法、美公使只带随从人员，由北塘登陆进京。英、法侵略者蓄意挑衅，坚持“不走北塘”，硬要把军舰从大沽沿白河开到天津，武装“护送”公使进京。

六月二十五日凌晨，英、法舰队闯进白河。何伯派火轮逼近障碍，用绳子缚住铁钎前柱，接连拖倒十几架；其余军舰则排列两旁示威。守卫大沽炮台的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yīng 膺)，但因皇帝有令，不许先开枪炮，气得眼睁睁地看着侵略军在中国内河横行霸道。目空一切的侵略者，突然在下午二时半开炮，猛烈轰击大沽炮台。守军忍无可忍，愤怒回击，打得侵略者晕头转向。不少舰船搁浅，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成了中国炮兵的靶子。侵略者拚死挣扎，派陆战队上岸，妄图抢夺控制全局的炮台，然而陷入淤泥之中，在枪林弹雨下陈尸累累，一无所得。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剥掉了“中立”外衣，狂呼“血浓于水”(表示英、美两国民族有血缘关系)，下令美军开炮，帮助英、法作战，但也无法挽回败局。

经过一昼夜激战，英舰五艘被击沉，两艘被俘，六艘丧失

了战斗力；英军一千二百人中，死伤近五百人，海军司令何伯受了重伤，他的副手一命呜呼。此外，法国侵略军的舰队司令也被打伤。英、法侵略军惨败而逃，狼狈退向上海；充当帮凶的美国公使，却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由北塘登陆进京，并于回程中在北塘和清政府交换了《天津条约》批准书。

大沽口的胜利，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这一仗，是由英、法侵略者的横蛮挑衅引起的，中国士兵被迫自卫反击，完全是正义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中国当局反对的不是英国外交使节前往北京，而是英国军舰沿白河上驶。中国当局曾经请普鲁斯先生由陆路入京，无须用军舰护送。……难道法国公使留驻伦敦的权利就能赋予法国公使以率领法国远征队强行侵入太晤士河的权利吗？……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义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①

英、法侵略军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资产阶级报纸掀起一片“大规模报复”的喧嚣。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咆哮：“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去攻击并占领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到那里。”伦敦《每日电讯》报狂呼：“应该教训中国人重视英国人。”法国政府也在国内积极策划新的侵略战争。一八六〇年二月，英、法政府决定再次派额尔金、葛罗为特使，率领侵略军进犯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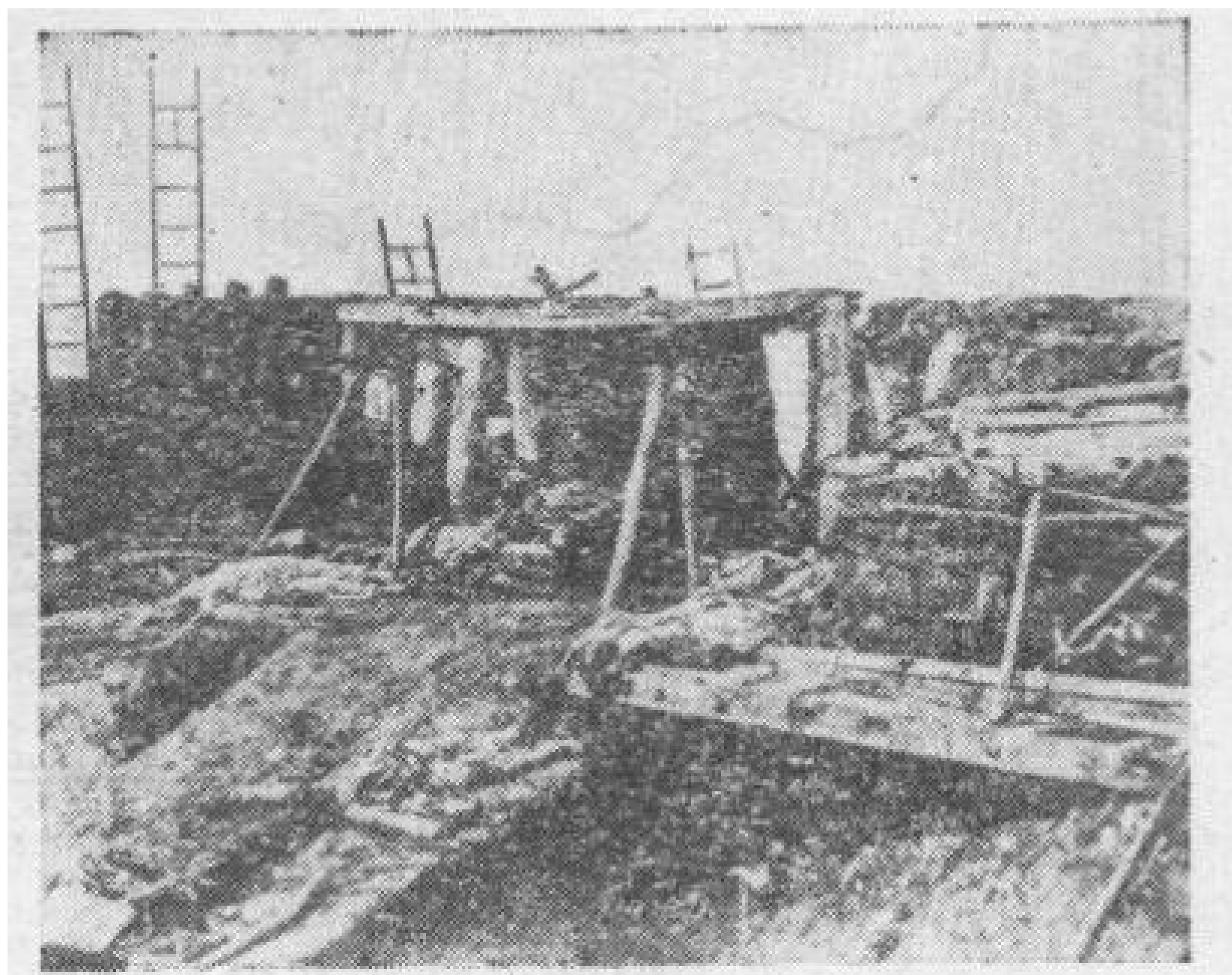
清政府在大沽口战役取胜之后，虽然说了些“条约作罢”之类的硬话，但骨子里还是想妥协求和，根本没有抵抗侵略的决心。咸丰帝口口声声告诫统兵大臣：“不得见敌辄先开炮，

^① 《新的对华战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四三页。

致碍和局”，“总须以抚局为要”；还特意留下北塘一口不设防，幻想以此作为“通使议和之地”，和外国侵略者握手言和。

一个暴跳如雷，决计要打；一个急于求和，无心抵抗。当时侵略者与清政府的情况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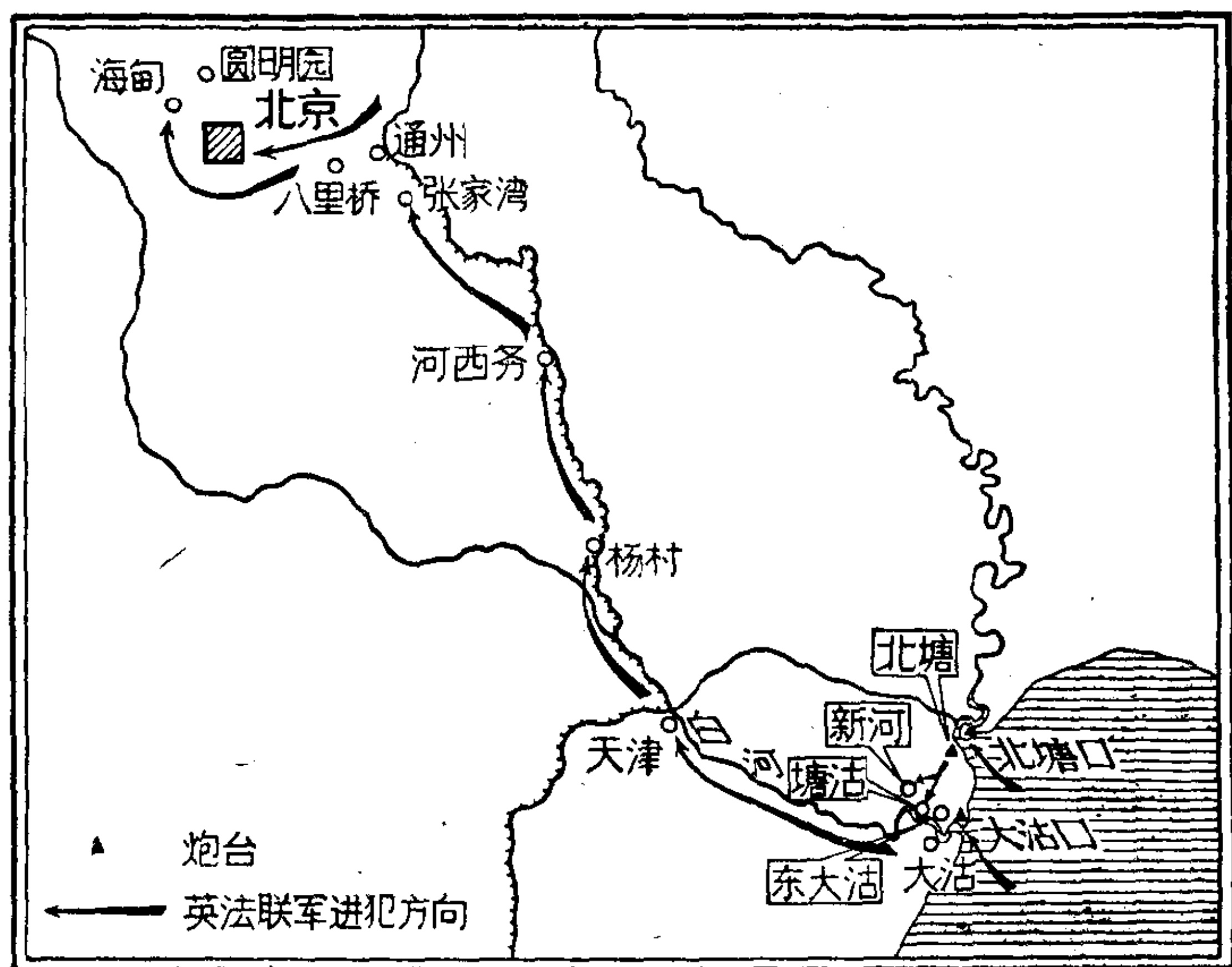
一八六〇年春，英军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余人，陆续到达中国。七月底，英舰一百七十三艘、侵略军一万零五百名，法舰三十三艘、侵略军六千三百名，又闯到大沽口外。先期到达的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率领四艘军舰到处刺探情报，发现北塘毫无戒备。八月一日，在沙俄侵略者指引下，英、法军舰三十多艘乘虚而入，未经战斗就占领了北塘。十二日，侵略军万余人攻新河，手持马刀的中国骑兵三、四千人，分两路奋勇迎战，猛烈冲锋，一气夺得英军大炮三门。连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的爱国士兵是“最优秀的骑兵”，“无人能比他们更勇敢地前进”。在侵略军猛烈的炮火下，许多骑兵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维护民族尊严而血染沙场。十四日，侵略军攻占塘沽，包抄后路，大沽炮台陷入腹背受敌、孤立被围的险境。二十一日，大沽北岸炮台被英、法侵略军攻占，主持防务的科尔沁亲



被英法联军攻陷的大沽炮台

王僧格林沁，一口气逃到通州；贪生怕死的直隶总督恒福，强令各营“竖立免战白旗”，将南炮台拱手献敌。英、法侵略军沿白河长驱直入，二十四日占领了天津城。

天津失陷以后，清政府连忙派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求和。英、法侵略者漫天要价，除不许丝毫更改《天津条约》外，又提出天津开埠、增加赔款、公使带兵换约等新条件。咸丰帝犹豫不决，特别对公使带兵换约这一条，顾虑重重。侵略者存心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城下之盟”，因此悍然中止谈判，直扑通州。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侵犯京津图

咸丰帝一面下令僧格林沁在通州布防，一面赶紧派怡亲王载垣赴通州议和，接受了侵略者提出的全部要求。但是，侵

略者欲壑无穷，九月十七日，英、法谈判代表巴夏礼又节外生枝，向载垣提出了两个新的条件：一是进京后要面见咸丰帝，亲递国书；一是要清政府立即撤除北京周围的防御。前一条，清帝认为是“国体所存，万难允许”，如欲亲递国书，必须跪拜为礼，无论如何要保持这最后一点封建皇帝的威严；后一条，等于要清政府解除武装，更难接受。因此，“谈判”再度破裂。

九月十八日，英、法侵略军突然发炮，猛轰通州前沿张家湾清军阵地；二十一日，又向位于通州入京要道的八里桥发动总攻。驻防张家湾和八里桥一带的清军，共三万余名，由曾经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蒙古骑兵头子僧格林沁率领。在侵略军几百枝步枪的密集射击下，清军骑兵溃散，张家湾失守，通州陷敌。八里桥一仗，清军下层爱国官兵勇猛还击，战斗坚持两小时，侵略军遭受很大损失。八里桥失陷之后，侵略军打开了进犯北京的通道，只是由于人力的消耗太大，才不得不在通州停留半个月，以待天津援兵和军火的补充。

当英法联军的铁蹄，由通州向北京步步进逼时，咸丰帝也曾慷慨表示，要“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但他心里想的，却是准备逃跑。张家湾、八里桥战败之后，咸丰帝心胆俱裂，由“御驾亲征”一变而为向热河狂奔。他的弟弟恭亲王奕訢(xīn 心)，被留在北京“督办和局”；他手下那群畏敌如虎的王公大臣们，干脆“开门揖盗”。十月十三日，英、法侵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北京安定门。一座封建王朝的京城，就这样轻易地陷入外国侵略者的魔掌。

封建统治阶级走的是投降路线，中国人民走的却是抵抗路线。京、津一带人民义愤填膺，决心拿起武器，和侵略者血战到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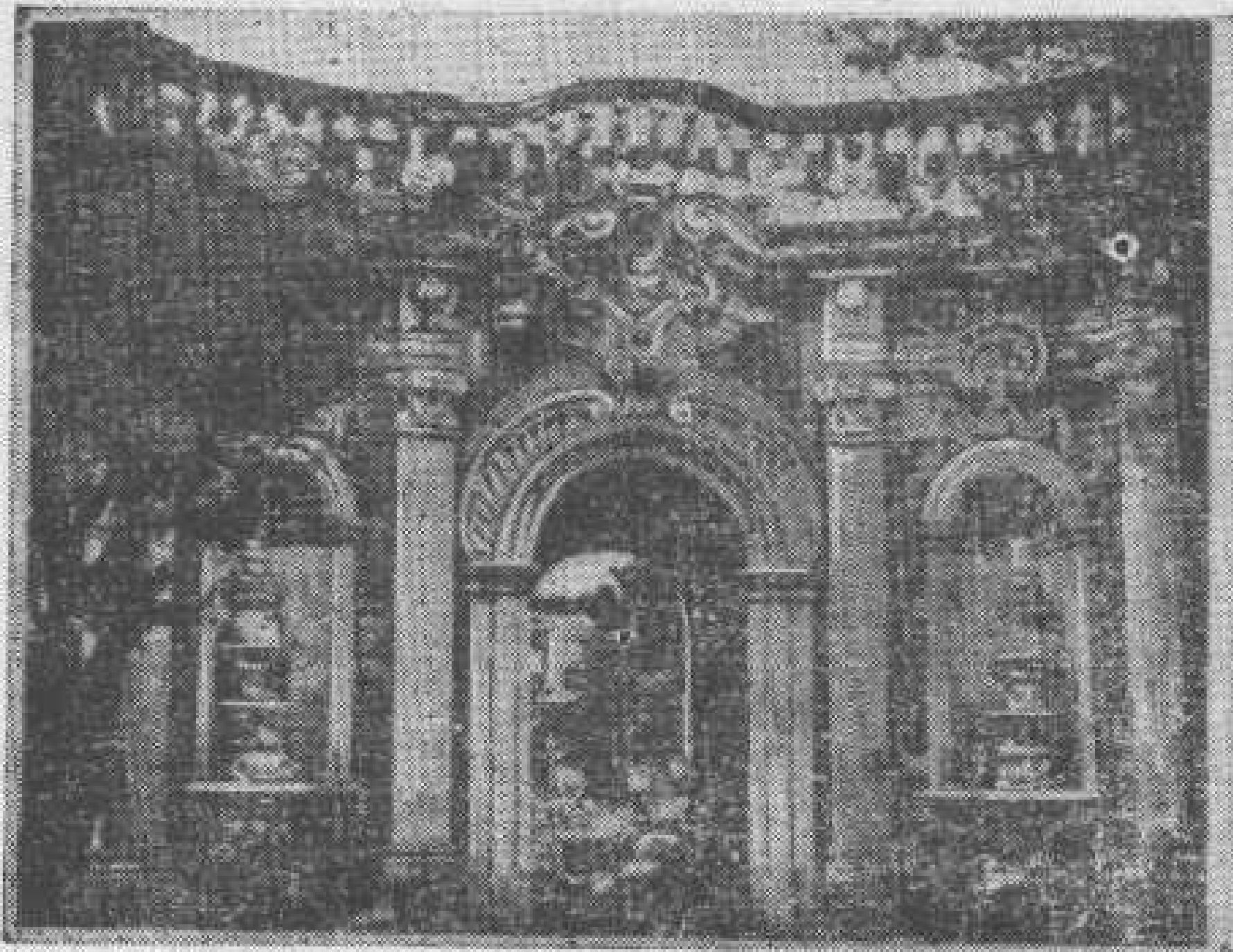
九月间,天津人民王兴邦、隋登初等,自动组织起来,焚烧敌船、截杀敌军。十月,北京西郊谢庄人民举办团练,在猎户冯三保率领下,隐蔽于石寨、土堡,待侵略军接近,才众枪齐发,打退了约一百名侵略军的进攻。为了防备敌人报复,冯三保的女儿冯婉贞,集合了一批少年猎手,在离村四里的树林中埋伏。果然,侵略军拖着大炮向谢庄扑来,当敌人走近时,冯婉贞率众突然杀出,冲进敌群,“挥刀奋砍”。侵略军惊慌失措,炮火又无法展开,只得匆匆上刺刀应战。猎手们奋勇杀敌,所向披靡,侵略军仓皇败退。勇士们咬住不放,谢庄人民也赶来助战。直至傍晚,侵略军死伤累累,其余的丢弃大炮,狼狈溃逃,再也不敢来谢庄侵扰。

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外国侵略军面前,中国人民是巍然屹立的巨人,是宁肯战斗死、不愿跪着生的铮铮铁汉!“惧夷者,官也,非民也。”流传在当时天津民间的这段话,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害怕外国侵略者的丑态。

英法联军侵犯北京期间,烧杀淫掠,无恶不作。火烧圆明园,是其中最令人发指的罪行。

圆明园座落北京西郊海淀附近,周围三十里,是专供地主阶级总头目清朝皇帝奢侈享乐的别宫。从一七〇九年开始,清朝皇帝就从全国人民身上敲骨吸髓,集中难以数计的人力、物力、财力,经营这座宫苑(yuàn 怨)。圆明园是中国劳动人民精心创造的园林艺术的典范,是世界上最豪华瑰丽的宫殿之一。园内珍藏的金珠珍宝、铜瓷古玩、名人字画、孤本秘籍,以及古今中外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使它又成为一座闻名世界的伟大的博物馆、艺术馆和图书馆。

一八六〇年十月六日，英、法侵略军闯进圆明园。这群明火执仗的强盗，将圆明园洗劫一空，凡是能搬动的东西，统统抢走，背不动的，就赶大车和牲口搬运，拿不走的，则任意破



圆明园的拱门



被侵略者焚掠后的圆明园

坏、践踏，以至棒击，必至粉碎而后快。《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报道：“据估计，被劫掠和被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在场的每一个军人，都掠夺得很多。在进入皇帝的宫殿后，谁也不知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无价的瓷器和珐琅（fà láng 发去声 狼）瓶，因为太大不能运走，竟被打碎……许多人掠得三、四十磅纯金，另一些人则得到无价的珍珠和宝石。”从北京发出的这篇通讯，是侵略者贪婪、凶残、极端无耻的自画像。

圆明园遭受了万劫不复的灾难。为了消灭罪证，额尔金决定将圆明园全部烧毁。十月十八、十九日，三千五百名侵略军奉命出动放火，圆明园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大火三日不熄，烟云漫天，这座瑰丽宏伟的宫苑，竟被万恶的侵略者烧剩一堆瓦砾。

最“文明”的国家，用最野蛮的方式毁灭了圆明园，这件事，典型地暴露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的野蛮本质。

英、法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在国内受到了人民的谴责。连法国资产阶级文学家雨果也痛斥：“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篋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

圆明园余烬未熄，恭亲王奕訢就在沙俄公使伊格纳切夫的“调停”和“保护”下，向英、法侵略者屈膝求降，未经任何谈判，接受了全部侵略条款。一八六〇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清政府与英、法先后签订《北京条约》。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二，增开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拐卖人

口,出洋做苦工;四,割让九龙司给英国;五,赔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六,赔偿英、法军费各八百万两。

美国因国内南北战争行将爆发,驻华公使华若翰不在中国,没有和清政府另订新约。但根据“一体均沾”的惯例,照样享受到了英、法通过侵略战争所取得的各项殖民特权。

沙俄借口“调停”有功,趁火打劫。十一月十四日,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详下节)。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政府与英、法、俄分别订立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告终。十一月,英、法侵略军趾高气扬地退出北京。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后果是严重的。

一、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空前劫夺和蹂躏。英国霸占了“九龙司地方一区”。沙俄吞并了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是劫夺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侵略国家。

二、外国侵略者通过公使驻京,和扶植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的洋务派贵族官僚,大大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政治控制;清政府通过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支柱和走狗。此后,主子与奴才狼狈为奸,结成反革命同盟,联合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三、中国的通商口岸,由原先的东南五口,扩大为十六口,分布于沿海和长江的十个省。战后,外国商品和鸦片输入急剧增加,从中国掠夺出口的农副产品和其他原料也急剧增加,在经济上大大加速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

四、外国侵略者由协定关税扩大为直接把持中国海关后,凭借对关税的控制和支配,不仅从财政上掌握清政府的命

脉，而且在政治上也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海关被外国侵略者控制，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五、外国侵略者由只能在五口活动，扩大为可以随便进入内地传教、游历。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加强文化侵略和精神麻醉，为非作歹，无法无天。间谍、特务或利用传教，或借口游历，深入中国内地，收集情报，干着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

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清王朝的闭关政策完全失败，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更加广泛深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

四 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沙皇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本来同中国并不接壤。十六世纪八十年代，沙俄越过欧、亚交界的乌拉尔山，迅速向东扩张。一六四三年，第一批沙俄侵略者一百三十多人，由西伯利亚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他们烧杀抢劫，残暴成性，这年的冬天，甚至象野兽一样，吃掉了五十多个中国居民。他们蓄意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地区，因此，从十七世纪中叶起，沙俄就和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

一六八九年，中、俄签订第一个边界条约——《尼布楚条约》，规定了中、俄东段边界，肯定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两岸的广大地区，除乌第河地区待议外，都是中国领土。一七二七年，又签订中、俄《布连斯奇界约》，规定中、俄中段边界（这段边界目前大部已成为蒙、苏边界）。至于当时中国西部疆界巴尔喀什湖，同沙俄疆界相距还很远，根本不发生

交界问题。

但是，对于中国黑龙江流域和滨海等地，沙俄侵略者一直馋涎欲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①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沙俄却逐渐成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一八四七年，沙皇尼古拉一世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侵略中国的急先锋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配置大量兵力，步步入侵，将魔爪伸向中国黑龙江地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沙俄认定侵占中国领土的时机已到，便勾结西方列强，军事威胁与外交讹诈双管齐下，鲸吞中国东北和西北大片领土。

被斯大林斥责为“东方民族的恶魔”^②的沙俄，在一八五〇年强占了中国黑龙江口的庙街，并以沙皇名字命名为尼古拉耶夫斯克。尼古拉一世感到十分高兴，指着地图上庙街一带地方狂妄地宣称：“俄国的国旗不论在哪里一升起来，就不应当再降下去。”沙俄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扩张领土。一八五三年底，穆拉维约夫在给沙皇政府的秘密报告中提出：“目前中国的内乱（按：指太平天国革命），正是开辟黑龙江航线的大好时机。”一八五四年五月，这个家伙亲自率领舰船七十五艘，载运一个步兵大队、一个哥萨克骑兵中队和一个山炮队，气势汹汹地闯进中国内河黑龙江，公然在下游一带建立大批军人村屯、炮台和兵站，实行军事占领，叫嚣要“充当中国的保护者”。一八五六年底，沙俄非法在中国黑龙江流域设立滨海

① 《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四——三五页。

② 《关于东方革命运动》，《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一九〇页。

省。到一八五七年，又乘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清朝政府无力北顾之机，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了一万六千名步兵、五千名骑兵、一千名炮兵，配备大炮四十门，建立哨所，屯兵筑垒，造成强占黑龙江上、中游北岸和下游两岸中国领土的既成事实。恩格斯当时就指出：“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①

沙皇一手拿着大棒，派穆拉维约夫强占中国黑龙江大片领土，进行赤裸裸的军事威胁；一手挥动“橄榄枝”，派遣海军上将普提雅廷出使中国，进行外交讹诈，逼签割地条约。

普提雅廷在同穆拉维约夫密商后，于一八五七年八月乘兵船到达天津。他以帮助清政府“抵抗”英、法侵略和“迅速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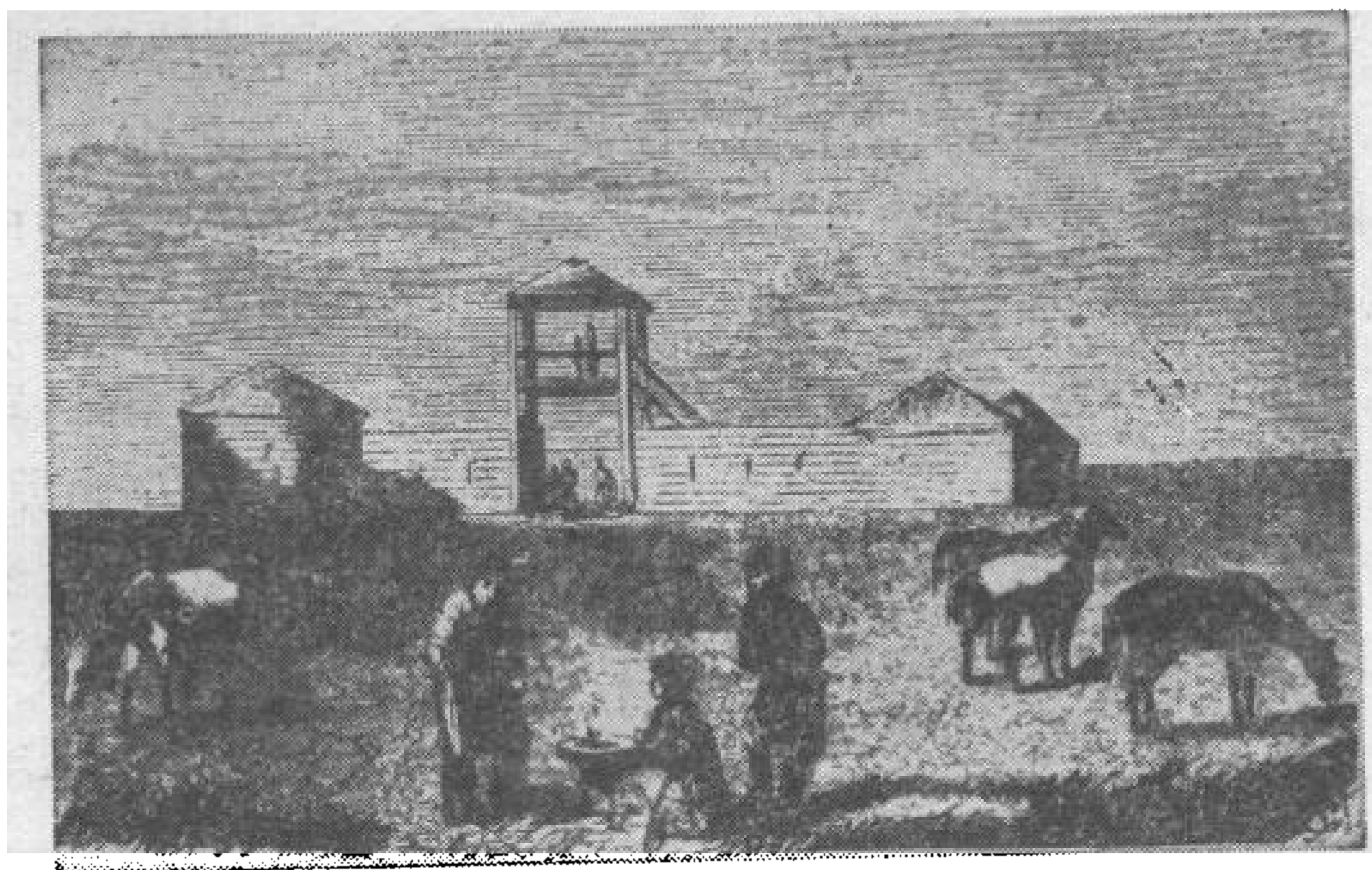


侵入黑龙江地区的沙俄船“贝加尔”号

^① 《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一页。

平叛乱”，即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诱饵，提出了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中、俄两国界河的领土要求。清政府回答说：中、俄两国东段边界早经《尼布楚条约》划定，“当时立定界牌，永垂不朽，无可再议”。普提雅廷一计未成，又生一计，十一月底赶到香港，和英、法、美侵略者勾结，以售其奸。他向额尔金和葛罗献计：“除去对北京直接施加压力之外，对中国政府没有其他办法。而使这种压力生效的最好手段，莫过于将吃水较浅的军舰，径直开进白河。”并指出，五、六月间是军事行动的最好时机。第二年三月，当清政府拒绝在上海和英、法、美、俄四国侵略者举行谈判时，普提雅廷又进一步建议：“只有一个办法可以取胜，即占领天津，直接威胁北京。”普提雅廷的所作所为，彻底暴露了沙俄侵略者的狰狞面目。

一八五八年四月，英法联军到达天津白河，五月二十日攻占大沽，清政府被迫接受天津谈判。谈判过程中，普提雅廷大搞阴谋诡计，他一面竭力怂恿英、法侵略者，对清政府“使用武



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北岸建立的军人村屯

力”，叫嚷“只有在施加巨大压力和突然采取行动的情况下，才能迫使它让步”；一面又以“调人”的身份，从中渔利，利用清政府害怕战争的心理，逼它接受无理的领土要求，捞取最大的侵略权益。

一八五八年六月十三日，普提雅廷抢在英、美、法之前，诱迫清政府订立中、俄《天津条约》，沙俄除原有的陆路通商权外，又取得了中国东南沿海及长江各口的通商权、内地传教（东正教）权、领事裁判权，以及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沙俄不仅享受到了其他侵略国在中国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一切殖民特权，还居心叵（pǒ 破上声）测地在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条中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后来的许多事实表明，所谓“秉公查勘”，无非是沙俄借勘界为名，一再侵吞中国领土而已。

与普提雅廷的外交讹诈相呼应，沙俄外交大臣指示穆拉维约夫：“必须趁着清政府还在同英、法交战，而又急需调整对俄关系以对付英、法的时候，不失时机地结束对中国的谈判。”于是，五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英法联军侵占大沽口的第三天，穆拉维约夫突然率兵二百余人，在两艘炮艇的护送下直驶瑗琿（ài huī 爱灰，今爱辉），向黑龙江将军奕山提出狂暴的领土要求。谈判一开始，穆拉维约夫就拿出早已拟定的条约草案，宣称“以河（黑龙江）为界字样，断不能改”，强迫奕山签字画押。奕山反驳说：《尼布楚条约》“从无更改”，“断难迁就”。穆拉维约夫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大声喧嚷：“我不能再等了”，如果不从，就要联合英国对华作战。接着，就在黑龙江出动军舰示威，开枪放炮，进行武力威胁。

屈服于沙俄大炮的压力，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奕山

被迫签订不平等的《璦琿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割去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穆拉维约夫这个猖狂的殖民强盗，也因侵华有“功”，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破格晋封为“阿穆尔(黑龙江)伯爵”。

对于中、俄《天津条约》和中、俄《璦琿条约》的侵略本质，恩格斯曾经在一八五八年十月尖锐地加以揭露，指出：沙俄“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①“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②

然而，贪得无厌的沙俄侵略者，仍不满足。《璦琿条约》签订后十多天，穆拉维约夫又着手鲸吞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从一八五八年六月起，沙俄侵略者就占领中国城镇伯力，改名哈巴罗夫斯克，以此为据点，多次派兵派船，侵入黑龙江、乌苏里江甚至松花江，并在乌苏里江东岸建立几十个军人村屯、设置炮台、测绘地图、移动界标。对于这些罪行，穆拉维约夫直认不讳，他说：“现在我正下令，将全部中国官吏和哨卡，都从乌苏里江右岸(即东岸)驱逐到左岸去，并命令将抗拒者用武力加以逮捕，押往璦琿。”一八六〇年六月，沙俄侵略者强占重要港口海参崴(wēi 威)，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思是“统治东方”)，进一步暴露了它的殖民野心。

造成一个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然后强迫订约割地，这是沙俄侵占中国领土的惯伎。当穆拉维约夫操刀肢解乌苏里江

① 《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三九页。

② 同上书，第三七页。

以东地区的中国领土时，沙皇又派遣他的忠实走卒、近卫军将领伊格纳切夫，为新任驻华公使。

伊格纳切夫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到达北京。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一会儿花言巧语地骗，一会儿凶相毕露地吓，诱迫清政府将乌苏里江以东领土割给沙俄，否则，“俄国必定能比其他海上列强，更容易给中国以猛烈的致命的打击。”清政府当即指出：乌苏里江以东“系中国地方，岂能擅行借给外国占住。倘有人到贵国侵占地方，贵大臣等岂肯允从？”伊格纳切夫讹诈未成，第二年六月由北京赶到上海，同额尔金、葛罗会见，为英、法侵略军出谋献策，怂恿他们早日进攻北京，以便借助英、法侵略者的军事压力，重演趁火打劫、从中渔利的老把戏。

叫嚷“用武力狠狠教训中国政府一顿”的，是伊格纳切夫；提供情报，指引英、法侵略军乘虚而入，由北塘登陆的，是伊格纳切夫；给英、法侵略军送最详尽的北京地图，“指出城防最薄弱的地点”，同英、法一起研究攻城计划的，也是伊格纳切夫。这样可恶的一个帮凶，居然出来“调停”，装成“公正的保护者”，宣称“只有俄国真诚地对清朝友好”。

更不知羞耻的是，沙俄吹嘘自己“调停有功”。究竟对谁“有功”？还是让法国侵略者来回答吧！他们坦白地说：“我们全靠伊格纳切夫将军的斡(wò)旋，才使恭亲王迅速地作出(投降的)决定”。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伊格纳切夫一面向恭亲王奕訢丑表功，说是“如果一些强国不进行干涉，强迫英、法撤军，那么，外国鬼子就会占领你们的国家”。一面向清政府伸手，说：“俄国所要求的报偿，只不过是一些对中国毫无价值的

边境领土。”还公然威胁说：“兵端不难屡兴”，“你们国家与我国有一万俄里长的陆地边界，俄国在你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给以不可抗御的打击，都是轻而易举的事”。甚至“把联军叫回来，也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清政府这时惊魂未定，深怕沙俄勾结英、法再来寻衅，于是完全屈服。

一八六〇年十一月十四日，沙俄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北京条约》，将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大片中国领土，由《璦琿条约》规定的所谓“共管”变为割让沙俄，又霸占了中国领土四十万平方公里。同时，沙俄蓄意侵占中国西部领土，在第二条中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中国境内的山岭、大河作为两国划界的标志。接着，沙俄又根据中、俄《北京条约》的规定，在一八六四年十月七日，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口吞了下去。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沙俄一面派出庞大的兵力，对中国边境领土实行直接军事占领；一面扯起“中立”的破旗，打着“调停”的幌子，借助英、法的武力，趁火打劫。它不仅攫取了和英、法、美同样的侵略特权，还吞并了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一八五八年以后，每签一次条约，每勘一次边界，沙俄就从中国割去一块领土，其野心之大、行为之卑劣、伎俩之阴险，是历史上少见的。连英国外交大臣也是又眼红又恼火地破口大骂：“象俄国这样，用极其方便而狡诈的手段，获得那么肥沃的土地，在世界上实在难以找出第二个！”

身受其害的中国边疆各族人民，对沙俄侵略者“无不切齿同仇”、英勇抵抗。一八五〇年，沙俄侵略者在黑龙江口附近

刚登陆，两百多个村民就将他们团团围住，提出严重抗议。一八五五年，西北塔尔巴哈台地区中国居民五、六百人，愤怒谴责沙俄侵略者的杀人暴行，烧毁他们的贸易圈子，赶走了这群吃人的豺狼。一八六〇年，分布在乌苏里江以东、采捕为业的广大人民，二、三个月内就设营一百五十余座，组织起一万多人的反侵略队伍。各地少数民族人民，拿起猎叉、斧头，同沙俄侵略者英勇搏斗。居住在阔吞屯附近的三十户赫哲族人民，带着牲畜船只向松花江一带迁移，宁死不做沙俄的奴隶。一八六八年，海参崴东南青岛地方的中国淘金工人，英勇反抗沙俄殖民统治，用火绳枪和刀、剑打死打伤沙俄官兵十多人。喜讯传开之后，苏城等地人民首先与青岛起义群众联合起来，烧毁黄岛、石庙子、蚂蚁塘一带的沙俄军事哨所，围攻侵略者设在沿海地区的军人村屯，狠狠打击了沙俄殖民强盗。直到八十年代，一个俄国军官在给沙皇政府的报告中，还无可奈何地哀叹：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无论是汉人、赫哲人还是鄂伦春人，“都不服从俄国政权，而只服从中国政权”，“彼等常欲脱我羈(jī 机)绊”。

历史证明：“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①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第四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英勇斗争

一 天京上空的乌云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在广州和京、津地区燃烧时,太平天国革命正经历巨大的波折,逐渐由盛转衰。

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全盛时期,是一八五六年夏天。当时,从武汉到镇江,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以波涛滚滚的长江为大动脉,东西畅通,南北呼应,各个战场捷报频传。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的上空出现了乌云。窃踞太平天国要职的地主阶级分子韦昌辉,利用当时领导核心内部的矛盾,在天京策动了一场反革命暴乱。

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天京变乱是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

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内部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金田起义前,杨秀清就拥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地位;永安封王后,又一手控制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实权。在太平天国前期革命斗争中,由于洪秀全的指导和广大军民的支持,杨秀清是立了功劳的。那时,太平军正和清政府进行生死搏斗,大敌当前,领导核心是团结的,阶级敌人钻不到空子。然而,定都天京后,情况不同了。东王杨秀清居功自傲,飞扬跋扈(bá hù 拔护),独揽大权,

严重破坏了领导体制。为了树立自己的威权，杨秀清任意杖责（即鞭刑）高级将领，甚至借用代天父传言的名义，要杖责洪秀全。这种独断专行，上欺天王、下压首义有功将领的恶劣行为，使太平天国的领导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领导核心内部的这些矛盾，给了韦昌辉以进行反革命屠杀的可乘之机。

韦昌辉阴忍残刻，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用反革命两面手法，麻痹洪、杨，骗取他们的信任。对洪秀全，他极力奉迎，以致洪秀全赞誉他“爱兄之心诚”，引为心腹。对杨秀清，他更百般谄媚，只要杨秀清的轿子一到，就三脚两步跑出来扶迎；同杨秀清说不上几句，就跪在地下连声说：“非四兄（指杨）教导，小弟肚肠嫩（才识短浅之意），几不知此。”有一次，韦昌辉的哥哥与杨秀清的妾兄争房屋，杨秀清要韦昌辉议罪，韦昌辉竟定了五马分尸的酷刑，以讨好杨秀清。韦昌辉口蜜腹剑，表面上处处阿谀洪秀全和杨秀清，骨子里却包藏祸心，蓄谋伺机而动，篡夺权位。

一八五六年八月，紧接着西征告捷和打垮江南大营，杨秀清被胜利冲昏头脑，个人野心恶性膨胀，又借“天父”下凡的名义，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来，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洪秀全为了维护革命利益和领导体制，一面许诺杨秀清生日（九月二十三日）加封，以便拖延时间；一面密召韦昌辉、石达开等回京处理，解决杨秀清威逼太甚的矛盾。

九月一日深夜，毒如蛇蝎的韦昌辉，带领亲信部队三千余人，赶回天京。二日凌晨发动突然袭击，闯入东王府，刺杀杨秀清，残害他的亲属、部众数千人，制造反革命屠杀事件。洪秀全责备韦昌辉不应滥杀无辜，韦昌辉奸诈地表示愿受杖责，九月四日，诱骗杨秀清部属解除武装去看他“受刑”，趁机埋伏

亲信，又进行了一次残酷的大屠杀。两个多月时间里，两万名身经百战的太平军骨干及其家属，在韦昌辉策划的反革命暴乱中牺牲了。反革命的清军在战场上做不到的事，却假手于混进革命领导核心的地主阶级刽子手韦昌辉办到了。

石达开得到事变消息，于九月中旬从武昌赶到天京。韦昌辉大权在握，感到石达开也是他的障碍，再动杀机。石达开闻讯连夜吊城从小南门逃往安庆。韦昌辉派兵包围翼王府，找不到石达开，就杀了他一门老小。

表现了地主阶级凶残本性的韦昌辉，不仅在天京继续“乱杀文武大小男女”，甚至举兵围攻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韦昌辉这一连串反革命暴行，激起广大太平军将士的无比愤慨。十一月，在洪秀全号令下，“合朝同心”，镇压了反革命暴乱，处决了韦昌辉及其死党二百余人。

天京变乱之起，杨秀清是有过错。但洪秀全念他对太平天国的贡献，事后，将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九月二日）定为“东升节”（东王升天之意），以志纪念。至于反革命罪魁韦昌辉，一直被太平天国和革命人民唾弃，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韦昌辉被诛后，石达开回京辅政。洪秀全鉴于杨秀清专权及韦昌辉变乱的教训，对石达开存有戒心，在任命他“提理政务”的同时，又封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与石达开同理政事，加以牵制。石达开借口洪秀全“重重生疑忌”，竟独树一帜，分裂革命。一八五七年五、六月间，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带领十多万太平军精锐部队踏上了分裂主义的道路。

野心家石达开出走后，决定远征四川，自立一国。他带兵

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处处失利。一八六〇年，石达开在广西招兵买马，改变太平天国制度。这时，大部分官兵觉悟到分裂的错误，强烈要求“万里回朝，出江扶主”。第二年，吉庆元、彭大顺、朱衣点等六十余名将领，各率所部“返旗回京”，在江西广信和太平军会师，回到了革命的怀抱。消息传来，洪秀全十分高兴，授予这支军队以“扶朝天军”的称号。石达开众叛亲离，一意孤行，便从广西带兵经湖南、湖北、贵州、云南进入四川。一八六三年五月，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今安顺场），陷入清军重围，抱着“真心投诚，或可侥幸免死”的可耻目的，向敌人投降。但是，清政府并没有放过他。结果，部下被杀，他自己也在六月二十五日做了刽子手的刀下鬼。

天京变乱使太平天国大伤元气，革命形势急剧恶化，清军趁机猖狂反扑。西线，湘军于一八五六年底攻陷武昌、汉阳；一八五八年五月，李续宾所部攻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及全军一万七千余人，英勇战死。东线，清军重建江南大营，一八五七年底攻陷镇江；第二年四月，进驻雨花台，与江北大营隔江呼应，再度围困天京。刽子手曾国藩得意忘形，说是太平军已无路可走，“不患今岁不平”！

严重的挫折，险恶的敌情，吓不倒太平天国革命英雄。洪秀全自任军师，总理国政，及时提拔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等青年将领以及李秀成，联络在淮河流域有巨大力量的捻军首领张洛行等，发动攻势，坚决回击反革命的疯狂进犯。

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锻炼出许多真正的英雄，陈玉成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多年来，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冲向哪里。这时，陈玉成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前军主将的重任，为扭转危局

而英勇奋战。

一八五八年七月下旬，陈玉成会同李秀成，召集各路将领在皖北枞(zōng 宗)阳镇开军事会议，决定联合作战，先破江北大营。九月，太平军前后夹击，以浦口战役为重心，歼灭清军德兴阿、胜保所部万余人，大败张国梁援军。江北大营从此垮台，太平军再克扬州，天京与江北交通恢复，反革命的封锁又被打破。

正当太平军击破江北大营的时候，湘军悍将李续宾率重兵进犯安徽，一路攻陷太湖、潜山、桐城、舒城等安庆外围城市，十一月初，攻三河镇。三河镇在巢湖西岸，是太平军积聚粮食、军械，接济庐州、天京的重要据点。陈玉成得知三河镇告急，立即挥师西援，将气焰嚣张、孤军深入的敌人紧紧围困。十五日，陈玉成率军在金牛岭与李续宾所部决战。正值大雾弥漫，湘军“只闻人声，不知向处”，阵脚大乱。陈玉成这时从后方杀出，横扫敌军左路、中路、右路；太平军后援部队冲上阵来助战；三河守将吴定规，也从城内杀出接应。三路大军，一齐攻向敌营，经过一场短兵相接的鏖(áo 熬)战，太平军斩了李续宾和曾国华(曾国藩胞弟)，湘军精锐六千余人全部就歼。太平军乘胜追击，收复舒城、桐城等地，围攻安庆的清军闻风而逃。湘军头目曾国藩、胡林翼垂头丧气地说：“自三河败后，元气大伤”，“四年纠合之精锐，覆于一旦”。

捷报频传，乌云驱散，太平天国革命形势有了较大好转。不久，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于一八五九年四月从香港来到天京，参加革命。洪仁玕是一个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村塾教师，也是最早的拜上帝会成员之一。五月，洪秀全封洪仁玕为干王，委任他总理朝政。六月，又以陈玉成战功卓著，晋封为英王。

同年十二月，李秀成也被封为“忠王”。这样，就形成了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力量。

洪仁玕在香港等地长期居留，较多地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科学文化，了解世界大势，热烈地希望中国改变旧貌。到达天京几个月后，他怀着对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深切期望，向洪秀全提出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革新建议——《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开宗明义提出“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观点，主张太平天国按时代的潮流和形势的发展进行革新，造成一个“新天新地新世界”，使

“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

洪仁玕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借鉴，对太平天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提出整套革新方案。他建议：政治上“要自大至小，由下而上，权归于一”，加强统一领导，但要设立不受一般官吏节制的新闻纸和告密箱，沟通上下，发扬“公议”，听取社会舆论和群众意见；澄清吏治，禁止走后门和买卖官爵。经济上主张开矿山，办工厂，建设铁路、公路，疏浚河道，仿造火车、轮船，兴银



《资政新篇》

行,设邮局,奖励技术发明。外交上主张和资本主义国家平等往来、自由通商、交流文化,但不准外国干涉内政、“擅入内地”、“毁谤国法”。此外,洪仁玕还建议办学校、办医院,主张“文以纪实”,提倡移风易俗,禁止封建迷信。

洪仁玕企图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外国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基础上,兴办近代工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显然有进步意义,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对于这些革新建议,洪秀全大部分都批上了“是”、“可行”或“此策是也”等字样,表现了洪秀全向西方学习,“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①的强烈愿望。只有两条,洪秀全表示了不同意见。一条是设“新闻官”,专收十八省及万方新闻,洪秀全批道:“此策现不可行,恐招妖魔乘机反间,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一条是“勿杀”,洪秀全批道:“斩邪留正,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这两点,都反映出洪秀全坚持革命,坚持对阶级敌人专政,时刻警惕“妖魔”的破坏活动。《资政新篇》虽然颁布了,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和太平天国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却没能付诸实现。

二 巩固天京的战斗

一八六〇至一八六一年间,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的军事斗争,处于拉锯状态。清军逐步进逼,力图围困天京、扼杀革命。太平天国则以西线安庆保卫战为主,东线围歼江南大营为辅,为打破清军反革命包围、巩固天京革命政权而战。

一八六〇年初,清军江南大营在和春、张国梁指挥下,挖

^①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五四页。

壕数十里，筑营百余座，加紧围困天京。为了解救天京，保卫革命，太平军将士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战斗。洪仁玕提出：“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州）、杭（州）虚处力攻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pèi 沛）自救，必获捷报也。”这是一条“围魏救赵”、出奇制胜的妙计。按照洪仁玕制定的战略计划，李秀成、李世贤率部自皖南攻入浙江，三月，占领杭州。不出所料，江南大营果然分兵一万四千余人，急援杭州。太平军一面在城厢内外遍布疑旗，迷惑敌人，一面撤出杭州，迅速由小路回师，飞驰天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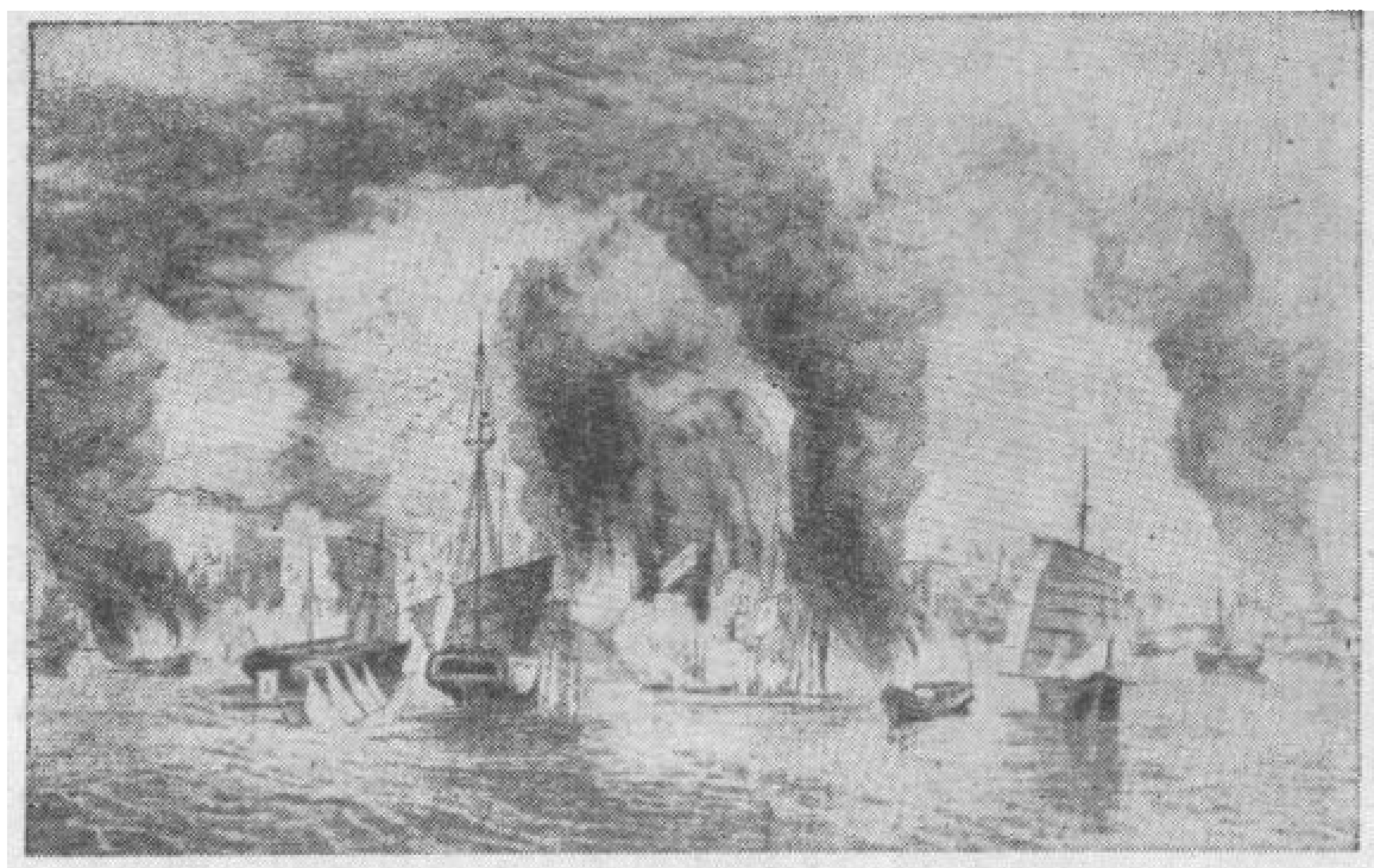
四月底，太平军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五路并进。五月二日，猛攻江南大营，城内驻军也分头出击，里应外合，打响了天京破围战。和春、张国梁招架不住，节节败退，太平军大获全胜，再次踏破江南大营。和春以烧酒吞服鸦片自杀，张国梁连人带马溺河而死。六月，太平军挥师东进，以凌厉的攻势，在不到两个月时间内，先后攻占常州、苏州、松江、嘉兴、临安等地，并以苏州为首府，建立了包括江南二十多个州县的苏福省。

江南大营的覆灭，解除了三年来清军顿兵天京城下的长围。江浙根据地的开辟，不仅在军事上屏障了天京，还为支持太平天国后期革命战争，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江浙地区的太平军，在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支持和欢迎下，镇压地主武装，建立地方政权，没收官僚豪富的财产，开展减租斗争，使这一带出现了生产恢复、商业活跃的繁荣景象。但是，由于有的地主武装混入了太平军，有些地方政权被地主豪绅把持，尤其严重的是，基本上允许地主收租，默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太平天国在江浙一带建立的根据地，是不很巩固的。

太平军在东战场的胜利,对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有重大影响。反革命方面,咸丰帝原来打算让湘军出死力攻安庆,由满族大员统率的江南大营破天京,夺头功,以抬高他们声望。现在,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派作钦差大臣,指挥大江南北水陆各军,付予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全权,湘军势力从此大进一步。太平军方面,严重的战略分歧由此而生——李秀成“顾己不顾人,顾私不顾公”,片面地重下游、轻上游,将苏杭繁华之地,看作自己的地盘,不顾关系全局的争夺上游之战。洪仁玕对李秀成指出:古人将长江比作长蛇,湖北为头,安徽为腰,江苏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中既折,其尾虽生不久”,形象而正确地说明了安徽战略地位的重要。

洪仁玕强调:“安庆一日无恙(yàng 样),则天京一日无险。”太平天国的死敌曾国藩,也把争夺安庆,作为打败太平天国的关键。他向咸丰帝献计:“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势,建瓴(líng 零)而下乃能成功。”就是说,他主张夺取安庆,造成自上而下的有利态势,以控制与占领南京,反革命用心十分险恶。一八六〇年上半年,湘军分三路步步进逼安庆;六月,攻占集贤关、枞阳镇,开始围攻安庆。

洪秀全亲自批准了由洪仁玕提出的,夺取武汉以保卫安庆的第二次西征计划。这个计划是正确可行的,因为,武昌是湘军后方重镇,势在必守;但湘军主力集中在安徽,武昌空虚。如果以大军攻其必救,湘军势必回援,这样不仅安庆之围可解,还能趁机歼灭湘军。一八六〇年九月底,北路军由陈玉成率领,沿长江北岸进军,从安徽入湖北;南路军由李秀成率领,计划从长江南面,经江西入湖北。南北两路大军,预定一八六一年四月在武汉会师。



太平军水师在长江与清军激战

陈玉成率领的北路军，“风驰雨骤，昼夜兼行”，一路奋战，势如破竹。一八六一年三月，攻克离汉口只有一百五十里的黄州（今黄冈）。当时武汉只有三千清兵，守备十分空虚。正在安徽助战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听到消息后急得吐血，连骂自己是“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赶紧调兵援救武汉。英王如果挥兵急攻，必能得手。但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这时出面干涉。英国参赞巴夏礼慌忙赶到黄州，威胁陈玉成说：武昌、汉口、汉阳“彼此相关”，“太平军夺取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难免不损坏整个大商港的贸易，因此我劝告你们必须远离该埠”。四月下旬，李秀成率领的南路军还杳无音讯，安庆又告紧急，陈玉成不得不率大军驰援安庆，同时分兵驻守黄州，以待南路太平军的会师。外国侵略者的蛮横干涉，李秀成的贻（yí 移）误军机，把偏处武汉的一群反革命，由绝处救活了。

李秀成的南路军，为什么不能如期赶到湖北，与陈玉成的

北路军会师呢？关键在于李秀成贪图苏杭，不顾全局，反对进取武昌。只是在洪秀全严令之下，才于一八六〇年十一月中，由芜湖迟迟而行，比陈玉成出师整整晚了一个半月。年底逼近湘军祁（qí 齐）门老营（指挥部）时，民贼曾国藩惶恐万状，惊呼“军事日危，旦夕不测”，“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之中”，预写遗嘱，准备一死了之。不料李秀成怕和湘军打硬仗，竟绕道行军，放过了曾国藩。在由江西到湖北的路上，李秀成又不顾会师期急，多处招收队伍，扩张势力，耽搁了许多日子。因此，拖到一八六一年六月，才到达武汉前沿，贻误了军机。不仅如此，当湘军胡林翼、鲍超等先后率部赶来时，李秀成又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不战而退”，陷入逃跑主义的泥坑。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就此夭折。

西征失败，使安庆保卫战更加艰难。安庆已被湘军包围了一年，曾国荃（quán 全）（曾国藩胞弟）深沟高垒，步步为营，在外围挖了三条长壕，一道用来阻挡城内太平军出击，一道用来防御太平军增援，一道用以护卫后方。五月，陈玉成在安庆外围，与曾国荃对阵，鏖战二十余日，不能取胜。湘军总兵力在五万以上，又有水军配合，“力求破安庆一关”。六月，赤冈岭沦陷，太平军主将刘玗琳（qiāng lín 枪林）被杀，所部四千余众全部牺牲。七月，太平军在安庆外围的据点，几乎全部陷入湘军手中。

面临危局，陈玉成坚韧不拔，八月上旬又组织进攻，增援安庆。陈玉成身先士卒，亲冒矢石，率领战士经过十几天奋勇作战，冲入集贤关，“掷草填壕”，突破了敌军第一道战壕。城内守将也率兵接应，猛扑敌营。但为深沟高垒所阻，终不能会合。一八六一年九月五日，清军用地雷轰塌西门城墙，安庆陷

落了。这时，城内“绝粮已久”，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吴定彩和战士一万余人，英勇抵抗，宁死不屈，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悲壮激烈的安庆保卫战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英雄们不怕牺牲、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人民怀念、歌颂！

安庆失陷后，陈玉成退守庐州。敌军一面四出追击，一面扑向天京，太平军处境非常不利。陈玉成虽受革职处分，仍然振作精神，化挫折为鞭策，继续为保卫安徽根据地、保卫首都天京而战。

第二年二月，湘军多隆阿部进逼庐州。五月，陈玉成率兵四千余人突围北走，前往寿州，不幸被明投太平军、暗通清帅胜保的团练头目苗沛霖诱捕。胜保先派人劝降，被英王骂退。接着，胜保亲自出场，令英王下跪，英王巍然挺立，痛斥败将胜保：“尔见仗即跑，在白石山踏尔五十营，全军覆没，尔带十余匹马抱头而窜。我叫饶尔一条性命。我怎配跪你？好不自重的物件！”面对骄妄的敌人，英王极端藐视地说：“若非中苗沛霖之计，亦不能将我擒住。”胜保还想劝降，陈玉成大义凛然，厉声喝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一八六二年六月四日，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就义，年仅二十六岁。

陈玉成是太平天国最优秀的青年将领，战场上英勇无畏，刑场上忠贞不屈，他把自己年轻的一生，献给了壮丽的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无愧于“英王”的光荣称号。

安庆失守，英王就义，湘军气焰嚣张。天京危急，革命形势空前恶化。太平军在江浙战场虽然取得了很大胜利，除建立苏福省外，一八六一年十二月还攻克了宁波、杭州；但这些胜利，终究无法弥补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安庆保卫战的失利。

三 痛打外国侵略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外关系的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外国侵略者为了巩固和扩大从清政府手中攫取的权益，对清政府由打到拉，互相勾结；对太平天国革命，则撕下了虚伪的“中立”面纱，进行赤裸裸的武装干涉。

在此之前，外国侵略者和清朝地方政府，早就有过勾结。上海在一八四三年开埠后，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基地。一八五三年九月，上海小刀会响应太平天国革命，在刘丽川领导下发动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外国侵略者一面宣布租界“中立”，一面和江苏巡抚勾结，在县城和租界之间筑起围墙，切断小刀会给养。买办出身的上海道台吴健彰，也在美国侵略分子营救下，从县城逃进租界。外国军舰连续发炮轰城，法国侵略军甚至配合清军攻城，屠杀起义军和居民。小刀会起义军奋战十七个月，最后粮尽弹绝，一八五五年二月，被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绞杀了。

正是在这段时间里，英、美、法三国侵略者，以“中立”为幌子，混水摸鱼，巧取豪夺，将租界变成它们在中国的殖民地。一八五四年，英、美、法侵略者不仅勾结清朝地方官员，抢夺了上海海关行政权，还扩大了租界特权，在租界擅自建立工部局，组织“义勇队”和巡捕，对中国居民行使征税权和司法权，推行一整套殖民制度，使租界变成了“国中之国”。

一八六〇年五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席卷江南，挥戈直指上海，外国侵略者感到极大恐慌。上海道台吴煦(xù 续)，不顾自己的中央政府正在和英、法交战，竟向敌人请求“救援”。英

国公使卜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决定以武力阻挠太平军的进攻。他们在五月二十六日联名布告中外，悍然宣称：“上海为万国通商口岸”，“余等与驻沪海陆军将领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任何暴动与抢劫；同时，上海内城也在保护之列，不使其蒙受外来攻击”。中国的领土竟要由他们来“保护”，岂不是十足的强盗逻辑！但是，清朝官僚和东南各省蚁聚上海租界的地主豪绅、富商买办，却将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外国侵略者当作救星。六月，按照买办出身的苏、松、太粮道杨坊的倡谋，组成了以美国军事流氓华尔为首、由两百名外国人和几百名中国人组成的臭名昭著的洋枪队。七月，华尔率领洋枪队袭取松江。这样，上海租界又成了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太平天国的反革命基地。

面对着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和军事挑衅，太平天国英雄们坚持民族独立，发扬革命大无畏精神，拿起武器，给予侵略军以迎头痛击。

一八六〇年八月初，华尔洋枪队在一万多名清军配合下，进犯上海西郊青浦。太平军在青浦旗开得胜，一举歼灭洋枪队三分之一，杀伤大量清军，缴获洋枪二千余支、大小洋炮一百多门、船数百艘。华尔身中五枪，被人用轿子抬着狼狈逃窜，同残兵败将一起退回松江。太平军和外国侵略者首次交锋，就大获全胜。

太平军乘胜收复松江，八月十七日进军上海城下，逼近英、法租界。当时负责东征军事的李秀成，不仅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缺乏警觉，甚至还盼望同外国侵略者结成“新盟”，未攻上海之先，他就向外国公使宣告攻城日期。十八日，李秀成带兵三千，进驻徐家汇，以为用不着经过严重的战斗，就能

轻取上海。但是，在城头迎接李秀成的，却是英、法侵略军的枪炮。太平军在进攻县城西门、南门和租界时，遭到侵略军的轰击，受到严重伤亡，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还隔租界炮轰太平军阵地。这时，后方嘉兴又遭清军进攻，太平军不得不在二十二日退出上海。东征的最后目标——攻取上海，就这样被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干涉，和李秀成的玩忽轻敌破坏了。

同年十月，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清政府投降外国侵略者，中外反革命的勾结迅速完成，他们把枪炮一齐对准了太平天国。

英国首相帕麦斯顿，马上宣布对华政策说：“全局的情况现已改变了。从前中、英为仇敌，今则我们与中国政府已有极友善的关系”；公开声明要“援助”反动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令中国内部全局得入正规”。法国公使立即表示：愿为清政府“助剿”太平军，而且“停泊各口之船只兵丁，悉听调遣”。据清朝官员报告，沙俄公使也提出：“请令中国官军于陆路统重兵进剿，该国拨兵三、四百名在水路会击，必可得手”，还主动送给清政府一批洋枪洋炮。

被太平天国革命烽火烧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的扶植和救援感激不尽，当即提出“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的卖国方针。恭亲王奕訢主张：对洋人应“遣使通好”，以消除“心腹之害”——太平天国。清政府急令江苏巡抚：“所有借师助剿，应克日办理。”曾国藩不仅和他的主子一样，奴颜婢膝地投靠外国侵略者，弹起“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的滥调，而且提出了一套汉奸哲学，严令部下对洋兵“平日则言必忠信，行必笃（dǔ 赌）敬；临阵则胜必相让，败必相救；

但有谦退之义，更无防范之方”。对革命人民，他们是狼，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对外国主子，他们是羊，是俯首帖耳的奴才。

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清政府为了统一前线清军的指挥，授予曾国藩以节制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军政大权。曾国藩亲率湘军主力，督曾国荃从长江上游攻天京；左宗棠率另一支湘军攻援浙江；李鸿章领淮军由安庆赶往上海，对太平军作战。这三支反革命武装，从军事、政治到经济，都得到英、美、法侵略者的大力支持，成为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进攻太平天国革命的凶恶工具。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反动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被曾国藩看中后，纳入湘军，任为帮办军务，招兵买马，扩充湘军实力，在领军作战过程中，取得了反革命实战经验，入浙不久，就任浙江巡抚，勾结外国侵略军，疯狂屠杀中国人民。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进士出身，以曾国藩为师，投入湘军作幕僚。一八六一年，奉曾国藩之命，按照湘军的模式，在安徽招兵。李鸿章纠合地主武装，于一八六二年春，编成淮军七千人，乘英国轮船由安庆到上海。四月，由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淮军是继湘军后，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支反革命军阀武装。

外国侵略军赤裸裸的武装进攻，反革命湘、淮军的气势汹汹，都吓不倒太平天国英雄。

这个时期，中国人民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太平天国的领导者，曾以宗教形式的相同，误认外国侵略者为“洋兄弟”，满想他们会严守“中立”，以致缺乏应有的革命警惕，在第一次进军上海的战役中，吃了大亏。但是，吃

一蜚长一智，当革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看到了“洋人助妖”这个严酷的现实，就毫不犹豫地同外国侵略者对阵，以牙还牙，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军乘浙江大胜之势，从苏、杭五路进兵，接连攻克奉贤、南汇、川沙、金山等地，吹响了第二次进军上海的号角。太平军在布告和公函中，严正警告外国侵略者，不得“助逆为恶”，否则“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二月，反革命势力急忙在上海组织“中外会防局”，筹划对策。英、法侵略军一千五百余人在上海分区“布防”，不足，又从香港、厦门、天津增调英军数千；华尔洋枪队改称“常胜军”，扩编至五千人；连同刚刚赶到上海的李鸿章的七千淮军，结成中外反革命联合武装。在英国侵华海军司令何伯指挥下，侵略军气焰嚣张，“约同新到之俄国兵数十名”，倾巢而出，向太平军阵地疯狂反扑。四月初，侵略军在离城三十里的罗家港战斗中，受到太平军的严惩。华尔这个亡命之徒，带领“常胜军”三次冲锋，都败下阵来。太平军炮火一阵阵射向敌人，何伯负伤，喽罗溃逃，侵略者尝到了太平军铁拳的滋味。

四至五月，装备精良的侵略军频繁出击，但在太平军的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他们在太仓吃了一次败仗，在嘉定吃了两次败仗，在青浦吃了三次败仗。耀武扬威的法国海军司令卜罗德上将，被太平军打死在战场，英国海军司令何伯中将负伤，所谓“常胜军”成了常败军，连副统领美国人法尔思德，也被太平军活捉。五月间的太仓激战，太平军打死外国侵略军数百人，摧毁清军营垒三十余座，歼灭五千余人，缴获了大量洋枪洋炮。接着，再克嘉定、南翔。六月，青浦一仗，慕王谭绍光又率领太平军，几乎全歼“常胜军”一个团。

太平军威震浦江两岸，侵略军闻风丧胆。左宗棠、李鸿章供认：“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洋人敛(liǎn 脸)兵不动”，龟缩上海再也不敢出战。可惜的是，天京这时因湘军进逼而告急，天王一日三诏，太平军主力不得不回师西援。中外反革命得到了一个喘息和复苏的机会。

与进军上海同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在浙江战场和外国侵略者也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八六二年五月，英、法侵略军出动军舰六艘、陆战队四百余人，伙同清军进攻宁波。太平军坚决抵抗，击毙法军舰队长格尼和英军舰长二名，在给予敌军大量杀伤之后，才主动撤离。侵略者感到太平军是个强对手，于是，仿照上海洋枪队先例，在浙江组织了中法、中英混合军（“常捷军”、“定胜军”），还把华尔“常胜军”也调来浙东。九月，太平军在慈溪击毙华尔，使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美国流氓，受到了应得的惩罚。华尔死后，“常胜军”统领几经更换与争夺，一八六三年三月，才由参加焚掠圆明园的英国侵略军军官戈登接任。

援救天京的太平军，和湘军恶战四十六天，没有能取得破围战的胜利。中外反革命联合武装，却乘太平军主力集中天京周围之机，从江浙战场疯狂出击。

一八六三年，太平天国的处境已经非常不利。

江苏方面——一月，常熟守将骆国忠叛变投敌，为反革命进攻苏南打开了缺口。五、六月，太仓、昆山相继失陷。九月，敌军直逼苏州。洪秀全号召全军：“人人当奋勇与敌人及其番鬼盟军作战！”忠诚革命的慕王谭绍光，在苏州率领太平军，修筑坚固的城防工事，誓死抵抗，反革命联军陈尸于坚城之外，不能越雷池一步。曾经投身太平军战斗的英国朋友呤喇，在

《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一书中提到：太平军“在他们的英勇的首领的激励之下，以大丈夫的气概，冒着二十门左右的大炮在三小时内射出的猛烈炮火，始终据守在自己的阵地上”，“勇敢地屹立不动，寸土不让”。连戈登也不得不承认：太平军“战斗得非常英勇”，“阵地非常坚固”。

李鸿章和戈登见硬攻不行，就向谭绍光诱降。谭绍光以更加勇猛的战斗，回答了敌人的无耻勾当。纳王郜(gào 告)永宽等八人，准备献城投降，李秀成明知其事，却向叛徒们大开方便之门。他说：太平天国“其势不久”，投降之事“皆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甚至表示：“我乃国中有名之将，有何人敢包我投乎？”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叛徒嘴脸。十一月三十日，李秀成自带亲信离开苏州。十二月四日，叛徒郜永宽、汪安钧等，刺杀慕王谭绍光，拱手献城。苏州陷入反革命魔爪，太平军将士两万余人，惨遭李鸿章屠杀。叛徒们以太平军战士的头颅献媚敌人，但第二天却都被李鸿章杀了，叛徒的下场就是如此！

浙江方面——太平军继续严惩法国侵略者。一月，在绍兴击毙“常捷军”统领勒伯勒东；二月，又打死继任统领达尔地福；三月，太平军因弹药不继，主动撤出，侵略者才进占绍兴。九月，左宗棠勾结德克碑“常捷军”，攻陷富阳，进犯杭州。后经七个月恶战，遭到重大伤亡，才于一八六四年三月攻陷杭州、余杭。

苏、杭尽失，太平军在江浙的战局，已呈瓦解状态，革命到了存亡危急关头。然而，守卫金坛、常州一带的太平军，坚持战斗，决心与阵地共存亡，表现了革命战士不畏强敌的英雄气概。三月金坛之战，侵略者使用了极为猛烈的炮火，三次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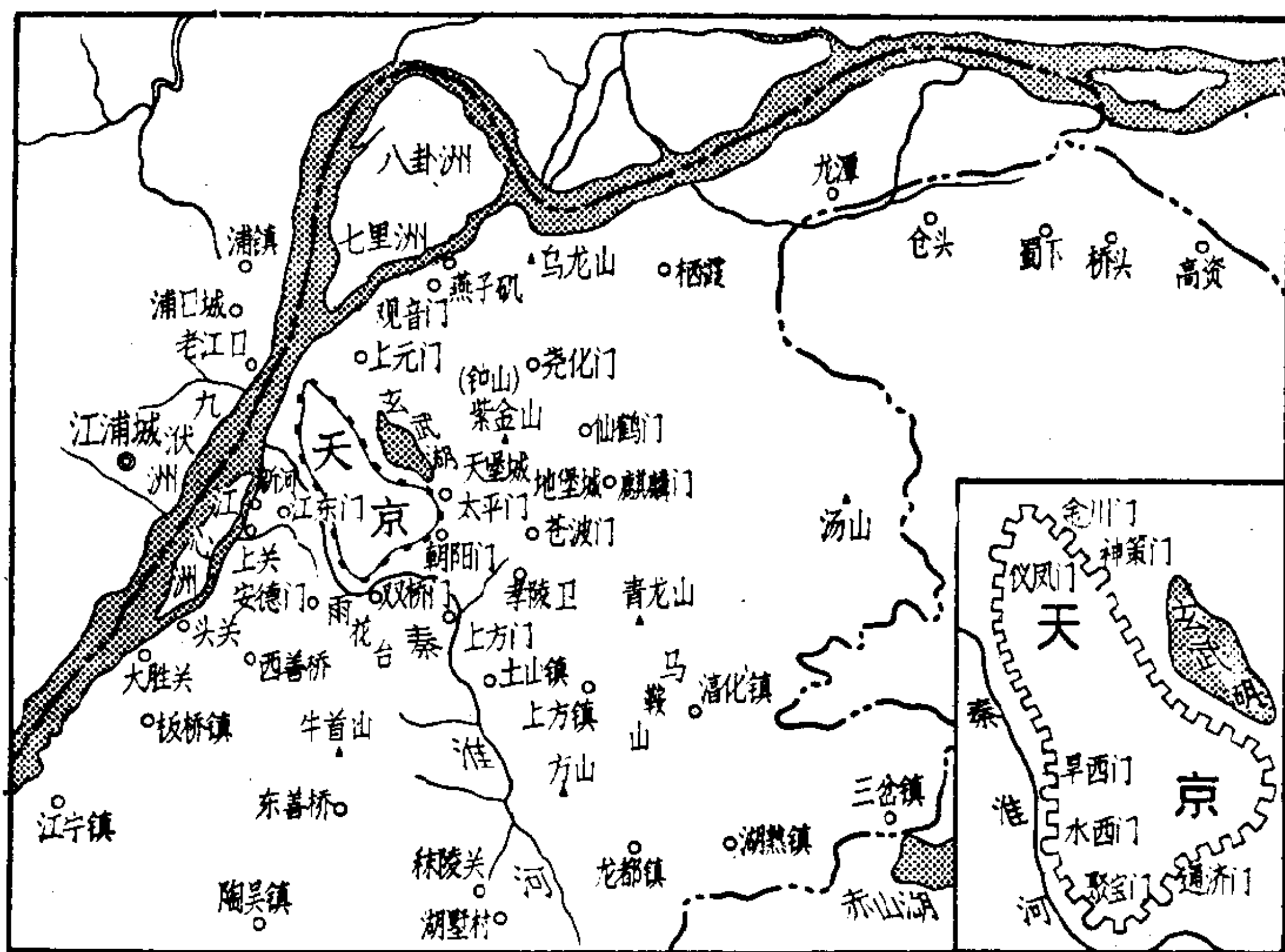
冲锋，全被守城太平军以激烈的肉搏战压了下去。戈登及其部将柯克汉姆、柏郎，都被打伤。四月，戈登率领喽罗围攻常州，刽子手李鸿章也赶来督阵。常州太平军在护王陈坤书指挥下，壮怀激烈，浴血奋战，多次挫败敌军破城攻势。五月十一日，“常胜军”、淮军一齐出动，攻破常州。城虽破，巷战不停，最后剩下几十名战士，还坚守护王府。陈坤书就义前慷慨陈词：“奈事不成，只有尽忠。”

天京已成孤城，中外反动派弹冠相庆。李鸿章、左宗棠之流，以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攻下苏州后，李鸿章加太子少保头衔；进军杭州前，左宗棠爬上闽浙总督高位；他们手下的爪牙，也都加官进爵，一个个成了提督、总兵等领兵大员。洋奴高升忘不了洋大人恩典，李鸿章奏请同治帝（一八六二——一八七四年在位），授予戈登以提督军职，赏赐这个镇压中国革命的恶棍穿黄马褂、戴花翎（líng 灵），彻底暴露了汉奸民贼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丑恶嘴脸。

四 扑不灭的革命烈火

天京外无援兵、内缺粮械，湘军加紧围困、疯狂进逼。坚守孤城的太平军，临危不惧，不顾力量对比的悬殊，抱着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的决心，和五万余名凶悍的敌军英勇奋战。

一八六四年二月底，敌军攻陷钟山要塞天堡城，天京仅有的一条对外通道被切断。三月二日，敌军窜犯太平门及神策门，天京各城门均被合围，粮食来源断绝，处境更加艰险。李秀成以城中无粮涣散斗志，天王下诏：“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



天京形势图

生。”“甜露”就是指野草。李秀成说：“此物不能食得。”洪秀全愤然驳回，下令“取来做好，朕(zhèn 镇)先食之。”显示了洪秀全宁死不屈，即使没有粮食也要以野草充饥，同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

在洪秀全激励下，太平军将士齐心协力，坚守天京。曾国藩湘军虽然长期围困天京，却攻不下这座革命的堡垒。四月间，曾国荃下令湘军两次挖地道、架云梯，猛攻天京城，都败下阵来。

长期的紧张和疲劳，使洪秀全健康状况一天天坏下去，一八六四年六月一日，不幸因病去世。洪秀全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杰出的农民革命领袖，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摸索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先驱。他领导了伟大的太平天国

革命，对国内外敌人作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人民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他的逝世，对正在坚持最后斗争的太平天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气壮山河的天京保卫战在继续进行，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的代价。清政府严斥曾国荃进攻不力，湘军攻城更急。七月三日，拱卫天京的另一要塞地堡城失守。敌军利用这个位于钟山第三峰的高地，架设大炮百余尊，日夜轰城。曾国荃发狂地命令各营开挖地道，轮流攻城。战斗已进入短兵相接的最后阶段，太平军战士的大无畏气概，使敌人胆战心惊。曾国藩在给皇帝的奏稿中供认：这半个月里，湘军“各营轮攻，伤亡极多”，“官军五万余人，筋力将疲”，总兵大员三人，也在“数日之内，次第阵亡”，担心“事久变生”，感到“深为可惧”。

但是，天京孤城无援，经过日夜浴血奋战，英雄的太平军战士，最后只剩下三、四千人。七月十九日中午，敌人从地道用炸药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清军由缺口蜂拥而上。黄昏时，屹立了十一年的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陷落了。

守卫天京的英雄们，寸土必争，与敌军白刃相见，为革命甘洒热血。反革命头目曾国藩惊呼：守城太平军“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伟大的农民革命战士，用自己殷红的鲜血，书写出太平天国历史最悲壮的一页。

反革命军队攻破天京后，兽性大发。据记载：“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入于湘军。”这是匪徒们烧杀淫掠的真实写照。曾国荃带头抢劫天王府，湘军将天京洗劫一空后付之一炬，火光烛天，七日不熄。这一座保存了中国中古文化的六朝名城，顷刻之间化为瓦砾。

天京陷落时，幼天王洪天贵福冲出城墙缺口，在安徽广德

州和洪仁玕会合，一起退入浙江湖州；后来在江西先后被俘殉国。洪仁玕视死如归，“宁捐躯以殉国，不隐忍以偷生”，绝命诗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信太平天国未成的事业，“有日必复生”。带着金银珠宝突围的李秀成，被清军捕获后，却向敌人屈膝投降，乞求活命。在敌人的囚笼中，李秀成写了几万字的自白书。这份背叛革命的供状，不仅恶毒攻击太平天国革命是“害民害众”，而且卑劣地为曾国藩出谋献计，阴谋招降转战大江南北的太平军。但是，曾国藩在李秀成写完供词的当天，就杀了他。这就是叛徒李秀成的可耻下场。

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同治帝论功行赏，加封曾国藩太子太保衔、一等侯爵；赐曾国荃太子少保衔、一等伯爵；东南各路领兵头目，也都青云直上。逃亡在外的地主豪绅，在反革命清军的支持下，张牙舞爪地猛扑回来，向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和反攻倒算。据英国人呤唎记载：一八六〇年八月至一八六四年九月，仅在苏浙战场上被屠杀的太平天国军民，总数达到二百八十七万。在中外反革命的烧杀抢掠下，江南各省“几于百里无人烟，其中大半人民皆死亡，室庐焚毁，田亩无主，荒弃不耕。”

清政府每攻占太平天国一地，马上重建封建地方政权，恢复封建土地所有制。中外反革命军队所到之处，地主阶级卷土重来，“州县如饿虎出林，绅衿（jīn 今）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在“田归原主”和“夺田”的反攻倒算口号下，一齐扑向农民，剥夺了农民在革命时期得到的土地和一切权利。“收租局”、“租栈”、“催租局”又出现了，苏州一带的田租，不仅很快就恢复，而且超过了太平天国革命前的原租额。清朝统治者还组织地主豪绅参加“保甲局”，推行联保联坐，将封建统治

的枷锁，重新强加于劳动人民。

血腥的屠杀，沉重的剥削，残暴的统治，统统向人民压来。在农民战争之后，地主阶级对于革命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

但是，人民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天京陷落后，太平天国英雄们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举起革命大旗，联合捻军，驰骋大江南北，坚持武装斗争，继续奋战达四年之久。

侍王李世贤率领太平军，由江西进入福建，占领漳州等地，在闽南建立了根据地。清政府急派左宗棠，配合外国海军进行围攻，淮军也以侵略者提供的轮船和军火，由海道登陆厦门。在中外反革命联合进攻下，李世贤战败突围，转入广东。一八六六年二月，太平军余部在南中国的革命斗争，全部被清政府镇压了。

长江以北的太平军和捻军，仍然百折不挠地进行战斗。一八六四年十一月，捻军和西北太平军，共推遵王赖文光为领袖。赖文光按照太平军的兵制和纪律，整编捻军，改步兵为骑兵，成为新捻军，继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在黄、淮平原展开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其中，一八六五年五月的高楼寨战役，最快人心。

新捻军的对手，是清廷宠信的蒙古贵族僧格林沁。他的内蒙古骑兵，在对内镇压中十分凶悍。为了歼灭这支顽敌，赖文光采取“以走致敌”的战术，有时昼夜急驰，几天之内行千里，有时牵着清军，百里之内打圈子，先以运动战拖垮敌人，然后寻找战机加以歼灭。刚愎(bì必)自用的僧格林沁，以为捻军怯战，尾追不舍，但到处扑空，疲惫不堪，累得连马缰绳也提不起

来。一八六五年五月十八日，新捻军在山东菏泽西北的高楼寨，布下天罗地网，一举全歼敌军，击毙僧格林沁。清朝统治者吓得手忙脚乱，先后急调曾国藩、李鸿章前来镇压。第二年十月后，捻军在河南分为东、西两路，以赖文光、张宗禹为领袖，坚持战斗，给予湘、淮军以有力打击。一八六八年一月，赖文光冲破苏北六塘河敌军防线后，受伤被俘，在扬州英勇就义，东捻军失败；八月，张宗禹在山东茌平作了最后一战，西捻军也归于失败。

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革命高潮。

从金田起义到天京陷落、捻军失败，太平天国革命前后坚持十八年，风暴席卷十七省，攻克城市六百余座，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太平天国革命，带着以往农民革命不曾有过的姿态，跃登中国近代历史舞台。在革命烽火中，农民阶级组织起强大的武装力量，建立自己的国家政权，推行带有民主精神的革命政策，和反动的清政权对峙、斗争了十多年。从紫荆山麓到长江南北、大河上下，亿万农民群众掀起革命怒涛，向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腐朽没落的上层建筑猛烈冲击，使清政府从此一蹶不振，即便有外国主子撑腰，洋枪大炮扶持，湘、淮军阀跳梁，也救不了它的性命。四十多年之后，以太平天国革命后继者自许的孙中山先生，就发动辛亥革命埋葬了这个封建王朝。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中国社会，它不仅是一场反对本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而且是一场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革命。毛主席明确地将这次革命，称

之为“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①而反帝反封建，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特点。太平天国英雄们，不愧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同凶恶、狡猾的外国侵略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于敌人的侵略要求，严词拒绝；对于敌人的武装干涉，坚决回击。太平天国坚持民族独立，维护民族尊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者，阻止了他们妄想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罪恶企图。

这一切，“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②显示了农民阶级在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主力军作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太平天国革命，加快了清王朝的死亡，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近代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伟大作用，这是它的不朽功勋！

太平天国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云、贵、陕、甘地区，燃遍了苗民、彝民、回民起义的革命烽火；后继者更踏着先烈的足迹，为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而奋斗。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为什么最终失败了呢？

这是因为，“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势力”。^③清政府那时已成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英、法、俄、美等国，害怕中国人民革了清政府的命，会断送它们在中国的侵略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二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③ 同上书，第五九七页。

权益，因此就在太平天国刚刚建立自己的政权，还没有来得及把革命的伟大抱负一一展开时，便同清朝统治阶级勾结起来，用反革命武装绞杀了太平天国革命。外国侵略者是太平天国革命最凶恶的敌人，洪仁玕在英勇就义前，终于觉悟到：“我朝祸害之源，即洋人助妖之事”，“如洋人不助敌军，则吾人断可长久支持”。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总结近代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教训时，更着重指出：“历来中国革命的失败，都是被帝国主义绞杀的，无数革命的先烈，为此而抱终天之恨。”^① 这个用鲜血换来的教训，革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从主观原因看，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农民领导的革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得不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领导，因而无法克服自身必然存在的局限性，最后不能不陷于失败。

土地问题是关系到革命成败的中心问题。太平天国革命，虽然猛烈冲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并以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打击了地主阶级，但总的说来，提不出一个正确的、切实可行的土地纲领。这样，就不可能消灭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满足千百年来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归根结底，也就不能不削弱太平天国同广大农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革命战争难以坚持到最后胜利。

太平天国革命者，对封建思想意识进行了勇猛冲击，但是，宗教毕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农民阶级没有从根本上战胜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天京建都之后，一些领导者经不起封建意识的侵袭，大兴土木，建筑豪华的宫殿王府，挑选宫女王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四〇页。

妃，颁行等级森严的“礼制”，在宫则使役成群，出行则仪仗呼拥。保守怀安和享乐腐化思想，日益严重。不少驰骋于刀光剑影中的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敌人面前无愧为英雄，但在腐朽混浊的封建意识和习惯势力面前，却丧失了还手之力。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敢于用武装斗争造内外反动派的反，大敌当前，他们能团结战斗、同心合力，但在胜利之时，却滋长了骄傲情绪。某些领导者如杨秀清，甚至居功自傲，热衷于宗派活动，个人野心恶性膨胀。这就涣散和破坏了革命队伍的团结，给了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韦昌辉的反革命暴乱，石达开的分裂出走以及李秀成的叛卖破坏，使太平天国革命事业受到了无可估量的损失。革命要胜利，就必须纯洁自己的队伍，严防阶级敌人的混入和破坏。鲁迅先生说得好：“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

毛主席英明地指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①整个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条千真万确的真理。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八页。

第五章 洋务“新政”与边疆危机

一 如此洋务“新政”

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洋务“新政”，是在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太平天国的腥风血雨中开场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乐于扶持并加紧控制卖国的清政府，把它变成自己的驯服工具；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更把“借洋兵助剿”和“购买外洋船炮”，当作挽救危局的救命草。

适应勾结外国侵略者的需要，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清朝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的一批官僚军阀逐步买办化。在中央，以恭亲王奕訢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这就是所谓洋务派。他们依靠外国侵略者，兴办了一些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训练了一支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反动的陆海军——这就是所谓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

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史书，将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标榜为“自强新政”。实际上，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洋务派执行的是一条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残酷镇压的反动路线，他们的一切洋务措施，都是为着挽救病入膏肓(huāng 荒)的清朝封建统治。

《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俄、美等国公使，相继进驻北京，加紧控制清政府。这些外国公使，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军舰、大炮为后盾，对清政府发号施令。美国公使公然叫嚷：“事实上，外国的公使成了中国政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一方面横行霸道，“任意斥责一切对待外人不称职的中国官吏”；一方面收买拉拢，竭力培植对侵略者俯首帖耳的买办官僚。

在外国侵略者控制清政府的过程中，海关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达四十五年之久（一八



一八五七——一八九一年的上海海关

六四——一九〇九年)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不仅通过分布各口的税务司，干涉地方内政，收集各种情报，通过掌握关税，控制清政府的财政命脉，而且直接插手许多重大的外交活动，干涉高级官员(如云贵总督、四川总督)的任免，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起着多方面的支配作用。赫德因为侵略有“功”，被英国

政府封为男爵；又因为办洋务有“功”，被清政府赏头品顶戴、加尚书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功臣”和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功臣”，竟然同时体现在赫德一个人身上。这种怪事，也只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才会出现。

清政府过去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为了勾结和迎合外国侵略者，在一八六一年，设立了由恭亲王奕訢和户部左侍郎文祥等满族亲贵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是清朝统治机构半殖民地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总理衙门的职权，并不限于外交事务，实际囊括了所有洋务活动，从购买和制造船炮、海关税务、各口通商、传教、学堂、电报、铁路、矿务、开办工厂、直至建立海军，凡是和洋人打交道的事务，都归它掌管。因此，总理衙门也就成了洋务衙门，成为凌驾于六部（吏、户、礼、兵、刑、工）之上的洋务内阁。总理大臣奕訢，则成为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的洋务总管。

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清政府又设置南洋、北洋通商大臣。一八六五年起，南洋通商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一八七〇年起，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任。南、北洋通商大臣，不限于管理各口通商事务，而是所有对外交涉都要就地办理，然后上奏皇帝，并行文关照总理衙门。因此，兼署通商大臣的直隶总督和两江总督，是当时最有权势的地方官，选任的也都是受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头子。例如曾国藩、李鸿章，就曾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多年，使两江和直隶成为他们在地方倡办洋务、扩展实力的基地。

一八六二年，清政府还在总理衙门附设京师同文馆，培养“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言语”的翻译和洋务官员。京师同文馆先后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以及天

文算学馆。此外，李鸿章在江苏巡抚任内，一八六三年设立同类型的广方言馆于上海；两广总督瑞麟，也在一八六四年设立广州同文馆。作为同文馆事业的延伸，清政府在一八七二年派出了由陈兰彬和容闳(hóng 宏)率领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外国公使的发号施令，总税务司的操纵支配，突出地表现了外国侵略者对清政府控制的加紧；总理衙门、通商大臣等官僚机构的设立，又突出地表明了中外反革命阶级的互相勾结和洋务派的逐渐得势。

至于被称之为“新政”的洋务活动，主要包括以“求强”为目的的军事方面的活动，和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方面的活动。主持这两方面活动的洋务派头目，则是在地方上掌握实权的湘、淮军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以及后起的洋务官僚张之洞。

洋务派的所谓“求强”活动，以使军队获取新式武器和使用“外洋船炮”为基本内容。洋务派既害怕洋人“船坚炮利”，主张对外屈膝求降，又感到洋人的武器可以用来镇压国内太平天国等人民革命，巩固自己的统治。因此，早在一八六一年，奕訢就跟曾国藩一唱一和，说什么“自强之术，必先练兵”，“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同年，曾国藩打下安庆后，为了“试造洋器”，办起了安庆内军械所；一八六二年，随着中外反革命联军的频繁出击，李鸿章设上海制炮局。

依靠外国侵略者的支持，湘、淮军练习洋操，购买洋枪洋炮，利用新式武器攻城夺地，残酷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李鸿章在奏稿中一再提到：“购买外洋枪炮，设局铸造开花炮弹，以资攻剿，甚为得力”，“参用西洋火器，利赖颇多”。因而在反革命硝烟弥漫中，洋务事业逐步推进。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写

信给奕訢，说：“中国欲自强，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所谓“觅制器之器”，就是向外国购买制造军械的机器。奕訢根据李鸿章的建议，上疏同治皇帝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六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初，洋务派以“自强”为幌子，兴办了一批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兵工厂。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这是清政府开办的最大的兵工厂；

同年，李鸿章又在南京创办金陵机器局；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这是当时最大的船舶修造厂；

一八六七年，崇厚在天津创办天津机器局，一八七〇年由李鸿章接办，并加以扩充。

此后，张之洞于一八九〇年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局。

这些封建官僚办的军事工厂，在生产上依靠外国人，如金陵机器局受英国人马格里操纵，福州船政局受法国人日意格摆布。不仅机器设备，连原材料也仰赖外国，如江南制造局造船用的“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各厂制造枪炮子弹，“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在管理上则由湘、淮军阀掌握，塞满大小头目，等于添设了一批腐朽的官僚衙门。这类企业的筹建经费和常年开支，都来自清政府的税收。产品只供军用，不计生产价格，不参加市场交换，矛头完全针对国内人民。在外国侵略者操纵下，洋务派“自造”的枪炮、练成的新军，连李鸿章也不能不说：“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侮，

实未敢信。”说到底，洋务派的所谓“求强”，不过是向外国资本主义“求”新式武器，借以镇压国内人民起义，“强”化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和洋务派的实力地位而已。

随着六十年代军事工业的兴办，原材料和燃料的需要量不断增长，运输也日益繁忙，特别是，要维持军事工业和一支庞大的军队，又必须有钱有饷。洋务派逐渐感到：“必先富而后能强”。因此，从七十年代起就标榜“求富”，搬用资本主义生产技术，兴办了一批民用企业，以便聚敛钱财，用“求富”支撑“求强”，并趁机中饱私囊。

二十多年间，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比较重要的有：

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资本二百六十万两，是这类企业中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

一八七八年，李鸿章在天津设开平矿务局，开采煤矿；

一八八〇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左宗棠在兰州设立机器织呢局；

一八八二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机器织布局；

一八九〇年，张之洞设汉阳铁厂，第二年又开采大冶铁矿；

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四年，张之洞在湖北武昌设纺纱、织布、缫(sāo 骚)丝、制麻四局。

这类民用企业，除官办之外，还有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形式。然而，即使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企业，也是“官有权，商无权”，“一切唯总办之言是听”，实际上仍然是官在操纵。掌握实权的洋务官僚和买办，更是贪污中饱，营私肥己。一八七七年，招商局总办盛宣怀以二百二十万两银的高价，买进美商旗昌洋行十八只破旧轮船，自己从中一次就捞取佣金十余万

两银。这类企业的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和原材料，也同军事工业一样，处处依赖外国，甚至连作电线杆用的木头，也都要从外国进口。企业经营十分腐败，包含了封建官场的一切流弊积习，还利用政治特权，实行经济垄断，排斥和压制商办工业。例如，李鸿章在奏设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提出“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的专利规定，严重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洋务派为“求富”而经营的这类民用企业，既有买办性、封建性，又有一定的垄断性，实际上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雏型。尽管洋务派从外国人那里搬来一些生产技术方面的“新”玩意，但它决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皮毛，来维护垂死的封建统治，达到所谓“自强”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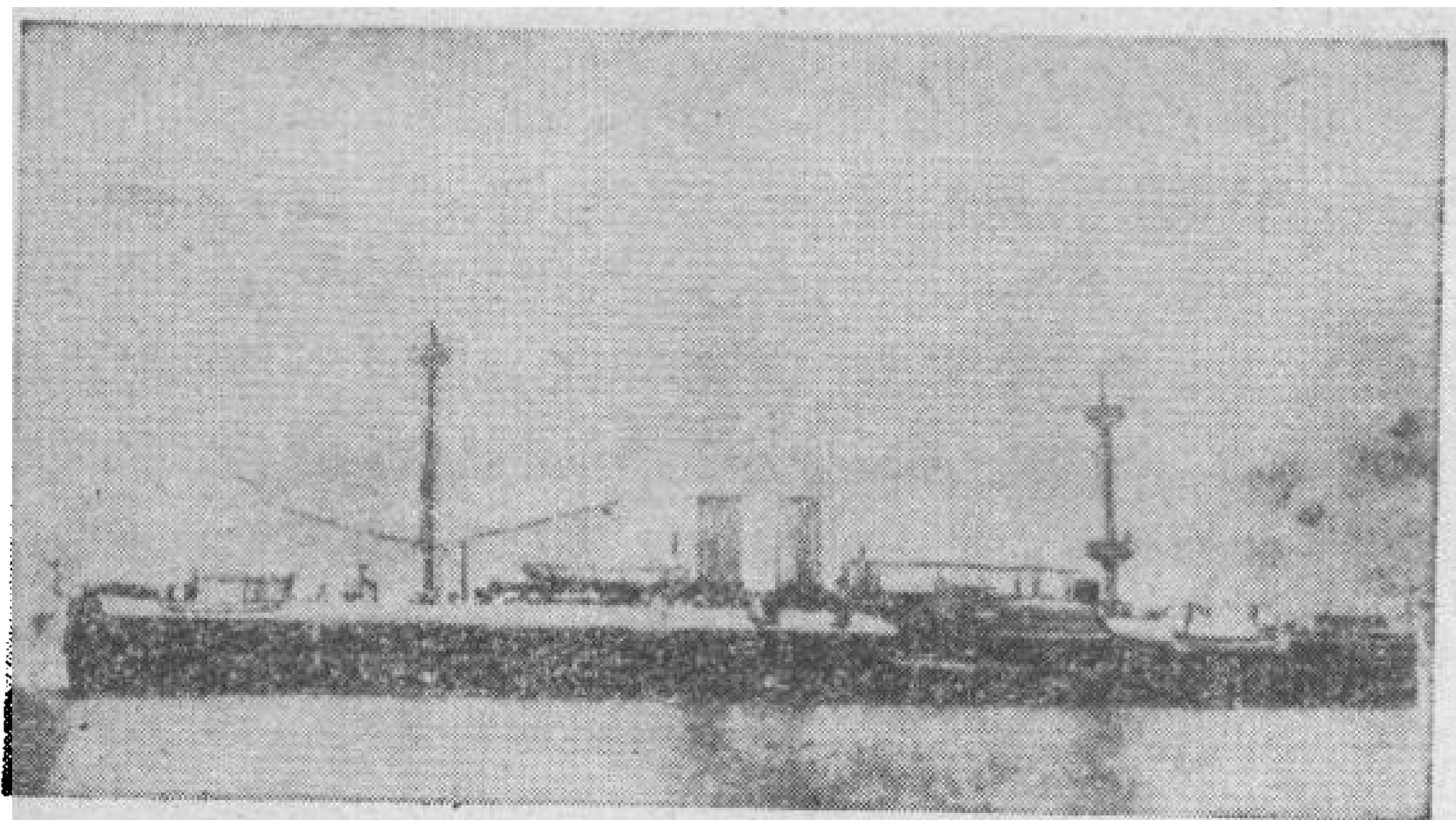
“自强新政”的中心是建立海军。清政府在这方面用的钱最多，花的时间也最久。

在李鸿章之流看来，中国不从外国买进铁甲舰，“即永无自强之日”。在兴办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同时，清政府耗费巨款，从英、德等国，购进大小舰艇三十九艘。洋务派果真是为了抵御外侮而“订购铁甲舰”吗？不！李鸿章自己就不打自招地说：这样做，“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jù 巨)云御大敌也。”

一八八四年，清朝海军初具规模，大约有南洋水师军舰十七艘、北洋水师军舰十五艘、福建水师军舰十一艘，分别控制在湘系军阀、淮系军阀和福建船政大臣手中。八月，中法战争马尾海战一仗，福建水师葬身海底，南洋水师也受到损失，只有李鸿章手里的北洋水师，因蓄意置身战外而保存了实力。一

八八五年，清政府设立海军衙门，李鸿章又以整顿海防名义，从外国添购新舰，并乘机将别处较好的船舰，调到北洋海军来。

一八八八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拥有军舰二十二艘，其中十七艘购自英、德，五艘自造。买来的铁甲舰中，“定远”、“镇远”是两艘七千多吨的主力舰，“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是五艘两千多吨的巡洋舰。一八九一年，李鸿章忘乎所以地吹牛说：“北洋兵舰合计二十余艘，海军一支，规模略具。……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财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然而，一八九四年甲午海战的隆隆炮声，淹没了洋务派的“自强”虚声，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宣告了洋务“新政”的彻底破产。



北洋舰队“定远”舰

洋务“新政”始终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是“求”了三十多年，“求”到了些什么呢？是国家愈来愈弱，人民愈来愈穷。有没有人“强”和“富”了呢？有，那是湘、淮军阀和洋务官僚。

清朝封建统治者把洋务运动吹嘘为“同治中兴”或“同光新政”，但是，帝国主义学者却不给清政府半点面子，干脆把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屈从时期”。历史证明：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利益的洋务派，“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①他们的所谓“新政”，到头来只能把中国推入更深的半殖民地泥坑。

二 边疆烽火

洋务派叫得最响的口号是“求强”。然而，恰恰是在他们掌握实权、推行“自强新政”的时期，外国侵略者的魔爪，进一步伸入中国东南海疆和西北、西南、东北边疆。遥望着边疆告急的烽火，洋务派步步退让，他们嘴里喊的是“求强”，实际干的是求降。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帝国主义过渡。资本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商品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②中国周围的友邻国家，相继沦为英、俄、法、日的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外国侵略者虎视眈眈，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

尖锐的边疆危机，对清朝统治集团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借口中国军备落后，海防空虚，主张对外妥协投降。一八七〇年，曾国藩曾说：道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页。

②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九八页。

光、咸丰两朝，“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而同治（一八六二年）以后，由于“守定和议，绝无变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如果对外抵抗，“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因此，唯一的对策，是“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这就是说，对于外国侵略者，只能投降，不能抵抗，只有“委曲求全”，才能“中外相安”。李鸿章不愧为曾国藩高足，在他把持外交大权的三十多年间，以“徐图自强”为幌子，坚持对外不抵抗。在他看来：“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因此，决不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只能对侵略者“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路线。

顽固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封建性较多、与外国资本主义关系较少的一批守旧官僚，以醇（chún 纯）亲王奕譞（xuān 宣）、大学士倭（wō 蜗）仁等人为代表。他们害怕“洋人”的威胁，担心王朝末日，幻想恢复旧日的闭关时代，因而盲目排外。顽固派“以不谈洋务为高”，每逢对外交涉，动辄主战。然而拿什么来战？倭仁说是“以忠信为甲冑，以礼义为干櫓（即防御盾牌）”。归根到底，是以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武器，加上一支腐朽落后的军队，来对付外国侵略者。其结果，总不外战败求和。

洋务派与顽固派争执不休，一个主张和而不战，一个宁愿战败而和。但殊途同归，结局都只能是投降，使中国更多地丧权失地，丝毫解救不了强敌寇境的边疆危机。

东南海疆，首先燃起了报警的烽火。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从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它力图向外扩张，“征韩论”、“征台论”甚嚣尘上。一八七二年九

月，日本要挟琉球国王接受“藩王”的封号。一八七四年，又以琉球船民曾在中国台湾遭难被杀为借口，出动陆海军三千人，进攻台湾。羽毛未丰的日本，为什么敢悍然入侵台湾？主要因为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美国对台湾早有侵略野心，一八四七年，曾派人到台湾勘察煤矿；五十年代，妄想加以占领；一八六七年，公然派军舰两艘、陆战队一百八十一人，侵袭台湾。高山族人民在山里英勇伏击，打死美军头目，赶走侵略军，挫败了美国对台湾最初的武装侵犯。此后，美国改变手法，不断怂恿日本侵略台湾，并为它提供军火、船只、指挥官和顾问。

一八七四年五月，日本侵略军在美国支持下，从踉蹠(liáng qiāo 粮敲)登陆，进攻高山族村社，被当地人民据险击败，退守龟山。日军残暴地烧杀劫掠，高山族人民顽强地进行



抗击日本侵略的台湾高山族人民

抵抗，侵台日军不仅死伤五、六百人，而且瘟疫流行。与此同时，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统带海陆军援台，加强防务。日本武装进攻不成，美、英公使立即出面“调停”，在军事上、外交上露骨地声援日本。李鸿章明知“日船非中国新船之敌”，“中国兵将之众，断不畏彼三四千人”，但他不敢违拗英、美公使的旨意，力主义和，不准清军“开仗”。十月，清政府与日本订立《北京专约》，承认琉球为日本属国，还赔偿日本兵费五十万两，作为从台湾撤兵的条件。一八七九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从此，台湾就成了日本“南进”的首要目标。

初兴的日本，向“中兴”的清朝戳了一枪；清政府的优势兵力，竟然换来屈辱的投降。这对洋务派正在吹嘘的“自强”，实在是一记响亮的巴掌。

接着，烽火出现于西南边疆。

缅甸与中国云南接壤。一八五二年，英国占领下缅甸后，窥伺中国西南，不断探测滇、缅交通，将触角伸进云南。一八七四年，英国派柏朗上校，带兵二百人，组织武装探路队，企图由缅入滇。英国使馆派翻译马嘉理，前往云南入缅接应。第二年二月，马嘉理擅自带引武装探路队，闯入云南蛮允附近。当地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对马嘉理严加盘问，马嘉理竟开枪行凶。滇民激于义愤，打死马嘉理，并将英兵逐回缅甸。马嘉理事件，是由英国蓄谋侵犯中国西南边疆而引起的，但是英国公使威妥玛，却抓住这件事大肆讹诈，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并一再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等，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恫吓。洋奴李鸿章认为马嘉理案“其曲在我”，而且万万不能与英国“失和”，主张全盘接受侵略者的无理要求。一八七六年九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会议，订立了中、英《烟

台条约》和入藏“探路”专条。

《烟台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英国派官员赴云南调查五年，“察看通商情形”，以商订章程；二，扩大领事裁判权，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观审”；三，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四，租界内洋货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都只纳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五，英国可派员从北京起程，经甘肃、青海，或由四川进入西藏，转赴印度，也可派员由印度进入西藏。这些规定，不仅扩大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侵略特权，而且给英国侵略者以及其他列强，提供了入侵中国云南、西藏的便利条件。《烟台条约》是洋务派媚外求降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卖国条约。

在西北，穷凶极恶的沙俄，将魔爪伸入新疆地区。

新疆是中国的西大门。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屏障着祖国西部河山。沙俄早就觊觎富饶的新疆地区，在一八六四年割占中国西部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之后，仍然欲壑（hè 贺）无底，妄想进一步鲸吞整个新疆地区。为此，沙俄与英国之间勾心斗角，展开了激烈争夺。

一八六四年，新疆地区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第二年，浩罕汗国（紧邻新疆，位于今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境内）的一个军事头目阿古柏，侵入新疆地区，与割据喀什噶尔地区的回族封建主相勾结，先后攻占天山南路诸城，并于一八六七年建立反动的“哲德沙尔（七城）汗国”。阿古柏不仅“严刑厚敛，税及果树”，而且厉行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新疆地区各族人民遭受极大苦难，不断掀起反抗阿古柏残暴统治的斗争。一八七二年，沙皇政府公然承认阿古柏

为“哲德沙尔国首领”，肢解中国对新疆地区的领土主权。英国见沙俄势力深入南疆，于己不利，加紧笼络阿古柏，一八七四年承认它为“合法的独立王国”，与之签订商约，还给它大批枪支弹药。这样，阿古柏就成了英、俄分裂中国神圣领土新疆地区的罪恶工具。

对于天山北路，沙俄采取直接的军事占领的手段。一八七一年七月，沙俄以帮助清政府“防乱”和“安定边境秩序”为名，出兵强占伊犁。阴险狡诈的沙俄，一面悍然宣布：“伊犁永远归并为俄国领土”，在伊犁地区设官分治，占地垦殖，对中国各族人民征派重税，进行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一面又估计清政府根本无力恢复统治秩序，因此伪善地表示：沙俄“无久占伊犁之意，只以中国回乱未靖，代为收复”，一旦清政府力所能及，“即行交还”。但在第二年，当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多次向沙俄交涉归还伊犁时，它不仅拒不交还，反而横生枝节，提出一系列侵略要求。很明显，沙俄是在故伎重演，想以军事占领的既成事实，迫使清政府屈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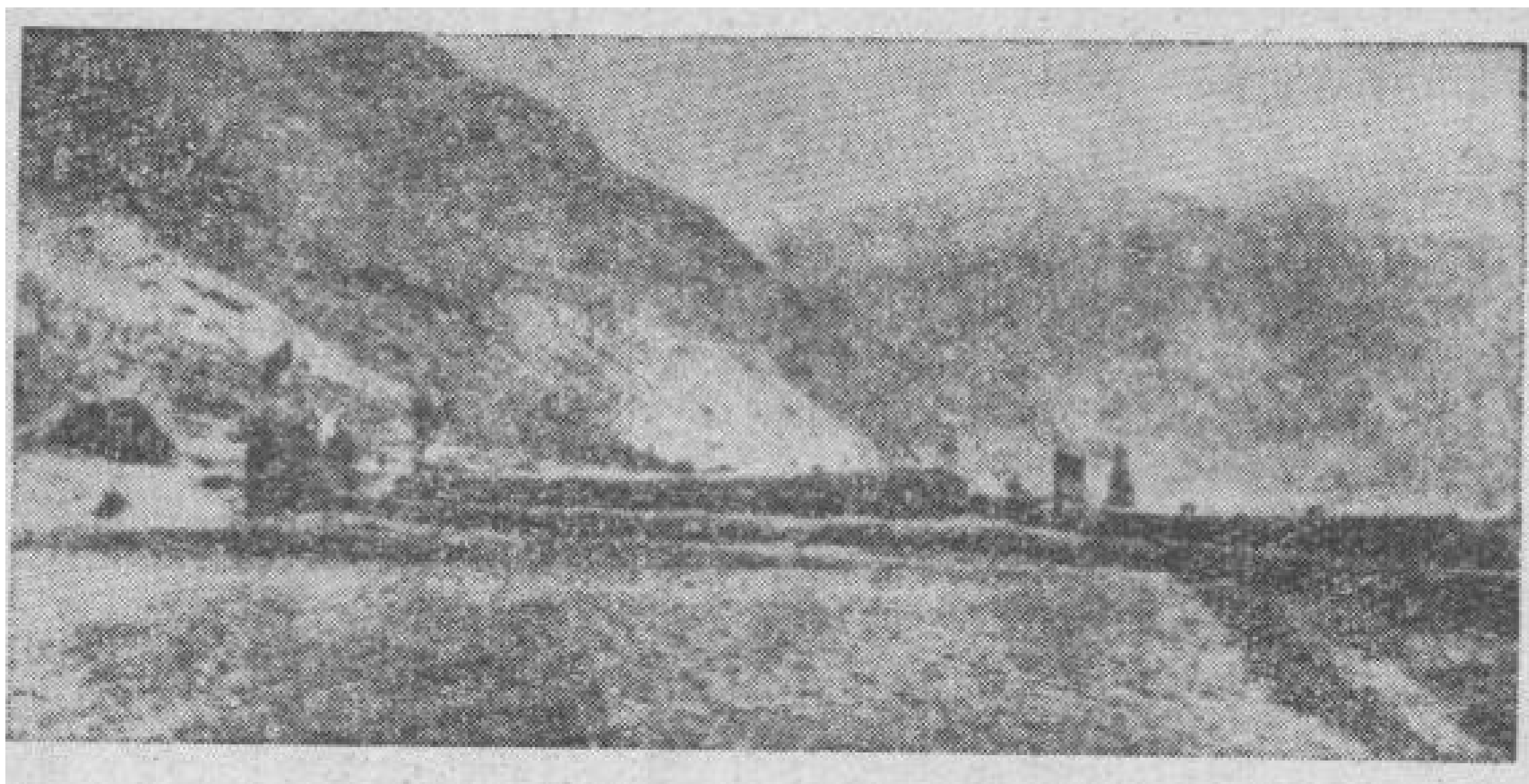
面对日本染指台湾、沙俄强占伊犁的边疆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海防”和“塞防”的激烈争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借口“海防”重要，主张放弃新疆，“移西饷以助海防”，叫嚷“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湘系集团，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力主收复新疆。两者的争论，虽然反映了湘、淮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且目的也都是为了维护清朝统治，但左宗棠的主张，具有反抗外国侵略、维护领土主权的一面，因此，受到国内舆论的支持。清政府最后接受了左宗棠出兵新疆的主张。

一八七六年七月，左宗棠带兵进入新疆，讨伐阿古柏。在新疆各族人民支援下，清军节节取胜，十月收复北疆大部，一八七七年乘胜收复南疆八城，新疆又回到祖国的怀抱。阿古柏败逃自杀，残部在沙俄侵略者庇护下，窜入沙俄境内。英、俄利用阿古柏瓜分新疆天山南北的阴谋，终于彻底破产。

清政府规复天山南北后，再次向沙俄提出收回伊犁的要求。沙俄翻脸不认账，妄图永远霸占。一八七八年，清政府派崇厚去俄国谈判收回伊犁。“暗于边情”的崇厚，竟在沙俄胁迫欺弄之下，于一八七九年擅自签订出卖祖国巨大权益的十八条款，其中包括：割让伊犁以南、以西大片领土，赔偿“代守”伊犁兵费五百万卢布，俄商在新疆、蒙古贸易免税，允许沙俄经新疆至天津、汉口、西安陆路通商等。而换回的，仅是一座险要尽失、三面临敌的伊犁孤城。这些骇人听闻的卖国条款，激起全国人民无比愤恨，清政府也不敢加以批准。

一八八〇年，清政府派曾纪泽为出使沙俄钦差大臣，交涉改约。沙俄外交副大臣梅尼疯狂叫嚣：同中国人谈判，必须“把枪口对准他们的胸膛”。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沙俄迫使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清政府虽然收回了被沙俄盘踞十年之久的伊犁，以及伊犁南境领土，但却被沙俄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大块领土，“赔款”数也增加到九百万卢布（合银五百万两）。当沙俄从伊犁撤退时，竟把许多居民强迫迁走，“其不愿迁移者，鞭挞重至，哀号之声，彻于四野”。这件事，既表现了沙俄的残暴和侵略成性，也证明了边疆同胞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更严重的是，条约还规定中、俄已定的西北边界，“有不妥之处”，应重新“勘改”。于是，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以后的几个勘界议定书，又把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

土，并入了沙俄版图。一八九二年，沙俄更出兵帕米尔地区，违约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短短半个世纪中，凶恶的沙俄帝国主义从中国掠夺了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它相当于三个法国或者十二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何等触目惊心！



沙俄在中国帕米尔建立的军事村屯

马克思曾经说过：“历史本身就是审判官”。^①洋务派投降外交的可耻历史，不仅宣判了他们是外国侵略者最忠实的走狗，而且证明，他们手里挥动的“求强”旗号，不过是几片用来遮羞的破布。这一点，在后来的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中，暴露得更加明显。

三 中法战争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西南边境燃起了中法战争的烽火。这

^①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八〇页。

次战争，是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不义之战，也是中、越两国人民反抗共同敌人的正义之战。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我们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①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也说：“越中两国人民早就有着历史悠久的深厚友谊。近百年来两国人民都曾长期饱受帝国主义者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我们不但是友好邻邦，同时也是患难的兄弟。”^②

法国侵略者对越南早有侵略野心。十七世纪初，法国第一批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在越南活动。一七八七年，法国主教百多禄就向国王路易十六建议：占领越南，“建立殖民地”，进一步“开辟商道”，侵入中国中部。这个奏议，立即被路易十六接受了。其后，路易十六虽然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但首先吞并越南，然后以它为根据地侵略中国，却一直是法国侵略者奴役东方的狂妄计划。

一八五八年，法国借口保护天主教徒，勾结西班牙，组成法、西联军，进攻越南。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法国立即抽调侵华法军三千五百名，全力进攻南圻(qí 骑)(越南南部)，并于一八六二年六月，强迫越南订立第一次《西贡条约》，割嘉定、边和、定祥三省及昆仑岛。一八六七年，又占领永隆、河仙、昭笃三省。这样，法国侵略者就在越南南部建立了一块殖民地，控制了十分重要的湄公河三角洲。

法国原想从湄公河上溯，侵略中国云南，后来发现湄公河

① 引自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② 引自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

上游不能通船，就想占领北圻（越南北部，法国人称为东京），由红河侵入云南。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露骨地叫嚷：“法国必须占领北圻……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有了这个基地，一旦欧洲各强国企图瓜分中国时，我们将是一些最先在中国腹地的人。”法国侵略者的大炮，不仅威胁着越南民族的生存，也威胁着中国人民的安全。越南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息息相关，共同的命运，使中、越两国人民互相支援，并肩战斗。

一八七三年十一月，法国驻西贡总督派安邨（yè 邨）率军侵占河内，攻陷附近四省。越南军民奋起抵抗，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也在越南政府邀请下，抵抗法国的野蛮侵略。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的一支农民起义军，一八六七年后，因受清军压迫，转移到滇、越边境保胜（今老街）一带，开辟山林，聚众耕牧。黑旗军十分痛恨法军暴行，这时在越南人民激励下，刘永福决定率领一千多名英勇善战的黑旗军，抗击敌人。他们沿着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翻山越岭，扎寨于河内城郊。一八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安邨带着法军出城挑战，黑旗军象潮水一般冲上前去，砍下安邨的脑袋，打死打伤法军数百名，缴获枪械几百枝，迫使法国侵略军退出河内。黑旗军旗开得胜，给予侵略者建立“法兰西东方帝国”的狂妄计划以迎头痛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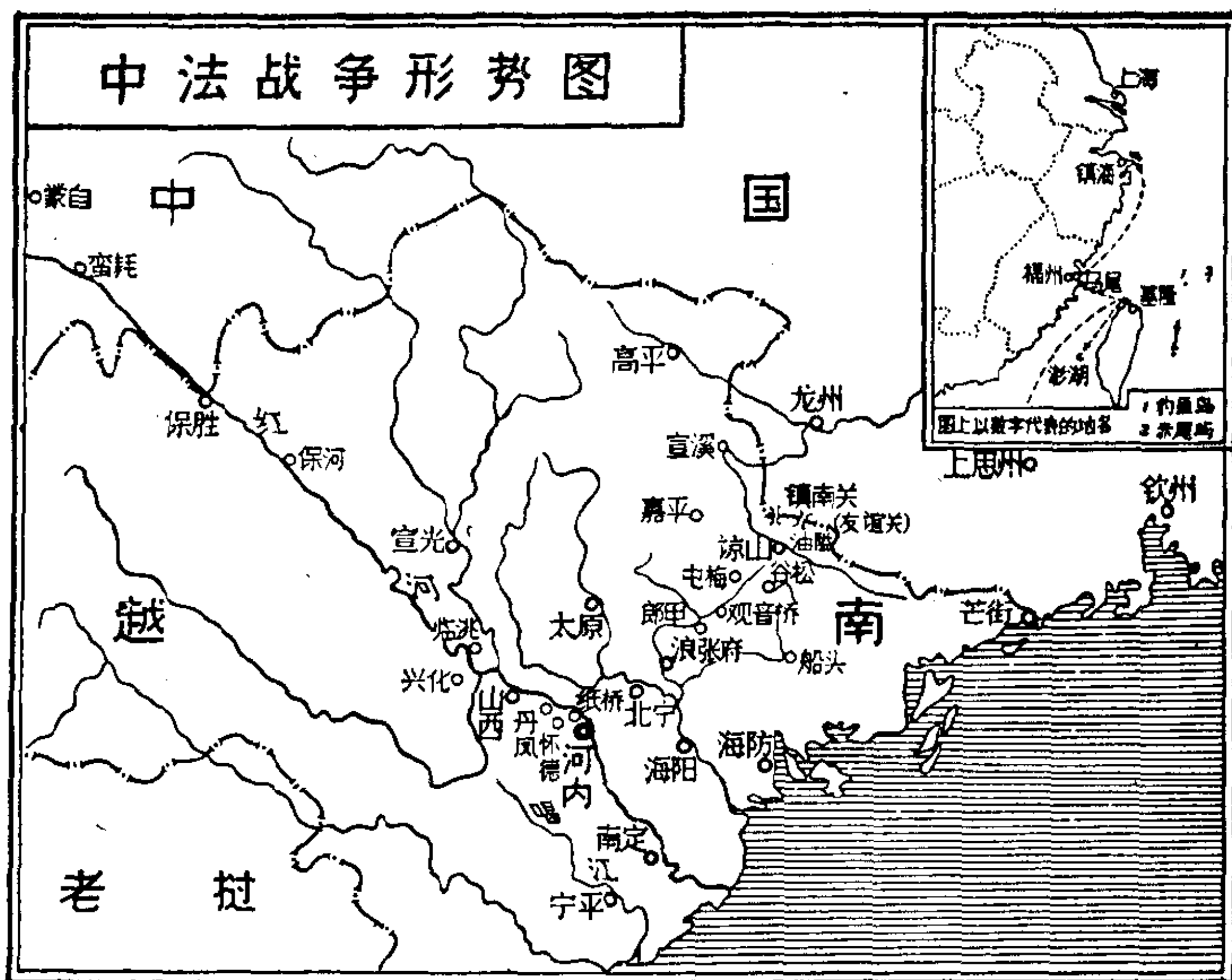
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法国金融资本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大资产阶级变本加厉地推行殖民政策。一八八〇年九月，被恩格斯痛斥为镇压巴黎公社的“可耻的刽子手中最可耻的一个”^①的茹费理，第一次出任法国内阁总理。这个家伙一

^① 《“‘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1871—1875)”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二卷，第四八九页。

上台,就狂妄地宣称:“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为此,“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按:指越南)之上”。一八八二年四月,法军再陷河内,企图打通红河,直窥云南。第二年五月,黑旗军和越南人民又一次配合作战,在河内城西的纸桥,与法军白刃相接。黑旗军健儿个个“极力奋战,直前猛攻,势如波涌涛翻”,杀得侵略者狂奔乱逃。侵略军司令李威利当场被击毙,法军二百多人丧命。这就是名震一时的纸桥大捷。刘永福也因战功,被越南政府任命为三宣正提督。

法国侵略军虽然在越南北部屡战屡败,在越南中部(中圻)却攻占了当时的首都顺化,强迫越南封建王朝订立城下之盟,接受法国的所谓“保护”。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和主权,越南政府曾先后两次派使者到中国,要求清政府给予援助。这时,清政府内部主战、主和争论不休,最高决策机构更举棋不定,既害怕法国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又不敢公开抵抗,得罪法国。在军事上,清政府一面派军队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不准主动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越,一面又企图同法国议和。掌握清政府军事、外交大权,并受最高统治者西太后支持的李鸿章,一味主张对外“委曲求全”、“妥协退让”。但是,法国侵略者却在“和谈”烟幕的掩护下,积极扩大对越南的侵略,准备将战火烧到中国本土上来。一八八三年,法国狂热的殖民主义头目茹费理第二次组阁;十二月,议会通过了追加军费和增派一万五千名侵略军的提案,决定先占取越南北部,然后进攻中国。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中法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陆上战争,从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到一八八四年四月,战争局限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第二阶



中法战争形势图

段分海、陆两个战场，从一八八四年七月到一八八五年三月，在中国和越南境内进行。

一八八三年十二月十一日，法军六千人在孤拔率领下，分兵两路进攻清军和黑旗军防地山西。由于投降路线作祟，清军指挥混乱、士气低落，前敌主帅未战先逃，留下黑旗军和少数清军御敌。黑旗军与法军血战三日，毙敌三百余人，最后因众寡悬殊，山西失守。法军攻占山西后，大肆烧杀劫掠。一个法国侵略分子供称：“他们把所遇见的男人、女人、小孩——一切生物，全都杀死了。”第二年三月，法军向北宁窜犯，清军又不战而逃。十九日，太原陷敌。四月，兴化弃守。法军完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

清政府因军事失利而十分恐慌，法国乘机诱降。李鸿章鼓吹“遇险而自退，见风而收帆”，与法国侵略者遥相呼应。一八八四年五月，清政府派李鸿章到天津，与法国代表福禄诺谈判，西太后严令李鸿章，不得“迁延观望，坐失事机”，十一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并将北圻清军撤回边界（但未明确规定期限）。在谈判中，李鸿章完全迎合法国侵略者的要求，因此茹费理大为高兴，夸奖李鸿章“深于阅历，所见两国公共利益并未来之事，竟与我辈相同”；李鸿章受宠若惊，回敬茹费理“见识远大”，还说什么“彼此为难之隐衷，两地心照”，媚外降敌、卖国求荣。

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是永无止境的。六月间，法军七百余，以“巡边”为名，在谅山附近挑衅，强迫尚未接到撤防命令的清军交出阵地。清军派代表进行解释，但法军蛮横无理，竟至开枪打死代表，炮击清军阵地。守军忍无可忍，被迫自卫反击，打死打伤法军近百人，击退了法军。谅山挑衅失败后，法国侵略者反诬中国“破坏”《简明条约》，七月十二日，法国驻京代理公使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中国立即从北圻撤兵，赔偿兵费两亿五千万法郎，不然就要派海军，占领中国沿海一、二海口，作为赔款抵押。清政府被迫再次与法国谈判，准备在一个月內撤退驻越中国军队，并下令沿海各省不可“先发开衅”，“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也静以待之”。

法国侵略者咄咄逼人、势在必打，清政府低声下气、和战不定。结果，侵略军气焰更嚣张，清军前敌指挥更混乱。七月中旬以来，法国舰队在司令孤拔指挥下，强行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与中国军舰同泊在一条江上。侵略者已经打到

眼皮底下，但主管福建水师的船政大臣何如璋等，却在投降路线指挥下，不作战斗部署，甚至丧心病狂地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惟恐妨碍“和议”。八月五日，法舰进犯台湾基隆，被中国守军奋勇击退。八月二十三日，停泊马尾的法国军舰，以水雷、大炮向中国海军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水师的舰船，连起锚都来不及，仓促应战。在侵略者优势炮火轰击下，福建水师广大官兵临危不惧、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已遭鱼雷击中，但仍迅速而准确地以尾炮回击法国旗舰“伏尔他”号，第一发就命中舰桥，击毙法军六名，舰长差一点丧命。“振威”号遭敌舰炮火夹击，船体已被打穿，仍奋战不息，直至全部沉没前的一刹那，还射出了最后一颗愤怒的炮弹，重创敌舰舰长。“福星”号开足马力冲入敌舰群，左右舷同时发炮，与法舰作殊死战，最后不幸火药舱中弹爆炸，全舰官兵壮烈牺牲。

清政府对外投降的罪恶路线，葬送了福建水师军舰七艘、商船十九艘，官兵伤亡七百余人。洋务派经营了十多年的这支舰队，经马尾一仗便全军覆没；花了两千多万两银子才办起来的马尾船厂，被法国军舰一举摧毁。洋务派大吹大擂的所谓“自强新政”，随着福建水师的葬身海底也就漏了底。

面对法国侵略者的暴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各地掀起抗法斗争的怒潮。“万众汹汹，各无异心”，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地人民，自发地起来向法国侵略分子作斗争，焚毁法国天主教堂，驱逐法国传教士。特别是在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不给法国轮船装卸，英国殖民当局出兵镇压时，爱国同胞更展开大规模的罢工、罢市斗争，反对法国利用香港进行侵略战争。旅居美国、日本、新加坡、古巴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捐款，支持祖国的反侵略战争。人民

群众的抗法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

一八八四年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马尾丧师三天之后，腐败的清政府才被迫对法宣战，命令滇、桂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舰入侵。

法国侵略者在加紧诱降的同时，大举进兵。十月，法国侵略军再次侵犯台湾。淡水守军在当地猎户武装配合下，奋勇迎战，法军损失惨重，纷纷逃回军舰。法军进攻受挫后，采取封锁办法，孤立台湾守军。广东、福建、上海等地人民，不断突破法舰封锁，向台湾运送物资，接济台湾军民的抗法斗争。一八八五年三月，法舰侵扰浙江镇海，招宝山炮台发炮还击，法舰狼狈退出。孤拔座舰也被击中，他身受重伤，六月死于澎湖，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陆战在越南北部进行。一八八五年二月，法军又一次增兵越南，在尼格里指挥下，直扑中、越边境。由于李鸿章“败固不佳，胜亦从此多事”的失败主义影响，潘鼎新统率的东线清军，士气异常低落。侵略军长驱直入，潘鼎新闻风而逃。二月二十三日，法军一度闯入中、越边境重镇——镇南关（今友谊关），广西全省大震。

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年已七十的老将冯子材，奉命率领粤军赶到前线。在中、越人民高昂的战斗意志鼓舞下，冯子材团结各军将士，整顿部队，周密设防，誓与边境长墙（防御工事）“共存亡”。三月二十四日，尼格里率法军分三路扑向关前，冯子材指挥各军死力抵抗，与敌人猛烈搏斗；越南义军一千余人，也来助战，英勇阻击敌人。当法国侵略军象恶狼一样爬近长墙时，冯子材大喝一声，手执大刀，“跃出墙外”，指挥各军冲进敌阵。主帅身先士卒，全军热血沸腾，用大无畏的肉搏战，

将敌人压下了山谷。二十五日，冯子材下令发起总攻击，中国军队和越南义军并肩冲杀，“大获全胜，追贼出关”。尼格里被迫撤退，法军留下了一千多具尸体后，仓皇逃跑。中国军队乘胜追击，二十九日，攻克军事重镇谅山，重伤尼格里，侵略军丢盔弃甲，连十二万银元也抛进河里，拚命南逃。与此同时，西线黑旗军和越南义军互相配合，也在临洮(táo 桃)打败法军，取得重大胜利。处于两面夹击的河内法军，提心吊胆，惊恐万状。

镇南关一谅山大捷，沉重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扭转了整个越南战场的危局。中、越两国军民斗志昂扬，愈战愈强；法国侵略军全线崩溃，处境狼狈。三月底，法军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法国人民立即行动起来，举行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理”的口号。当天晚上，茹费理内阁垮台了。

正当前线捷报频传，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中、越两国军民准备乘胜前进，将侵略者完全赶出越南的关键时刻，清政府竟于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诏令前线停战。

原来，表面上“和战经年定计无”的清政府，实际上对法国侵略者，却一直奉行避战求和的方针。一八八五年初，清政府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秘密牵线，派另一英国侵略分子金登干，去巴黎同法国外交部进行秘密议和。二月，中国军队在越南战场的一度失利，更加速了清政府的求降活动。镇南关大捷前夕，金登干与法国政府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

战场形势的激变，使中国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但在清朝统治者看来，这却是一个妥协投降的最好机会。这伙汉奸民贼，大肆鼓吹“乘胜即收”，将前线军民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当作向侵略者屈膝求和的资本。李鸿章建议：“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清

政府完全赞同他的投降主张，就在中国大胜、法国大败之际，急急忙忙下达投降卖国的停战撤兵令。前线将士闻讯，“皆扼腕愤痛，不肯退兵”，“拔剑斫（zhú 浊）地，恨恨连声”。

一八八五年四月，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在巴黎与法国侵略者签订《停战协定》，重新肯定中、法《简明条约》为有效，中法战争结束。六月九日，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驻华公使签订中、法《越南条约》，承认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这样，法国在战败的形势下，仍然达到了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全部目的。

在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在历史上是少见的。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清政府和李鸿章执行了一条投降主义的路线。中法战争的失败，用触目惊心的事实，再次向人们揭露了清政府的昏庸腐朽，和洋务“新政”的卖国本质。

四 反洋教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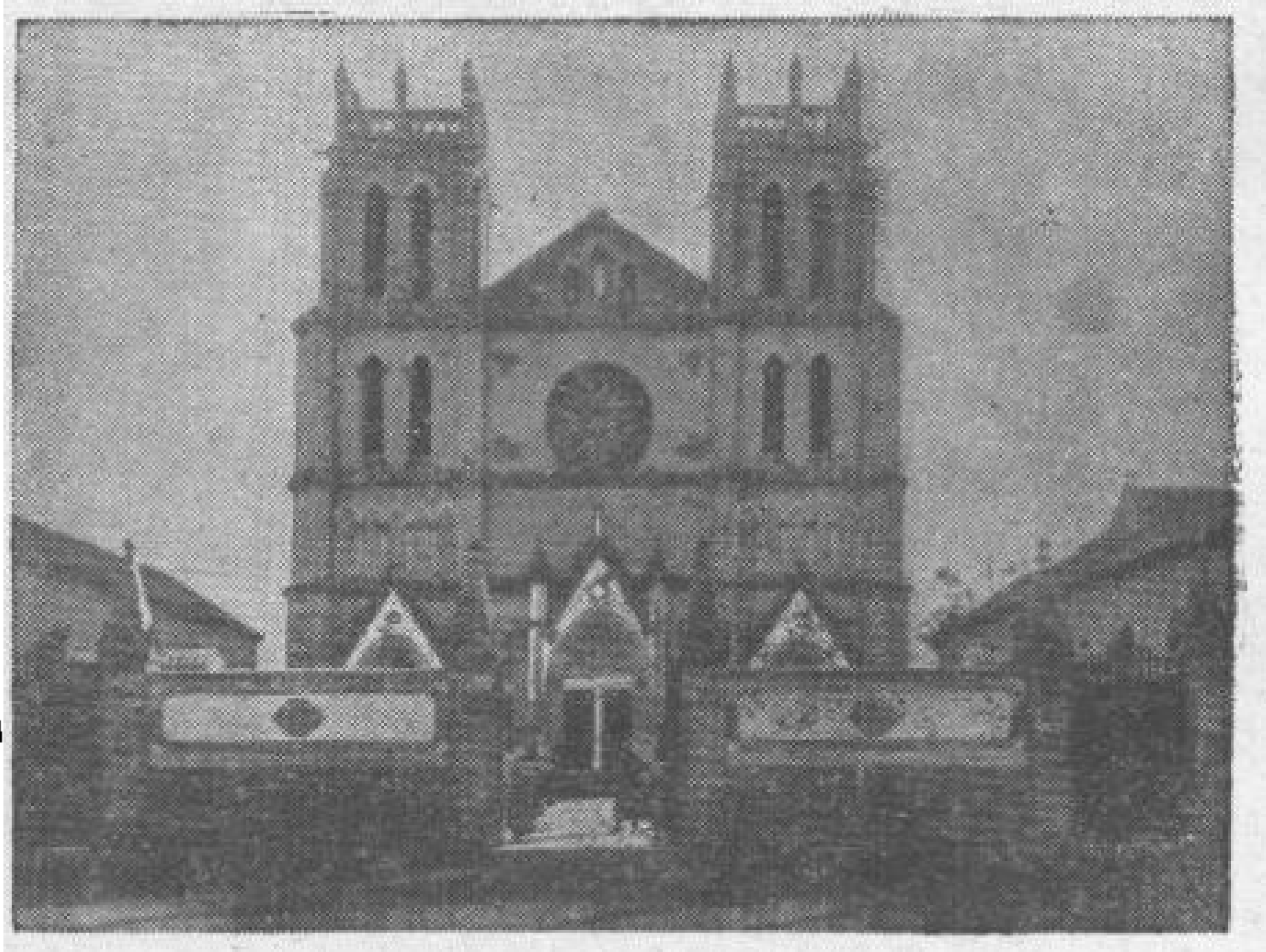
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撤去民族的藩篱，沿着投降卖国的道路越走越远。和这条民族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相对立，中国人民却以此伏彼起的反洋教斗争，英勇不屈地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

基督教、商品、大炮，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三部曲。翻开中国近代历史的每一章，都能看到洋教士作恶多端。

作为殖民侵略急先锋的洋教士，以“中国通”的资格，直接参预或策划了一次又一次对华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一八三二年，乘间谍船“阿美士德”号出没于中国沿海各战略要地，

为英国侵略军提供极有价值的军事、政治、经济情报的，是德籍英国传教士郭士立。起草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的，是英国传教士小马礼逊。强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的美国使团，聘用美国传教士伯驾、裨(bì 弍)治文当中文秘书，伯驾还因侵华有“功”，后来升任驻华公使。裨治文供认：“我等在中国传教之人，与其说是由于宗教之原因，毋宁说是由于政治之原因。”这表明，洋教士们只是把传教当作手段，侵略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

鸦片战争前，传教士就叫嚣以“十字架征服中国”。鸦片战争结束后，外国侵略者通过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和自由传教的特



遍及全国各地的教堂之一

权。一八六〇年以后，由于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都明订了“护教”条款，侵略者又窃取到在中国内地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特权，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们大批涌进中国边

疆、腹地，穷乡僻壤也有他们的活动踪迹。手捧《圣经》的洋教士，尽管满口“劝人为善”、祈祷“灵魂得救”，但在肮脏的殖民事业中无恶不作。“慈善”的外衣、“圣洁”的面纱，遮掩不了外国教会的侵略本质，相反，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仇、阶级恨。

通过渗入中国内地的教堂，洋教士大干收集情报的间谍勾当。美国公使田贝，在一八八七年情不自禁地吹嘘：“这些先锋队（按：指传教士）所收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及一般文化的情报，将其送回国内，对于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各国侵略者异口同声地表彰“辛勤工作的传教士之功”，这就从反面照出了传教士充当间谍特务的原形。

在各国政府的支持纵容下，外国教会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如在山东的一个传教士竟自称“巡抚”，以一省最高官吏自居，命令中国官员服从教堂指示。教会吸收土霸、流氓、坏蛋入教，恃作爪牙；洋教士包揽词讼、私设公堂，甚至在教堂周围设置堡垒武装，征收税捐，“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他们还用圈占、强买、强租、“发还教产”、“捐助”等手段，霸占田产房屋，“经营蕃息”，剥削中国人民。四川彭县白鹿场天主堂，竟拥有土地一万亩，重庆教堂则有房地产四百五十处以上。外国教会依仗侵略特权，任意残害中国人民。一八六九年，四川省酉阳州天主教会，“设置炮台”，组织武装，屠杀反抗教会暴行的当地人民二百余名，“内有肢解、燃烛、轮奸之惨不忍言者”；至于各省发生的传教士“强占人之妻女财产及人命重案，不可枚举”。是可忍，孰不可忍？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富有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

绝不能容忍洋教士的滔天罪行。

一八六一年，反洋教斗争首先在贵州兴起，随后迅速扩展到湖南、江西。最初，封建官绅和地主阶级上层分子，也曾混迹于反洋教斗争的洪流，因为他们怨恨教会损害了自己独占的统治权力，担心不拜天地、不敬祖宗的洋教，会动摇封建统治秩序，但是经不起一两个回合，就仓皇退却了。一八六二年，法国传教士罗安当等，在江西南昌奸淫妇女，禁锢幼童。三月，当地群众愤怒地拆毁教堂、捣破育婴堂。清政府在法国公使恫吓下，屈辱投降，卷入斗争的地方官员和地主阶级上层分子，立即偃旗息鼓。但是南昌人民却英勇地表示：对侵略者决不能让步，“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只有“与他拚命”！在宁死不屈的革命人民面前，侵略者无所施其伎。第二年，罗安当等法国教士，企图乘船再入南昌，重建教堂。船刚停泊滕王阁下，便见江岸竖起“禁止法夷入城”的大旗，随即砖石齐飞，吓得洋教士马上解缆，逃往九江。

反洋教的烈火，在祖国遍地燃烧。六十年代，贵州、湖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福建、台湾，都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斗争。在一片驱逐洋教的怒吼声中，爆发了震动中外的“天津教案”。

一八七〇年六月间，天津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收养的幼儿，死去三、四十名，尸体溃烂，惨不忍睹。与此同时，天津一带不断发生迷拐幼孩的案件，拐犯“当堂直供，系天主堂指使，此事哄传后，人心大愤”。六月二十一日，数千名愤怒群众围住天主教堂，斥责洋教士的野蛮罪行。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及秘书长西蒙，气势汹汹地闯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暴跳如雷，要他派兵镇压，并当场开枪；出衙门后，丰大业又枪击天津

知县，扬刀开路的西蒙，更猖狂地朝群众开枪。侵略者的蛮横气焰，激起群众满腔怒火，丰大业和西蒙这两个暴徒，当场被群众打死，投尸河中。随后，群众又火烧育婴堂，救出中国幼儿，捣毁法、英、美等国教堂及领事署，打死外国教士、商人及官员二十人。

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侵略者，一面联衔“抗议”，逼令清政府屠杀天津人民，一面抽调战舰，麇集海口示威，叫嚣“十数日内再无切实办法，定将津郡化为焦土”。可耻的清政府，再一次屈服于侵略者的武力威胁，赶紧派出以媚外和残忍著称的大汉奸、大刽子手曾国藩，去天津“查办”，不久又派李鸿章会同办理。

天津教案，是因外国教会侵略而激起的，天津人民的斗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斗争。曾国藩明知“曲在洋人”，但却抱定以残杀人民向侵略者“告谢”的奴才方针。被诬害的爱国人民，“虽酷刑而不畏”。曾国藩杀害义民十六人、缓刑四人、充军二十五人，残酷地镇压了天津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外国侵略者赞赏曾国藩的汉奸行为，人民却口诛笔伐，痛骂曾国藩为卖国贼。不久，曾国藩在国人皆曰可杀的唾骂声中死去。这位“中兴名臣”的媚外抑民，又一次揭破了洋务派所谓“自强”的卖国本质。

刽子手的屠刀，吓不倒革命人民，只是惊退了在反洋教洪流中浮沉的封建官员和地主士绅。从七十年代到中法战争前，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反洋教斗争日益扩展。一八七六年，四川邻水、涪州、江北厅人民攻打教堂，火烧医馆，给予当地天主教侵略势力以沉重打击。一八七九年，福建延平人民喊出了“不受洋人荼毒，亦不受官长欺凌”的战斗口号。八

十年代，东南沿海和西南沿边各省，反洋教斗争风潮大起，东北、华北也不断有“教案”发生。

中法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更加高涨。这时，封建阶级的各个阶层，已退出了斗争行列，城乡劳动人民成为斗争的领导力量。“万民一心，众怒难犯”，九十年代初，终于在四川大足县、长江中下游和热河朝阳三个地区，迸发为震动全国的大规模反洋教武装斗争风暴。

一八九〇年，四川大足县爆发以余栋臣为首的反对教会侵略的武装起义。起义军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和传教士的滔天罪行，揭发封建官绅的帮凶嘴脸，号召人民同心奋起，驱逐外国教会的侵略势力。起义军转战川东，架列土炮抬枪，与前来镇压的优势清军浴血奋战，持续两年之久。

一八九一年，长江中下游一带掀起波澜壮阔的反洋教怒潮。沿江一带的码头工人、挑夫、民船水手、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是斗争的主力；民间秘密结社——哥老会，成了斗争的领导核心。四月，芜湖万余群众“势如潮涌，声若山崩”，不畏洋人枪炮，冲破清军“弹压”，拆毁并烧掉了教堂和教会学校。芜湖暴动的信息，闪电般传遍大江南北，安徽、江苏、江西、浙江等地，卷起更大的反洋教风暴。清政府极力镇压。“所有外国在华可以出动的炮舰，都出动完了”，但是侵略者依然提心吊胆，美国公使惊呼：“没有一个城市是安全的，上海也包括在内。”

伴随着长江中下游反洋教斗争的高涨，一八九一年十一月，热河东部朝阳一带人民，又在秘密结社金丹道、在理教的领导下，聚众数万，发动了大规模武装起义。起义军“焚堂灭教”、“仇杀贪官”，打毁衙门、监狱，纵横驰驱数百里，直逼清朝

统治的心脏地区——直隶。他们以鸟枪刀矛为武器，与拥有洋枪装备的清军奋战两个多月，打了大小数十仗，使清朝统治者感到“隐患未已”，惶恐不安。

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不仅从政治、军事、经济各个方面侵略中国，而且，“对于麻醉中国人民的精神的一个方面，也不放松，这就是它们的文化侵略政策。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①在这方面，教会出力最多，起的作用也最坏。外国教会向受尽压迫和剥削的中国人民，灌输“忍耐、保守和受苦受难的基督精神”，胡说西方的入侵是上帝的“福音”，用歌颂“天堂”的靡靡之音，麻醉和瓦解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列宁说：“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②他们办的医院，一方面以小恩小惠欺骗人民，一方面却惨无人道地以中国人当试验品。他们也办了一些学校和报纸。据统计，一八七六年时，单单美国在中国设立的中等以下学校，就有二九四所；基督教于一八六〇至一八九〇年间，在中国发行的期刊多达七十六种。目的都是为了宣扬腐朽的资产阶级文明，培植服从于它们的知识分子，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帝国主义的所谓“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真相就是如此！

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广泛的反帝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在这一历史阶段，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它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顽强战斗精神，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统治，戳穿了洋务派所谓“中外和好”的骗局，显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二——五九三页。

②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示了中华民族抗击外来压迫的英雄气概。一九〇〇年伟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就是在反洋教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洋教斗争的性质是正义的，但形式上却带有笼统的排外主义色彩。那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①

五 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新阶级出现

推行“洋务”的三十年间，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日益加深，中国不仅在政治上加速了半殖民地化，而且社会经济的半殖民地化，也日益明显。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和封建统治机构的买办化，更为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提供了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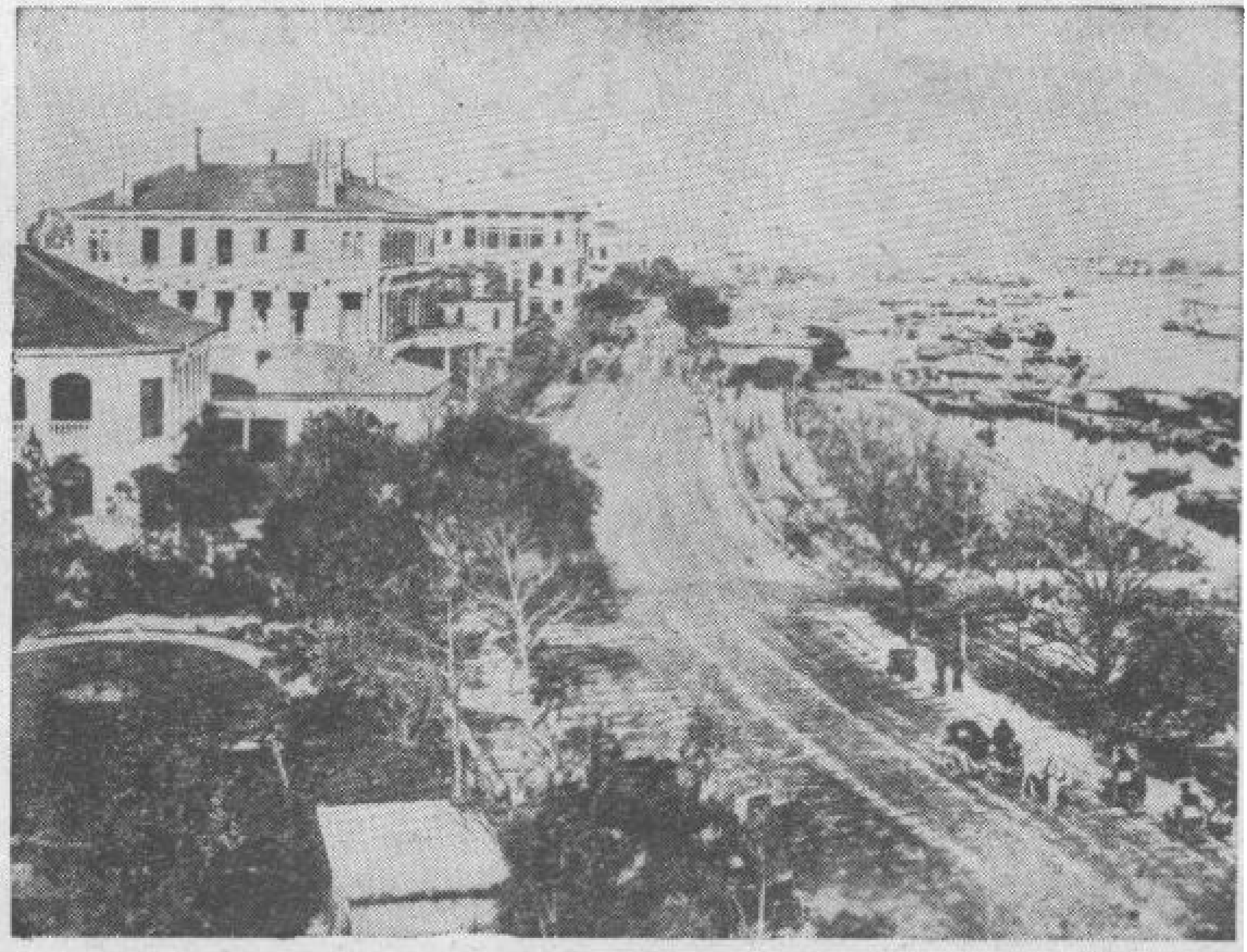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中国被迫开辟的通商口岸，由一八六〇年前的七个（东南五口，加上西北的伊犁和塔城），增加到一八九四年的三十四个；侵略者的吸血管，由沿海各口一直伸展到长江流域和广大内地。外国商品的进口额，也由一八六四年的五千一百余万两，激增为一八九四年的一亿六千余万两。进口货物中，八十年代前，鸦片占首位；八十年代后，棉织品跃居第一，占进口总值的三分之一，鸦片虽退居第二位，但绝对数仍一直上升；机器和工具的进口，到九十年代初，才占百分之零点五。出口货物中，八十年代前，主要是茶和丝；八十年代后，棉花和大豆逐步增长。中国被迫加速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漩涡，成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产地。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五页。

为了发展掠夺性贸易，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对中国进行商品输出之外，也开始了初步的资本输出。

首先，是设立银行。甲午战争前，外国在中国开设的银行，主要有：英国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等，而以汇丰银行势力最大。这些银行，不仅在中国发行纸币，吸收存款，操纵国际汇兑，而且贷给清政府以附有政治条件的债款，逐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其次，是经营航运。依仗条约特权，英、美等国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先后在中国设立轮船公司。七十年代前，中国的轮船航运由英、美操纵；七十年代后，形成英国独霸，而以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势力最大。一八七二年招商局成立前，



一八八〇年的上海外滩

航运业全被外人控制；一八九二年，外轮仍占百分之七十八。外国商船直驶中国沿海和内河，擅自装载客货，不仅侵犯了中国主权，扩大了商品掠夺，而且严重打击了中国帆船航运业，造成大量水手和运输工人的失业。

再次，是开办工厂。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工厂，有一百多个，大致可分为船舶修造业、各种进出口加工工业、小规模轻工业，以及在租界经营的公用事业四类。外国侵略者在中国设立近代工业，不仅直接掠夺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丰富的原材料，制成商品后，直接拿到中国市场销售，牟取惊人的暴利，而且，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凭借自己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的巨大优势，阻碍和压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愈来愈深地陷入半殖民地泥坑，卷进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一八八三年，英国驻华领事的商务报告说：“在每一个村庄里，都有英国棉线出售，每一个商店的货架上，都可以看到英国棉线。”一八九一年，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痛心地说道：“洋布、洋纱、洋花边、洋袜、洋巾入中国，而女红失业。洋油、洋烛、洋灯入中国，而东南数省之柏（jiù 旧）树皆弃而不材。洋铁、洋针、洋钉入中国，而业冶者多无事投闲。此皆大者，尚有小者不胜枚举。……华人生计，皆为所夺矣。”大量事实表明：“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①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九页。

毛主席强调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是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的企业中、在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的无产阶级。”^①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阶级，它们是向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作斗争的新的阶级力量。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中国社会自然经济的破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商品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破产，给资本主义造成了劳动力的市场；同时，中国社会内部，也积累了一些能够转化为资本的货币财富。这样，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货币资本的结合，就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直接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中国的资产阶级，是由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组成的。控制官办和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的洋务派大官僚，以及实际负责经营这些企业的大买办，是中国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雏型。民族资产阶级主要是指中产阶级，“这个阶级代表中国城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②

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碍下，经过二十多年惨淡经营，到一八九四年甲午战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七三——一三七四页。

②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页。

争前，一共创办了一百多个大小不等的企业（主要是小型企业）。

在这些企业里，机器缫丝业出现得最早。一八七二年，广东侨商陈启沅，在家乡南海县创办继昌隆缫丝厂。这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工厂。一八七八年，上海几个绅商呈请开办新式棉纺织厂，但因洋务派的压抑，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出现了华新纺织新局和裕源纱厂。面粉、火柴、造纸、印刷等业的经营相当早。为适应航运业的需要，民族资本在上海、广州、汉口也经营了几家船舶修造厂。一八八〇年，恒昌祥机器厂在上海建立。此后，民族资本经营了一些新式采矿业，如安徽池州煤矿、山东枣庄煤矿等。各地还开办过近十个金、银、铜、铅矿，但大多归于失败。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国家日益陷入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一点，决定了它不可能得到顺利的发展，而只能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畸形地、艰难地挤出一条生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以武力强迫中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根本无法与外国资本抗衡。清政府对兴办各种工业，都进行控制与束缚，日益加重的苛捐杂税，又使民族工业不堪其重负。同治以后，各地厘卡林立，“只鸡尺布，并计起捐”，以致“行旅愁叹，衢路荆棘”，大大阻碍了本国工农业产品的运销流通，成为民族资产阶级难以冲破的网罗。不仅如此，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的各种企业，以及洋务派所控制的民用企业，又都凭借政治上、经济上的优越地位，竭力摧残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

建主义的压迫与束缚,因而同它们有矛盾、有斗争;另一方面,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产生对它们的依赖性和妥协性。为了不致破产,求得发展,有的企业引进外资,或聘请外国人作经理,挂上外商招牌;有的企业巴结清朝官僚,乞求官府庇护;至于在机器设备、生产技术、原料收购和产品推销方面,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或本国封建势力,更是司空见惯。

这一切,决定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①“一方面——参加革命的可能性,又一方面——对革命敌人的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②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就是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兴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产生了中国的工业无产阶级。

鸦片战争后不久,外国资本首先在香港、广州和上海等通商口岸,经营近代工业,雇佣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产业工人。六十年代后,在洋务派举办的军事工业、民用企业,以及七十年代民族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中,又产生了另一批产业工人。因此,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据初步估计,一八七〇年前后,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约不到一万人,至一八九四年,增加到近十万人。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是在中国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在逐渐长成的过程中,它自己显著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二页。

②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五页。

的特点。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前身，是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地主压迫，而陷于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资本主义各国的商品侵略，城乡手工业的被破坏，残酷的地租剥削，苛重的封建赋税，商人与高利贷的层层盘剥，同治、光绪年间频繁的自然灾害，造成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死亡、破产、流离失所。外国资本在中国经营航运业的结果，改变了中国旧日商品运转的线路，又使不少地区的运输工人失业破产。就这样，大批破产农民、手工业者以及失业流亡的人群，涌入城市，做了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后备军。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队伍，从一开始就是比较集中的。从地域分布来看，上海、汉口、广州三个城市的工人，就占了全国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七，其中上海一地占百分之四十六。从企业雇佣的人数来看，五百人以上的大企业已不算少，最大的企业雇佣工人达三、四千人。例如，一八九四年，江南制造局拥有工人二千八百名，上海机器织布局雇佣工人达四千名。此外，在将近十万人的队伍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女工和童工。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一开始就受到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痛苦生活。那时，中国一般普通工人的工资，是每天一角五分至二角。有训练的男工超过二角，高的也只有二角七、八分。普通女工的工资，大约每天一角至一角六分。然而，即使这么低的工资，还要遭到老板和工头的拖欠克扣。与工资低微极不相称的，是中国工人劳动时间之长。一般讲，每天劳动在十一小时以上。劳动时间虽有“规定”，也不过是表面文章，如江南制造局在赶

工的时候，工人经常是在棍棒威逼下日夜操作，累得筋疲力尽。企业主只顾追求利润，根本不顾工人死活，一般厂矿都严重缺乏安全设备和卫生设备，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伤事故层出不穷。以缫丝厂为例，车间常年保持高温，七、八月间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狱”，女工和童工每人管一口固定的锅，里面装着半锅沸水，工人就在这样的沸水中手工操作，手指因烫伤脱皮以至溃烂，而监工还要将童工的手，揪到沸腾的锅里加以“惩罚”。

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实行殖民主义的压迫。外国资本家和工头随意辱骂、殴打、甚至杀害中国工人。同样做工，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外国工人的几分之一或几十分之一。在清政府经营的企业中，工人还受到严重的封建专制统治。厂里设置刑庭，对工人滥施鞭笞（chī 吃）、“枷号示众”。为了“弹压”和“管束”工人，许多厂矿都驻有军警，江南制造局一个厂，就派了“巡警营”官兵一百多名。封建把头的野蛮控制，更是遍布所有企业。在民族资本经营的工厂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与外资企业和洋务企业竞争，追求利润，同样对工人实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

由于身受三重压迫，中国工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遭到非人的待遇，挣扎在饥饿线和死亡线上。一个在湖北织布官局担任总监工的英国人报道说：中国工人“瘦到只有皮包着骨头，五十人里面也找不出一个体格健康的人。”这个厂如此，其他厂中国工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恩格斯当时就曾指出：“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①工人出卖全部劳

^① 《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八卷，第四六七页。

动力，换来的是杂粮、豆渣、菜皮等最粗劣的饭食，住的是茅棚、土屋、“滚地龙”（一种用芦席搭盖的简陋住所），穿的是褴褛(lán lǚ 蓝吕)不堪的衣衫。

残酷的压迫，激起不断的反抗。中国工人阶级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以罢工斗争为武器，反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一八五八年，香港工人举行罢工，反对英、法侵略军强占广州。一八七九年七月，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工人罢工，反对工头克扣工资；九月，英商祥生船厂工人发动罢工，反对外国监工殴打工人和迟发工资。一八八二年，开平煤矿工人为要求平等的工资待遇，举行罢工；上海会德丰及荣泰船行驳船水手罢工，要求增加工资。一八八三年和一八九〇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工人两次罢工，反对延长工作时间。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工人发动罢工，拒绝为法国侵略者修理军舰，反对法国利用香港进行侵略战争。

以上罢工，虽然只是中国工人阶级早期反抗斗争的部分事例，但却证明，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同压迫和剥削他们的中外反动阶级进行斗争，即使对外国侵略者也毫不畏惧，突出地显示了新生的中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中国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当然，这一时期的罢工斗争，还是工人群众的自发斗争，在斗争中，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旧式的秘密结社，和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帮口。这些情况又说明，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还处在幼年时期。

第六章 甲午中日战争

一 日本的对外扩张

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中“不败而败”，这件事，助长了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野心。一八九四年（旧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推行扩张政策、蓄谋侵略中国的必然步骤。一八六八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建立起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从此，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起来，并和残余的封建经济以及天皇制的国家机构相结合，对外特别富于侵略性。早在明治初年，日本就制订了先征服朝鲜和中国台湾，进而征服中国以至世界的狂妄的“大陆政策”。一八六八年春，日本明治天皇颁布“御笔信”，叫嚣要“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所谓“开拓万里波涛”，第一个实际目标，就是侵略一海之隔的近邻——中国和朝鲜。

为了实现对外扩张的狂妄野心，日本明治政府一方面大肆鼓吹“国之兴废，在于兵力”，在国内加紧搜括，增加军费开支，建立现代化的陆、海军；一方面竭力争取美、英的支持。这是因为，日本统治阶级虽然野心勃勃，但实力有限，它不能不采取一面侵略一面从属的方针，依靠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作为后盾，对中国和朝鲜步步进逼。一八七四年，日本在美国支

持下出兵台湾,企图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接着,又在美国援助下入侵朝鲜,想夺取这个“渡满洲的桥梁”。一八七六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获得了通商、租地、领事裁判权和在朝鲜沿海自由航行等侵略特权。

中国和朝鲜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中、朝两国人民之间,有几千年悠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说:“朝中两国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年月里中结成了亲密的友谊,在反对外国侵略者的共同斗争中,曾互相给以帮助。”^①早在十六世纪末,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派军队侵略朝鲜时,明朝将领李如松,就曾率领中国军队,配合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统率的朝鲜海军,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朝两国相继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对象,两国人民更成为同命运、共呼吸的患难兄弟。

但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入侵朝鲜时,统治中国的腐朽清政府,并不能帮助朝鲜抵抗侵略者。当日本胁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时,李鸿章竟密劝朝鲜政府,用“以敌制敌”之策,相继和美、英、德、俄、法等国订立不平等条约,企图借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势力,来“牵制日本”。这种引狼入室的办法,不仅不能制止日本侵略势力在朝鲜的发展,而且由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迅速插入,加速了朝鲜的半殖民地化,并使朝鲜成为当时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争夺的一个焦点。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侵略势力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上,全面向朝鲜渗透。在军事上,他们更以帮助“改组”军队为名,派遣军官打入朝鲜军队,力图加以控制。日本的侵略活

^① 《朝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金日成选集》第六卷,第三五一页。

动，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遭到朝鲜人民的坚决反对。一八七九年四月，釜(fǔ辅)山附近发生朝鲜人民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暴动。一八八二年，朝鲜城市贫民和士兵发动兵变。起义群众焚毁汉城日本公使馆，严惩卖国的封建官僚，矛头直指日本侵略势力。日本借口这一事件，立即派遣军队去朝鲜，进行战争威胁，逼迫朝鲜政府签订《仁川条约》，除得到赔款外，还取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利。它的侵略铁蹄，又前进了一步。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初，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朝鲜国王在清朝军队帮助下，镇压了政变。日本就此对清政府进行要挟，第二年，在天津与李鸿章订立中、日《天津会议专条》，议定将来朝鲜如果发生变乱或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须行文互相通知。后来，日本就利用这一条款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一八八七年，日本参谋部拟定了一份《征讨清国策》，即侵略中国的战争计划，准备以大部分兵力进攻北京，而以小部分兵力占领长江流域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妄想战争取胜后，将中国包括辽东半岛在内的盛京(即沈阳)、盖平以南地区，山东登州府(山东半岛)，浙江舟山群岛，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十里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时，将中国其余地方，分割为东北、江南、华北、青藏、内外蒙、甘肃、准噶尔等几个小国，分别附属于日本。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拟定：“以五年为期作好准备，抓住时机发动进攻。”

为了制造舆论，日本军阀头子、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一八九〇年发表“施政演说”，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是日本的生命线”的侵略理论。一八九二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一八八

五年起的十年扩军计划。这时，日本已建成战时可达二十三万人的新式陆军，和一支拥有六万多吨位舰只的新式海军。第二年，日本派遣大批特务潜入中国，参谋次长川上操六，也偷偷溜进朝鲜和中国境内的军事战略要地，察看作战地形，搜集情报，绘制了详细的军用地图。

日本侵略者已经刀出鞘、箭在弦，从各方面作好了侵略中、朝战争的准备。

二 日军侵入朝鲜和中国

一八九四年春，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提出了“逐灭倭夷”、“尽灭权贵”等口号，把斗争矛头指向外国侵略者（特别是日本）和本国封建统治者。起义军攻击官署，夺取武器，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贫民。各地群众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南部的全罗、忠清、庆尚三道，六月初，攻占全罗道首府，革命浪潮迅速波及全国。

日本侵略者阴谋借朝鲜农民起义的时机，挑起侵略战争。它一方面指使日本浪人组织“天佑侠”潜入朝鲜，以“帮助”起义军作战为名，妄图扭转东学党“逐灭倭夷”的斗争方向；另一方面玩弄外交阴谋，竭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以便为自己出兵制造借口。日本驻朝公使表示：如果清政府帮助朝鲜政府镇压起义，“我政府必无他意”。掌握对日军事和外交实权的李鸿章，完全无视侵略者的诡计，对日本政府“必无他意”的鬼话深信不疑，于六月四日应朝鲜政府请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一千五百人去朝鲜（九日至十一日在牙山港登陆），并备文照会日本政府。

早在六月二日，日本政府获得朝鲜政府要求清朝派兵的消息，就决定以“保护”使馆和侨民的名义出兵。五日，日本设置战时大本营，秘密派出一支七、八千人的混成旅团，火速运往朝鲜。八日，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已在仁川登陆。十日，从仁川到汉城一带战略要地，全被日军控制。这时，清军在牙山港尚未登陆完毕。六月底，进入朝鲜的日本侵略军增达一万人，总兵力远远超过清军。很明显，日本侵略者决计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后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自己供认：这个战争政策，在“帝国政府派军队于朝鲜时，业已决定”。

面对日军在朝鲜的优势，李鸿章不敢抵抗，也不敢增援，进退失据，大为惊惶，建议两国军队同时撤兵，以求早日“收场”。但日本蓄意扩大事态，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无理要求，企图把整个朝鲜置于日本控制之下，悍然拒绝清政府的建议。

战争一触即发，国内舆论强烈要求清政府增援备战。以光绪帝（一八七五——一九〇八年在位）和他的师傅翁同龢（hé和）为首的一部分官僚（帝党），也想借主战向西太后争权，不断催促李鸿章备战。但西太后和李鸿章为首的另一部分官僚（后党），在“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的投降主义支配下，深怕中、日关系紧张，一味妥协退让，避战求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英、俄等国的“调停”上。沙俄此时表面上虽支持清政府，暗地里却怂恿日本侵朝，以便从中渔利，因而不愿立即进行干涉。英国为了与沙俄对抗，拉拢日本；日本则以不侵犯英国在华利益，换取英国支持。“调停”已成泡影，李鸿章仍训令叶志超“静守勿动”，幻想“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就这样，清政府和李鸿章步步退让，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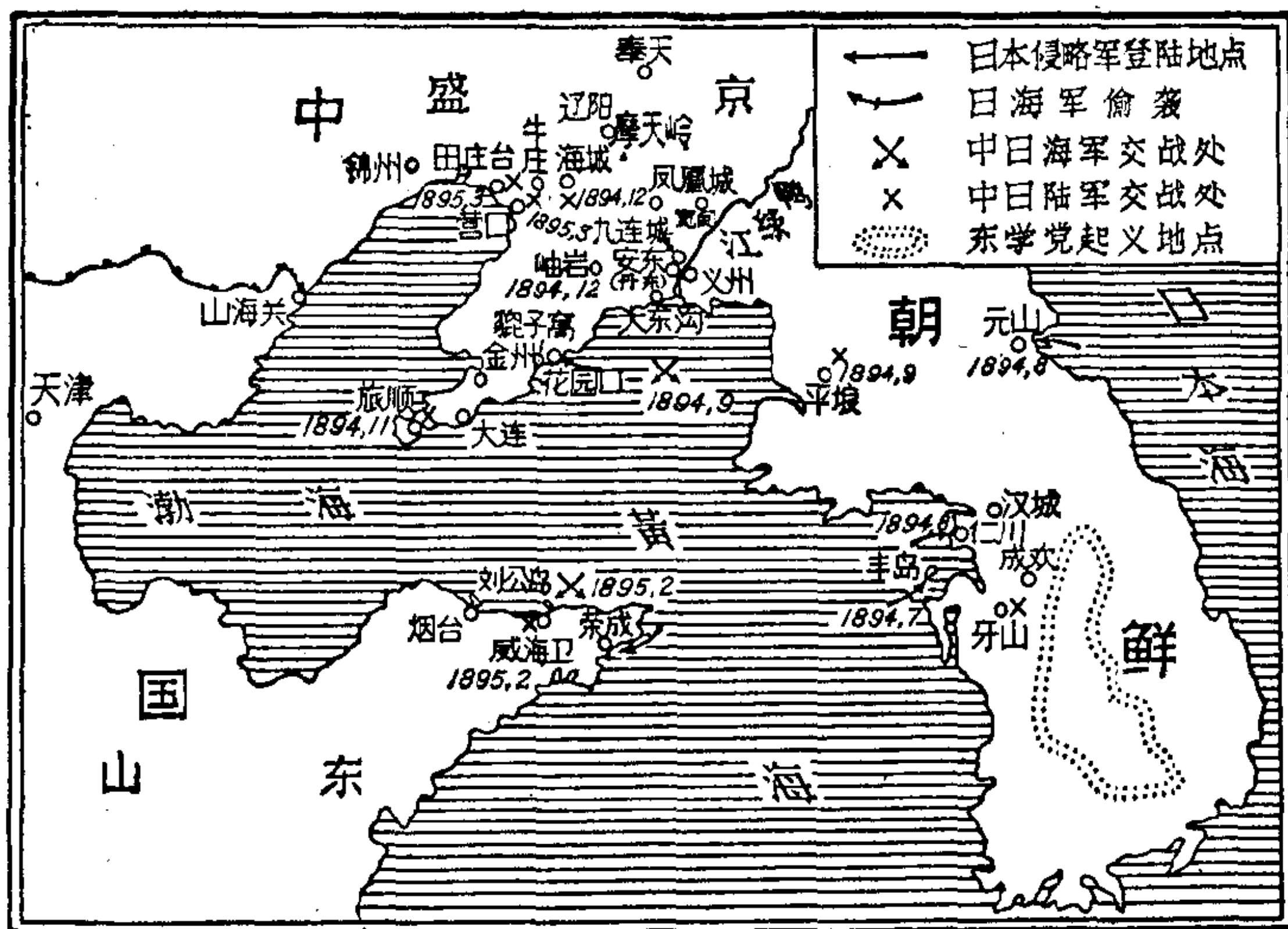
加猖狂。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进逼，国内主战派的舆论压力以及光绪帝的连下“密谕”，迫使李鸿章不得不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陞(shēng 生)阿等四军，从辽东渡鸭绿江进军平壤。同时，又雇英国商船“高陞”号等运兵渡海，增援牙山港清军驻地。

潜伏在天津的日本间谍，用重金贿赂，获得援军开船日期这一重要军事情报。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侵略者派军舰集结于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突然偷袭护航的中国“济远”舰和“广乙”舰，同时拦击运兵英轮“高陞”号。船上的中国官兵，坚决不向侵略者投降，用步枪抵抗日舰。“高陞”号为鱼雷、大炮击沉，全船官兵七百余人壮烈殉难。日本侵略者在进行海上偷袭的同一天，又出动陆军，向牙山清军发动袭击。由于日军大队猛攻，清军主将叶志超又拒不增援，聂士成部在毙伤大量日军后败退。这时，畏敌如虎的叶志超，已率军逃跑。聂军追及，合军后继续绕道北撤，直到八月下旬才逃到平壤。

侵略者对丰岛海面和牙山清军的偷袭，开始了日本对中国的不宣而战。八月一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甲午战争中，日本是侵略者，中国为自卫而战，为阻止日本侵略朝鲜而战，它所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八月初，中国援军卫汝贵等四路，共一万四千人，陆续开抵平壤。中国军队初进平壤时，朝鲜人民夹道欢迎，热烈慰问。在战争中，朝鲜人民积极支持中国军队抵抗日本侵略者。到九月间，侵略朝日军已达五万人，中国军队集中在平壤的约两万人。从牙山逃至平壤的叶志超，一路上谎报军情，饰败为胜，腐朽的清政府不仅大加奖励，还任命他为平壤各军的总指挥。清军将各一



甲午中日战争形势图

心，不服调度；叶志超等聚集平壤后，只知克扣军饷，既不争取军事上的主动进攻，又不积极布置防务；加上清军纪律败坏，抢掠骚扰，致使朝鲜人民大失所望。

九月十五日，日军分路进攻平壤。清军匆促部署，守卫各门。马玉昆部在大同江东岸和平壤南门，奋勇迎战，自清晨战至午后，终于击退来犯日军，打死日军官兵一百四十名，打伤二百九十名，日本少将旅团长也被击伤。左宝贵部坚守城东北玄武门，侵略者的炮火异常猛烈，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并向叶志超求援。叶志超不发援军，还想弃城逃跑，受到左宝贵的严厉抵制。在玄武门阵地上，中国士兵拚死抵抗，奋勇杀敌，给予日本侵略者以重大杀伤。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阵地相继失守，玄武门为日军占领。

日军占领玄武门后，不敢立即入城。当时马玉昆、卫汝贵

部，已击退东、西两路日军，战事尚未定局。特别是朝鲜农民起义军，不断打击日军后方，向汉城挺进，支援了中国军队的抗战。中、朝军民配合作战，完全有可能击退敌人的进犯，但主将叶志超贪生怕死，不顾中、朝军民的浴血抗战，又一次下令撤退。就在当天夜里，叶志超丢弃大量军火物资，趁暴风雨率军仓皇逃出平壤。叶志超带着一批将领向北狂奔五百里，二十一日逃过鸭绿江，退到九连城、凤凰城一带。从此，日本侵略者的战火，便直接烧入中国境内。

平壤战役后两天，日本舰队又在鸭绿江口的黄海海面，向中国北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九月十七日上午九时左右，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护航返经大东沟时，在黄海海面上发现一支悬挂美国国旗的舰队。等到迫近北洋舰队时，这支舰队突然全部改悬日本旗。当时，中国北洋舰队的兵舰是十艘，另有鱼雷艇四艘，日舰十二艘。从力量对比看，双方舰队吨位相差不大，在舰龄、火炮口径、射击速度、航速和装甲等方面，亦各有优劣。丁汝昌发现日舰后下令迎战，并在旗舰“定远”号上，与总兵兼“定远”号管带刘步蟾(chán缠)等议定：由旗舰“定远”号及姐妹舰“镇远”号(两主力舰各七千吨，炮大、装甲厚)居前，以“分段纵列”阵应战。刘步蟾怕死惧战，故意发错信号。接着，丁汝昌在旗舰飞桥上震落受伤，“济远”号管带方伯谦更重演临阵脱逃的故伎。北洋舰队虽已指挥不灵，阵势混乱，但大部分舰艇的广大爱国官兵，仍然同仇敌忾，沉着应战，表现了中华民族誓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大无畏精神。

在海战中，巡洋舰“致远”号勇往直前，中弹最多，在弹药将尽、船身倾斜的危急时刻，管带邓世昌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向最凶恶的敌舰“吉野”号撞去，不幸中鱼雷沉没，全舰两百五

十二人壮烈牺牲。巡洋舰“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浴血奋战，中弹阵亡，全船官兵坚持战斗到最后沉没的时刻。旗舰“定远”号全船起火，水兵们仍毫无畏惧，沉着发炮，轰击敌舰，有的炮手身负重伤，仍裹创再战。经过五小时激战，中国海军在四艘被击沉、两艘逃走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重伤敌舰多艘。敌旗舰“松岛”号被“定远”号巨炮命中，弹药库起火爆炸，敌指挥官以下毙伤一百多人。



邓世昌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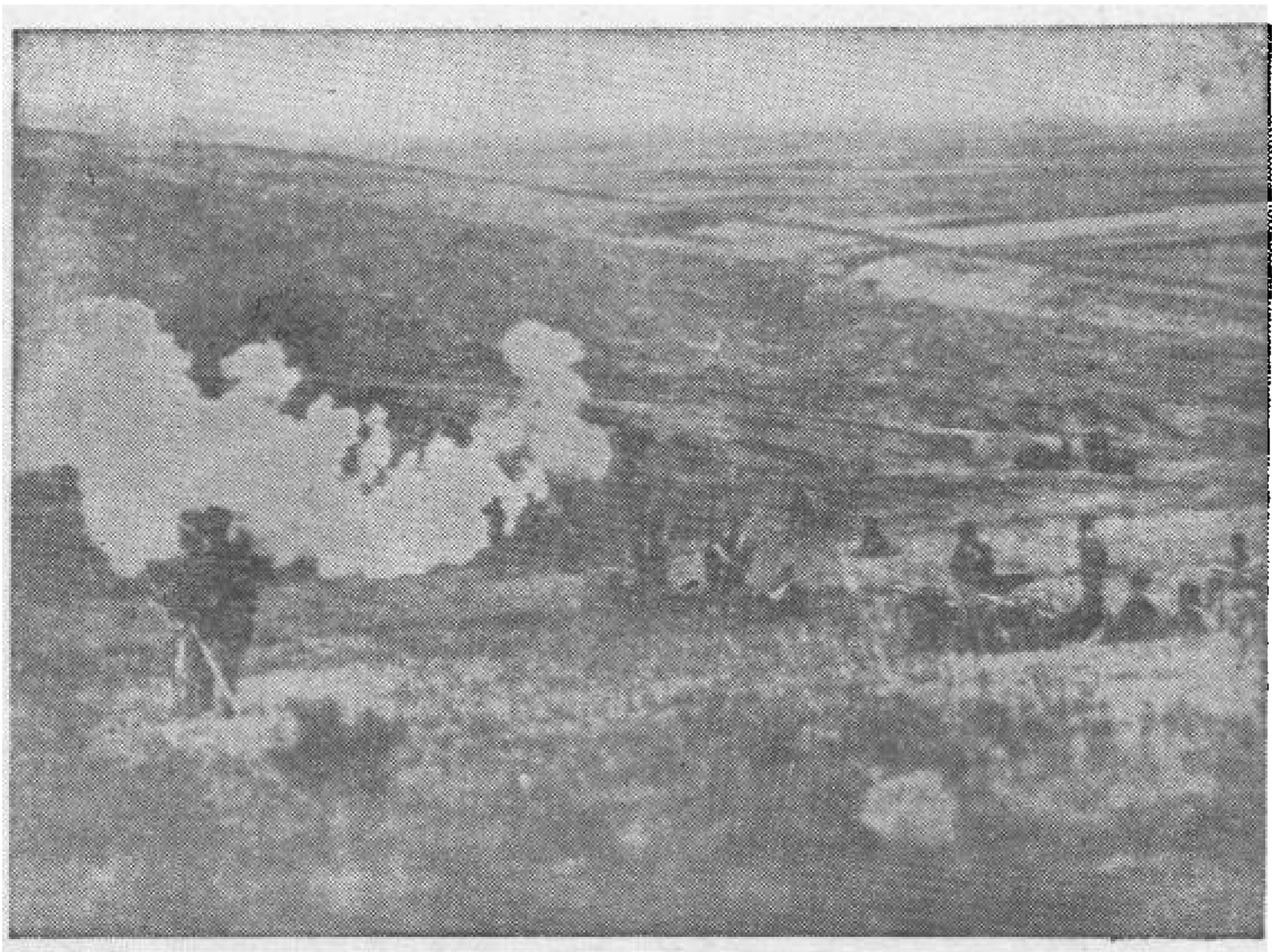
敌舰付出了很大代价后，于傍晚下令先退。侵略者“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没有得逞，北洋舰队退返旅顺。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深刻暴露了清朝统治制度的腐朽黑暗，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它表明：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必然导致军事上的失败主义，路线错了，即使武器不弱于敌，又有广大士兵和部分将领的英勇抗战，也无法避免整个战事的失败局面。李鸿章在黄海海战后，为了保持他的实力地位，竟无耻命令北洋舰队躲进威海卫港内，“不得出大洋浪战”；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不可则退”，实行不抵抗主义。任凭日本侵略者调兵遣将，在陆上海上耀武扬威。

十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经过一个多月整顿和布置，分两路同时向中国进犯。

一路从平壤北犯，准备渡过鸭绿江，进攻中国辽东。这时，驻守鸭绿江边境全线的清军达四万人，在战略上消极被动，只想依凭鸭绿江天险阻挡日军。十月二十四日，日军前锋二、三十人偷渡鸭绿江，二十五日，大队日军过江。除聂士成部在虎山有所抵抗外，其他各军纷纷溃退。二十六日，安东（今丹东）和九连城失陷。到十二月中，凤凰、宽甸、岫（xiù 袖）岩、海城等城镇，相继失守。

另一路日军也于十月二十四日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三万日军登陆，前后共用了十二天时间，清军未作任何阻击。丁汝昌曾向李鸿章要求率领舰队进援旅顺，决一死战。李鸿章大骂说：你好好在威海守住几只船别丢，其他不是你的事！在李鸿章失败主义支配下，旅顺、大连地区的多数军官在敌人进



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日军炮轰旅顺

攻面前，只顾搬移家财，毫无抵抗意志。十一月初，日军进攻大连，守将先一日逃走，大连不战而陷。十八日，日军向旅顺进攻。当时旅顺还有清军一万三千余人，但守将已逃，军心涣散，只有徐邦道部孤军在旅顺以北出战一天，一度打败日军先头部队。二十一日，日军以大炮猛轰旅顺。二十二日，日军主力发动进攻，旅顺失陷。旅顺、大连是被洋务派头子李鸿章经营了十六年、花了几千万两银子建成的海军要塞。它的失陷又一次说明，在清政府对外妥协投降的路线下，任何坚固的要塞，也是不起作用的。

日本侵略军侵占旅顺后，兽性大发，进行了连续几天的血腥大屠杀。据英人胡兰德记载：“在这次屠杀中，幸免于难的，全市仅三十六人。这三十六人是为供驱使以掩埋其同胞的尸体而被留下的。”日本军国主义欠下的这笔血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日本侵略者侵入中国领土后，到处烧杀抢掠，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反抗。处在前线的辽东人民，以土枪、鸟銃(chòng 冲)甚至斧头、镰刀为武器，自发组织起来，配合当地坚持抗战的清军，打击侵略者。据统计，仅辽阳、凤城一带的武装群众，人数就有三十万之多。日军曾四次进犯辽阳，都被当地武装群众击退。一八九五年二月，鸭绿江边的东边道一带人民，广泛展开狙(jū 居)击战，二十五日在欢喜岭等地，歼灭日军七、八十名，乘胜追击，收复宽甸。三月一日，又打死侵略军八十余名，一举收复长甸。这些胜利充分证明：“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①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四七八页。

一八九五年一月，日本侵略者为了迫使清政府完全屈服，派遣侵略军在山东半岛成山头登陆，采取包抄后路的办法，进犯威海卫，目的是消灭困守在港内的北洋舰队。二月，处境危急的北洋舰队广大水兵和部分爱国军官，奋力抵抗侵略者达半个月之久。在侵略军海、陆夹攻下，舰只多数被击沉，形势愈来愈险恶。舰队中几个外国顾问和一些贪生怕死的将领勾结起来，逼海军提督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宁死不降，下令各管带同时沉船，但遭到反对。在内外敌人威逼下，丁汝昌服毒自杀。十二日，由美国顾问浩威起草降书，缴出残余舰艇十一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三月，日军又相继攻占牛庄、营口和田庄台，不到十天功夫，辽东战场六万清军，全面溃败。

从一八九四年七月到一八九五年三月，八个月的战争，清军战无不胜，失地丧师，这是清政府妥协投降路线的必然恶果。西太后一心想保持和局，要在甲午年歌舞升平地庆贺她的六十大寿，因而，事先是挪用海军经费五百万两银子，修建颐和园；接着，在朝鲜交涉问题上，完全支持李鸿章；甲午战争打响后，又竭力压制主战派。由西太后、李鸿章这一类投降派、卖国贼主持国家方针大计，战争的败局是注定了的。

清政府因战败而惊恐万状，决意屈膝求降。日本侵略者由于国内财政困难和中国人民奋勇抗击，也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攻势。于是，在美国操纵策划下，马关议和开始了。

三 《马关条约》

军事上的节节溃败，被投降派当作卖国有理的“论据”。清政府由妥协退让、避战求和，发展到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屈膝

求降,最后,签订可耻的《马关条约》。

早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下旬,当清军和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失利时,西太后就重新起用中法战争时被罢职的恭亲王奕訢为总理衙门大臣,以便让他寻求外国调停,实行对日求和。十月,日本侵略者深入中国国土,奕訢亲自出面,哀求英国等列强,共同调停中日战争,并答允英国提出的对日赔款等要求。但这时日本由于军事上的胜利,侵略胃口很大,不愿马上接受英国等联合调停。十一月,清政府又向美国提出调停要求。一贯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并从中图利的美国,认为这时伙同日本向中国勒索的时机已到,表示愿意居间调停。这时,美国暗示日本,要它的战争行动适可而止,否则将引起欧洲列强的干涉,给日本带来不利。外强中干的日本,经过几个月海上和陆上战争,不仅到处受到中国人民的反抗,而且已经出现财政空虚和军需缺乏等困难,所以也愿意接受美国的调停。

一八九五年一月,清政府派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huán环)、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同时,在美国诱迫下,聘请前美国国务卿科士达为代表团顾问。

清政府的卑屈求和,激起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慨。当时有人上书清廷,要求杀李鸿章,指出议和就是卖国。张荫桓等去日本求和,路经上海时,上海人民纷纷抗议,贴出匿名揭帖,要求继续抗战,表现了广大人民群众反侵略的强烈愿望。

清政府虽然派出正式代表到广岛求和,但这时日军正向北洋海军基地威海卫进攻,气焰甚为嚣张。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讨论议和条件时,开价极高,有的主张除辽东半岛及台湾外,还要把中国的东三省割去,有的特别希望勒索巨额赔款

等。清政府担心割地为社会舆论所不许，加上威海之战及辽东战事尚未结束，还不愿无条件屈服。

日本侵略者看出，清政府这时还不可能全部接受它的侵略要求，为施加压力，便借口清政府求和代表“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同时示意清政府，只有派出象李鸿章那样的大卖国贼，才能同意谈判。最后，张荫桓等受到种种刁难，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狼狈回国。

清朝统治集团在日本军事进攻和外交压力下，哀叹“战和皆无可恃”，决意屈膝投降。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三日，正当威海卫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进一步受到全国舆论谴责时，清政府却迫不及待地要以这个大卖国贼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三月，日军在整个辽东战场得逞，威胁京津。在“宗社为重、边徼(jiào 叫)为轻”这一出卖国土的口号下，清政府正式批准李鸿章以割地卖国的“全权”，赴日求和。

一八九五年三月二十日，李鸿章带着美国顾问科士达，同日本全权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务相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日本马关(今下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

马关议和，是日本在美国支持下宰割中国的一次会议。在谈判中，端迪臣为日本出谋划策，“起草约稿，索取赔款”，威吓勒索，无所不用其极；科士达则在另一方面为日本取巧，催逼李鸿章赶快割地赔款，签字投降。两个美国侵略者，表面上各为一方，互相辩论；实际上串通一气，忠实地执行美国政府支持日本、宰割中国的政策。

从谈判开始，日本政府为了防止其他资本主义列强乘机干涉，就力图强迫清政府迅速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同时又继续保持对中国的军事压力，作为谈判桌上的威吓手段和砧

(fǎ 法)码。三月三十日，双方订立停战协定，规定停战期限二十天，但日本把准备侵吞的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划在停战区域之外。

四月一日，日本抛出了极为苛刻的议和条件，限四日内答复。主要内容为：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占奉天南部、台湾和澎湖列岛，赔偿军费三亿两，开放包括北京在内的口岸七处，其他的工商业特权等。李鸿章一面将这些条款偷偷告知英、俄、法三国公使，希望各国干涉；同时又奴颜婢膝地哀求日本侵略者，减轻议和条款。伊藤博文在谈判中，除将赔款减为二亿两，开放港口减为四口以外，其余各款不容稍减。四月十四日，日本宣称这些媾和条款已是“尽头”，中国的答复只有“允、否”两个字。并以战争威吓李鸿章说，如果谈判破裂，“中国全权一去此地，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亦属不能保证”。李鸿章哀求再谈一次，被伊藤博文断然拒绝，并扬言如再打下去，日本的议和条件将更苛刻。日本侵略者样子装得很凶，其实，“国内军备殆(dài 带)已空虚”。侵入中国境内的日军，不断遭到中国人民打击，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侵略者如此张牙舞爪，不过是为了吓唬李鸿章这样的卖国贼罢了。

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和李鸿章讨价还价的过程，活现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强盗相和汉奸卖国贼的奴才相。例如，当日本强迫中国割让中国神圣领土台湾省时，伊藤博文限令清政府在一个半月内办完交割手续。李鸿章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尚未下咽，饥甚！”短短几句对话，帝国主义的贪婪(lán 拦)本性，洋奴走狗的甘心卖国，暴露得何等彻底！

清政府在停战期限将满，各国干涉又无希望的情况下，训

令李鸿章在无可商讨时，同意订约，也就是屈膝投降。

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与日本签订了空前屈辱的卖国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主要内容有：一，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二，割让辽东半岛。这一条，直接触犯了对中国东三省怀有极大领土野心的沙俄，条约签订不到几天，沙俄就纠集法国和德国出面干涉，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由中国加付日本三千万两“赎地费”，这就是所谓“三国干涉还辽”。三，勒索巨额赔款。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加上赎还辽东半岛费用三千万两，共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四，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际上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五，允许日本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六，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轮船可驶入上述各埠，搭客载货。

《马关条约》，是日本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一副沉重枷锁。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过程中，它是继《南京条约》后又一严重的卖国条约。根据《马关条约》，日本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这不仅又一次严重破坏了中国的领土完整，而且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恶浪。《马关条约》规定空前巨大的赔款，相当于清政府每年国库收入八千万两白银的三倍。为了支付这笔赔款，清政府大借外债，出卖更多的民族利权；外国侵略者则通过借款，进一步从政治上控制中国，从经济上掠夺中国，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马关条约》允许外国资本家在中国开矿设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榨取更多的利润。英、美、法、德、俄等国资本家，援引“利益均沾”这一片面的最惠国待遇，都同样获得这项新的特权，争先恐后地到中国

开设工厂。这一条款，适应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需要，对中国民族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是一个直接的障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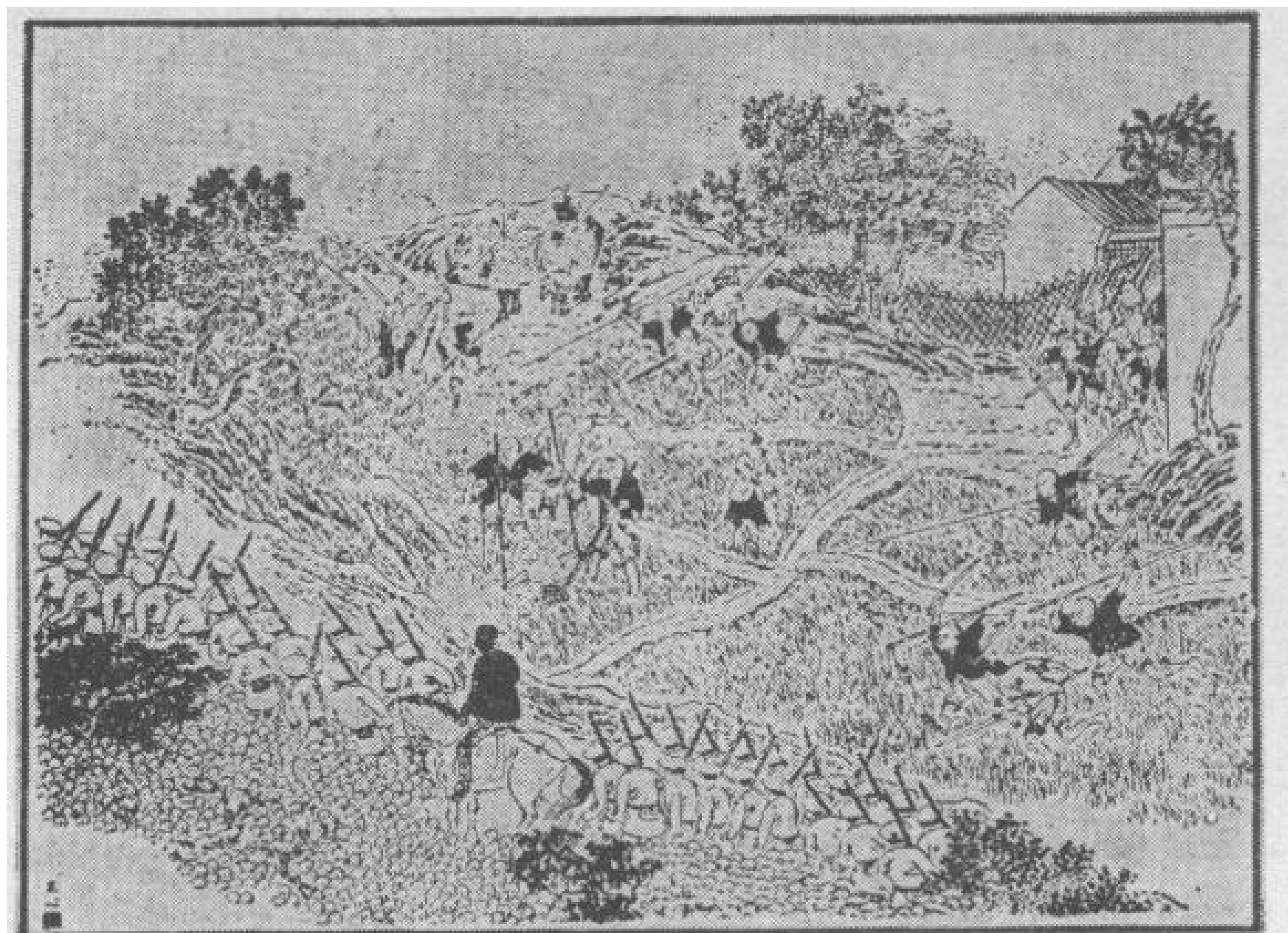
《马关条约》签订后，立即爆发了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事件，接着，又出现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争夺投资、抢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争斗，中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被瓜分的危险更加迫近了。

四 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战

甲午战争期间，从黄海海面到台湾海峡，从鸭绿江边到山海关前，广大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与日本侵略者展开顽强不屈的战斗。其中，尤以一八九五年六月开始的台湾军民保卫国土和家乡的长期浴血奋战，为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增添了壮烈的一页。

一八九五年四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全国立即卷起一股反对割地赔款、要求继续抗战的浪潮。“城头逢逢雷大鼓，苍天苍天泪如雨，倭人竟割台湾去”——诗人黄遵宪字字血泪，写出了当时中国人民的极度愤慨。处在抗战前线的东北海城、盖平、岫岩等地人民，“愤不欲生”，指出如果东北门户被打开，侵略者将会“长驱直入”，表示誓以“坚壁清野”来消灭入侵者。正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康有为等，痛感民族危亡，纷纷上书，要求废约拒和、迁都抗战。台湾籍举人更义愤填膺地表示：“如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地军民必能舍生忘死”，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奋战到底。

割台凶耗传到台湾后，台北立即鸣锣罢市，群众拥进巡抚衙门，抗议清政府的卖国罪行。全台人民严正表示：要与日本



台湾人民英勇打击日本侵略军

侵略者“决一死战”，“决不接受日人统治”；并警告台湾巡抚等官吏，不许他们离台逃跑，不许将抗战所需的库银和武器弹药运出台湾。台湾巡抚惊呼，三、四万名台湾籍军队和一部分大陆去的军队，已不听调度。台湾人民发布抗战檄文，怒斥李鸿章“无廉无耻，卖国固位”，表示台湾人民反对割台的决心。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一部分清政府官僚，由于害怕和无视人民的抵抗力量，希望依靠列强干涉，来拖延或拒绝批准《马关条约》。这当然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法国就以“极明显、极准确的语言”，拒绝清政府要求干涉日本割去台湾的问题。清朝统治集团只好如期交割台湾。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日，清政府命令台湾巡抚唐景崧(sōng 松)，率文武官员“陆续内渡”，从台湾撤走；同时，派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为“割台大臣”，伙

同和谈顾问美国人科士达来完成这一卖国勾当。

台湾巡抚唐景崧等人，表面上敷衍台湾军民强烈的抗日情绪，被迫作出留台的诺言，背地里却极力压制和破坏台湾军民的抗战。他把主张抗战的将领和军队，调至台南一带，台北地区则控制在自己手中，既不认真设防，又听任一部分清军陆续逃离，造成防御空虚。五月二十九日，从冲绳出发的日军主力部队近卫师团，在基隆东面三貂角登陆，日舰则从正面对基隆进攻。守军坚持阵地，并在宜兰地方武装四千人配合下，包围了登陆的日军。六月二日，清政府“割台大臣”李经方，慑于台湾人民要处死他的义愤，不敢踏上台湾，在科士达策划下，偷偷地在基隆口外日舰上干完了交割台湾的手续。第二天，日军猛攻基隆，当地守军奋勇抵抗，日军以惨重代价夺取了基隆。唐景崧闻讯，却不战而放弃台北，退至沪尾（淡水港），并于六月七日偷偷地和一批官吏士绅，坐上外国商船，逃归大陆。台北的大批军械物资和库存几十万两银子，都白白地落入敌人手中。整个台北地区，在六月上旬就这样失陷了。

随着唐景崧的逃跑和台北失陷，台中的清军守将和官吏，也都弃地不顾，相继带兵或挟库银财物内渡，台中只剩下极少数坚持驻防的清军。台南地区三面临海，日军早已派兵舰进行骚扰，甲午战争初被清政府移驻台湾的黑旗军刘永福部，坚守海防，但兵力单薄。在日军大兵压境的严重时刻，台湾人民发扬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任何外敌的光荣传统，纷纷自动组织抗日义军，成为台湾抗战的主要力量。抗日义军队伍，较大的有七、八支，每支各有几百人到几千人，其中最杰出的是徐骧(xiāng 香)和吴汤兴两支义军。徐骧是新竹县爱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侵略军进犯新竹前夕，他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国土，保卫

家乡，“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举吾民之骨血，与全台俱尽”，表现了台湾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六月下旬，在台南，台湾军民共推刘永福为首领导抗日，为保卫祖国领土而“誓同死守”。

悲壮激烈的台湾保卫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竹保卫战。六月十二日，日军分两路进犯通往台中的门户新竹，抗日义军徐骧、吴汤兴、姜绍祖部和少数清军，分路迎战，据险狙击。东路日军在三角涌一带，被徐骧等义军和当地武装群众“四面包裹”，一举被歼六十名；西路日军依仗人多，“弹如雨下”，但吴汤兴部“善狙击，弹无虚发”，连续杀伤敌人，迫使日军退却。新竹抗战坚持到六月下旬，终因军械不济，粮食断绝，义军被迫退往苗栗等地，新竹失陷。七月十日，义军又组成一支力量，反攻新竹，在县城东与日军争夺十八尖山，两军对战，姜绍祖率部与敌人“相拒至夕，枪弹尽”。最后姜等壮烈牺牲，义军后撤。新竹义军坚持抗战一个多月，大小战斗二十多次，连日本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被打败，附近村民便立刻变成我们的敌人。每个人甚至青年妇女，都拿起武器来，一面呼喊，一面投入战斗。”新竹争夺战，有力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凶焰。

第二阶段：台中、彰化之战。八月中旬，日军自新竹向南推进，进攻苗栗。刘永福派来支援的黑旗军吴彭年部，仅以数百兵力，防守苗栗城，抵御敌军一个旅团的进攻，终因伤亡过多而退出。苗栗失守，台中重镇彰化就成为抗敌的主要阵地。黑旗军在吴彭年指挥下，以大肚溪为天然屏障，建立防线，顽强抗击来犯日军。日军正面不能取胜，就绕道夺取大肚溪上游的台湾县（今台中），再分三路进犯彰化。彰化城东八卦山，

牺牲。吴彭年率三百名黑旗军战士来援，用肉搏战严惩了敌人，最后受伤数十处，和大部分黑旗军战士一起英勇战死。徐骧率余部杀出重围，退往台南，彰化终于陷落。

第三阶段：嘉义、台南之战。彰化失守后，刘永福立即派出将领王德标守卫嘉义。在台湾军民的沉重打击下，日军近卫师团狼狈万状，急忙从辽东调两个师团到台湾，重组“南进司令部”，分水陆两路进犯台南。这时台北、台中失陷，台南地区在武器和粮饷方面极端缺乏，清政府却严令官民“不得丝毫接济台南”，力图扼杀台湾军民的抗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了坚持战斗，有人曾建议刘永福，带兵“入内山”为根据地，这样，日军因“地险”难以深入，黑旗军则能进一步得到高山族人民和义军的响应。但刘永福没有接受这一建议，仍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清朝官吏的接济上，多次派人赴大陆筹款，结果都空手而回。十月十一日，日军得到增援后，大举进攻嘉义。守将王德标，在城外一带兵营内，埋下大量地雷，弃营进城。半夜，日军进占营房，被地雷炸死七百余人。第二天，日军又以大炮轰塌嘉义城门，窜入城中，黑旗军七星队和义军奋起巷战，杀伤日军无数。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在这次进犯中受到抗日军民严惩，重伤毙命。

嘉义失陷后，日军二万五千余人，从台南以北的布袋口和以南的枋寮登陆，配合陆上的近卫师团，夹攻台南。抗日军民在曾文溪一带，与在布袋口登陆的日军展开大战。在这场殊死搏斗中，誓与台湾共存亡的义军首领徐骧等，奋勇战死，余军退往台南。从枋寮登陆的日军，进攻打狗港（今高雄市），守军顽强迎战，十五日失守。在台南危急的时刻，刘永福经不起考验，几次想通过美国驻台南领事欧思纳，向日军求和。十七

日，日军攻台南，刘永福驻安平炮台。城中粮绝，守军溃散。十九日，日军进攻炮台，刘永福抛弃他所率领的抗日军队，偷偷地乘英国轮船逃往厦门。二十一日，台南陷落。

英勇的台湾军民，以劣势装备艰苦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三个近代化师团和一支海军舰队，重创侵略者，取得多次胜利。在五个月的激烈战斗中，日本侵略者被打死、打伤和因病中途遣回的，达三万两千余人，占侵台日军总数四分之三以上。日军主力近卫师团，被台湾军民消灭了近半。台湾军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日本帝国主义强行霸占台湾五十年，台湾人民就反抗日本统治半个世纪，这种威武不屈、顽强斗争的精神，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①

^①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四七页。

第七章 戊戌维新

一 瓜分狂潮

甲午中日战争的全过程，进一步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马关条约》的签订，更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敞开了大门。如果说，鸦片战争是世界资本主义侵入中国的开始，那么，甲午战争就是世界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开始。

十九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①“列强力图奴役其他民族，掠夺殖民地，以获得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②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各国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开办工厂、银行，抢夺铁路投资，进行政治贷款，强占军事基地，划分势力范围。亡国的灾祸，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

附有政治条件的高利借款，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进行资本输出，控制和掠夺中国的重要侵略手段。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清政府要分三期支付日本二亿三千万两巨额赔款。但它国库空虚，岁入不过八千万两，不能不大量借外债。为了输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八〇八页。

② 《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二四页。

出资本并控制清政府，以英、德为一方，俄、法为另一方，彼此进行激烈争夺，不断地到总理衙门吵闹。甚至连承办投降事宜的清朝大官僚也不能不感到：为兜揽借款，英国公使“咆哮恣(zì字)肆”，专横跋扈(bā hù 拔护)；法国公使“无耻无饜(yǎn 雁)”，欲望没有止境；沙俄公使更以战争作威胁，如“不借俄而借英，伊国必问罪”。结果，沙俄以“干涉还辽应有酬劳”为理由，勾结法国，抢到了第一次借款权；英、德拚到另两次借款权。

三次借款，每次一万万两，共三万万两白银。这些借款，不仅利息重、折扣大、期限长，而且都附有苛刻的政治条件，要以国家的重要收入——关税、盐税、厘金作抵押。一八九五年七月，清政府与俄、法订立的借款合同，规定年息百分之四，九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分期还清，以关税收入为担保，并允许沙俄参加海关行政管理。英国在借款合同中规定，原由英人担任的海关总税务司这一重要职务，四十五年内不得更换他人。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共借外债四千五百多万两，关税收入，每年抵补有余；一八九四至一八九八年，光是战费和赔款，就借了外债三亿四千多万两。关税收入，本是政府重要财政来源，现在被外债的巨额本息扣住了。这样，帝国主义通过政治借款，就在金融、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使清政府更加受它们的控制。

在争夺政治借款的同时，沙俄竭力向中国东北扩张，一手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其目的并不是为了保全中国领土，而是为了把日本从中国东北挤出去，以便“将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由于“还辽”事件，西太后、李鸿章等亲俄派，自诩(xǔ 许)有“政治远见”，清廷内外笼罩着一片联俄气氛；沙俄则

以“共同防日”为幌子，对清政府极尽欺骗、拉拢之能事。一八九六年五月，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miǎn 免），沙俄事先向清政府暗示，派老卖国贼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赴俄。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一面诡称“将来英、日难保不再生事，俄可出力援助”，“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一面对李鸿章进行巨款贿赂。结果，六月三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共六款，主要内容是：日本如侵占沙俄远东或中国、朝鲜领土，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战时沙俄军舰得驶入中国所有口岸；中国允许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达海参崴（即东省铁路），铁路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同年九月，沙俄又通过订立《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攫取了东省铁路沿线地区的行政权、司法权、驻军权、采矿伐木权以及减免税厘等特权。密约及公司章程，表面上打的是对日军事同盟的旗号，骨子里却是沙俄要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的独占殖民地。李鸿章做着“联俄制日”的美梦，以为投靠沙俄，可保中国“二十年无事”。可是墨迹未干，就在密约签订的第二年，沙俄出动军舰强占旅顺、大连；再过两年半，更大举进兵中国东北。带头想要瓜分中国的，就是这个口头上大叫“援助”的沙俄。

在中国开设工厂，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另一重要方式。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援引《马关条约》的规定，纷纷来中国开办工矿企业。仅仅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六年一年时间里，以纺织业来说，就增加了英国的怡和纱厂、老公茂纱厂、德国的瑞记纱厂、美国的鸿源纱厂等四家，资本共达四百多万两，规模之大，远非民族资本纱厂可比。此外，它们还投资开办面粉厂、榨油厂等。据不完全统计，一八九五到一九〇〇年间，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企业投资，包括工矿、铁路、银行等各方面，总共在一万万两以上。这些外国企业，不仅直接残酷地压榨中国广大劳动群众，掠夺中国丰富的资源，还严重地压制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抢夺铁路投资，也是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主要目标。帝国主义不仅把在中国修建铁路，看作是经济侵略最有力的工具，而且在政治上更作为争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

一八九五年，法国趁三国干涉还辽正在进行的时机，以“出力调处，大有益于中国”为词，向清政府施展外交压力，首先取得了从越南边境至广西龙州的铁路修筑权，和在云南、广东、广西三省优先开矿权。

紧接着，就是沙俄巧取豪夺，一八九六年从清政府手里取得了横穿中国东北，修筑和控制东省铁路的侵略特权。

俄、法和英、德两个集团，还激烈争夺芦汉铁路（芦沟桥至汉口，今京汉线）的修筑权，最后由比利时出面修筑，实际上是落到它的后台俄、法集团手中。

一八九八年，德国取得了山东胶济铁路的修筑权。美国取得了粤汉铁路的借款和筑路权。英国眼看俄、法势力扩张，并将伸入到自己利益所在的长江流域，就急起直追，一口气向清政府索取了津镇（天津到镇江，后为津浦线）、广九、浦信、苏杭甬，以及从山西往河南到长江沿岸等五条铁路的借款和修筑权，以与俄、法相争。

伟大的列宁，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在世界各地抢建铁路的侵略本质，他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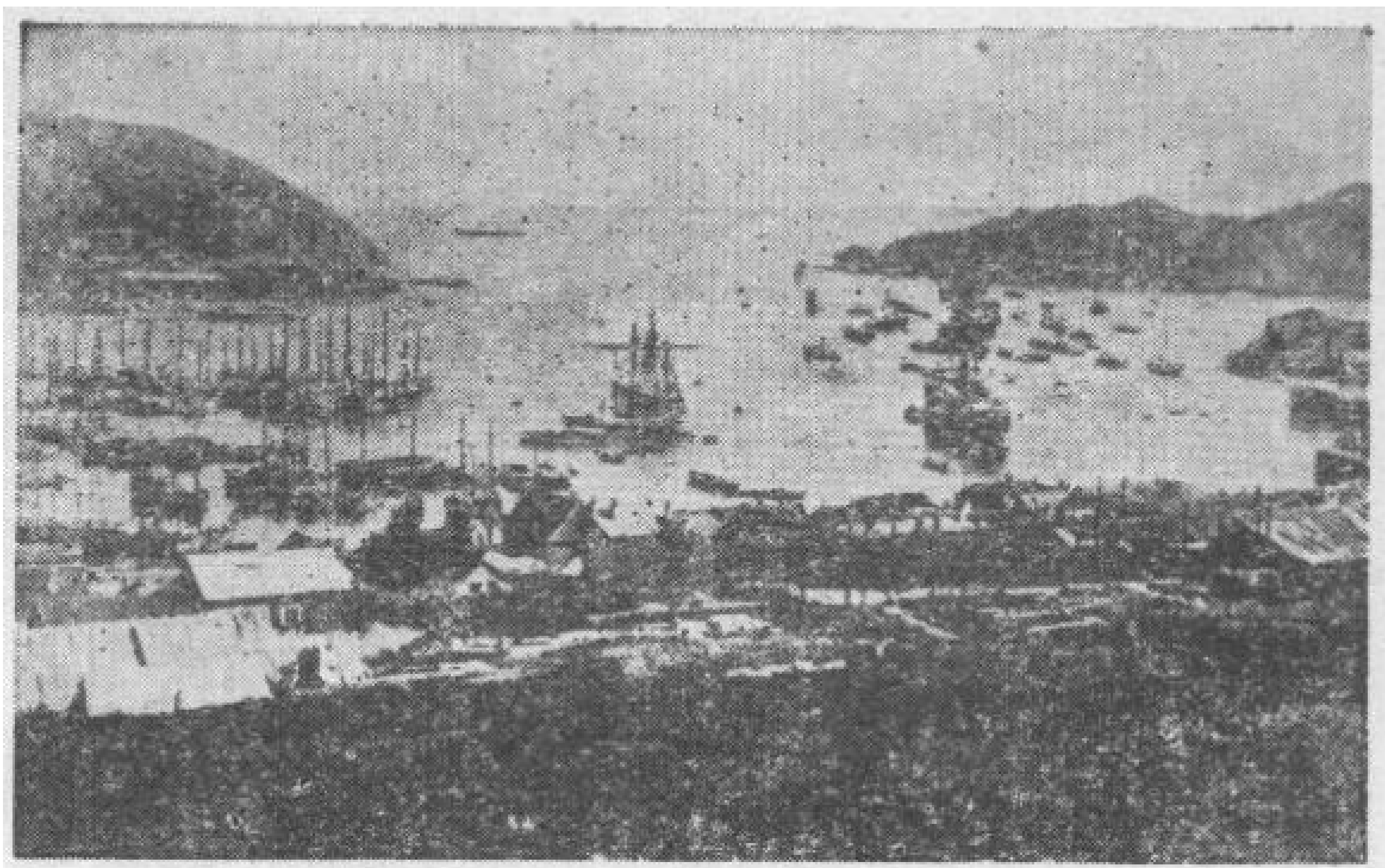
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①一八九五至一八九八年间,帝国主义疯狂抢夺中国主要铁路干线修筑权和借款权,其目的就是为了加紧掠夺中国,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国闻报》也惊呼:“中国之铁路,均西人之铁路,铁路成而中国亦遂不国矣!”感到瓜分惨祸将接踵而至。

通过《马关条约》,日本侵略者从中国割去辽东、台湾等大片领土。三国干涉还辽,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狗咬狗的斗争,并成为十九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进行大争夺的信号。

德国首先出马。一八九七年八月,德皇威廉二世访问沙俄,就侵占中国胶州湾问题,同尼古拉二世取得默契。这年十一月初,德国借口两个德籍传教士被杀(即“巨野教案”),派兵强占胶州湾,夺取青岛炮台。第二年,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强租胶州湾作为德国军港,租期九十九年。此外,还取得了在山东境内筑路、开矿等特权,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沙俄支持德国占领胶州湾,是以德国支持它夺取旅顺、大连,作为交换条件的。紧接德国占领胶州湾不到一个月,沙俄舰队突然闯进旅顺口,霸占了旅大地区。一八九八年三月,清政府被迫与沙俄订立《旅大租地条约》,旅顺和大连租期各为二十五年,“但经双方同意得延长之”。沙俄实际上取得了长

^①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三三页。



一八九八年，沙俄强租旅顺口为军港

期盘踞的特权。清政府并允许东省铁路从哈尔滨开始，造一条支线接到大连。这样，不仅从日本侵略者口中挖出的赃物落入了沙俄的血盆大口，而且整个中国东北，都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法国的侵略胃口也很大。以德、俄为先例，法国于一八九八年四月，逼迫清政府同意“租借”广州湾（今湛江地区）九十九年，允许法国投资修筑自越南至昆明的铁路，并承认不把两广、云南割让给他国。这三个省的大部分地区，就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刚刚侵吞了中国神圣领土台湾，这时它又看红了眼。在英国的支持和德国的默认下，再次伸出黑手，于一八九八年四月迫使清政府允诺，不把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于是，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

老牌的英帝国主义在中国侵略权益最大，抢夺“势力范

围”，当然不甘落后。一八九八年二月，英国强迫清政府承认长江流域属于它的“势力范围”，并对这一地区作出“不割让声明”的保证。接着，在六、七月间借口抵制法国势力，强租九龙半岛深圳（zhèn 镇）河以南地区，租期九十九年。为对抗沙俄势力，又强租山东威海卫为军港，租期二十五年。这就不仅把长江流域作为它的独占势力范围，还在中国南、北两翼，伸展了触角。

美帝国主义也竭力叫嚷“分割中国”，只是因为它在一八九八年忙于和西班牙争夺殖民地菲律宾，一时无力兼顾，以致原先想夺取的威海卫，也因英国抢先而落空。美国在美、西战争取胜后，把菲律宾当作侵略中国的一个跳板，露骨地说：“直接随着它，还有中国那一片无限广大的市场。”美国政府曾决定，强占舟山的定海作为侵略基地，但因和英国利益冲突，没有得手。就在一八九八年，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康格哀叹：“除了直隶一省以外，事实上没有其他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但美国侵略者并不就此罢休，而是阴险地采用了新的侵略手法。

一八九九年九月，美国政府经过一番密谋策划，由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臭名昭著的“门户开放”政策，即承认各国在华的“势力范围”，但各国在“势力范围”内，不得限制它国通商、航行等活动。这样做，一方面是要各国的势力范围都向美国开放，使美国垄断资本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运用自己优势的经济力量，尽量掠夺和剥削整个中国；另一方面，也暂时缓和了帝国主义之间争得不可开交的矛盾，在政治上达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协议。当然，美国从没有放弃割占中国领土的要求，直到一九〇〇年，它还看中福州北面的三沙湾，想强占为“租借地”，只因日本坚决不让，才没有实现。

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八年不到三年时间，辽阔的中国领土，绝大部分都已成了帝国主义各自的“势力范围”：沙俄在长城以北，英国盘踞长江流域，德国在山东，日本在福建，法国在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分地区。漫长的中国海岸线，竟没有一处可以作为自己海军基地的港口。

列宁在一九〇〇年愤怒地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①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质进一步深化的重要标志。帝国主义都想吞掉中国这块肥肉，他们狂妄地叫嚷：中国已经气息奄奄，再过几年来看，它就不复存在了。

“处处扼咽喉”，“天涯何处是神州”？瓜分大祸，迫在眉睫，中国人民广泛地开展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伟大的反帝风暴——义和团运动，处在迅速汇合、即将爆发的进程中。刚由地主阶级转化而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来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他们在一八九八年，发动了一次著名的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由于这一年是阴历戊戌(wù xū 勿需)年，所以叫作“戊戌维新”，也叫“戊戌变法”。

二 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形成，有一个发展过程。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四页。

中国的产生而出现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世的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产生的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国内社会危机的加剧，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在八十年代中法战争失败后，逐步汇合成一股改良主义思潮；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失败后，迅速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一八九八年，则形成为改良主义的政治实践——“百日维新”。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沿海各省先后开办了五十个左右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这些企业产生的过程中，一部分商人、官员、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逐步向资产阶级转化。他们不满清政府压制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不满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华民族的压迫和摧残，开始感到顽固守旧的封建专制制度、儒家学术和八股文一类东西，已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必须从中挣扎出来，探讨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认为，只有向西方寻求医治中国的方案，才能实现发展民族工业，解救民族危难，缓和社会矛盾的愿望。他们不甘心帝国主义的奴役、掠夺，要求“国家富强”，又担心清政府会被日益扩大的革命风暴淹没，满想通过政治改良的途径，把它挽救出来。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从它最初登上政治舞台起，就是既有“维新自强”、“救亡图存”的一面，又有害怕革命、欺骗群众的一面。

最早比较明显地提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主张的，是广东的容闳（hóng 洪）。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著有《西学东渐记》一书，自称要“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就是说，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面貌，来改造中国。

八十年代前后，比较有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是王

韜(tāo 滔)、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这些人属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他们通过著书、写文章,发表变法言论,逐渐在知识界形成一股改良主义思潮。他们的主要著作有: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薛福成的《筹洋刍(chú 除)议》,马建忠的《适可斋记言记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其中,《盛世危言》最有代表性,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甲午战争前改良主义思潮的全貌和特点,流传和影响也较广。

这些著作的基本内容是:一,揭露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危害,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他们认为,中国要保持国家的独立自主,只有兼采西学,变法自强。然后通过修约谈判等方式,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各种特权。但是,他们以为只要“自强”起来,帝国主义就会停止侵略,放弃特权,从中国撤走。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二,要求振兴民族工商业,以“民间自主公司”兴办企业,采取“富人出其资,穷人出其力”的方式,实行资本主义剥削。建议清政府执行保护关税、废除厘金制度等“保商”政策,通过“商战”,和外国资本主义竞争。他们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但又不敢触动封建统治的基础——地主土地所有制。三,要求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他们认为,君主制君权太重,民主共和制太偏激,只有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民共主(君主立宪政治),才能“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

改良主义者要求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他们不同于顽固守旧的士大夫,和洋务派官僚买办也有区别;但是,他们幻想在维护清朝封建统治的条件下,通过改良主义的政治药方,来挽救民族危机,缓和阶级矛盾,发展民族工商业,并使自己成为当权的统治阶级中的一

员。这就充分反映了改良主义者软弱和妥协的本性。

后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

康有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年)，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从小就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他早年游历香港、上海，接触到一些西方资本主义的事物，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他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古老的封建制度，有一套较进步的治理方法，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看待它们。从此，他更加留心“西学”，急切地想进一步了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把它当作救国的真理。

作为维新运动的主角，康有为早在八十年代末，就已开始了自己的政治活动。

一八八八年，当时一些同中国有密切关系的邻邦，相继被英、法等国侵占。外国侵略者的铁蹄步步进逼，边境狼烟四起，警报频传。人民对清朝统治者的不满情绪也愈来愈高涨，全国各地“骚乱”不停，暴动迭起。康有为这时痛感民族危机的加深，害怕人民革命的迫近，利用在北京应试的机会，第一次写了封五千字的上皇帝书，向清朝统治者大声疾呼：“强邻四逼于外，奸民蓄乱于内，一旦有变，其何以支？”他认为，在这个时候赶紧变法改良，还来得及挽救危局，要是再拖延下去，就会不堪设想。这次上书，是康有为把酝酿已久的变法主张和改良愿望，化为正式建议的开端。但他把人民群众酝酿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诬为“奸民蓄乱”，这说明“资产阶级害怕群众运动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①康有为在提出挽救民族

^① 《两种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三〇页。

危亡、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改良主张的同时，就带有抵制革命的用意。

这封上书，因被顽固守旧的官僚扣压，没有送到光绪帝手里。康有为回到广东，于一八九一年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把它当作培养助手、制造维新理论的场所。梁启超就是在这时拜康有为为师，后来成为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主要助手的。

为了宣传改良主义，康有为在讲学的同时，写了《新学伪经考》（一八九一年）和《孔子改制考》（一八九二年开始写，一八九七年出版）等维新变法的重要理论著作。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要有所变革，就一定要向顽固派“恪守祖训”的旧思想开火。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就是怀着对“祖宗之法，莫敢言变”的强烈不满情绪写成的。顽固势力反对变法的理论根据，是传统的儒家经典。为了破除变法的思想障碍，康有为在书中多方论证，说历代统治者所尊崇的孔丘经典，有许多是假货，是刘歆(xīn 心)为了帮助王莽篡夺汉朝政权而捏造的“伪经”，不是孔丘的“真经”。从这点出发，康有为引导人们去怀疑那些被儒家奉为“神圣”的经书，冲击了“万马齐喑”的沉寂局面。

在《孔子改制考》一书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要求出发，把孔丘装扮成“托古改制”的祖宗，宣称孔丘假托那些“古圣先王”的言论，以推行其“改制”的政治主张。其实，孔丘是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反对任何革新与进步的保守派。康有为虚构一个“改制”的孔丘，是企图给变法维新的主张，挂上“孔圣人”的招牌，让孔丘穿上资产阶级的服装，为变法呐喊，借人们对孔丘思想的迷信，来堵住顽固守旧派的嘴。

康有为的这些议论和主张，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对儒家思想的动摇和改造，在客观上打击了当权的封建统治势力，因此遭到顽固守旧派的迫害。这两部书，先后几次被查禁毁版。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发挥了“托古改制”的思想，奠定了资产阶级改良派进行变法的理论基础，成为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思想武器，为戊戌维新运动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包含浓厚的封建主义内容和极大的妥协性。康有为为什么要搞“托古改制”这一套？他自己供认：“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尚未抓到什么权力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布衣”们，幻想穿戴起改装过的孔丘古衣冠，就可以避开顽固派的压力，实行他们所要求的变法维新。屈膝“改制”，恰恰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娘胎里就带来的软骨病。

康有为还写过一部《大同书》。这是他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出发，向封建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拾取有关思想资料，加上自己的想象，描绘出来的一个空想的“大同世界”图案。《大同书》说，人世间是一个大苦海，贫者贱者有苦，富者贵者有苦，甚至帝王也有苦。他提出，要把这个“极苦之世界”，变为“无私产、无阶级、无家族、无邦国、无帝王，人人相亲，人人平等，无忧无虑”的“极乐之世界”。康有为害怕资产阶级革命有“铁血之苦”，更害怕无产阶级革命有“铁血之苦”。他乞求人们发挥“不忍之心”的“本性”，互相携手、拥抱，消弭（mǐ 米）革命的铁和血，建立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但是，“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

性。”^①康有为从地主资产阶级超阶级的人性论出发，鼓吹“人有不忍之心”，反对革命，幻想取消阶级斗争，调和阶级矛盾，把被压迫阶级“同”到地主资产阶级的旗帜下，走向“无阶级”的“大同”。这只能是自欺欺人罢了。

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②到达大同的路不能是别的，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为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兴起，造了舆论。但是，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活动，却捧着两个最大的封建权威：一个是皇帝的政治权威，一个是孔丘的理论权威。这就深刻地暴露出：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方面，从一开始就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三 “公车上书”

甲午战争的惨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严重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人民。“四万万人齐下泪”，普遍要求抵抗侵略、反对签约。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一八九五年四月，正是各省举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会试的时候，康有为等探知《马关条约》的全部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在举人中发动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绝批准这一卖国条约。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二七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

各省举人闻风而动，纷纷到都察院上书。几天之内，都察院门前人群纷集，议论沸腾，反对签约的巨大声浪，传遍京都。

康有为看到举人们爱国的激动情绪，认为“士气可用”，能为他的变法活动造成声势，决定联合在北京的所有举人，来一次规模更大的上书请愿，便连夜起草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在这份“万言书”里，康有为痛陈割地、赔款的严重后果，特别指出：台湾一割，民心散失，其他帝国主义必将接踵而至，“外患内讧（hòng 哄），祸在旦夕”。他要求皇帝“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并认为这四项中的前三项，是“权宜应敌之谋”，变法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关于变法，康有为主张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实行“议郎制”（即议会制）。这就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实行君主立宪制度的改良主义政治纲领。

康有为写好这份万言书后，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齐集松筠（yún 云）庵开会，他们在万言书上签名，于五月二日递交都察院。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官府的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入京。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这次上书，虽然没有转达到光绪帝手里，但这一政治行动，已冲破了长期来清王朝压制“士人干政”的禁令。变法主张很快在各地广泛流传，康有为也成了全国瞩目的维新变法领袖。“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开始转变为具有实际斗争意义的政治改良运动。

上书后第二天，举人会试发榜了。康有为中了进士，被任为工部主事，这是一名小官。他没有到工部去就职。五月末，

他又写成一封上皇帝书(第三书),内容和“公车上书”大致相同,强调了赶快变法的道理。清政府都察院迫于当时舆论,把它递给了光绪帝。光绪帝读了,觉察到所谈变法要求,正合巩固清朝统治、提高自己权势的需要,很重视和欣赏。

光绪帝的“重视”和“欣赏”,似乎为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运动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帝国主义激烈争夺中国并施展种种政治阴谋的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中,两派政治势力的争斗日益加剧。“后党”以西太后为首,把持朝中和地方实权,力主守旧,反对革新,不断出卖国家主权,以换取帝国主义特别是沙俄的庇护;“帝党”以光绪帝为首,不甘处于无权的傀儡地位,希望借助于另一些帝国主义,与“后党”相抗衡。当时依附帝党的,只有少数没有实权的官僚。因此,帝党重视康有为进行变法的政治活动,想把这一活动当作对后党争权的一着棋子。光绪帝的师傅翁同龢,是户部尚书、一品大员,并任军机大臣,他不惜降低身分,去访问小小的工部主事康有为。在翁、康的接触中,康有为向这个帝党重要官僚,详述了维新变法的道理,翁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还向康有为透露了光绪帝受制于西太后的宫廷内幕,显露出对维新变法前途的忧虑。帝党和改良派的接近,加深了改良派依靠皇帝和王公大臣实现政治改良的幻想。

“公车上书”给维新变法运动创造了气氛。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支持,就有一个宣传维新思想、制造变法舆论的迫切任务。因此,康有为等人,在上书皇帝和联络王公大臣的同时,又积极从事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和开办学堂等工作。

一八九五年八月,康有为自己凑钱,在北京创办两日刊

《万国公报》，十二月改名《中外纪闻》，由他的大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编写文稿，宣传西学，主张变法。开始时，每期印一千份，随当时专载诏书和奏章的《京报》，附送给北京的官员们看，不收报费，后来增印至三千份。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主办的第一个报刊，它在官僚士大夫中引起了注意，使他们“渐知新法之益”。

组织学会，是改良派进行政治改良活动，积蓄力量，宣传鼓动的组织形式。经过康有为奔走联络，八月由帝党官僚文廷式出面，在北京组织“强学会”，会员数十人，改良主义者陈炽为会长，梁启超为书记员。当时，除帝党官僚入会外，连袁世凯也钻进了这个组织。投机的军阀官僚张之洞、刘坤一等，还各捐款五千两银子，给强学会作经费。强学会隔几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演讲，“讲中国自强之学”。康有为写了发起宣言——《强学会序》，痛陈帝国主义侵略下，形势危迫如“海水沸腾，耳中梦中，炮声隆隆”，呼吁封建官僚和士大夫们，起来挽救民族危亡。

强学会的出现，引起了英、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注意，他们想乘此机会，对帝党和维新人士施加影响，使强学会适应他们同沙俄争夺利益的需要。英、美驻中国公使馆，立即表示愿意捐助强学会图书仪器，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美国传教士李佳白等，赶到北京多方活动，打入强学会。李提摩太此时向光绪帝提出了所谓《新政策》的长篇意见书，借口赞助“新政”，公然提出要清政府聘请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深可信任的二西人，合筹良法”。建议成立“新政部”，作为决策和执行“新政”的领导机构，主管人员的一半，要由那些臭名昭著的帝国主义分子如赫德、科士达等人担任。这就充分暴露了“新政策”的殖民主义

本质。如果接受了他的这套办法，整个中国就会落入帝国主义的魔掌。

这些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活动和建议，虽未得逞，但却加深了帝党官僚对英、美帝国主义的依赖，助长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希望同帝国主义合作，共同“推进”维新运动的发展。

同年十一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分会。第二年一月，出版《强学报》。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两地会员共约五十人，主要成员和活动力量，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变法维新的呼声高起来了，以“后党”为核心的顽固势力，感到这是对他们的严重威胁，竭力反对任何改革，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一八九六年一月，顽固派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首先跳出来，上奏章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攻击《中外纪闻》贩卖西学。西太后借此勒令光绪帝查封强学会，禁止《中外纪闻》发行。那些见风转舵的官僚，纷纷宣布退出强学会；表示过“支持”强学会的两江总督张之洞，马上换了副面孔，停止供给经费，并下令立即禁止上海强学会活动，不准《强学报》出版发行。

京、沪两地强学会虽被封闭，但封闭不了它所产生的影响，议论时政的风气已开，维新运动在全国各地继续发展。

强学会被查禁后，改良派又于一八九六年八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旬刊），由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年），广东新会人，出身于小官僚地主家庭，擅长文字宣传，是康有为的主要助手，当时人们以“康、梁”并称。梁启超在《时务报》上，连续发表《变法通议》等一系列论文，宣传西学，鼓吹维新变法，强调“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

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则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启超议论新颖，文笔流畅，大为知识界所欢迎。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加到一万多份，是维新变法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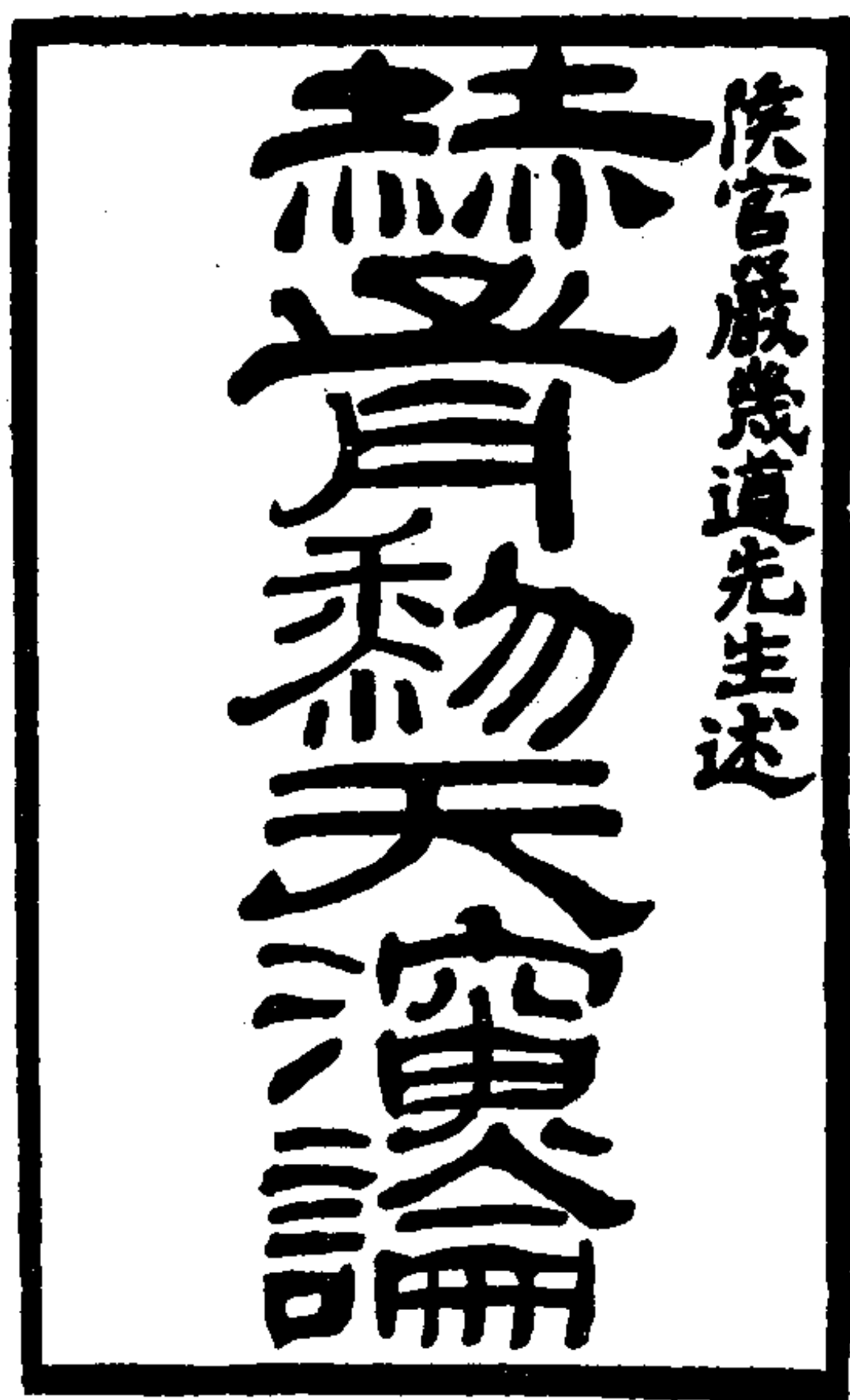
当北京、上海的维新变法活动进入高潮的时候，湖南也迅速行动起来，并成为当时全国最活跃的省区。甲午战争后，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便在浏阳创立学会，宣传变法。谭嗣同（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年），湖南浏阳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他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极为愤慨，说是把全国四万万人的身家性命都断送了。一八九六年，他在南京写成《仁学》一书，大声疾呼要“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触及了封建统治秩序。谭嗣同痛恨封建伦理道德，怒斥三纲五常“箝制天下”，杀人“灵魂”，但不敢正面批判纲常名教的炮制者孔丘。他咒骂两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宣传“民重君轻”，否定“君权神授”，但却为拥护光绪帝变法而卖力。这个事实表明，软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即使是表现得慷慨激昂如谭嗣同这样的人，也逃不出被织成蛛网一样的封建势力的束缚。一八九七年，当时的湖南巡抚陈宝箴（zhēn 贞）、按察使（掌握一省刑法的官）黄遵宪，和学政（掌握一省文教的官）江标及后任徐仁铸，都赞同变法。陈宝箴于同年十月，在湖南长沙设立时务学堂，邀请梁启超担任总教习，唐才常等任分教习，宣传“民权”思想，力倡变法维新。第二年春，谭嗣同等又创立“南学会”，总会设在长沙，各府厅州县设分会。长沙南学会，每七日集会演讲一次，“每会集者千数百人”，“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成为湖南维新活动的最重要部分。同时，长沙又先后创办了《湘学新报》（旬刊，后改名《湘学报》）和《湘报》（日报），刊

载了不少关于维新变法的论文,主张“君民共主”的立宪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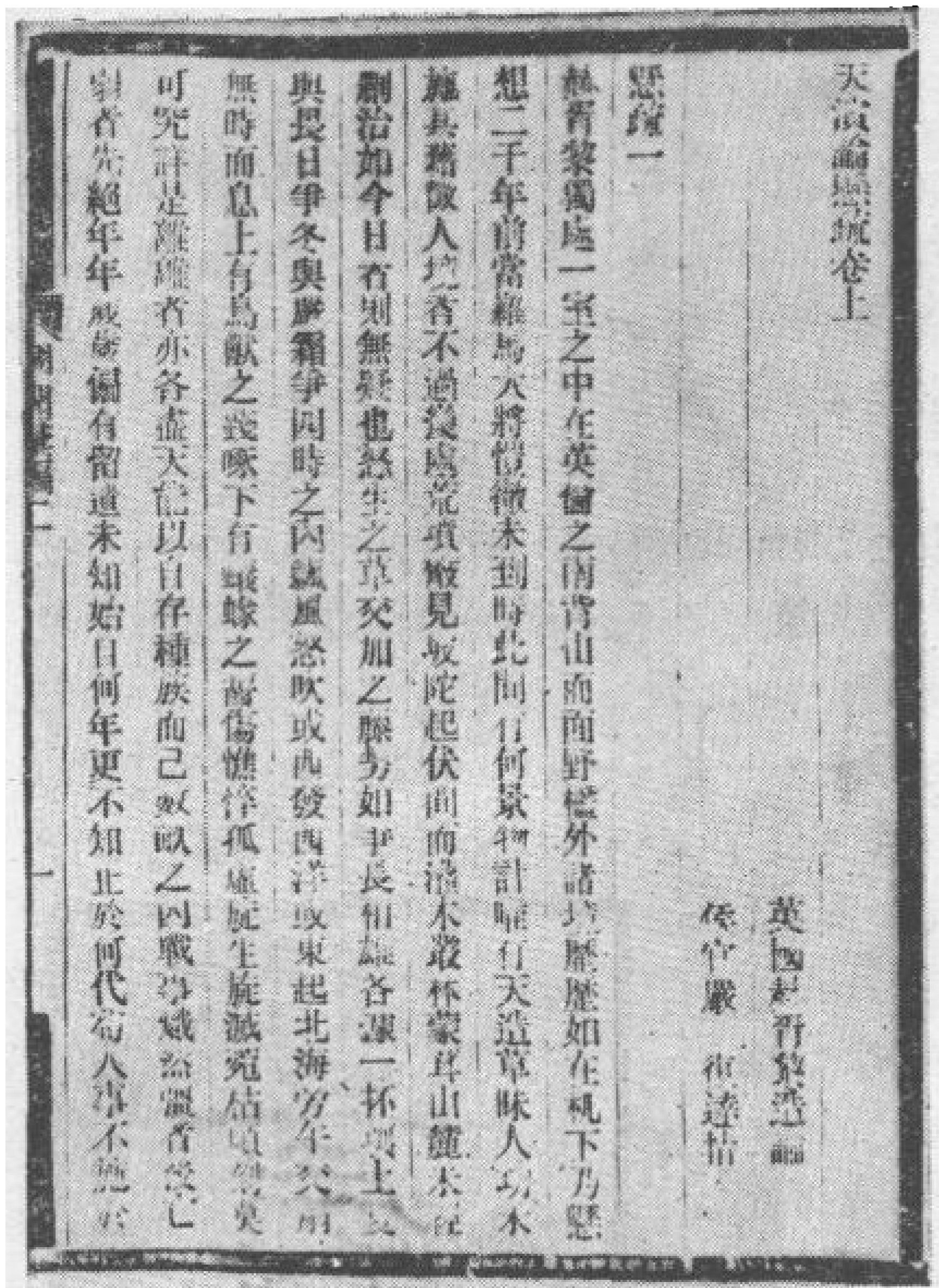
康有为自强学会被封后,回到广东,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一八九七年,又在澳门创刊《知新报》,由他弟弟康广仁主编,成为中国南方宣传维新变法的重要报刊。同年春,康有为又去桂林讲学,组织“圣学会”。康有为总是念念不忘孔丘的“圣教”,到处把它作为大旗挥舞。

在天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等人,一八九七年十月和十二月,先后创办《国闻报》(日报)和《国闻汇编》(旬刊),鼓吹变法维新,介绍《天演论》(即进化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著作。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年),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父亲是个普通医生。严复一八六七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一八七七年留学英国,学习海军驾驶。一八八〇年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前后二十年。严复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比较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开始译述《天演论》,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开始,在《国闻汇编》上发表了一部分,第二年印成专书发行。



《天演论》封面



《天演论》
 (英国赫胥黎著，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前半部是唯物的，讲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后半部是唯心的，讲的是斯宾塞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严复运用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向中国人民敲响了祖国危亡的警钟，大声疾呼，要求改革现状，变法维新，否则，“优胜劣败”、“弱者先绝”，中国将亡国灭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是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用它来激励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因此《天演论》出版后，风行一时，轰动全国。康有为认为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鲁迅先生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作学生时，“一

最早发表在《国闻汇编》的《天演论》部分内容

疾呼，要求改革现状，变法维新，否则，“优胜劣败”、“弱者先绝”，中国将亡国灭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本来是为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但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用它来激励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因此《天演论》出版后，风行一时，轰动全国。康有为认为严复“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鲁迅先生回忆，自己早年在南京水师学堂作学生时，“一

有闲空，就照例地吃倭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可见其社会影响之深。

这段时期，严复还发表了《原强》《辟韩》等重要政治论文，全面发挥维新理论，宣传“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激烈主张。当时，上海《时务报》和天津《国闻报》，分别处于南、北舆论界领导地位。严复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推动维新变法方面，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

紧接“公车上书”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在各地陆续组织学会、开设学堂和创办报刊。这是开展维新运动的重要步骤，起了组织力量和制造舆论的作用。在改良派的积极推动下，一八九五——一八九八年间，全国兴办的学会、学堂和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之多，主要分布在江苏、湖南、直隶和广东等省。维新人士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影响所及，维新变法运动已成为不可阻遏的政治潮流。

四 维新与守旧的斗争

戊戌维新，是近代中国新旧斗争，即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义斗争的一个发展阶段。康、梁、谭、严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代表资产阶级上层，登上政治舞台，企图通过“循序而行”的改良途径，“变”地主阶级之“法”，“维”资产阶级之“新”。但是，顽固的清朝封建统治者，却抱着“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教条，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容不得资产阶级半点改良主张。

顽固派大学士徐桐公开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洋务派大官僚张之洞，这时也脱去支持维新的伪装，跳出来大骂改良派“离经叛道”，攻击维新思想的传播是“邪说暴行，横流

天下”。为了破坏变法维新，消除“中国之祸”，这个家伙还在一八九八年三月，抛出《劝学篇》，叫嚷“务本以正人心”，“务通以开风气”。就是说，以孔孟之道正人心，这是根本，不能变；有关工商业和报馆、学堂等事，可以变通举办。说来说去，还是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老调。西太后对《劝学篇》维护封建统治的主张，大为夸奖。光绪帝对其中尊君权的叫嚷，也很欣赏，立即下令全国刊印，“挟朝廷之力而行之，不脛而遍于海内”。湖南大劣绅王先谦（岳麓书院院长）、叶德辉之流，纠集一群顽固党徒，打着“保卫圣道”的旗号，攻击改良派是“无父无君之乱党”。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与地主阶级的顽固守旧，形成了尖锐的对立。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思想斗争，是围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反帝反封建斗争问题而展开的。戊戌变法前的那几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地主阶级顽固派之间，通过报纸、书刊、奏折和学堂（或书院）讲坛，进行了激烈论战。论战的主要问题有三个：

第一，要不要变法。顽固派坚持“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反对变法，反对改变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叫嚷：“祖宗之法不可变”，封建专制制度是深合孔孟治国之道的，不允许作任何改变，否则便是“祸乱国家”。

改良派用历史进化论的“变”的观点，反对顽固守旧的“不变”论。梁启超强调：“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上下千岁，无时不变，无事不变”。康有为借取古代所谓“据乱”、“升平”、“太平”的三世学说，用来解释从古代到近代的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三个历史阶段，强调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可阻遏，为变法维新制造理

论根据。他向清朝皇帝呼吁：“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还说：“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无情地打击了那些死守“祖宗之法”，却又守不住“祖宗之地”的顽固守旧势力。康有为也批判了洋务派的所谓“新政”，认为如不改变封建专制制度，那么所有的修补，只不过是“饰粪墙，雕朽木”。

严复通过译述《天演论》，阐发了“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不变一言，决非天运”的观点。他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逼得中国非变不可，如果再不变，就要落入任凭宰割的境地。严复宣传“人胜天”的思想，激励人们“与天争胜”，敢于“争天而胜天”，鼓舞人们奋发图强。然而，不管是康有为的“变”，或者严复的“变”，都是庸俗进化论，只承认量变、渐进，不承认质变、飞跃，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不敢触动封建制度的根基。

第二，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封建顽固派、洋务派论战的焦点。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维新变法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参加到政权中去，分享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权力。“兴民权”、“开议院”和“君主立宪”等政治主张，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改良派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猛烈抨(pēng烹)击。谭嗣同把攻击矛头直指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强调“有民而后有君，君末也，民本也”，“臣之与君，名异实同”；君由民举，“使治会事”，事办不好，就该撤换，这才是“天下之通义”。严复在《辟韩》中，批判唐朝韩愈宣扬“君者，出令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即皇帝是天

生的统治者，老百姓天生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的荒谬论点。指出“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根本不是什么“天之意”、“道之原”。严复把封建帝王统治，比之为“大盗窃国”，并从西方资产阶级民权观点出发，宣传国家是“民之公产”，王侯将相是民之“公仆”，“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些，对封建道统和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都是有力的鞭挞。

改良派强调，民权的兴衰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只有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兴民权”，“设议院”，才能挽救民族危亡，导致国家富强。但改良派的“兴民权”，不是为劳动人民争权，而是为资产阶级和正在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士绅争权。“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暴露了资产阶级异常软弱的政治态度。

顽固派和洋务派，都以封建纲常名教维护君主专制制度，反对民权。他们胡说“君臣之义，与天无极”，攻击严复的《辟韩》，是“弃君臣”，“去人伦，无君子”，叫嚣“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简直天都要塌下来，活现了他们对异常微弱的改良主张，也是极端惊恐的。

第三，要不要废八股，提倡西学。科举制的八股取士，是封建的考试制度；学校是当时仿效欧美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学校与科举之争，反映了资本主义新学与封建主义旧学的斗争。顽固派坚持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为了维护孔孟之道，提倡尊经崇古，作为他们奴役人民的精神枷锁。

改良派揭露了八股取士的严重危害，认为它是长期来统治阶级愚民政策的恶劣手段。严复痛斥八股有三大罪状：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指出仅这三害中的任何一害，

都足以亡国。因此,改良派特别重视废除科举制度,把它列为维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

严复当时还认为,“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特别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崇奉宋明理学的危害性,指出“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他极力提倡西学,认为“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改良派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主张设立新式学堂,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希望通过这种办法,造就人才,挽救危亡。

十九世纪末年的这次论战,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维新与守旧的激烈交锋。“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①改良派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搬来了进化论、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古城上,打开一个缺口,宣传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②的道理,使当时的知识分子打开了眼界,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但是,这次论战也暴露了改良派对封建势力的冲击,是异常软弱的。他们痛骂汉、宋以来信奉孔学的儒家,却不敢触动儒家祖师爷孔丘的一根毫毛。不仅如此,康有为等人还千方百计地神化孔丘,把他装扮成“托古改制”的“万世教主”。他们从改良主义需要出发,只求逐渐进化,不敢触动封建制度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五七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九页。

的基础，对当时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发展，患了恐惧症。他们把“兴民权”放在“兴绅权”之中，把“开官智”放在“开民智”之前，处处表现了改良派在政治上不愿和封建主义决裂，在文化思想上更跳不出封建主义的“网罗”。列宁指出：“一般说来，改良主义就在于，人们只限于提倡一种不必消除旧有统治阶级的主要基础的变更，即是同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①从这里，也就预示着改良主义政治运动的必然破产。

五 走不通的道路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各国侵略势力接踵而至，这是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重要信号。面对这一情况，沿海各地人民，首先奋起反侵略反压迫，维新变法的浪潮日趋高涨。

康有为闻讯后，从广州赶到北京，于这年十二月又写了一封上皇帝书（第五书）。他沉痛地指出，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险，“譬犹地雷四伏”，一触即发；国内人民到处都存在对清政府的不满，“乱民蠢动”，“奸宄生心”。他认为，清政府的统治，已到了内外交困、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还不动手变法，加以挽救，到那时想求半壁河山的偏安局面，皇帝想当老百姓，也不可能了。讲这种话，在当时是冒很大风险的，然而，康有为正想用这种不怕杀头的话，来激动光绪帝，以表示他的耿耿忠心。他还提出了改变这种危险局面的上、中、下三策。上策

^① 《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七九页。

说：要以沙俄彼得大帝、日本明治天皇为榜样，亲定国家大政方针，宣布变法。日本和中国在地理上很接近，两国的政俗也大同小异，如果效法日本，不但易于着手，也易于取得成效。这封上书，因顽固派多方阻挠，直到一八九八年初，光绪帝才看到。他颇为赞同，下令要康有为提供具体建议。

一八九八年一月，康有为奉令写了一篇《应诏统筹全局折》(第六书)，提出仿效明治维新实行变法的三条纲领：一，“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就是要光绪帝正式宣布变法这一大政方针，想依靠皇帝权力，来推行新政。二，设“上书所”以广言路，允许各级官吏和士民自由上书，官员不论大小，凡上书建议，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有合要求的，就破格任用。三，在宫中设制度局以定新制，选拔“通才”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决策后颁布施行。制度局是策划和实施新政的领导机关，下面设十二个局(法律、度支——即财政、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分别推行各项新政。

这个“统筹全局”的奏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革新政治的全部要求，也是戊戌变法的施政纲领。改良派眼睛里，只看到一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他们以为通过皇帝下诏书，走自上而下进行变法的改良主义道路，就能建立一个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国家，达到改良派参政和“救国”这两个目的。

一八九八年四月，康有为等除抓紧向皇帝上书外，还发动建立保国会。他们以救亡图强相号召，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讲求变法，讲求内政外交，讲求经济实效，以协助政府进行治理。《保国会章程》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

县均设分会；还规定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会员权利，等等。可以看出，从强学会发展而来的保国会，已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初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的组织。它的活动，只是想在清朝封建统治者的许可之下，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保国会在北京开过三次大会，第一次到会两三百人，后两次也在百人以上，目的是在封建士大夫和官僚中造声势，组织一定的力量，推动变法。但顽固派对于改良派这种乞讨性的革新活动，也异常仇视，纷纷跳出来攻击。他们指使御史文悌上奏，诋毁保国会是“名为保国，势必乱国”，“保中国不保大清”，准备以这个奏章为依据，进行查究。光绪帝是知道康有为对他、对清王朝的忠心的；认为文悌的奏折是有意攻击，革了他御史的职。顽固派大臣荣禄，竟公开进行威胁，要保国会员小心自己的脑袋。在顽固派的恫吓下，很多保国会的投机官僚和知识分子，纷纷声明退会，保国会的活动无形停止。

保国会虽因顽固派的破坏而夭折，但帝党与后党的争权斗争，日趋激烈。一八九八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接受改良派的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即确定国家方针的诏书，宣布变法。他企图通过维新变法，来摆脱西太后的控制，巩固自己的地位，使自己成为掌握实权的皇帝。新政从这一天开始，到九月二十一日西太后发动政变，共一百零三天，历史上称作“百日维新”。

变法诏书颁布后第四天，顽固派头子西太后，强迫光绪帝下令：一，将帝党首领军机大臣翁同龢革职赶回老家；二，二品以上文武大臣授新职，要到西太后前谢恩，借以笼络大员；三，派西太后头号亲信大学士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北洋

军队，控制北京。这说明，顽固派抓住军、政实权，加紧部署力量，准备政变。

光绪帝也采取行动。六月十六日，第一次召见康有为，详细谈论变法步骤和措施。改良派开始参与政权。但帝党少数官僚，加上有限的改良派维新人物，力量极为微弱。康有为在召见时，探问光绪帝：“皇上既然知道非变法不可，为什么长久没有举动，看着国家危亡？”光绪帝注视了一下帘外（防人偷听），然后叹口气说：“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康有为领会了他的意思，建议变法新政“不必尽撤旧衙门，只须增设新衙门，不必尽撤旧大臣的职，只要擢用有才干的官员，多多接见维新志士，给以官职，准许专折奏事（直接向皇帝上条陈，不须代递），将新政诸事交给他们办理。对旧大臣保持他们的高官厚禄，……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光绪帝表示同意。

这番君臣对话，活画出一个是怯懦的皇帝，一个是回避斗争的改良派君子。召见后，因为顽固势力的反对，康有为只获得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这个较低的位置。七月，梁启超被赐六品衔，办理大学堂和译书局事务。九月五日，光绪帝特别给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加紧推行变法。这样，康有为等改良派，在戊戌变法中，只抓住了一个光绪帝，和仅仅是起草与发布诏书的一点权力。

一百零三天中，共发布新政诏书、谕令一百十多起，主要内容有：一，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二，设立学堂，学习西学。三，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四，奖励新著作、新发明。五，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六，保护和奖励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制订有关制造的奖赏

章程等。七，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铁路、矿产总局。八，办理邮政，裁撤驿站。九，改订规章条例，精简机构，裁减不必要的官员。十，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十一，精练海、陆军，改用新法操练。十二，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原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这些新政，看来范围很广，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各方面的内容，有的是除旧，更多的是布新，但只是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连梁启超自己也承认，是“温和之已甚”。在实行新政期间，光绪帝对于改良派多次上书“立行宪法，大开国会”的君主立宪要求，都没有理睬，也没有颁发有关这类改革的新政诏书。这说明光绪帝对于新政建议，是以有利于他的皇权统治作为决策标准的。就是这些枝枝节节的改革，诏书下去，各省总督、巡抚，除了一个湖南巡抚陈宝箴还能执行外，其他不是敷衍推托，就是置之不理。由于顽固派和洋务派的阻挠破坏，皇皇诏书，大都成了一纸空文。

资产阶级改良派要实现变法“救国”的愿望，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瓜分威胁中解救出来，就不能不解决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的问题。然而，他们是怎样认识和对待帝国主义的呢？他们看得出这一些帝国主义的张牙舞爪，却识不破另一些帝国主义的口蜜腹剑；他们要学习西方、学习日本，却又把学习当作依靠，幻想在实行变法时，能得到某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康有为认为，英国是“救人之国”，相信英、美传教士是真心帮助中国变法，因此，推荐李提摩太担任光绪帝的顾问大臣。一八九八年二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神尾光臣等三人到武汉活动，想通过张之洞劝告清政府，联络日本和英国，以对抗沙俄。康有为知道了，却以为英、日可

用,特地去找翁同龢,要翁接受日本人的劝告。他不仅替人写了两道请联英、日的奏折,还自己写文章提倡中国和英、日结成同盟,对抗其他国家的侵略。英、日帝国主义分子趁机伪装同情,宣传沙俄对中国的威胁严重,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变法,使中国成为富强国家。改良派竟天真地把变法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英、日的支持上,以为这样外可以抵制沙俄,内可以打击沙俄支持的后党势力。显然,这只能是引狼入室。

九月初,光绪帝和西太后争夺权力的斗争,已经达到非常激烈的程度。光绪帝很想打破顽固派对新政的对抗。九月四日,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个大官,全部罢职;七日,又将阻挠新政的李鸿章等,从总理衙门撵走。顽固派认为反击的时机到了,纷纷出动。西太后不断派亲信去天津与荣禄密谋,京、津一带盛传,十月份西太后和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荣禄将举行兵变,废掉光绪帝。这时,荣禄突然调动北洋军队,移驻天津、长辛店,政变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光绪帝觉察到这种严重形势,于九月十四日传给康有为等人密诏,说自己皇位也要保不住了,叫康有为等赶快“设法相救”。改良派远离人民群众,在这关键时刻,毫无实力可恃,只有把他们“皇上”的命运、他们自己和新政的命运,全部寄托给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馆,和拥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康有为等乞求英、日帝国主义出面支持,没有结果。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年),河南项城人,生于官僚地主家庭,早年投靠淮军将领吴长庆。一八九五年,几经钻营,以道员衔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建陆军,逐渐拥有一支七千人的新式武装,为反动派所注目。同年,曾伪装倾向维新运动,做过强学会会员,因此维新派为他所迷惑。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深夜,谭嗣

同密访袁世凯，想借袁世凯兵力，杀掉荣禄，包围西太后当时住的颐和园，以救“皇上”。他对袁说：“如果你不同意，向西太后告密，杀了我的头，可以得大官。”狡猾的袁世凯，假装忠于皇帝，激昂地表示：“杀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但在二十日赶回天津时，马上把谭嗣同的策划，向荣禄告密。荣禄立即挂专车去北京，密报西太后。

九月二十一日凌晨，西太后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发动政变，把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yíng 迎)台。接着，用皇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西太后又一次“临朝听政”，并下令大捕改良派人士。康有为已事先出京，在英国人掩护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人掩护下，逃往日本。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和康广仁等六人，被捕后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大批参预新政和倾向变法的官员，被革职或放逐。顽固派发动的流血政变，结束了资产阶级改良派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新政措施，除京师大学堂保留外，全部都被取消。“百日维新”在顽固派一击之下，烟消云散。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一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斗争，其中包括戊戌维新，“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① 面对十九世纪末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改革现状，发动了一场要求学习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的维新政治运动，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派提倡资产阶级的新学，冲击封建主义的旧学，尽管在新旧斗争中表现得很软弱，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产生了积极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八页。

的影响。表现为戊戌变法后,人们的民主要求增长了,怀疑旧学、欢迎新学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以西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势力取消了新政,却取消不了由新、旧斗争产生的思想影响。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这就是戊戌维新留给中国人民的宝贵的历史教训。

这次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后的第一次表演。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他们的政治实践中,害怕群众运动甚于害怕顽固派反动势力。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一再以金田起义作为教训,以“民变”纷起当作警钟,把革命流血斗争描写得阴森可怕,要用变法改良的手段,来抵制革命的发生。这就使他们远远地离开人民群众,找不到能够真正打破一切旧势力的同盟军,只能借皇权的威力,和依靠少数士大夫的力量,去推行新政。资产阶级改良派之所以不堪一击,原因就在于他们醉心政治改良,害怕和抵制革命,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命运。谭嗣同就义前,感慨自己“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其实,人民自有回天之力,问题是改良派看不见,或者怕看见。于是,所谓“维新变法”,也就只能是君子们的幻想。

资产阶级改良派幻想在帝国主义帮助下,依靠一个“英明”的皇帝,来实现变法维新的大业。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把外国的东西移植过来,革新内政,自强起来,就可以避免帝国主义的侵略,阻止瓜分危机。他们把帝国主义当成先生,不知道正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正如毛主席深刻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

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① 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依靠这几个帝国主义，来抵制那几个帝国主义，根本不懂得东山老虎吃人，西山老虎也吃人的道理。中国不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就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改革。他们看不透帝国主义对中国分裂剥削和阴谋利用的两面手法，错误地把英、日、美三个帝国主义，看作是可以帮助中国革新的“友邦”。这种与“救国”愿望相反的认识和实践，决不可能使中国走出半殖民地的死胡同。

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阻止瓜分狂潮的历史使命，不是由改良派的君子们，而是由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运动承担起来了。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一页。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

一 反帝风暴席卷全国

戊戌维新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路线不可能挽救民族危亡。面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风恶浪，人民群众挺身而出，掀起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风暴，抗击八个国家的侵略联军，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次革命高潮。

义和团以“灭洋”为号召，深刻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正是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反洋教斗争的一个总汇合。

“义和团，起山东，不到三月遍地红。”反帝风暴首先兴起于山东，绝不是偶然的。甲午战争期间，山东人民备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战后，在帝国主义阴谋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又首当其冲。一八九七年底，德帝国主义在沙俄支持下，出兵强占山东重要港口胶州湾；第二年，把山东划为它的势力范围。一八九八年，英国强租威海卫，圈占文登、荣城两县地方，强迫界内农民纳税，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这时的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更无孔不入地深入山东各地。据统计，山东境内当时已有教堂一千多处，传教士和教徒约八万人。“入教便如

虎”，一批被收买的流氓、坏蛋充当教徒，在帝国主义传教士的指使下，干盗窃情报、霸占田产、包揽词讼、行凶杀人等罪恶勾当。清政府的大小官吏却认贼作父，站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一边，“护教抑民”。

面对中外反动势力有增无已的侵略和压迫，人民群众只有拿起武器，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八九九年，朱红灯率领义和拳在山东西部和西北部的茌平、高唐、平原等地进行反洋教斗争，附近各县以及南部沂（yí 仪）州等地也纷起响应。义和团的反帝烈火，就在这种斗争形势下，越烧越旺。

义和团组织，不是由某一个秘密结社单独发展起来的，而是分布在山东各地的义和拳和大刀会等，在群众性反洋教斗争中，逐渐汇成的统一名称。早在十九世纪初，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民间组织，就以“反清复明”为口号，在山东、河南、直隶一带进行反封建斗争。十九世纪末年，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它们以练习拳棒组织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犹如虎狼恶”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成为团结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组织形式。

义和团没有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和统一的领导机构，基层组织一般是“坛”、“厂”，参加者以青少年为多。青年妇女参加“红灯照”，着红衣，提红灯，投入战斗。义和团虽然缺乏统一的号令，但不论首领还是普通拳民，都要遵守纪律，紧密团结，因此“传单一出，千人立聚”，有很强的战斗力。

义和团的基本群众首先是贫苦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水陆运输工人和小商贩等。在尖锐的民族矛盾面前，为了吸收更广泛的群众参加反帝“灭洋”战斗，义和团曾经打出过“扶清灭洋”的旗号。但他们在把主要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的同时，从来没有停止过反对清朝反动统治的斗争。

朱红灯、本明和尚(原名杨照顾)率领的义和团队伍，是山东省规模最大的义和团组织。一八九九年十月，平原县知县蒋楷带领清军一百多人，前来捕拿朱红灯。义和团“列队千人，开放大炮”，用“轮伏轮起，轮退轮进”的战术，把清军打得七零八落。义和团声势益壮，山东巡抚毓(yù)贤，又派大股清军前来镇压。朱红灯率领一千余名战士，在平原县森罗殿设下伏兵，清军一到，义和团战士大刀长矛并举，土枪抬炮齐发，杀得清军狼狈而逃。清军屡战屡败，封建统治者惊呼：义和团“拥众千百，枪械林立，动言焚杀，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同年十二月，朱红灯等领导人虽不幸被捕牺牲，但义和团运动仍以燎原之势猛烈发展。

山东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对帝国主义势力的直接打击。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不断催促清政府镇压义和团。美国公使更认为走狗不得力，要清政府撤换毓贤，把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陆军的袁世凯，调往山东。清政府立即遵命，升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一八九九年十二月，袁世凯带领他的“新建陆军”七千人来到济南。上任第二天，就凶相毕露地抛出一个《禁止义和团告示》，对人民进行恐吓，并按照洋主子的旨意，疯狂屠杀义和团。

袁世凯的高压手段，并没有吓倒山东人民。就在袁世凯率军屠杀的日子里，济南人民包围了洪家楼教堂，拆毁了象征侵略势力的十字架；肥城人民杀死了作恶多端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给侵略者以应有的惩处；王玉振、王文义、孙洛泉等人带领的义和团，在山东西北部、北部和东北部奋勇战斗。义和团的反抗怒潮，使袁世凯的“新建陆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

袁世凯乘机召募新军马、步、炮队二十营，把兵力扩充到两万余人，并勾结在青岛的德国军队和各地教堂武装，对义和团大举进攻。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山东义和团势力受到很大摧残。但是，“反动派杀人越多，革命的力量就越大，反动派就越接近于灭亡。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法则”。^① 山东人民对袁世凯恨之入骨，民间流传“杀了袁鼂(yuán 元)蛋，我们好吃饭”的民谣。袁世凯胆战心惊，“防范甚严”，特地在卧室周围“密护铁网”，害怕人民来惩罚他。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除一部分仍在山东继续战斗外，主力进入直隶境内，与当地义和团汇合，直捣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老巢，将京、津地区的反帝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在山东义和团斗争蓬勃开展时，直隶南部各州县的义和团运动日趋高涨。故城、景州、东光、阜城一带人民，纷纷设立“拳厂”、“拳场”，练拳习武，和穷凶极恶的外国教会侵略势力展开斗争。山东义和团队伍浩浩荡荡进入直隶后，沿途遍贴告示，号召“保护中原，驱逐洋寇”，群众纷纷响应。直隶南部，广大贫苦农民、运河两岸失业的运输工人以及城市劳动群众，都踊跃加入义和团。义和团队伍迅速扩大，形成一股强大的革命力量。在直隶中部景州整顿队伍之后，分东西两路向京、津进军。到四月间，直隶北部也出现了“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的大好局面。

义和团在清朝统治心脏地区直隶的发展，使中外反动势

^① 《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六页。

力惊慌失措。帝国主义一再警告清政府，要它赶快将直隶境内义和团扑灭，否则各国就要自行调兵镇压。一九〇〇年五月，直隶总督裕禄，派副将杨福同带领军队前往涞(lái 来)水一带，疯狂屠杀义和团和当地人民。二十二日，预先埋伏在涞水石亭地方的义和团二、三千人，层层包围杨福同的马队，杀得清军人仰马翻，歼敌七十余人。杨福同突围未成，被砍死在马下。二十七日，义和团主力万余人攻占涿(zhuō 桌)州县城，声威大震。为了阻止清朝统治者调兵，义和团破坏芦保线涿州地段的铁路；焚毁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袭击京、津铁路的丰台车站，连西太后的“龙车”也被一把火烧毁。在义和团的分头反击下，清政府派出镇压义和团的聂士成部队，被迫溜回天津。

一九〇〇年六月，义和团打破清军的围剿计划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京、津前进。

这年春天，义和团已陆续进入北京。城内交通要道和教堂周围，贴满“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的反帝揭帖。义和团还把预先埋在温泉山煤洞中的石碑挖出来，碑文上说：“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



义和团在前往天津途中

下效，民冤不伸。”揭露清政府卖国求降、欺压人民的滔天罪行，推动群众团结起来，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六月上旬开始，北京附近各县的义和团，头裹红巾，手持大刀长矛，结队进入北京城。北京城内设“坛”八百多所，满街都是反帝的揭帖、“灭洋”的旗帜，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不下十万人。景山后面的宫墙下，每天都有青少年在一起操练拳棒。前门外打磨厂等处，日夜炉火熊熊，赶制杀敌的刀枪。整个北京城都处在义和团的控制之下，皇宫、衙门和王公贵族的住宅，有义和团监视；路口、城门有义和团日夜盘查可疑的行人。义和团还经常带领群众武装游行，高呼“杀洋鬼子”等战斗口号。侵略者成了众矢之的，他们都龟缩到东交民巷外国公使馆和西什库教堂，修筑工事，准备顽抗。

在天津，义和团于一九〇〇年三月间，就将反帝揭帖遍贴大街小巷。“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萧然。”义和团把矛头直指帝国主义，无所畏惧地对抗瓜分狂潮。四月，天津城内已有张德成、曹福田等领导的几支有战斗力、有号召力的义和团队伍在活动。天津人民踊跃参加义和团，附近各县大批义和团，也前来协同作战。义和团的英勇气概，不仅使外国侵略者心惊肉跳，也使清政府各级官吏威风扫地。六月初，建立在天津郊外独流镇的“天下第一团”，狠狠打击了来犯的沙俄哥萨克侵略军，迫使他们逃回天津。义和团如在街上遇见坐轿骑马的清政府官僚，就喝令他们下轿下马，脱帽旁立，这些封建官僚也只得乖乖照办。一天，镇压过义和团的清军头目聂士成，骑马过市，正好迎面有义和团百余人列队走来。义和团一见聂士成，怒从心头起，立刻举刀上前。聂士成

大惊失色，慌忙跳下马来，绕路逃走。

义和团威镇京、津，两地斗争互相呼应，短短几个月内，造成震撼中外的巨大声势，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帝怒潮的迅速高涨。

在东北，一九〇〇年二月，营口附近就有群众公开练拳，准备“杀逐洋人”。六月，盛京（今沈阳）城内贴满义和团揭帖，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号召中国人民行动起来，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从六月下旬起，义和团对侵略者发动大规模斗争，几乎全部烧毁了当地帝国主义的教堂。沙俄在辽宁境内的五百里铁路、桥梁、车站，除鞍山站外，都被愤怒的义和团群众拆毁。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传教士，有的遭到义和团制裁，有的逃到大连、哈尔滨等地躲避。

山西也是义和团活动的重要地区。五月间，省城太原已经是“揭帖遍张”。六月下旬，不仅太原的大街小巷都设有“拳坛”，“红灯照”到处活跃，而且全省四十多个县，都发生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惩办了罪大恶极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爪牙一百五十余名，捣毁教堂七十余处。

在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也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六月，西部地区已出现了义和团揭帖；七月间，整个草原燃起了反帝斗争的烈火。作恶多端的帝国主义分子、“西南蒙古教区”主教韩默理，被义和团带到托克托进行公审，背上插一面“老洋魔”小旗，游街示众，人民群众莫不拍手称快。

河南义和团也迅速行动起来，会同当地大刀会、江湖会等秘密结社，开展反帝斗争。这一年內，河南“全境教堂毁四分之三”，给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严厉打击。

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虽然由于帝国主义和买办官僚相

互勾结，破坏了义和团运动的向南发展。但在这些地区，仍然普遍展开焚毁教堂、驱逐教士的斗争，仅江西一省，就毁坏教堂三十九处；湖南、浙江、四川和陕西，也都发生群众性的反帝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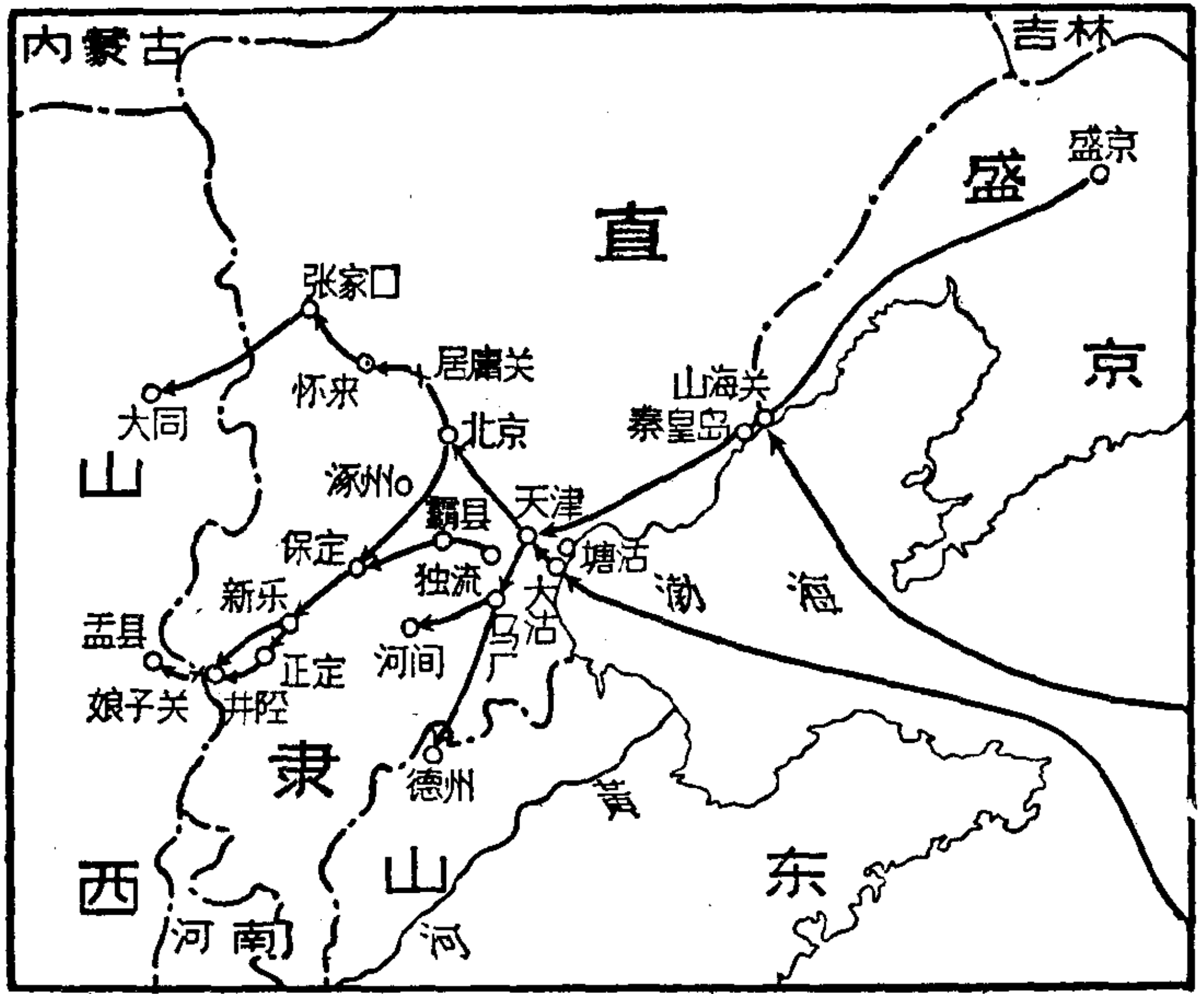
气壮山河的义和团运动，兴起于山东，借揭帖的传布和成员的奔走串联，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几个月便威镇京、津，波及全国。亿万农民郁积在心头的义愤怒火，爆发为强大的、前所未有的反帝风暴。

二 八国联军的进攻

义和团的反帝烈火，烧遍北方。帝国主义惊呼：“从黄河到长城内外的广大地区，将成为一片暴乱的火海”；“北京、天津每天都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侵略者直接感到反帝斗争的锐利锋芒，认为它们的走狗清政府，已不能将这一运动镇压下去。它们担心义和团运动继续发展，不仅将打破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还将激起世界各地殖民地革命运动的连锁反应。帝国主义急于乘机发动新的侵华战争，一举瓜分中国，它们疯狂地叫嚷：“上帝不允许我们放过这一个好机会。”

为了统一步调，帝国主义各国就镇压义和团一事，进行频繁的接触。一九〇〇年四月，美、英、德、法四国公使发出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将义和团“剿除净尽”，否则就要直接出兵“代为剿平”。然而，义和团并没有被清政府“剿除净尽”，反而以侵略者预料不到的速度，大大发展了。

眼看清政府已无法控制局势，帝国主义各国驻华公使，于



八国联军进犯路线图

五月二十日纷纷请求本国政府，直接出兵镇压。从五月三十一日到六月二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余人，以“保护使馆”为名，先后自天津开抵北京。六月五日，另一支侵略军六百人，由塘沽登陆开进天津租界。他们杀气腾腾地宣称：为了取得“广泛的商业和传教利益”，“武装干涉必须在更大规模上举行”。沙俄公使密电其政府说：“情况千钧一发，只有列强有力、坚决的合作，才能制止运动。”六月十日 and 十一日，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凑成一支二千余人的侵略联军，以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为头子，在大沽口登陆后，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

为了夺取大沽炮台，作为进攻的滩头阵地，侵略军六月十

六日晚八时，向炮台守将发出最后通牒，蛮横地限令第二天凌晨二时交出炮台。大沽守将罗荣光和全体官兵，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联军见威胁无效，在沙俄海军将领海尔德布朗指挥下，于当夜十一时发动突然袭击。炮台守军奋勇迎战，义和团群众百余名也参加战斗。直到十七日清晨，击沉击伤敌舰六艘，毙伤侵略军两百多名。终因“势孤力竭”，炮台失陷。八国联军占领大沽炮台后，大举窜犯天津、北京，对中国人民进行空前规模的屠杀和蹂躏。

八国联军的疯狂进攻，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

以义和团为代表的中国人民是铮铮铁汉，他们的回答是：英勇反抗，宁死不屈！

西太后把持的清政府，虽然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但它与帝国主义之间还存在一些又痒又痛的矛盾争斗，于是在八国联军面前，这个反动统治营垒，出现了某些暂时的破裂。

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害怕帝国主义用兵含有扶助光绪帝的意图。帝党、后党各有靠山，它们之间的争斗由来已久。戊戌政变后，掌握中央政府实权的西太前一伙，曾经玩弄手法，扬言“皇帝病危”，想把光绪帝置于死地。不料英、法等国驻京公使，竟向总理衙门提出警告，此计未成。一九〇〇年一月，西太后立端王载漪(yī 医)的儿子为大阿哥(皇太子)，准备废掉光绪帝，但各国公使又表示拒绝承认。西太后的废立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在由谁当头号走狗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是有摩擦的。

西太后集团中，以首席军机大臣荣禄等人为代表，和洋务派沆瀣(hàngxiè 巷谢)一气，秉承帝国主义主子的意旨，坚持“剿灭”义和团。载漪以及刚毅等人，既想玩弄“宣抚”手段，以制止革命形势的发展，又因和帝国主义主子有矛盾，企图利用义和团力量，对付帝国主义的军事压力。载漪等人在对外投降的基本立场上，与荣禄并没有两样。据记载，他们只要造成“使馆朝移，皇位夕易”的事实，虽投降“割地以赎前愆(qiān 干)，亦所不恤”。作为统治集团决策人的西太后，狡猾地耍弄两面手法，一面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义和团实行新的“剿灭”；一面又派出大臣到京郊义和团中心保定地区，施展“宣抚”手段，窥测义和团的实力，以便决定对策。

清政府虽然三令五申，严禁北京地区义和团活动，但毕竟无法阻挡群众性反帝怒潮的高涨。这时，帝国主义公使馆和外国教堂，已成为侵略者的军事据点。全副武装的各国海军陆战队，耀武扬威，四出挑衅。到六月十五日为止的几天之内，仅美国公使就供认：“使馆卫兵杀戮拳众近百人之多。”十七日，德国公使又带领随员，凶杀义和团成员七人。北京人民怒火燃烧，向侵略军的巢穴外国教堂和使馆猛烈进攻。西太后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急调李鸿章、袁世凯带兵进京，命令荣禄以“实力保护”使馆；同时又调集军队开赴天津附近铁路沿线，还在“御前会议”上，讨论阻止帝国主义增兵北京问题。这些命令表明，当时清政府的方针，是企图集中兵力，把义和团镇压下去，以讨好帝国主义。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但在另一方面，也想阻止帝国主义军队入京，以免危及西太后集团的统治权力。

就在六月十七日帝国主义攻陷大沽炮台那一天，局势发

生急变。荣禄将江苏粮道罗嘉杰送来的密报，向西太后告急。密报中有一条说：外国人要“勒令皇太后归政”于光绪帝。一直惧怕被帝国主义抛弃的西太后，恼火异常，不再查问虚实，决心孤注一掷。她在几天内接连召开“御前会议”，声称：“彼族焉敢干预予之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主张“开战”。载漪等乘机煽动“非战不可”。以袁昶(chāng 厂)、许景澄等人为代表的洋务官僚，惧怕和洋主子决裂，声言“衅不可开”。这时，西太后为了保持顽固派集团的统治权力，避开人民革命的锋芒，决定向帝国主义主子“宣战”。

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向各国公使馆递交“宣战书”，表面上慷慨激昂，要与各国“一决雌雄”，实际上是虚张声势。因为，西太后对义和团“剿抚两难”，“剿之则即刻祸起肘腋”，而“洋人欺负得太狠了(指勒令归政)，不免有些动气”。她在这种情况下，被迫向帝国主义主子“宣战”，因此，不可能采取实际的作战部署。“宣战”后四天，西太后就下令停止围攻使馆。八天后，向各帝国主义乞求“深谅”，说“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持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供出了清政府投降帝国主义、敌视义和团的真意。

当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宣战”的时候，中国南方的地方实力派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等，却拒绝执行清政府的宣战令，并表示凡六月二十日后的“上谕”概不奉行，事实上等于对清政府宣告独立。

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何况要在整个南方广阔省份，进行这样的分裂活动？原来，当一九〇〇年六月中旬，八国联军向北京进犯时，英国为了保持它在长江流域的优势地位，阴险地采取

分裂中国的手法。它勾引长江流域的军阀、官僚，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并防止其他帝国主义借口北方战乱，乘机打入英国这一地盘。但是，美、法、俄、德、日等帝国主义十分眼红，它们都插手争利，反对由英国单独干。最后，英国被迫让步，由各帝国主义共同参预策划所谓“东南互保”。

“东南互保”从六月中旬开始酝酿，由督办芦汉铁路大臣、大买办盛宣怀，奔走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在英、美帝国主义领事和刘坤一、张之洞之间，穿针引线，进行具体策划。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的“宣战上谕”发出后，谈判活动加速进行。二十六日，刘、张授权盛宣怀和上海道台余联沅，同各国驻沪领事正式会商，先后炮制了《东南保护约款》九条，及《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十条。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还明白地写着，要保护“洋人、教堂、教民”，“禁止谣言，严拿匪徒”。所谓“东南互保”，保的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及其走狗，反的是义和团革命运动。它是帝国主义分裂中国、巩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严重步骤。对此，大卖国贼李鸿章和袁世凯等，当然完全赞同。这样，“东南互保”的范围，就由两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湖广（湖北、湖南），扩大到广东、广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四川、河南、陕西、福建，实际上也附从了这一卖国的“互保”。

“东南互保”条款，后来虽未正式签字，但它已破坏了义和团运动向南方的发展，并使帝国主义能集中兵力镇压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尽快地恢复被义和团打乱了的反动统治秩序。这些，正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买办阶级，当时所迫切要求的。

在义和团运动的强大压力和八国联军的炮火威逼下，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的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代表地主、买办阶级的东南地方督抚，为了博得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阻挡义和团向南方发展，直截了当地托庇于帝国主义“保护”之下，与侵略者维持“友好”关系。形式上两者不一，实际上殊途同归，目的都是为了对内镇压义和团革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

资产阶级各派系，不论是改良派或者革命派，当时对义和团运动，也都采取反对态度。

改良派首领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甘当光绪帝的奴才。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康有为等认为，推倒西太后、拥戴光绪帝的机会，已经到来。因此，在破口大骂义和团为“团匪”、“拳贼”的同时，于一九〇〇年七月十六日写信给各地保皇会，要他们“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指光绪帝）”，依靠英国的帮助，在南方组织政府。另一改良派首领唐才常，在康有为指使下，创设自立会，组织自立军，准备八月九日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等省，举兵起事，“讨贼勤王”，“复起光绪帝”。唐才常等敌视义和团，想依靠帝国主义，结果却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张之洞、刘坤一等人，投于血泊之中。

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一面污蔑义和团是“酿祸奸民”，一面又想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达到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目的。十月八日，他们在广东惠州发动会党起义，后来因得不到来自日本的军火接济，被迫自行解散。

前有八国联军的疯狂进攻，后有清政府的镇压、破坏，资产阶级各派又横施诬蔑，义和团在腹背受敌的复杂情况下，巍然屹立，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英勇

悲壮的抵抗。

三 奋勇抗击侵略者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①面对用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帝国主义八国联军，义和团英雄们奋勇抗击，以赴汤蹈火的大无畏精神，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一、大败西摩尔(六月十日——二十六日)

六月十日，由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率领的一支一千八百人的侵略联军，由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京津铁路沿线义和团，立即出动，拆毁沿途几段路轨，阻止侵略军前进。西摩尔到达落堡(fá 伐)车站时，“铁路已断，随进随修，万分狼狈”。十一日下午，大批头扎红布的义和团，手持大刀、长矛，从铁路北侧，向正在修路的一支侵略军发起冲锋，经过激烈的肉搏战，侵略军伤亡累累，只是由于美国侵略军的炮队赶来掩护，才免于覆灭。十三日，大股侵略军窜至廊坊车站。十四日清晨，三百多名义和团战士，在侵略军第一列火车开出廊坊车站时，突然进攻留在车站加水的第二列火车，五个侵略者当场毙命。同一天下午，另一部分义和团战士，又包围了据守落堡的侵略军。西摩尔急派侵略军带上大炮回救，才解了围。

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的力量。侵略军从天津出发时，气焰十分嚣张，满以为用不了几小时，就可以走完这段路程，顺利地开进北京城，因此只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八六页。

带了三天口粮。但在各地义和团的英勇阻击下，侵略军的火车，第一天走了四十六公里，第二天十六公里，第三天只走了五公里，第四天爬到廊坊就前进无路，寸步难移了。侵略者企图派兵返回天津，搬运给养，也因路轨被义和团拆毁，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十八日，在部分清军士兵的配合下，义和团向困守廊坊车站的侵略军，发起猛攻。在枪林弹雨中，义和团战士猛冲猛杀，浴血战斗两小时，歼敌五十多名。

西摩尔的北犯计划，由于义和团的沉重打击而破产。但在被迫放弃廊坊、败退杨村车站后，还想改乘船只，沿运河北犯。十八日晚间，侵略者惊魂未定，义和团又一次发动猛烈袭击，打死打伤侵略者近四十名。这时，侵略军粮尽援绝，无力继续进犯，西摩尔只得下令“退兵”。二十日清晨，由水路回逃天津。当时，北运河沿岸的八十五个村庄中，七十五个有义和团组织。据侵略者记载，他们每过一个村庄，都要遭到义和团的截击，“一连几天，都是一面跑着撤退，一面战斗中度过的”。最后，这支焦头烂额的侵略军，白天不敢走动，深夜偷偷逃命，直到六月二十六日，才败回天津“租界”。用大炮、机关枪等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侵略军，却被只有大刀、长矛等旧式武器的义和团，打得溃不成军。义和团半个月来的奋战，使侵略者伤亡三百余名。西摩尔心有余悸地承认：“义和团所用西式大炮，则所率联军必全体覆没。”

二、天津保卫战(七月十四日以前)

六月十七日，帝国主义攻占大沽炮台后，大举进犯天津。天津人民在义和团带领下，展开激烈的保卫战。部分清军，也在义和团影响和推动下，参加了攻打紫竹林租界的战斗。

六月十七日晚间，从大沽方向开来满载沙俄侵略军两千

余人的列车，企图控制天津老龙头车站，并解救车站对面被包围的紫竹林租界。义和团早已在车站附近作好部署，沙俄侵略军一进车站，大队义和团立即持刀冲向敌人，展开激战。这时，义和团主要首领之一曹福田，也从城内率义和团赶来参战。沙俄侵略军企图以炮火进行封锁，阻止曹福田队伍前进。但是，钢枪、火炮吓不住义和团战士，他们冒死冲入敌阵，挥刀猛砍，直杀得沙俄侵略军死伤五百余人，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附近群众高兴地送来“得胜饼”、绿豆汤，祝贺义和团大捷。

义和团为了阻止帝国主义继续增兵天津，把从塘沽通往天津铁路线上的军粮城一段路轨拆毁；同时要直隶总督裕禄报告清政府，增派清军协同作战。在清政府拒发援军，侵略军却源源开进的严重局面下，各地义和团为了打击侵略者，纷纷涌向天津。仅从天津附近青县、静海、沧州、盐山、南皮、文安、霸州等地来的义和团，就有两万余人。六月二十七日，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向侵略者下战书。同天，义和团另一首领张德成率领战士五千人，分乘七十二只大船，从独流镇浩浩荡荡地开到天津城，马上投入攻打紫竹林的战斗。

在反帝爱国的战斗中，义和团不仅英勇顽强，而且机动灵活，发挥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侵略军在紫竹林一带，埋下许多地雷，妄图阻止义和团进攻。七月一日，张德成指挥战斗，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牵来了几十头牛，赶入布雷区，破坏了敌人的全部地雷。接着，大队义和团立即冲上前去，占领浮桥，直攻海关大道，焚毁了帝国主义在天津的三井洋行、萨宝实洋行和许多洋房。二、三日，曹福田率领的义和团，联合部分清军，猛攻火车站和法租界，持续两昼夜，毙伤侵略军百

余人。

当天津保卫战激烈进行的时候，清朝统治者进一步露出它的卖国嘴脸。七月上旬，清政府急调李鸿章回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准备公开投降帝国主义；同时，又调宋庆为帮办北洋军务大臣，把炮口指向义和团。宋庆公然下令屠杀义和团，严重破坏了保卫天津的战斗。帝国主义趁机向租界大举增兵，十三日派侵略军五千人进攻天津城。义和团和守军奋勇抵抗，击毙美军上校团长等军官及士兵百余名，打死打伤日、英、法侵略军七百余人，战果辉煌，这是开战以来歼敌最多的一天。但由于宋庆残酷屠杀义和团，造成城内空虚，奸细引侵略军乘虚而入。十四日晨，天津陷落。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后，沙俄宣布俄占区为沙俄财产，并强行成立俄租界，还伙同英、日等国侵略者，设置“都统衙门”，对天津人民进行了两年多的殖民统治。

天津是北京的门戶。义和团为保卫天津，和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激战一个月，歼灭侵略者一千余名，给予他们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北京义和团的斗争。

三、在北京的战斗(八月十四日以前)

当天津方面展开反侵略激战时，北京的义和团也发动对东交民巷和西什库教堂的总攻击。

东交民巷，是当时帝国主义公使馆集中的地区，也是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总指挥部。如前所述，自六月初以来，盘踞各国使馆的侵略军，以及武装起来的使馆人员，多次四出挑衅，杀害了不少义和团战士。六月二十日，凶横的德国公使克林德，又在东单牌楼向中国人民挑衅，当场被群众打死。怒火满腔的义和团，出动五六千人包围使馆，采用火攻战术，抛掷

火球和火药包,使比、奥、荷、意等四国使馆,首先陷入一片火海之中。接着,义和团又在长竹竿顶端缠棉絮、浸煤油,点燃为火炬,伸向使馆屋顶,使其延烧,以掩护大队进攻。同时,采用挖地道、轰地雷战术,使侵略者遭受很大损失。一个法帝国主义分子怀着恐惧的心情,描写说:“一天中午,在两声怕人的爆响中,法国使馆从地上飞起来了。”七月十三日,义和团战士和少数清军士兵,一度攻入法国使馆和德国使馆,经过一场白刃战后才撤退。义和团尽管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但始终斗志昂扬,前仆后继,以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坚决打击侵略者。到七月二十日止,使馆里的侵略军,五十名法军中死伤四十二人,五十四名德军中死伤三十人,六十名日军中死伤四十五人,俄、美、英、意、奥等国侵略军,也都有不少伤亡。在义和团的沉重打击下,幸存的侵略军,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听到义和团进攻的笳号声,就惊恐异常,说这种声音“可以使人的血凝而不流”,发出了“前途如何无法预料”的哀叹。

西什库教堂(即北堂),是法国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长时期来,它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宗教侵略的重要据点。六月十五日下午,一万多名义和团包围这座教堂。十七日起,一些清军也参加进攻。大炮向教堂轰击,教堂钟楼楼顶被掀起,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也被打落在地。义和团担任主要的进攻任务,他们发挥群众智慧,制造了一种火箭,射入教堂,能“力大穿屋”,而且尾部带有火种,可以引起燃烧;还不断挖地道、埋地雷,炸得教堂墙倒屋塌。

正当义和团战士们跟侵略者浴血奋战的时候,清政府却背后一刀,大干破坏义和团运动的罪恶勾当。清政府发布“宣战上谕”后四天,西太后就下令停攻使馆,命令荣禄派人到各

公使馆商议“和局”，还在英国使馆附近御河桥，竖起“钦奉懿（yì）旨，力护使馆”的木牌。七月十四日，天津失陷后，西太后更为恐慌。十七日即正式向法、德、美致“国书”，奴颜婢膝地乞求帝国主义主子息怒。二十日、二十六日，还连续派人将西瓜、冰块、蔬菜、酱菜、大米，以及一千磅面粉等，送给侵略者，表示讨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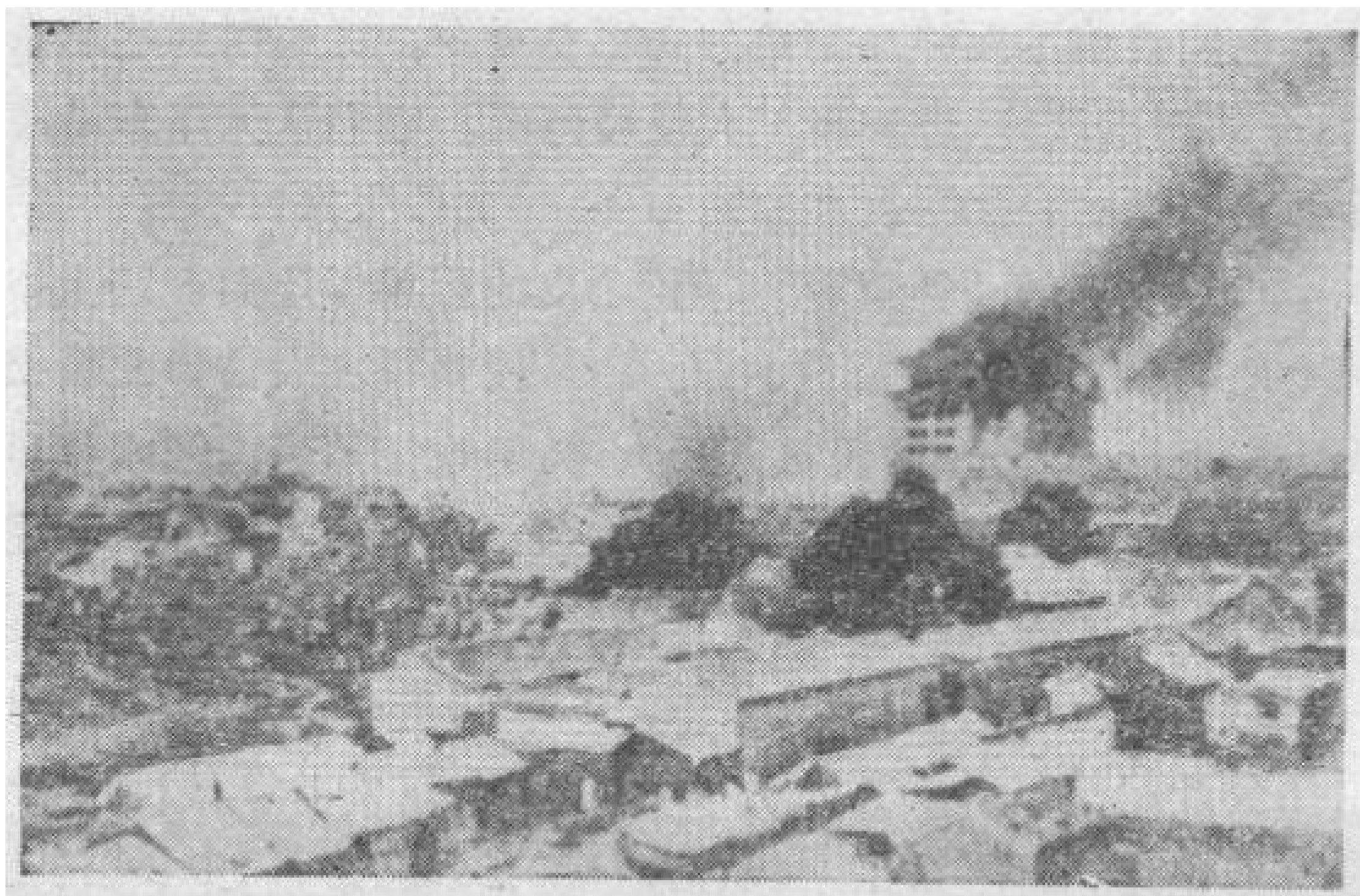
西太后对帝国主义是假宣战、真投降；对义和团则是表面合作、伺机消灭，手段极其毒辣。“宣战”后的第三天，清政府就命令大官僚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并制定所谓“团规”，要义和团战士遵守。凡违背“团规”的，就是“假团”，照“匪徒”办理，“格杀勿论”。对义和团中所谓“不受抚者”，就派到各处去“攻打前敌”，“少有退缩”，即“迎以大炮”。京、津一带的一些将领和官僚，执行清政府这一恶毒的屠杀政策，严重摧残了民族抵抗的有生力量。

由于清政府的破坏，义和团围攻使馆五十六天，围攻西什库教堂六十三天，都没有攻下。当时被围攻的侵略者承认，这是由于清朝统治者的“某种保护”，否则他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西太后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我是“处处都留着余地，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的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短短几句话，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卖国嘴脸。

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决不因清政府的屈膝求和而稍有收敛。八月四日，八国联军近两万名，其中俄军四千八百人，从天津出发。它们以日、英、美三国侵略军为左路，俄、法、德、奥、意五国侵略军为右路，沿运河两岸向北京窜犯。沿途不断遭到义和团的英勇抗击。当天在北仓，清军与来犯侵略军接仗

时，义和团大队数千人，从附近各处赶到，“血战良久”，杀伤侵略军一千余人。接着，八国联军又在杨村、河西务等地，遭到义和团坚决抵抗。而清军将领宋庆、马玉崑、李秉衡等，却受西太后制约，节节退让，即使偶有抵御，也是一战即溃。十三日，通州失陷。八国联军闯到北京城郊，日军和俄军窜到朝阳门、东直门一带，准备爬城。义和团毫不犹豫地同侵略军展开决死战斗，没有武器就用石块打；城里清军“神机营”、“虎神营”，听到侵略军来到，拔腿就跑。八月十四日，北京失陷。西太后挟光绪帝和亲信臣仆，换便服仓皇逃离北京。义和团和部分爱国官兵，与窜进城内的侵略者持续巷战三天，打死打伤侵略军四百余人，为保卫北京城，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表现了中国人民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各国仍不断增兵京、津，到九月中旬，已达十万人左右。为了协调侵略步骤，经过一番勾心斗



在焚烧中的前门



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义和团群众

角，各国推德军元帅瓦德西为联军总司令。瓦德西到达北京后，分兵四出攻掠，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它们从天津东沿津榆铁路，攻占山海关；自北京南窜保定，北侵张家口等地。

八国联军是一群蒙着“文明”之皮的野兽。他们一踏上中国土地，就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沙俄侵略军在大沽口北塘镇大肆烧杀，一万多户居民被杀死大半，鲜血把镇旁的河水都染红了。天津失陷时，日军架起大炮轰击市区匆忙撤退的稠密人群，制造了“死人满地”的大惨案。在北京，凡是义和团设过“拳坛”的地方，统统被放火焚毁。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退之日，抢劫从来没有停止过。日军自供，仅从清政府的国库(户部)中，就抢走二百六十三万两银子。一个侵略者描写攻陷天津后的抢掠情

况说：“城门刚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日军抢光天津盐道衙门库存的几百万两白银后，美军接踵而至，强迫被俘的四十名中国人，挖掘埋在地下的财物，挖了四天，又抢走了几百万两银锭。据侵略者自供，仅一个早上掠去的银锭，就可堆成一座“三十英尺长，三十英尺宽，四英尺高”的“银山”。那些外国传教士，也乘机大发横财。北堂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一次就从大官僚立山家，抢走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宝。北京城内的皇宫和西郊颐和园内，珍贵文物和财宝都被洗劫一空。仅颐和园的东西，侵略者就“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运了几个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被英法联军抢剩的八百多册《永乐大典》（明朝永乐年间辑成的一部极珍贵的大丛书），这次又被抢去三百零七册。

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连侵略军头子瓦德西也无法掩饰。他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故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还说：“从大沽到天津之间，以及天津重要部分，已成一种不可描写之荒芜破碎，……所有沿途村舍，皆成颓垣废圯。”

所有这些暴行，就是自称具有“西方文明”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干出来的。可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为掩饰他们的暴行，竟至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恶毒攻击义和团是“恣意焚杀”、“残忍已极”的“匪徒”，诽谤义和团运动是什么“极野蛮”的“残暴的仇外暴动”，声嘶力竭，无所不用其极！

伟大领袖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

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①铁的事实证明，真正杀人放火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口喊“文明”，跑到中国来侵略、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侵略者。

四 反对沙俄强占东北

义和团运动期间，沙俄除大量派兵参加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在京、津一带疯狂烧杀抢掠外，还一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出兵强占东北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占领。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在六月底叫嚷：“必须利用这个机会（指义和团运动），夺取整个满洲。”他还直言不讳地对德国外交官员宣布：满洲将立即被并吞，俄国“在那方面要求完全行动自由”。

一九〇〇年六月底，沙俄远东边境部队，已有七万人集结黑龙江地区，作好了一切入侵准备。在出兵强占东北之先，沙俄制造了两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瑗珲（今爱辉）县对岸，沙俄侵占后改名布拉戈维申斯克。七月十六日，全副武装的沙俄侵略军，把海兰泡中国居民和商人三四千人，强行押向黑龙江边，声称要遣送回国。从十七日至二十一日，沙俄侵略军刀砍斧劈、鞭抽枪击，将中国居民赶进江里，以致“伤重者毙岸，伤轻

^① 引自一九六七年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者死江，未受伤者投水溺之”，造成“骸骨漂溢，蔽满江津”的大惨案。最后游水逃向南岸被救起的，只有八十余人。

紧接海兰泡大屠杀，沙俄又制造了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东岸精奇里江（即结雅河）以南。这块土地聚居着中国汉、满、达斡尔等族人民，共两千多户、一万余人，历来归瑗琿副都统管辖。即便是在一八五八年订立的不平等的《瑗琿条约》中也规定，中国人在这里“永远居住”，仍由中国的“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不得侵犯”。可是沙俄久已垂涎这片肥沃土地，不断向这里强行移民，多次发生越界抓人、杀人等挑衅事件。七月十七日，沙俄侵略军冲进江东六十四屯，挥舞马刀，见人就砍，还“驱各屯居民聚于一大屋中，焚毙无算”。不少中国人被驱入黑龙江中淹死，只有一部分居民被瑗琿水师船只渡江救走。在这场大暴行中，江东六十四屯共有七千余人惨遭杀害，损失财产三百余万元。八月十二日，沙俄阿穆尔地区军事长官格里布斯基，悍然宣布：这块土地“已归俄国当局管辖，凡离开我方河岸的中国居民，不准重返外结雅地方，他们的土地将交给俄国殖民者供其专用”。中国劳动人民祖祖辈辈在江东六十四屯辛勤开垦出来的肥沃土地，又被沙俄殖民者强行霸占了。

就在七月间，野蛮的沙皇政府以保护它在东北强筑的铁路为名，出动俄军十七万人，趁各帝国主义联合武装进攻京、津之机，分六路入侵东北：一路由外贝加尔，经呼伦贝尔，越西兴安岭南下；二路由海兰泡渡黑龙江攻瑗琿，经墨尔根，直趋齐齐哈尔；三路由伯力附近溯松花江，经三姓（今依兰），直趋哈尔滨；四路由尼古拉斯克，攻绥芬河，抵哈尔滨；五路由海参崴附近攻瑛春、宁古塔，直趋吉林；六路由旅顺攻营口，经过

阳直趋沈阳。沙皇政府的野心，是想一举吞并中国的东北地区。

沙俄侵略军虽然来势汹汹，但是，富有反侵略传统的东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当侵略军向瑗珲进攻时，义和团高举着“大拳民”的旗帜，手持刀矛，冒着敌人的炮火，同侵略者展开血战，不少爱国的清军，也投入战斗。鄂伦春族五百健儿组成马队，同沙俄哥萨克骑兵进行激战。整个七月，奉天境内“北起开原，南至海城，计五百里”，除鞍山站外，所有沙俄铁路、桥梁和车站，全被义和团拆毁。八月上旬，侵略军进攻盖平、海城，遭到义和团和清军士兵的有力还击，在海城郊外多次被打败。在三姓的一次战斗中，东北人民击毙沙俄侵略军团长文尼阔夫。在宁古塔，由于民团武装——镇东军的奋起抵抗，沙俄侵略军的进犯，久久不能得手。

但是，清政府派驻东北的大官员盛京将军增祺、吉林将军



东北义和团与清军共御沙俄侵略者

长顺，不但不抵抗沙俄侵略军的进攻，反而对英勇抗战的义和团，加以控制和屠杀，这就给沙俄帮了大忙。增祺向沙俄侵略军要求停止进攻，沙皇尼古拉二世却悍然下令：“我们不能半途而废。我国的军队应在满洲由北向南通过”，“解除满洲军队及要塞的武装”，气焰嚣张到了极点。沙俄侵略军自七月强渡黑龙江进犯瑗珲开始，先后侵占了盖平、营口、牛庄、琿春、三姓、宁古塔、海城、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地，到十月一日占领沈阳为止，强占了中国东北全境。尼古拉二世得意忘形地欢呼：现在，“满洲之南南北北都有了我们的军队”，并开始拟定所谓“黄色俄罗斯”计划，妄图永远霸占中国东北。

沙俄侵略军到处烧杀抢劫，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瑗珲古城，被烧成一堆瓦砾。“盖平、海城沿铁路居民，烧杀无遗类。”据不完全统计，沙俄侵略军在瑗珲、琿春、三姓、海拉尔、漠河等地，屠杀的中国居民有数万人。在哈尔滨，残暴的沙俄侵略军竟将几十名中国人的手脚捆起来，丢进火里活活烧死。伟大的列宁，当时就以极大的愤慨谴责沙俄侵略者的暴行，指出：“沙皇政府在中国的政策是一种犯罪的政策”。^①“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②

为了使军事占领“合法化”，沙俄侵略者又强迫盛京将军增祺的代表，于一九〇〇年十一月八日签订所谓《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主要内容是：沙俄侵略军驻盛京及其他各地，中国军队一律撤散，收缴军械，拆毁炮台、营垒及火药库；沙俄在盛

① 《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一七页。

② 同上书，第二一五页。

京设“总管”，有权预闻盛京将军所办重要事件；中国设马、步巡捕，数额由双方商定等。按照这个规定，中国的主权全部丧失，盛京将军只不过是沙俄“总管”操纵下的一个傀儡。

《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传出后，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清政府也被迫不予承认，给增祺以革职处分，委派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代表，与沙皇政府交涉，要求废除“暂且章程”，归还东北三省。沙皇政府表面上同意废除“暂且章程”，实际上却丝毫没有改变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一九〇一年二月，沙皇政府提出所谓交收东三省条件十二款，这个约稿比《奉天交地暂且章程》还要狠毒，不仅囊括了东北的主权，还要夺取蒙古、新疆的路矿权利，并要由东北修筑一条穿过长城直达北京的铁路。沙俄企图乘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时机，强迫清政府承认它对东北的独占。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深恐沙俄得逞，危及它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纷纷出面阻挠。日、英、美、德等国，接连向清政府提出警告，反对在共同议订的条约之外，有同其他国家缔结的任何有关“领土性及财政性”的局部协议；并且以各国将纷起仿效、各自霸占中国的领土相威胁。沙俄看到这种形势对己不利，更担心日本和英国联合起来对付自己，因此以重金贿赂李鸿章。在三月中旬又提出最后约稿，压迫杨儒，限期半个月在条约上签字，不准更改一字，想尽快结束谈判，把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权益固定下来。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签约。上海、杭州等地举行了反对沙俄侵占东北、逼签条约的抗议集会，痛斥沙俄“外假仁义，阴怀讎(jué决)诈，以亡波兰之狡计，施于我中国”。东北各族人民，更以实际的战斗，来回击沙俄的侵略阴谋。一九〇〇年十一

月，呼兰人民组成抗俄武装，坚决打击侵略者。同月，宁远州的义和团，包围一支沙俄侵略军，歼灭六十余人。一九〇一年初，东北各地抗俄起义军，已发展到十几万人。二月，联合发布讨俄檄文，愤怒声讨沙俄侵略者强占东北的滔天罪行，表示决心“与俄贼决一死战，复我国土，拯我人民”。在各地抗俄起义军中，刘永和率领的忠义军最著名。他们响亮地提出了“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跟沙俄侵略军进行英勇搏斗，奋战在哈尔滨到牡丹江的铁路线及其南部广大地区，曾多次打败沙俄侵略军的“围剿”。忠义军的抗俄斗争，是义和团运动在东北的继续。它一直坚持到一九〇三年，力量最盛时达到二十万人。沙俄陆军大臣哀叹，他们的军队经常“被围在敌视我们（沙俄）的中国群众之中”。财政大臣维特也招供：“由于不可避免和持续的骚乱（指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我们不能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固有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人民对沙俄侵略者的激烈反抗，加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重重，因此，驻俄公使杨儒不顾沙俄的咆哮，始终拒绝在交收东三省的条约上签字。沙皇政府的阴谋虽然未能得逞，但却制造种种借口，拒不交还东北。直到一九〇二年四月，由于中国人民正在酝酿更大的拒俄斗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又有新的发展——英、日结成同盟，进行抵制，沙俄才不得不同清政府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约定分三期撤退沙俄军队。侵略成性的沙俄侵略者，对此当然是很不甘心的。到一九〇三年四月，即第二期撤兵前两个月，沙俄又施诡计，要把它的侵略军在吉林省北部和黑龙江省北部，“无定期地驻留”下来。清政府拒绝这一无理要求，愤怒的中国人民，更为此掀起空前规模的拒俄运动。

五 屈辱的《辛丑条约》

义和团坚决抵抗八国联军的进攻，清政府却在帝国主义大炮面前屈膝求降。

西太后逃出北京后，毫不掩饰清政府对帝国主义假宣战、真投降，对义和团假合作、真屠杀的反动面目。一九〇〇年九月七日，她在山西崞(guō 郭)县发布“上谕”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在调清军镇压义和团，请八国联军“助剿”的同时，西太后催令李鸿章迅速北上，授以卖国全权，并加派庆亲王奕劻(kuāng 匡)，会同商办“议和”事项。清政府对八国联军无耻献媚，甚至在城镇入口处，悬挂义和团领袖之头，“以示欢迎联军”；瓦德西则以“攻打拳党之中国官军统帅”自居，得意洋洋。这样，清政府就完全跪倒在帝国主义脚下，中外反革命势力共同把枪口对准义和团。

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帝国主义吓倒。一九〇〇年八月后，撤退在京、津郊区和广大直隶农村的义和团战士，坚持反帝斗争，不断袭击侵略者。十一月间，从保定向山西井陘(xíng 形)等地进攻的一支侵略军，因受到当地义和团力量的前堵后击，被迫从山西逃回。自北京出发进犯张家口的一支侵略军，在怀来县遭到义和团的狙击，侵略军头子约克也被击毙。从九月以来，集结在京、津地区的十万名侵略军，四出攻掠，到处都遭到义和团的抗击。它们的铁蹄始终未能越出直隶，即使在直隶，也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及城市要塞。中国人民的英勇抵抗，打破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痴心妄想。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对于如何从中国攫取最大的侵略利益，是各怀鬼胎、矛盾重重的。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狗咬狗的互相牵制和激烈的利害冲突。沙俄要挟清政府，承认其独占东北的条约，并贿赂李鸿章单独订约，以此作为继续支持西太后当政的交换条件，所以，它唱的是立即撤出在京各国军队、开始议和的高调。英、日反对沙俄独占东北，尤其担心清政府单独订约，所以不承认李鸿章的议和代表资格，不主张立即开始议和。美国既想夺取“租借地”如秦皇岛、舟山、三沙湾等地，又热衷于继续玩弄“门户开放”的鬼把戏。早在一九〇〇年七月三日，当帝国主义侵略军窜犯京、津，阴谋瓜分中国的时候，美帝国主义就第二次发出所谓“门户开放”照会，虚伪地宣称，要“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美国反对瓜分，实际上是企图使中国最后完整地由它摆布；所谓“保持”“行政完整”，就是支持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作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

一九〇〇年十月十六日，英国为了反对沙俄，与德国达成一项暂时妥协，宣布“不利用目前纠纷，为本国在中国境内谋取领土利益”，主张帝国主义各国，“保持在中国之权益及现在条约上的权利”。其内容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一致，是要把全中国向一切帝国主义侵略者开放，任凭宰割。英、德协定的这一原则，得到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同意，除沙俄外，都被迫暂时放弃瓜分中国领土的妄想。在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面前，帝国主义不得不协调它们的侵华政策，采取了所谓“保全”中国，即继续扶植清政府作为它们共同走狗的政策。

这时，逃亡到西安的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朝统治者，抱着只

要帝国主义愿意维持清朝统治，任何苛刻条件都可以接受的卖国方针。因此，它一再电令奕劻、李鸿章，要不惜一切代价求和，不能拖延时间，以免危及清王朝的统治。十二月底，帝国主义方面经过一番争吵之后，抛出所谓“议和大纲”十二条，基本上确定了后来正式条约的主要内容，强迫清政府“无可更改”地接受。西太后见帝国主义主子仍愿保持她的地位，感激涕零地下令：“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这样，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没有经过任何争议，便确定了这一卖国条约的内容。“议和大纲”出笼后，帝国主义各国在勒索赔款、分赃等问题上，激烈争夺达九个月之久，直到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这一年是辛丑年），奕劻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的代表，签订空前屈辱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除正约十二款外，还有十九个附件。主要包括：

一、勒索巨额赔款。这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重要目的之一。赔款按当时中国的人口计算，每人被勒索一两，共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加上三十九年分年摊赔的利息，本息共计高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还有各省的地方赔款，至少在两千万两以上。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空前规模的勒索。这项勒索由于是针对旧历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历史上也叫“庚子赔款”。沙俄帝国主义独得赔款一亿三千余万两，在各国中占第一位。沙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曾洋洋得意地招供，这次侵略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充分说明了帝国主义的掠夺本性。条约规定，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即海关税和盐税收入，在分摊外债后的剩余部分）和常关税（清政府在水、陆交通要道或商品集散地设立的内地关税

收入)抵押给外国侵略者,作为赔款的来源。从此,清政府的财政收入,除田赋以外,其余各种重要税收,大多被帝国主义控制;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也完全成为代帝国主义收款的机构。

二、外国侵略军控制京、津地区,拆除京、津御敌工事。条约规定,帝国主义有权在北京,以及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派驻外国军队;大沽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设防的炮台,则“一律削平”。这样,从渤海湾到北京城的通道,就完全处于外国军队的控制之下。侵略者不仅随时可以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将清政府捏在自己手中;而且可以直接调动军队登陆,帮助反动统治者镇压中国人民。

三、建立帝国主义联合侵华的“使馆区”。条约规定,帝国主义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设立特殊的“使馆区”,不准中国人民在这个区域内居住,帝国主义在“使馆区”内,可以自行驻军。实际上,“使馆区”成了在北京的“国中之国”,帝国主义凭借治外法权,在这里策划种种政治阴谋,干涉中国内政,镇压人民革命。

四、加紧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条约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者参加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一律杀头。对赞助过义和团的官吏,也予以惩罚。凡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文、武科举考试五年。同时还规定,以后如果发生人民群众的反帝斗争,发生触犯外国侵略者利益的事情,清政府各级官员必须“立即弹压惩办”,否则就要革职、“永不叙用”。帝国主义企图以惩办官员、停止科举考试、禁止民间组织反帝社团等恶毒手段,达到消灭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巩固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罪恶目的。这当然是徒劳

的。

五、改设外务部。条约规定，清政府根据帝国主义意旨，把原有的对外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中央政府原有“六部”之前，还指定要由皇族亲贵担任外务部大臣。帝国主义强使清政府提高外务部的地位，确立“以邦交为重”即对外投降的卖国方针，目的就是要使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更加驯顺的走狗。

通过《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将清政府完全置于它们的控制之下。而腐朽的清政府，甘愿接受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充当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在“议和大纲”十二条签订后不久，西太后就厚颜无耻地扬言：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说，要把中国所有的财富都搜括拢来，以博取帝国主义主子的欢心。从此，在卖身投靠帝国主义的清朝统治集团面前，已经没有丝毫民族界限，他们构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汉奸、卖国贼营垒。

六 义和团的历史功勋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共同绞杀下失败了，但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列宁教导我们：必须“把民族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①震撼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就是被压迫的中华民族，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进步的、革命的民族

^① 《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二一卷，第三八八页。

战争。

义和团运动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威雄惊万里，风雨喷长空”。坚贞不屈的义和团，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用土枪土炮、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与武装到牙齿的侵略者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① 它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成为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中国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义和团反帝风暴兴起之前，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吹嘘，只要一万名现代化装备的侵略军，就能够横行全中国。但事实却表明，在义和团的英勇抗击下，入侵的十万名八国联军，一直被牵制在直隶的京、津地区；十七万沙俄侵略军闯入东北后，四处受敌，被中国人民打得焦头烂额。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凶焰，受到沉重打击。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被迫承认：“无论欧、美、日本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法国一议员公开承认：“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瓜分之说，不啻(chì 赤)梦呓。”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的“铁拳”面前，不得不暂时放弃瓜分的妄想。

义和团运动也有力地打击并削弱了封建统治势力，彻底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真面目，推动了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义和团运动是在不断打破清政府的反革命围剿中发展起来的，多次的较量，打得清军损兵折将，威风扫地。义和团反帝斗争全面展开后，清政府又不断地软硬兼施，剿抚并用，最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九五页。

后不惜出卖民族利益，公开勾结帝国主义，共同镇压义和团。这样，清政府就在广大群众面前，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卖国嘴脸。这对于提高中国人民用武力推翻清王朝的觉悟，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义和团运动在祖国大地雷轰电驰时，资产阶级各派一致反对，要求加以剿灭。义和团运动给予帝国主义沉重打击之后，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改变看法，对农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表示崇敬。如一九〇一年《开智录》上有一篇文章说：“义和团此举，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今虽败师逐北，溅血横尸，然其‘勇’之一字，未尝不轰全球人之耳，电全球人之目也。外人于此，则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议，……亦未敢如前之猖獗耳。”农民群众的英勇行动使人们看到：只要敢于起来斗争，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是可以斩断的。就这样，义和团运动不仅抵制了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本质，而且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

这一切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一条真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①

一九〇〇年的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当时无产阶级尚未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这一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不可避免地受到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因而不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义和团对帝国主义这一主要敌人的斗争是异常勇猛，没有丝毫的怯懦；但他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于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他们的斗争，也就不能不表现为“笼统的排外主义的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三二页。

斗争”。^①义和团对清政权的反动阶级本质，也认识不清，在极其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不可能科学地分析各阶级对革命的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提出正确的战斗纲领。甚至不适当地把“扶清”和“灭洋”这两个口号联在一起，混淆了保卫祖国和“扶清”的关系，以致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阴谋破坏，缺乏应有的警惕。在组织上，也反映出小生产者分散性的弱点，坛、厂林立，组织松懈，始终没有形成统一集中的领导，影响了战斗力的充分发挥。

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农民是近代反帝反封建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②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六六页。

②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八页。

第九章 辛亥革命

一 孙中山与兴中会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①



孙 中 山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出现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从十九世纪末年开始，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出现左右两翼，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则更加明显。右翼是从官僚、大地主、大商人通过投资新式工业转化来的。它们的政治代表，是十九世纪末搞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左翼的基本成员，是中小工商业者，以及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七页。

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它们的政治代表是孙中山。孙中山也和康有为一样，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登上政治舞台的。

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年)，原名孙文，字逸仙。后来他从事革命活动，化名为中山樵，人们就称他为孙中山。

一八六六年，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孙中山有个哥哥叫孙眉，早年赴檀香山(北太平洋中心，夏威夷群岛的中部)经营垦牧，后来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一八七八年，十三岁的孙中山随他哥哥到檀香山生活，先后入英、美教会在当地办的学校读书。一八八三年孙中山归国后，又相继进入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一八九二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

从一八七八到一八九二年，孙中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在这段时间内，他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这对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早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孙中山就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意愿。中法战争前后，他正在广州、香港学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它的媚外卖国政策，给他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清政府十分不满。

一八九二年，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日益关心国家民族的安危，酝酿着反清的政治活动。尽管孙中山已有革命要求，但他还没能从当时流行的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孙中山周围，有不少改良主义者常常给他以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何启(孙中山的教师)、郑观

应(孙中山的同乡)。因此,孙中山一面倾向革命,一面还想要求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一八九四年,孙中山给李鸿章写了一封表达政见的信——《上李鸿章书》。在这封信中,他向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政治主张,概括为四句话,叫做“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就是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农官,管理农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筑铁路、设工厂,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等等。很明显,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幻想通过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进行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上李鸿章书》写好后,孙中山找郑观应设法介绍,北上天津,想面见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拒绝接见。孙中山碰了个大钉子后,就从天津跑到北京,去观察清政府的动向。那时,甲午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遭到惨败,举国震动。清朝统治者却还在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准备庆祝西太后六十“寿辰”。吃一堑(qiàn 欠),长一智。孙中山经过这番阅历,认识到自上而下实行改革,是根本办不到的,就决心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他随即南下武汉,观察长江流域的形势,再经上海去檀香山,联合二十多个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在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建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孙中山在亲自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号召人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赶快奋起,“振兴中华,维持国体”。

兴中会成立时,日本侵略军已经攻占北洋海军的要塞旅

顺和大连,京、津震动,形势危迫。“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即率领会员数人,从檀香山赶回香港,于一八九五年二月成立香港兴中会,决定举行武装起义。香港兴中会和檀香山兴中会的章程,大致相同,但删去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的一些温和词句,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正面进行猛烈抨击,并在入会誓词中,明确提出“驱除鞑(dá 达)虏(指清朝皇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这是孙中山早期的革命纲领,表明了他推翻清朝封建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决心。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①他是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先进的中国人的一个杰出代表。

为了组织起义,兴中会设“乾亨行”于香港,表面上是做买卖,实际上是指挥武装暴动的总机关。后来,孙中山又设“农学会”于广州,借行医和提倡农业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半年联络,取得了部分会党、军队的支持,能够调动的人员已不下万人,于是决定在旧历重阳(九月九日,阳历十月二十六日)发动起义,袭取广州为根据地。孙中山通令各路起义人员,利用广州人民重阳登高、扫墓的风俗,装扮成扫墓人,于重阳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集中。可是香港方面有部分人员,擅自改动战斗布置,没有及时到达,致使起义计划被打乱。这样,孙中山只好命令已经集中起来的人员立即解散,可是清朝两广总督已得到密告,在广州捕去四十多人。孙中山领导的这次武装起义,虽然还没来得及发动,就被镇压下去。但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重要的意义,是革命党人企图用暴力手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七六页。

段，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尝试。这件事腾传国内，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为人们注意。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缉拿革命党人。孙中山逃亡日本，设兴中会分会于日本横滨。后来又转赴檀香山、美国、英国，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一八九六年十月到伦敦不久，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馆诱禁，准备把他装在一个大箱子里秘密运回中国，加以杀害。后经孙中山的老师英人康德黎奔走营救，才脱险出来。清政府的迫害，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脱险后，他继续宣传革命，并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时期的代表著作，考察欧美现实的社会政治，酝酿三民主义思想，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做理论准备。一八九七年六月，他又转回日本，就近策动中国革命。

一九〇〇年义和团反帝运动期间，孙中山认为起义时机又来了。十月，派兴中会会员郑士良率三合会人员六百余人，在广东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几次打败来犯的清军，十多天内发展到二万多人，声势浩大。但因把希望寄托在外国援助上，没有和群众斗争相结合，当外援不至时，起义军也就很快瓦解了。

孙中山从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后，虽然坚持革命，努力在海外华侨中宣传革命，但却没有取得多少成效。因为当时许多人还寄希望于清政府幡然悔悟，弃旧图新。戊戌变法的失败，虽然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但不少人还把康有为、梁启超看作真诚的爱国志士，对他们抱着幻想与同情。这样，尽管实践已经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然而，许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时还不能从改良主

义思想的影响下解放出来。

二 民主革命潮流的奔腾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民主革命的潮流奔腾而来。

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一九〇一年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的独立徒具形式。二十世纪初年,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象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人们心头。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本和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了一场强盗战争。海战先在旅顺口及其附近海面进行,后在对马海峡火并;陆战全在中国领土上厮杀,双方集中几十万兵力争夺旅顺、辽阳、沈阳等地。战争期间,两国侵略军都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从旅顺到开原,“纵横千里,几同赤地”,流离失所的东北人民,“以数十万计”。清朝卖国政府置国家主权于不顾,无耻地宣布“局外中立”,并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区,任凭帝国主义蹂躏。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以沙俄失败告终。第二年九月,日本和沙俄在美帝“调停”下进行停战谈判。沙俄无视中国主权,私自将它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包括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及附属权益,无偿地转让给日本;日本则“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帝国主义拿中国的土地和主权作交易,清政府竟然也予以承认。

西藏在十九世纪末,就成为英、俄争夺的地区。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英国趁日、俄关系紧张,派侵略军大举进犯西藏。西

藏军民奋起抵抗，一九〇四年五、六月间江孜(zī 滋)战役中，猛袭英军营地，与侵略者白刃相见，并以火绳枪、石块为武器，坚守阵地，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八月，英军侵入拉萨；九月，胁迫西藏地方当局签订非法的所谓《拉萨条约》，规定赔款、开商埠和拆毁边界工事，严重地破坏了中国主权。

危迫的形势，使一切爱国者忧心如焚，感到必须投入挽救民族危亡的斗争。但腐朽的清政府，不仅不能保卫民族利益，反而彻底投降帝国主义。清政府卖国本质的彻底暴露，从反面教育了人民，使人们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处于如此危急的境地，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要挽救民族危亡，使国家独立、富强，就必须起来革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命。革命已成为广大人民普遍的要求。

毛主席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① 同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不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一些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敏锐的感受，有比较强烈的爱国心。二十世纪初年，不仅国内学堂纷纷成立，知识分子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出国留学成为一种风气。日本是学习西方有成效的国家，离中国又近，留学费用少，去的人特别多。一九〇一年，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过一百多人，一九〇四年达到一千三百多人，一九〇六年更达八千名上下。这些留学生，亲眼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跃成为亚洲强国，深切地感到自己祖国命运的危殆(dài 带)。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真理，从各方面掀起火热的爱国运动，并在人民群众日

^①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三页。

益增长的革命情绪策励下，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迅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思想政治战线上，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员骁将。章太炎（一八六九——一九三六年），名炳麟，浙江余杭人。甲午战争后曾投身维新运动，一九〇〇年毅然剪除发辫，与改良派决裂。这时，章太炎已是一个知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一九〇二年四月二十六日（阴历三月十九日，即明朝最末一个皇帝被杀的日子），章太炎等联络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和留学生举行纪念会，以表示纪念明朝的灭亡、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这个纪念会，由于清政府的干涉，虽没有开成，却在留日学生中，鼓起了组织爱国团体和出版革命刊物的热潮。一九〇三年元旦，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与会者达一千多人，热烈演说，很多人都发表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国的革命议论。《国民报》、《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童子世界》、《江苏》等刊物，一开始在内容上虽然还有改良主义的烙印，但革命倾向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上海是当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展爱国活动的又一中心。一九〇二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学社，传播革新思想。他们经常在张园举行会议，热情奔放地宣传爱国革命，扩大了社会影响。

促使众多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是一九〇三年的拒法、拒俄运动。

一九〇三年三月，清朝广西巡抚王之春，准备向法国借款借兵，镇压广西的农民暴动。这一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上海爱国人士的激烈反对。接着，四月间又发生沙俄拒绝从东北按约撤兵，反而企图长期霸占东北的事件。帝国主义的侵略，

激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帝情绪。上海爱国人士，在张园开会反对，表示即使清政府承认沙俄的侵略要求，“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北京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并致电各省学堂，发起联名谏(jiàn 践)阻。在留日学生中，则掀起了更强烈的反对沙俄侵略的浪潮。四月二十九日，留日学生开大会，讨论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到东北去，打击沙俄侵略者。到会五百余人，当场签名参加的，就有二百人左右。这种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在卖国的清政府看来，也是叛逆行为。它秘密通知各省总督、巡抚说：东京留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斥各州、县严密查拿”，“随时获到，就地正法”。

清政府以为采取镇压的手段，就可以消弭日益增长的革命因素。但事实恰恰相反，许多爱国青年在“爱国无路”的情况下，坚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拒俄运动被扼杀后，原拒俄义勇队中的激进分子，立即组织“军国民教育会”，明确提出了革命的主张。

风雷激荡的斗争，很快地造就了一些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十九岁的留日学生邹容，就是其中的一个。

邹容(一八八五——一九〇五年)，字威丹，四川巴县人。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参加爱国革命活动。一九〇三年四月回上海后，参加拒俄运动，寄居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因政治思想接近而建立了友谊。他除参加爱国学社的各种活动外，又写成了著名的《革命军》。《革命军》是二十世纪初年鼓吹革命最有影响的论著。在这本小册子中，邹容以通俗生动的笔调，论述专制制度的罪恶和革命的必要性。他热情地歌颂革命，把革命称之为“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世界公理”；他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掷尔头颅，暴尔肝脑”，“驰骋于枪林弹雨中”，推翻

革命軍

不文以生居於蜀十有六年，以爭非出揚子江，故上海，以正官游海外，南紀年，錄達人名家書，印於腦中者，及思想間所不平者，列為編次，以報

我國其亦附於文明國中，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者歟。雖然中國人，奴隸也，奴隸無自由，無思想，然不文不嫌此區區微意，自以為以是報我同胞，同胞之恩我，父母之恩我，朋友兄弟姊妹之愛我，其有責我，責大德不遺者，其有信我為光明正大者，吾不計。吾但信虛聲，感受諸大哲，於地下有靈，必曰：嗚呼！子有知吾道其東，吾但信鄭成功張煌言諸先生於地下有靈，必笑曰：使起有人，吾其嘆曰：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吾言，吾心不已已。

皇漢民族亡國後之二百六十年歲次癸卯三月日革命軍中馬前卒鄭容記

革命軍

革命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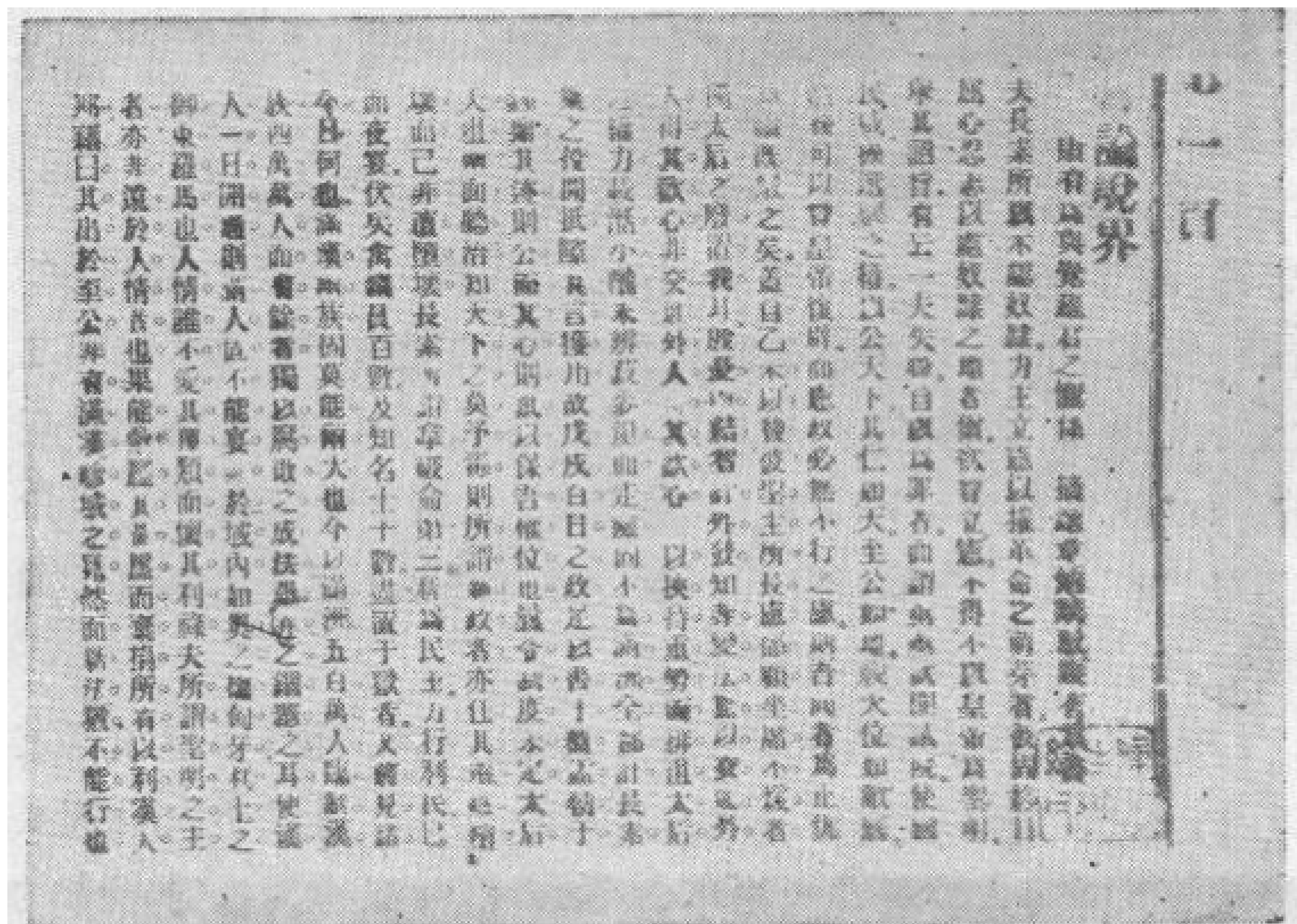
《革命軍》

清政府，建立一个“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人人有言论、思想、出版自由，“悉照美国宪法”和议院制的“中华共和国”；然后再扫荡那干涉中国主权的“外来之恶魔”，使“祖国之名誉飞扬”。邹容“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向人民大声疾呼：“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革命军》充满了勇猛奋发的革命朝气，自一九〇三年五月刊行后，“不翼不胫，而飞走海内”，如同嘹亮的革命号角，响彻大地。

章太炎对《革命军》一书倍加赞扬，特写《读〈革命军〉》发表于《苏报》，加以推荐。接着，《苏报》又在六月二十九日摘要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康有为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康有为诬蔑中国民智未开，不能实行革命。章太炎

针锋相对地指出：“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文章将被康有为吹捧为“圣明之主”的光绪帝，直斥为五谷不分的“载湉(tián 田)小丑”。还以鲜明的观点，肯定明末李自成（一六〇六——一六四五年）领导的农民起义和义和团运动，用他们的斗争实践，证明革命是提高群众觉悟和智慧的最有效途径。这些革命主张，反映了时代的要求，驳斥了改良派的谬论，深深打动了切望改善国家状况的人们的心弦，因而在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中，传诵一时。鲁迅先生就曾回忆说：“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文字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

清政府对这种革命宣传极为惊恐，连忙勾结帝国主义，通



摘要刊载于《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过上海外国租界当局，逮捕章太炎，监禁邹容，查封《苏报》。后来邹容死于西狱中，章太炎则被判处三年徒刑。内外反动势力这样勾结起来镇压革命，自以为得计，但却因此爆发了轰动全国的“苏报案”，大大促进了革命思潮的传播。

章太炎、邹容之外，陈天华也是当时著名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一八七五——一九〇五年），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爱国革命活动。一九〇三年“拒俄”运动前后，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写下了《猛回头》和《警世钟》两本小册子。《猛回头》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十言唱本”体裁，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清政府的走狗本质。书中写道：“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对这“洋人的朝廷”，难道还不该造反么？《警世钟》则以激昂的爱国主义热情，鼓动人们起来和侵略者作斗争。他大声疾呼：“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退侵略者，清除为侵略者效劳的汉奸走狗，以达到“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的革命目的。

在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岁月里，鼓吹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保皇派，越来越成为破坏革命发展的十分危险的敌人。一八九九年，康有为在加拿大组织保皇会。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间，康有为连篇累牍地写了《〈中庸〉注》、《〈孟子〉微》、《〈论语〉注》等著作，加紧鼓吹“尊孔教为国教”，以“孔子为教主”，妄图用顽固维护旧秩序的孔孟之道，来毒害人民，阻止人民走向革命。一九〇二年二月，改良主义的吹鼓手梁启超，在

日本横滨办起《新民丛报》，采取更加狡猾的宣传伎俩，说什么中国之所以被侵略、被奴役，不在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而主要是由于中国人民愚蠢落后。他叫嚷“新民为当务之急”，胡说救亡图存，应该从个人修养入手：“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正象孙中山说的，这些保皇党人“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

针对保皇党人的破坏，孙中山加强了他在留学生和华侨中的革命宣传工作。一九〇四年，孙中山发表《驳保皇报》，痛斥保皇派“爱国”是假、“害国”是真；强调今日中国“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则无挽救之法”。接着，孙中山在美国一面发表《敬告同乡书》，强调“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一面印发邹容的《革命军》，从正面大力宣传革命主张。第二年春，孙中山又去欧洲，先后在比利时、德国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中，宣传革命思想，发展革命力量。

由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持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大力宣传革命，批判改良派鼓吹保皇的反动思潮，因此，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华侨中，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阵地都日益扩大，而改良派则越来越不得人心。革命代替改良，成为汹涌澎湃的时代潮流。一九〇四年，孙中山热情洋溢地预言：“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

三 同盟会的成立

随着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继兴中会之后，全国各地相继

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拒俄运动后，军国民教育会中的许多成员纷纷归国，组织武装起义。一九〇四年初，原军国民教育会的浙江籍留学生龚宝铨(quán 泉)等，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首领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合作，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光复会通过联络会党，很快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一个比较大的革命团体。当光复会成立时，湖南籍留日学生黄兴、陈天华、杨笃生、宋教仁等，也先后回国活动，于一九〇四年二月，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华兴会成立后，另设同仇会专门联络会党。同年六月，刘敬安、吕大森、张难先等，在湖北新军和学生中成立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新军，是采用资本主义国家军队的编制和教练，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其主要成分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和贫苦知识分子。武昌起义前，湖北的革命分子为了运动新军，不少人投入新军当兵，后来成为发动武昌起义的骨干力量。

光复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的出现，反映了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同时也给革命党人，提出了怎样把分散的革命团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以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问题。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来到日本，根据客观形势的要求，倡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孙中山的主张，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赞同，七月三十日，在东京召开各团体的第一次联合会，决定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并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作为革命纲领。

八月十三日，留日学生一千三百多人，在东京召开欢迎孙中山的大会，盛况空前。孙中山在会上发表《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的演说，主张通过革命，赶上和胜过西方列强。痛斥改良派的中国“只可为君主立宪，不能躐(liè 劣)等而为共和”的

论点,是愚蠢可笑的。还指出,具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中国人民,只要“发愤自雄”,就一定能够打破常规,以“异常之速度”,在几十年内赶上和超过西方。

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开成立大会,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设立总部,由黄兴代表孙中山,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制定了《中国同盟会总章》以及包括《军政府宣言》、《对外宣言》等八个文件在内的《革命方略》,号召全国人民发扬“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同心同德”,进行“国民革命”。

十一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在日本东京出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他的十六个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作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理论原则。

孙中山倡导民族主义,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虽然还不能把满族贵族统治阶级和一般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但却摒弃了笼统排满的种族复仇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比起当时地主阶级反满派散布的“种族革命”论,民族主义无疑是一大进步。

孙中山倡导民权主义,主张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国”即资产阶级共和国。他说:“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而“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孙中山明确宣告:“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就不仅批判了保皇派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而且打破了推翻清王朝后重建

汉族君主政体的陈腐观念。

孙中山倡导民生主义，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他提出：要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孙中山眼见欧、美资本主义各国贫富悬殊，而且“富者极少，贫者极多”，为了预防这类“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在中国重现，他主张通过温和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来达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得其所”。这虽然是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但却触及了左右中国革命全局的土地问题。

“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提出的旧三民主义。

同盟会把分散的地区性组织，改建成统一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提出了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因而，它的成立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

然而，同盟会毕竟是一个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之间的松懈联盟。同盟会虽然成立，但组成同盟会的各团体之间的宗派界限和政治分歧，依然存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表面上虽被接受为指导思想，但许多人对它仍有所保留，比如，章太炎主张“一民主义”（民族主义），宋教仁赞成“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等等。这就为同盟会预伏了日后分裂的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同盟会纲领本身，存在重大的缺陷。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规定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但是，同盟会的纲领却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口号，没有提出彻底的土地纲领。

对外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民族革命的主要任务。可是，同盟会民族主义的主要锋芒，只是针对满族贵族统治，没有把帝国主义包括在内。这不只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而且因为他们害怕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为了避免帝国主义干涉，同盟会在《对外宣言》中讨好帝国主义，宣告他们打算在革命后，承认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得的一切特权，幻想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中立和支持。

对内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同盟会纲领中，虽然提出了“驱除鞑虏”，即打倒满族贵族所建立的封建专制政府，却没有把汉族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作为革命对象，而是把这些人当作可能的同盟者来争取。同盟会在《略地规划》中，甚至规定起义后的地方秩序，应由当地的地主、绅士来维持。这就更加表现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妥协性。

同盟会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口号，但并没有把这个口号，同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联系起来；而是企图用“核定地价”的办法，解决革命后的土地问题，预防中国因资本主义发展而引起新的社会革命。同盟会更反对农民起来，“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即反对农民使用暴力，摧毁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不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当然不能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也就根本不可能完成反帝反

封建的任务。

同盟会纲领缺乏明确的反帝反封建内容,这深刻表明: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他们“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①

同盟会纲领虽然存在重大缺陷,但它规定用革命暴力,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统治,取消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个主张,仍然是革命的、进步的。毛主席指出:“旧三民主义在旧时期内是革命的,它反映了旧时期的历史特点。”^②正因为它符合当时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愿望,因此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前进。

同盟会成立后,除出版机关刊物《民报》外,公开或秘密发行、翻印的各种刊物,达一百多种。这些刊物,不断揭露清政府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卖国投降的罪行,同时大力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歌颂人民起义的英雄事迹。《民报》还刊登了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许多消息、照片和评论文章,号召人民奋起革命。同盟会的成立,大大加速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步伐,成为民主革命高涨的起点。同盟会成立不到一年,内地各省相继成立分会,会员人数迅速扩展到万人以上,全国广泛撒开了革命的火花。正如孙中山所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①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三四页。

② 同上书,第六五四页。

四 从两条战线上出击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着重抓两件大事:一,大造革命舆论,向改良派发动思想进攻;二,领导武装起义,向清政府发动军事进攻。

早在同盟会成立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已经对改良主义反动思潮进行过批判。但当时革命派还没有统一的组织,因而不可能集中力量,给改良主义以歼灭性的打击。同盟会成立后,以《民报》为主要阵地,加强了对改良派的思想进攻。《民报》第一期第一篇文章,就对改良派宣战。当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党,污蔑革命党为“瞎闹派”,对资产阶级革命极端仇视。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



《民报》第一号的封面与发刊词

里，声称他们与革命势不两立，“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改良派以《新民丛报》为据点，顽固地进行反扑。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激烈论战。

改良派制造种种理由，为清政府辩护，反对暴力革命。

改良派认为，要使中国富强，并不需要推翻清政府，只要实行立宪即可；而实现立宪的手段，则“宜以要求，勿以暴动”。

改良派说，不好的人民，才“造出”不好的政府；如果政府去其专制压力，没有好的人民，政治反而更坏，所以问题不在政府恶劣，而在人民恶劣。

改良派顽固地声称，政治改革只能顺着开明专制、君主立宪、民主立宪的路子，循序渐进，“断难躐等”。胡说中国人民没有实行民主政治的能力，目前连实施君主立宪的资格都不够，只能实行开明专制，首先培养人民的“公益心”和“自治能力”，然后才能乞求皇帝恩赐君主立宪。

改良派还吓唬革命派说，如果实行革命，硬搞民主政治，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的暴乱，破坏社会秩序。其结果，必将导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使国家陷于被瓜分灭亡的危险，因此革命不但不是爱国，反而是“祸国”。

不从思想上政治上批倒改良派，就不能将革命迅速推向前进。在这激烈的论战中，孙中山“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①

革命派列举大量事实，证明清政府是坚决拒绝一切根本

^① 《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一一页。

性改革的，希望清政府自动将立宪赐给人民，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指出，欧洲各国的历史表明，不搞暴力革命，不借助兵力，就不能立宪；改良派鼓吹用磕头、请愿的办法，请求清政府实行“君主立宪”，那完全是骗局。他们还用戊戌变法失败的事实，说明清政府是一点权力也不肯放弃的。对这样一个恶劣的政府，改良派居然还为它辩解，哀求它实行君主立宪，这只能证明改良派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巩固清政府的“野蛮专制政体”。

革命派认为，中国经过革命，可以后来居上。过若干年，“中国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胜过西方，“亦非不可能之事”，批判了改良派“断难躐等”的反动思想。他们还根据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的理论，指出实行民主政治，是人类共同的要求，驳斥了改良派散布的“人民恶劣”，不能实行民主政治的谬论；至于改良派所说的人民某些观念的缺乏，正是黑暗的封建统治所造成，废除了君主专制制度，这些现象完全可以改变。

革命派指出，清政府已成为“洋人的朝廷”，它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正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才要打倒这样的卖国政府。而改良派却千方百计地维护它的统治，这正说明了改良派所标榜的“爱国”，实际上是“爱清”，他们和清政府一样，都是出卖祖国、出卖人民的卖国贼。

革命派虽然在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打倒清朝专制政府，能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的问题上，批倒了改良派，但在要不要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敢不敢反对帝国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上，却不敢正面反击改良派的挑衅。他们只是说，可以把群众的“自然暴动”，引导到“有秩序的革命”，这样，就不会搞乱社会秩序，

不会触动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利益，也就不会招致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干涉。革命派的这种论调，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这次大论战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暴露出严重弱点，但是他们终究坚持革命的方向，加强了人民的革命信念，鼓舞了群众斗志，揭露了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潮流。改良派在论战中败下阵来，《新民丛报》无可奈何地供认：“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向改良派发动思想进攻的同时，积极领导武装起义，企图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从一九〇六年萍乡、浏阳、醴陵(II里)陵起义发端，到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及其他革命团体发动的武装起义，共有十多次。

一九〇六年春，同盟会总部派湖南籍留日学生刘道一、蔡绍南等回国，活动于湖南、江西交界地区，联络会党，策划起义。萍、浏、醴一带，是会党聚集地区，刘、蔡等同各会党领袖积极联系，宣传民主革命，计划以安源煤矿数千矿工为主力，在萍、浏、醴三地同时起义。十二月四日，萍、浏、醴起义爆发，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推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为都督，按同盟会纲领发布檄文，斥责清政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提出推翻清朝统治，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

起义爆发后，安源矿工、贫苦农民和防营士兵纷纷参加，十天之内，总数增达三万多人。清政府急调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各路军队五万余人围剿。起义军和清军奋战月余，交战二十余次，终于失败。龚春台不知所终，蔡绍南、刘道一等死

难。萍、浏、醴起义声威远播，清朝统治者镇压起义后，又在各处清乡，搜捕革命党人和革命群众。后来发现起义领导机关在东京，就要求日本政府迫令孙中山离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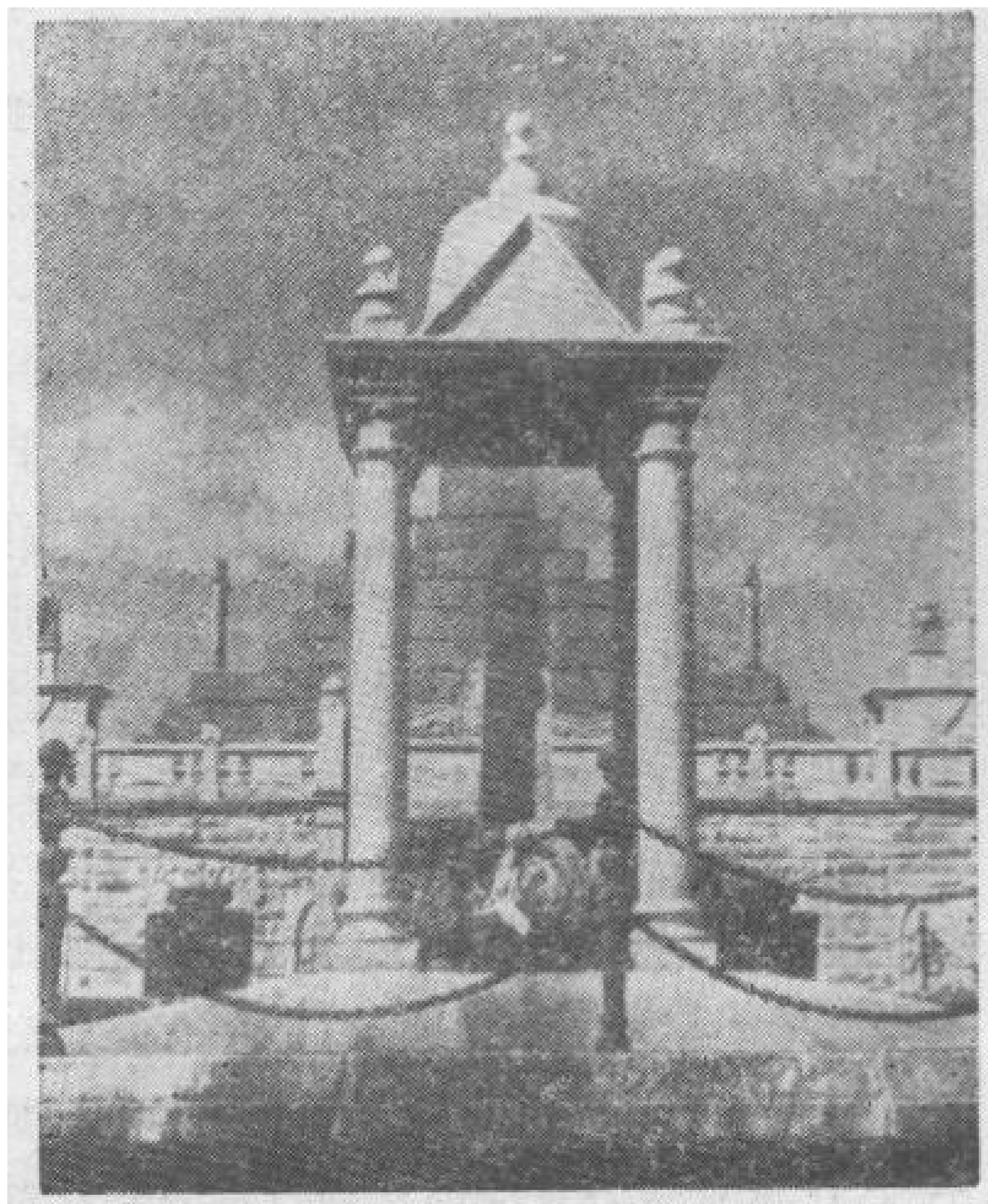
一九〇七年初，孙中山从日本移居越南河内，设立革命机关，派人联络会党，在中国南部和西南边境（广东、广西、云南）连续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这六次起义是：一九〇七年五月潮州黄冈起义；六月惠州七女湖起义；九月钦州、廉州起义；十二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一九〇八年三月的钦州、廉州起义；四月河口起义。同盟会在西南边境经营了两年多的武装斗争都遭到失败。但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的武装起义，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

当同盟会在南部和西南边境发动起义时，光复会的徐锡麟和其他成员，也在安庆两次举行起义。一九〇七年夏，徐锡麟率警察学堂学生数十人举行起义，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一九〇八年，安徽巡防营炮队队长熊成基，又领导军队暴动。这两次起义都因众寡悬殊失败了。徐锡麟起义时，女革命党人同盟会会员秋瑾（jīn 仅），在浙江绍兴曾联络会党，准备响应。徐锡麟失败被害，秋瑾因事泄被捕，也壮烈牺牲。

几次起义失败后，同盟会领导人总结经验，认为过去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地点选得太偏僻，从海外运送军火有困难；依靠会党作主力，战斗力不强。为此，一九〇九年，黄兴又在香港设同盟会南方支部，着重发动新军在广州起义。一九一〇年二月，同盟会会员倪映典，率领新军三千人在广州起义，结果也失败了。

新军起义失败，使不少革命党人感到灰心。这时，孙中山约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开会，鼓舞大家的斗志，并决定于广

州发动一次规模更大的起义，同清朝统治者决一死战。为此，孙中山亲自到华侨中募捐，购买武器；同盟会在香港设立统筹部领导起义，特别组织了八百人的敢死队作为骨干，还联络新军、会党、防营，准备响应。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一九一一年
四月二十三日，

黄兴由香港秘密赴广州部署起义。正在这关键时刻，负责运送枪械的人员叛变，不仅一部分军火不能到手，而且两广总督张鸣岐，得到消息后加强戒备，形势非常严重。黄兴决定放弃原来十路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四月二十七日（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午后五时半，黄兴率领一支由同盟会骨干一百余人组成的主力敢死队，猛攻总督衙门，及至攻入后堂，才发现张鸣岐已经逃走。起义军刚出后门，就和大队敌人遭遇，展开激战。很多革命党人英勇牺牲，黄兴也负了伤，最后化装脱险。起义失败后，找出在战斗中牺牲的七十二具尸体，合葬在广州城外的黄花岗。所以这次起义，又叫做黄花

岗起义。

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先后归于失败。但是，烈士们的鲜血没有白流，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牺牲，影响尤大。他们奋不顾身的革命牺牲精神，起了鼓舞斗志、振奋人心的作用，从而推动更多的人投入推翻清王朝的斗争。

然而，同盟会本身却因武装起义的一再失败而日趋涣散。部分人由于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巨大威力，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在“英雄史观”支配下，竭力倡导暗杀。《民报》最后几期，也载文鼓吹，暗杀之风大盛一时。有的则各存意气，相互攻击。光复会章太炎、陶成章等，为了经费问题，竟致不顾大局，在南洋华侨中散布传单，公开攻击孙中山，还在内地重拉光复会旗帜，采取独立行动。一九〇七年，长江中游各省和四川籍的部分同盟会会员，如邓文辉、焦达峰、刘公、孙武、张百祥等人，对同盟会总部行动迁缓和只重视经营华南，表示不满，在东京联络各地逃亡到日本的会党首领，成立共进会。黄花岗起义失败后，由于大批重要骨干丧失，同盟会领导力量大大削弱。以宋教仁为首的一批人，又于一九一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它虽然不是独树一帜，但与总部近于分庭抗礼。这些情况说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中心的同盟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已经无力对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进行坚强的统一领导。

五 抵制革命的假立宪

革命猛烈冲击着清王朝的统治。这个反动王朝，一面使用反革命暴力，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一面加紧玩弄和平欺骗

的诡计,妄图抵制和瓦解革命。清朝末年的所谓“预备立宪”,就是这种和平欺骗政策的产物。

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君主立宪,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一贯的政治纲领。改良派深恐“秩序一乱,不可回复”,害怕革命烈火会将他们的财产和特权一齐烧掉,因此,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和国内的一些资产阶级上层分子里外呼应,一直在吁请清政府,赶快实行立宪。从一九〇三年起,江、浙地区的资产阶级上层代表人物和地方官绅,如张謇(jiǎn 剪)、汤寿潜等,就预谋立宪。从此,这部分人就被称为立宪派。开始,他们勾结部分汉族大官僚,希望由这些人出面奏请立宪。一九〇五年,又利用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败和俄国革命的时机,大造舆论,宣称要国家变强,避免革命,只有实行君主立宪。

在革命的威胁和立宪派的策动下,一九〇五年,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首先上书清廷,要求立宪。一些企图利用立宪以保持和扩大自己权力的地方督抚,如两江总督周馥(fù 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xuān 宣)、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也先后呈请清政府实行立宪。西太后迫于形势,于一九〇五年七月,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作准备立宪的姿态。据当时《大陆》杂志报道,西太后表示:如果宪政能使“清朝基础永远巩固”,“民间革命之说自归消灭”,经过考察“确无弊害”,便决计仿行立宪。这说明清政府表示考虑立宪,决不是要让出一些权力,恰恰相反,是妄图以此麻痹人民,稳定其反动统治,以便躲避革命的风暴。

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宪派欣喜若狂,欢呼“伟哉此举!”为了反击清政府的立宪骗局,革命党人吴樾(yuè 月)怀揣炸弹,赶到北京正阳门车站,谋炸出洋考察的五大

臣。但因人群拥挤，炸弹早爆，吴樾当场牺牲，五大臣中仅有二人受了轻伤。在遗书中，吴樾揭露立宪骗局，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五大臣延至年底才出国，他们在欧、美、日本走了一趟，一九〇六年回国后，奏请立宪。载泽还向西太后上了个密折，说实行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又说，宣布立宪之后，还可暂不实行。这时，袁世凯加紧玩弄权术，装模作样地表示：“官可以不做，宪法不能不立”。新任两江总督端方，为了使自己能尽快“安于南洋之位”，也打出“力赞立宪”的旗号。西太后听说宣布立宪后可暂不实行，又可缓和与立宪派的矛盾，消弭“内乱”，加上一些地方实力派不断施加压力，于是，在一九〇六年九月一日，下诏预备“仿行立宪”。

张謇、汤寿潜等立宪派头面人物，联络江苏、浙江、福建等省部分官僚士绅，在上海成立第一个立宪政团——“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湖北、湖南、广东也都相继成立类似的团体。在美国的保皇党头子康有为，也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将“保皇会”改成“国民宪政会”，准备回国推动立宪。同年七月，梁启超又在日本东京设立“政闻社”，拥护清政府预备立宪；随后又将“政闻社”从东京迁上海。可是，西太后并没有忘记戊戌变法时的宿怨，七月间下令查封“政闻社”，严拿康、梁党徒，“勿任漏网”。“政闻社”从此不敢在国内公开活动。

这时，由“预备立宪公会”发起的各省立宪团体代表，纷纷入京，向清政府呈递速开国会请愿书。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吓坏了清政府中一些有权势的人物，使他们感到，“欲弭革命，舍实行立宪，别无良策”。一九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公布《钦定宪

法大纲》，并宣布从这年起，以九年为“预备期”，九年后正式实行宪政，以便拉拢立宪派。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西太后在十一月间，相继死去。三岁的溥(pǔ 普)仪，登上了皇帝宝座，改明年(一九〇九年)为宣统元年，由他的父亲载沣(fēng 风)任摄政王。载沣上台后，竭力削减汉族大官僚的权力以集权皇室，他罢斥袁世凯，说他的脚有毛病，叫他回河南老家“养病”。同时，继续玩弄假立宪的把戏，于一九〇九年三月特下谕旨，命令各省“切实筹办宪政”，成立谘(zī 资)议局。

载沣对预备立宪所表现的积极姿态，使立宪派产生了很大幻想。他们认为载沣是载湉(光绪帝)的亲弟弟，一定能继先兄的遗志，认真预备宪政。一九〇九年，各省谘议局纷纷成立，各省立宪派头面人物，也都进了谘议局。

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利用这一合法地位，联合发起立宪请愿运动，要求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十二月，江苏谘议局议长张謇，召集十六省谘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各省谘议局代表，于一九一〇年聚集北京，进行三次大请愿。前两次都遭拒绝，十月，中央资政院成立，一些立宪派代表被选为议员，扩大了立宪派的活动阵地，于是代表们又串连部分督抚，发动第三次请愿。

清政府因为第三次请愿有资政院与各省督抚参与，十一月，迫不得已，允许缩短“预备立宪”期限，提前在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并在国会召开前两年，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甚至将部分请愿代表押解回籍。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在京代表也纷纷失望而去。

一九一一年五月，清政府发表新内阁人选。在总理、协理

大臣和各部尚书(部长)共十三人中,满族九人、汉族四人。而满族九人中,皇族又占五人,实际上是一个“皇族内阁”。“预备立宪”的骗局至此完全拆穿。七月,各省谘议局上书,要求撤销“皇族内阁”,遭清政府拒绝。立宪派本来希望在内阁中取得席位,如今全成泡影。

清政府搞“预备立宪”,本是想拉拢立宪派,反对革命,以维护其反动统治。结果,不仅没有能削弱革命势力,反而由于在所谓“筹办立宪新政”的名义下,大量增加苛捐杂税,激起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它与立宪派的矛盾也加剧了,同路人的翻脸,使清政府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立宪派本是为挽救清王朝效劳的,但由于和清政府还有那么一点矛盾和争斗,因此得以蒙蔽一部分群众,捞到了一定的政治资本。武昌起义后,他们就凭这点政治资本,钻进革命队伍,从内部破坏革命,窃取胜利果实。

六 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二十世纪最初十年,历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蓬勃开展。辛亥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但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工农群众。同盟会领导的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后,尽管部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沮丧、动摇,但是,社会矛盾尖锐存在,日趋高涨的群众斗争,仍然把资产阶级革命推向前进。没有广大群众坚强不屈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在中国的统治。

辛亥前十年间,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主要表

现为：持续开展的反洋教斗争，抗捐抗税斗争，反饥饿抢米风潮，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

到一九一〇年，全国都乱起来了。据不完全统计，仅仅这一年发生的群众性反抗斗争，就达二百九十多次。“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风暴已经将清王朝这座朽烂的大殿，吹得东倒西歪。

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虽然给清政府规定了严厉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条款，但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依然在各省普遍展开。一九〇二年，直隶广宗人景廷宾，就因为清政府镇压人民抗拒“教案赔款”，竖起“扫清灭洋”大旗，发动河北、山东、河南二十四州县、二十多万人的农民大起义。一九〇四——一九〇八年，见于《东方杂志》上记载的“闹教”案件，就有三十五起（实际远不止这个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或者公开提出了“扫清灭洋”的口号，或者从事被清朝统治者称为“仇教戕（qiāng 腔）官”的活动，表明群众已经从义和团运动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开始自发地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联系起来。

抗捐抗税斗争，本是农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传统形式，二十世纪初年，则激化为普遍的群众运动，有力地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每年向各省摊派的“赔款”数额，江苏省最多，近三百万两，最少的贵州省，也有二十万两。除《辛丑条约》赔款外，各省又有赔偿教堂损失的所谓地方自筹赔款，最多的山西省，高达二百二十万两，最少的湖北省，也有二万多两。这些巨额赔款，当然都通过各种苛捐杂税，加到人民头上。此外，清政府还以练新军、办巡警、兴学堂、派留学、筹办地方自治、调查户口等“新政”名义，无止境地

增捐加税,大肆搜括。各地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又趁机混水摸鱼,敲诈勒索。

人民群众忍无可忍,纷纷起来“闹捐抗税”,到一九一〇



官肥民瘦

年,更出现了群众性的斗争高潮。如江苏全省就有一半州县,发生抗捐抗税斗争。湖南二十多州县群众,愤起焚烧官署、打毁关卡。河南、广西、广东、直隶、浙江等省,都发生规模不等的“抗捐”暴动。五月间爆发的山东莱阳抗捐运动,斗争规模最大,五、六万起义群众,在联庄会首领曲诗文领导下,“捣大户,捉富豪”,将平日以办“新政”为名,一贯强征暴敛的土豪劣绅,统统抓了起来;还几次围困县城,与清军展开激战,坚持斗争一年多。山东巡抚勾结帝国主义,从各地调来大量军队,杀伤群众四万多人,才将运动镇压下去。九、十月间,广东连州人民为抗捐发动武装斗争,这次斗争虽然被镇压了,但人民对统治者“冤仇结于骨髓”。连

州人民如此，全国人民莫不如此。

与抗捐抗税斗争同时，抢米风潮席卷长江流域。一九〇七到一九一〇年间，长江中下游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许多州县，都发生饥民暴动。据不完全统计，大小共九十多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一九一〇年长沙的抢米风潮。一九〇九年，湖南沿洞庭湖各州县遭受水灾，长沙以南又逢旱灾，全省灾民达十多万人，而官绅、富商、外国洋行，却乘机囤积居奇，抬高粮价。一九一〇年春，长沙米价由每升二十文左右，猛涨至八十余文。很多城郊农民、手工业工人、城市居民、铁路工人等，无法生活。四月，长沙一个挑水工人，以一天收入买不到一升米，忧愤交集，全家投水自杀，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成千上万的群众上街，捣毁碓（duì对）房、米店、钱庄、税卡、洋行、教堂以及外国领事馆，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形成为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在长沙人民斗争的鼓舞下，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以及直隶、奉天的许多州县，也都先后发生规模不同的抢米风潮，处处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秩序。

一九〇五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是这一时期遍及全国和海外华侨的反帝爱国群众运动。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美国为了开拓西部，大量拐骗和招引华工赴美，几十年间，数达十余万人。美国西部的许多矿山、铁路、城市建筑，都是中国工人建设起来的。七十年代后，美国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日益严重，资产阶级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恶意宣传中国工人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煽起排华事件，制造惨案。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美国政府胁迫清政府签订的虐待华工条约满期，中国各地人民和旅美华侨，纷纷要求废除旧约，改订新约，但美国政府置若罔闻。于是，怒不可遏的中国人民，奋起发动轰轰烈烈



广州《时事画报》刊登的抵制美货运动宣传画

烈的抵制美货运动。

运动先在上海发起，很快得到全国大小城镇和海外华侨商务团体的响应，电报、宣言、传单频传交飞，声讨美帝敌视中国人民的罪行，相约不买美货。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没有成为一支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但在斗争中却表现出坚决彻底的革命精神。如香港、上海、汉口、营口等地搬运工人，拒绝装卸美货。上海缝纫工人不制美料衣服，食品工人拒用美国面粉，刻字工人不刻美货商标，邮政工人不寄美货标本等等，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对华商品输出，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收回利权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和清政府卖国行径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大多是围绕着收回铁路和矿山主权

而开展起来的。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涨。

一九〇五年,湖北、湖南、广东三省人民,在各省人民声援下,从美国手中夺回了粤汉铁路的建筑权。四川人民也坚拒英、法两国的覬覦,在同年成立川汉铁路公司,自办川汉铁路。一九〇九年以后,运动更趋激烈,山东、四川、安徽、奉天、云南等省人民,先后从帝国主义手中,夺回了一些路矿利权。

正当收回利权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清朝“皇族内阁”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一九一一年五月颁布“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将各省商办铁路,一律收归“国有”,准备借“国有”名义,向帝国主义拍卖全国铁路主权。同时,它还派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强行接收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四省的铁路公司。粤汉、川汉铁路,是经过四省人民长期斗争才收归自办的。在四省募集的股本中,除广东全是商股外,其余三省不仅有商股,还有通过各种捐税集约的“民股”。清政府中的一群卖国贼,一面出卖路权,大借外债,贪污中饱;一面又以“铁路国有”为招牌,夺取商民对于铁路的投资。他们一箭双雕,自以为得计,却没料到这种反动的做法,迅速引起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保路风潮。

保路风潮首先从湖南掀起。当时湖南境内的粤汉铁路,已修通长沙至涑(lù)口一段。试车时,群众扬眉吐气,爱国情绪高涨。一听清廷出卖路权,群情愤激。绅商们聚集在谘议局开会,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散发传单,成立保路团体,各界参加的有一万多人。七月二十六日,湖北革命党人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发表《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文章,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同盟会在香港出版的《中国日报》及其他

报纸，也都极力声援保路斗争。四川各府、州、县遍设“保路同志会”，参加的有数十万人。一部分同盟会员还与会党联系，“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事”，酝酿武装起义。

清政府卖国心切，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各地上书及请愿要求，反将各省派往北京的请愿代表，押解回籍，命令各省严禁保路运动。这时，控制运动的立宪派人，纷纷妥协退让。他们害怕人民的革命行动，又不敢和清政府决裂，因此，一面表示要清政府将已用和现存的路款，发还股东；一面力图将群众斗争，控制在所谓“文明争路”的范围内，劝告群众不要暴动，只许叩头请愿。人民群众很快突破了立宪派设下的框框，开展剧烈的斗争。长沙、株洲一万多工人，举行示威；湖北宜昌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打死清军二十多人；湖南学生举行罢课，抗议清政府出卖路权；留日学生提出“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的口号；旅美广东籍华侨通过了“有劫夺商路者，格杀



路事问题

勿论”的决议。这些都表达了人民群众反抗帝国主义走狗清政府的斗争决心。

保路斗争,以四川最为激烈。八月,清政府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一段的消息,传到成都,几万人举行大会,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以示抗议。各地纷起响应,立宪派已无法控制运动的发展。九月一日,群众宣布不纳粮,不纳捐税,不承担分厘外债。群众暴动事件,连续发生。五日,号称“屠夫”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逮捕铁路公司负责人蒲殿俊、罗纶等;七日,更枪杀请愿代表数十人,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一些同盟会会员,用木板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等字样,涂上桐油,用油纸包裹,乘夜投入锦江,称之为“水电报”。“水电报”顺流而下,赵尔丰的罪行,很快传遍川东南各地,激起了全省规模的武装起义。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联络哥老会组织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转战各地,攻占州县。吴永珊(吴玉章)、王天杰等人,于九月二十五日,宣布荣县独立,建立革命政权。四川保路运动发展为武装起义,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

保路运动,是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清政府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它由“文明争路”、和平请愿,迅速发展为武装起义。革命怒涛一日千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已经形成,清王朝的覆灭指日可待。

七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

列宁说:“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

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
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
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
能获得胜利”。^① 革命党人的不断起义,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使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四面楚歌,再也
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就在清政府手忙脚乱地应付四川保路
运动时,武汉三镇成了辛亥革命的突破口。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这次起义首先在
武昌爆发,是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长期踏实工作的结果。
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在同盟会影响下,一直酝酿武装起义。
一九〇六年萍、浏、醴起义时,革命组织日知会准备响应,由于
叛徒告密,日知会被破坏。后来,这个团体几经整顿,于一九
一一年初又以“文学社”名义,重建组织,在新军中继续活动。
同时,一九〇九年后,共进会也以会党结盟方式,在新军士兵
中发展革命分子。革命力量日益壮大,武昌起义前夕,湖北新
军共一万五千多人,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的,已达五千多人。
这就为武昌起义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都在湖北新军中做了很多工作,可
是彼此门户之见很深,一直未能很好地配合活动。一九一
一年夏,同盟会中部总部在上海成立后,努力策动两个团体合
作。八月底,四川保路风潮高涨,由于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两团体经多次协商,终于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文学
社社长蒋翊(yì 亦)武任起义军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任参谋
长,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九月二日,清政府调湖北

^①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三九页。

新军一标(相当于团),由端方率领,入川镇压保路运动。革命党人担心湖北新军被陆续调走,使革命力量分散,迅速决定于十月十一日举行起义。不料十月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制造炸弹时,不慎爆炸,起义计划暴露。第二天,设在武昌的起义指挥机关也遭破坏,革命党人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人,被捕牺牲,蒋翊武等匆忙分散隐蔽。十月十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湖广总督瑞澂(chéng 惩)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在这严重时刻,革命士兵的英勇首创精神,弥补了领导机关被破坏的损失。他们主动联络,当天夜里,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士兵首先起义,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新军其他各部革命党人纷纷响应,合力攻占总督衙门,瑞澂等仓皇逃往停泊在长江中的“楚豫”兵舰。经过一夜紧张战斗,革命士兵占领了武昌全城,随即成立革命政权——湖北军政府。紧接着,革命党人又在十一日晚和十二日晨,在汉阳和汉口举行起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首先在武汉三镇取得胜利。

武昌起义的胜利,震动了全国,长期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革命热情,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大江南北、长城内外,许多地区的革命党人,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

首先起来响应的是湖南。十月二十二日,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率领会党和新军攻入长沙,建立湖南军政府,焦、陈二人被举为正副都督。湖南起义的胜利,使武汉免去了后顾之忧。这一天,陕西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也联络会党发动起义,占领西安。接着,江西、云南、贵州、上海、江苏、浙江、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十一月十三日宣布独立,不久又取消)、四川等省,有的举行起义,有的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从十月十日武昌起义起,到十一月下旬,一个多月时间里,清

政府所辖二十四个省区，已有十四个省脱离了它的统治；它暂时还能控制的，只有河南、直隶和东北三省。

各省武装起义，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拥护和积极支持。革命形势飞速发展；很快就形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革命高潮。这次革命高潮，以一九一一年的武昌起义为标志。因为这一年是旧历辛亥年，所以这次革命被称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它对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武昌起义前，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多次武装起义失败，对形势的估计十分悲观。他们只看到自己和少数革命党人的活动，而看不到人民群众的革命要求。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内部互相埋怨，闹不团结。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已经没有一个统一的、有力的领导中心。更严重的是，革命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也迅速地暴露出来。他们一再声明，维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又拿出“秩序革命”这根大棒，压制工农群众，企图用保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秩序，来换取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同情。他们越来越多地把革命解释成只在于推翻清政府，声称不论什么人，只要反对清朝、拥护共和，就可以引为同志。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取得帝国主义、旧官僚和立宪派对革命的支持。恰恰相反，一切反革命势力正是利用他们的软弱性，乘隙而入，窃取革命果实。当战场上犹是炮火纷飞，人民群众正在欢庆胜利之时，各地军政实权却在不同情况下，纷纷落入反动势力手中。

第一种情况：革命党人发动起义、夺取政权后，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军政实权很快就为旧官僚和立宪派把持。湖北



指挥武昌起义的秘密机关之一

就是如此。

十月十一日，激战一夜的武昌城沉寂下来，胜利了的起义士兵，面临组织革命政权的任务。他们聚集在阅马厂湖北谘议局开会，讨论推举都督，成立革命政权。由于“英雄创造历史”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作祟，他们认为应该举一个有“名望”的人来领导，才能号召天下。孙中山、黄兴是最有名望的，但一个远在美国，一个寄居香港；直接组织这次起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首领，又在起义前夕或遭杀害，或被迫逃亡，没有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可供推举。混入这次会议的立宪派分子，就乘机提议，把反动的清朝新军协统（相当于旅长）黎元洪，拉出来当都督，说他“声望高”，如果让他充当湖北军政府首脑，一

定有很大的“号召力”。他们还提议，把原湖北谘议局议长、立宪派头子汤化龙，请出来当民政局长。幼稚的革命党人，居然附从这个建议，拱手把浴血奋战夺得的政权，让给了这两个家伙。

黎元洪（一八六四——一九二八年），湖北黄陂（pí 皮）人，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在北洋海军中任职，后来到湖北投靠张之洞，一直升为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十月十日晚间，他曾亲手杀死两名革命士兵。当这个躲藏起来的家伙被革命士兵搜出，要他当都督时，他吓得浑身发抖，连称“莫害我，莫害我”，坚决不愿当都督。后来，他被革命党人用手枪逼着上台，就一言不发，还坚持不肯剪去辫子，以示对清朝忠诚。汤化龙钻进革命政权后，则大肆玩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公开表示对革命“自当尽死效命”，暗中却向清政府保证，“化龙决不从逆”。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们也看出清政府败亡在即，就抓住已经窃取到的权力，发号施令；还利用革命党人内部不团结，施展鬼蜮伎俩，挑拨离间，使他们互相攻击，甚至彼此残杀，以达到瓦解革命力量的目的。就这样，湖北的反动势力逐步扩大，革命力量日益削弱，以至后来黄兴到达武汉时，还不得不屈居于黎元洪之下。资产阶级革命党的领袖，在第一个革命政权中，地位竟不如反革命刽子手黎元洪，其余的就可想而知了。陕西、浙江、福建等省，都发生过类似湖北的情况。

第二种情况：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很快为反革命势力通过反动政变，将政权夺去。湖南就是如此。

武昌起义后，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在长沙起义响应，赶走清朝官吏，建立了革命政权。但由于他们对立宪派毫无警惕，对反动势力斗争不力，没有全部解散湖南的反动军

队，却把它整队收编。结果，立宪派头子谭延闿(kǎi 凯)，联合一批反动军官，逼迫革命党人让出民政大权。接着，谭延闿又煽动旧军队，发动武装政变，杀害了都督焦达峰和副都督陈作新，并在全省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和会党群众，使湖南政权完全落入立宪派手中。类似湖南的情况，贵州也发生了。

第三种情况：名义上宣布独立，响应革命，实际上是一批旧官僚、立宪派搞“和平光复”。这种情况可以江苏为代表。

十一月三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胜利，在苏州的立宪派和绅商各界上层分子，异常惊慌，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抢先一步宣布独立，以逃避革命的打击。程德全乘机于十一月五日，把巡抚衙门改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于是，旧衙门变成“新政府”，巡抚变成都督，旧官僚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元勋”，一切照旧。当时有一则报道说：“苏州光复时，没有丝毫变动，仅用竹竿挑去抚衙大屋堂上的几片檐瓦，以示革命必须破坏云。”这是对于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性的一个极大讽刺。江苏之外，广西、安徽第一任都督，也都是原来的巡抚。

除上述情形外，有些省份和地区较为曲折，或革命党人掌了权，或几经曲折掌了权，如上海、广东、四川、山西。但这些革命党人掌权后，很快就向右转，或者变成新官僚。鲁迅先生在《这个与那个》这篇文章中，曾写到绍兴光复后的第一任都督，说他最初“还算顾大局，听舆论的”，不久，“这个拜会，那个恭维，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结果是变成老官僚一样，动手刮地皮”。鲁迅先生描写的这种上层革命党人堕落的现象，当时是极为普遍的。

从独立后的各省来看，不论是钻进来的立宪派或旧官僚掌权，还是革命党人掌权，他们维护旧秩序，压制甚至镇压工

农群众运动，都是一样的。广大工农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刚一发动，就被扣上“假冒革命”、“假冒民军”、“行动越轨”等罪名，轻则勒令解散，重则派兵镇压。如上海独立后，附近青浦、昆山、宝山、南汇诸县，掀起抗租风暴，结果被诬为“土匪”、“海盗”，遭到镇压。上海制造局工人，刚刚成立一个“制造工人同盟会”，就被沪军都督、同盟会会员陈其美查禁。广东独立后，光是省城内被裁撤的民军，就有九万人。四川的保路同志军，全被遣散，有的还被当作“会匪”惨遭屠杀。一部分下层急进的革命党人，在稍后曾谋反抗，但都惨遭镇压，先后抱恨倒在血泊之中。

革命的危机，不仅表现为独立后各省政权，多数落入立宪派和旧官僚手中，以及上层革命党人当权后很快地向右转，更重要的，还表现为同盟会的迅速解体。本来在武昌起义前，同盟会已经日趋涣散；武昌起义后，很大一部分革命党人，为了争小团体和个人的权力，不惜和反动势力同流合污。当时曾有人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这句话当然是错误的，但却反映了那时同盟会的瓦解状态。

武昌起义后，各省响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作为全国的领导中心。但事实上，当时南方已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是“首义之区”的武汉，一个是同盟会中部总部所在地的上海。两个地区，各出现了一个政客集团，积极筹组中央政府，争夺最高领导权。后来，几经争论，决定在武汉开会，讨论组织中央临时政府问题。十一月三十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召开会议，制定《临时政府组织法大纲》，规定中央政府由各省都督代表会议产生；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会议选举；临时参议院由各省都督府

各派议员三人组成。会议在帝国主义的影响和立宪派、旧官僚的操纵下，竟然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时袁世凯已被清政府起用为内阁总理大臣，负责镇压革命）。这样，临时政府在酝酿之初，就定下了妥协、投降的调子。

十二月二日，江浙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革命重心由湖北转移到长江下游。十二月十日起，各省代表齐集南京，商讨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二十五日，孙中山回国。孙中山为革命奋斗多年，在全国人民中有很高的威信，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开会，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但为了不得罪袁世凯，各省代表又决定，请孙中山致电袁世凯，表示如果袁世凯“拥护”共和，孙中山仍将让出大总统的位置。

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



一九一二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立。三日，各省代表加选黎元洪为副总统，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九人，组成民国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中，虽有立宪派和旧官僚，但它终究是资产阶级革命分子领导下的政权。南京临时政府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颁布了一些有利于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它的成立，宣判了清朝反动统治的死刑。

八 胜利果实被窃取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①武昌起义刚爆发，帝国主义各国，就妄图尽快加以扼杀。英国公使朱尔典，马上通知驻华海军，要他们给湖广总督瑞澂，“以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到十月二十二日为止，英、美、日、德、俄军舰二十艘，集中武汉江面，日夜升火待命，准备武装干涉。但是，由于武昌起义迅速获得全国响应，革命潮流势不可挡，清王朝眼看必垮无疑，因此，帝国主义一面打起“中立”的幌子，麻痹革命党人，一面将更“忠实”、更“强有力”的走狗袁世凯牵出来，作为他们破坏辛亥革命、继续统治中国人民的新工具。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继曾国藩、李鸿章之后的又一个大军阀、大官僚、大卖国贼，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早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他就因为屠杀中国人民特别卖力，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武昌起义的枪声才打响，一个美帝国主义分子，就在北京扬言：“如果清朝获得象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

^①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〇二页。

人的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各国公使推派美国公使嘉乐恒，在北京外交使团会议上，正式提出起用袁世凯的主张。帝国主义报刊，发出一片“非袁不能收拾”的反革命叫嚷。

清政府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后，急派陆军大臣荫昌，于十二日率领北洋新军，南下镇压起义。第一军由荫昌亲自指挥，第二军由冯国璋指挥；并加派海军舰艇，对武汉进行水陆夹击。但北洋新军是袁世凯培植的私人武装，只受袁世凯“遥控”，不听荫昌指挥。清皇室束手无策，为了挽救危亡，不得不请受到帝国主义支持、手里又有反革命实力的袁世凯出山。十月十四日，清政府下令，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嫌权力太小，一面借口“脚病”还没治好，拒不受命；一面暗使冯国璋“慢慢走”、“等等看”，利用南方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向清政府讨价还价，索取指挥水陆各军和组织内阁的全权。

袁世凯欲擒故纵，野心勃勃；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清皇室，不甘大权旁落。事情闹成僵局。

十月下旬，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荫昌又在前线连吃败仗。二十九日，山西爆发革命；同日，驻直隶滦（luán 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也在革命潮流推动下，举行“兵谏”。火从脚下起，清政府惊恐万状，感到“不用袁世凯，指日可亡；如用袁世凯，可以延迟灭亡，或可不亡”，被迫于三十日解散“皇族内阁”。十一月一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向袁交出全部军政大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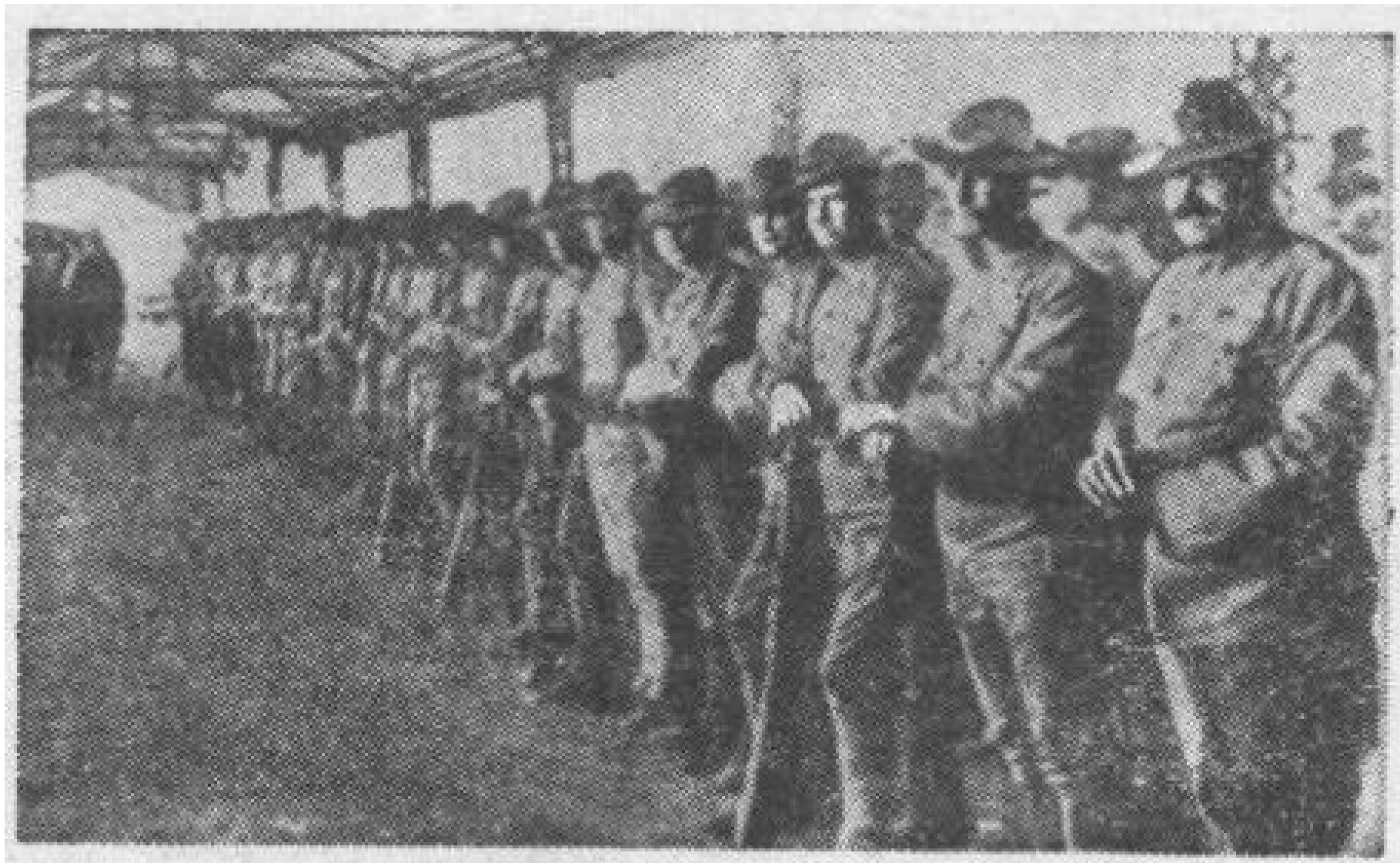
这个任命一传出，帝国主义十分高兴。英国外交大臣立即打电报表示：“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各国驻华使节也马上开会，向袁世凯致贺，并授权英国公使朱尔典，与

袁世凯密谋绞杀中国革命的所谓“妥善行动”。这样，帝国主义就和中国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重新组合在一起，用一打一拉、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来镇压与破坏辛亥革命。

在帝国主义卵翼下，袁世凯的箭，一边射向清廷，一边射向革命；他用革命吓唬清廷，更以暴力压制革命。十月底，袁世凯下令冯国璋，猛攻汉口，使出“打”的一手。十一月二日，也就是袁世凯受命组阁的第二天，北洋军攻陷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冯国璋纵兵焚掠，汉口三十里街市化为瓦砾，人民惨遭蹂躏。接着，袁世凯就玩弄“拉”的一手，派亲信到武昌军政府，对黎元洪进行“和平”试探。窃据革命党上层领导的一群立宪派和旧官僚，早就盼望“和平了结”，鼓吹什么“如袁世凯反正，即举为大总统”。但是，中下层革命党人坚决拒和，斥令袁世凯的代表滚蛋。革命群众更齐集军政府外示威，反对妥协投降。

袁世凯诱和不成，下令猛攻汉阳。十一月二十七日，北洋军占领汉阳，并在龟山架炮，轰击武昌。在反革命炮火的直接威胁下，武昌陷入一片混乱。这时，朱尔典又出场，和袁世凯一搭一档，利用革命军的暂时受挫，二十九日电令汉口英领事葛福，提出三项议和条件：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帝退位；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屈服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双重压力，正在汉口英租界开会讨论组织临时政府的各省代表（有许多人是立宪派），十二月一日接受停战议和，放弃了武装斗争。但与武昌告急同时，江浙革命联军却攻克南京，士气大振。帝国主义怕革命军乘势北伐，于是加紧玩弄和谈阴谋，为袁世凯赢得喘息时机。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帝国主义策划下，革命军方面以伍廷芳为代表，袁世凯方面以唐绍仪为代表，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进行“南北议和”。二十日，英、俄、法、德、美、日六国驻上海领事，向谈判双方递交一份照会，猖狂宣称：“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使外人的物质利益与安全，遭受严重的危险”，叫嚷双方“必须尽速达成协议，以停止现在之冲突”。这



美国侵略军在上海登陆，对革命进行威胁

件照会，对袁世凯集团，是一个露骨的支持；对革命势力的发展，是一个粗暴的压制。谈判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体问题上坚持共和制，但在国体问题即由哪个阶级掌握政权的根本问题上，却向反革命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让步。伍廷芳声明：谈判必须以承认共和为前提，但只要袁世凯反正，逼清帝退位，就可以举袁为大总统。二十九日，孙中山在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同一天，也给袁世凯打电报，表示自己是“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革命党人越是妥协退让，反动势力越是步步进逼。袁世凯以武力为后盾，以“和谈”为手段，千方百计掐(qiā 恰阴平)死南京临时政府。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刚宣布“中华民国”

成立，袁世凯便指使北洋死党冯国璋、段祺瑞等四十余将领，联名通电，狂叫：“若以少数人意见采用共和政体，必誓死抵抗。”为了同袁世凯呼应，帝国主义列强的军舰，在长江耀武扬威，日、俄军队在东北张牙舞爪。各帝国主义报刊，也大造反革命舆论，攻击南京临时政府是“寡头政治”，孙中山等人“没有维持中国领土完整和恢复和平的能力”，吹捧只有“强有力”的袁世凯，才能“统一”南北。帝国主义各国，根本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还冻结海关收入，从财政上卡它的脖子；另一方面，却给袁世凯提供借款，强化他的反革命军队。

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敢也不可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钻进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更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里应外合，从内部破坏革命。他们纠合同盟会里一些搞倒退、闹分裂的人，公开要求解散同盟会；指摘孙中山“理想太高”、“贪恋禄位”，迫使孙中山让位。窃据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立宪派头子张謇，甚至得意洋洋地致电袁世凯说：“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

内外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与破坏，使孙中山处境十分艰难。不久，资产阶级革命派再一次向敌人妥协。一月二十二日，孙中山声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自己立即辞职，向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孙中山的保证后，立即布置逼宫。一月二十六日，那班前不久还在通电“誓死抵抗”共和的北洋将领们，一下子变成了主张“立定共和政体”的英雄好汉，而且，为了逼清帝退位，冯国璋、段祺瑞还决心“率全军将士入京”！已经被革命吓破胆的清朝皇室贵族集团，在这种形势下，只得接受袁世

凯和南方议定的清帝退位优待条件(主要为: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废,以对外国君主之礼相待;岁用四百万元,由民国付给;暂居皇宫等)。二月十二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正式宣告退位。清帝退位前一天,袁世凯在给孙中山的电报中,装腔作势地表示:“共和为最良国体”,决心“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将自己打扮成共和制的倡导者、保卫者,借以欺骗和麻痹缺乏坚强斗志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

二月十四日,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十五日,参议院选袁世凯继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经不起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威逼利诱,竟将到手未温的政权,拱手让予大阴谋家袁世凯。

孙中山虽然被迫退位,但还希望维护在革命中缔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他在给参议院的辞职咨(zī 咨)文中,提出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设在南京;二,新总统到南京任职时,大总统与国务员再辞职;三,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约法(《临时约法》此时尚未颁布)。孙中山主张建都南京的用意,是想使袁世凯离开京、津地区,到革命势力比较强大的南方来当总统,并用一部《临时约法》,来防止他专制独裁。然而,袁世凯怎么肯离开他苦心经营并赖以发迹的北洋老巢呢?帝国主义凭恃《辛丑和约》,驻兵京、津以至山海关等要地,成了先是清政府、后是袁世凯的太上皇,当然也不愿临时政府设在南京。

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派专使蔡元培等到达北京,迎袁南下就职。老奸巨猾的袁世凯,特开正阳门对专使隆重欢迎,还假惺惺地安排南下路线,表示“极愿早日南行”。二十九日晚,正当迎袁专使以为大功告成时,忽然外面枪声大作、火光烛

天。原来，这是袁世凯嫡系曹錕部下，奉命发动“兵变”。不仅东安门外及前门一带，商民千余家惨遭焚掠，连专使住宅也被侵入，吓得专使们狼狈走避。接着，保定、天津、通州，也演出



袁世凯指使发动“兵变”后的情景

一台台“兵变”好戏。帝国主义立即调兵遣将、剑拔弩(nǚ努)张，又是“巡逻”城内，又是“保护”使馆，和袁世凯大唱双簧。这时，袁世凯又第三次使出他的杀手锏(jiàn健)，以冯国璋、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将领，通电表示：“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副总统黎元洪也大叫：“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可奈何，只得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十日，让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临时约法》；四月一日，正式解职离任。四日，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至此，全国政权落到了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手中，袁世凯取代清王朝，建立起了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反革命专政。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抢走了。

毛主席曾精辟地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①

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除了代表最落后最反动的地主阶级利益之外，又逐步成为帝国主义间接统治中国的、最合适的政权形式。辛亥革命，打毁了皇帝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大创举，也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而起的第三次革命高潮，是中国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斗争的、比较更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虽然是辛亥革命的大胜利，但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地位和特权，丝毫没有触动；地主买办阶级的权势，依然保持；中国人民，仍旧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两座大山压迫下。一句话，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辛亥革命终究失败了。

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呢？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八页。

毛主席说：“我以为原因在两个地方：第一是敌人的力量太强；第二是自己的力量太弱。一个强了，一个弱了，所以革命没有胜利”。^①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当时面对着强大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主要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之间虽然有种种矛盾，但对镇压中国革命，枪口却是一致的；满、汉大地主之间，尽管充满了互相倾轧，但为了绞杀革命，还是纠聚在袁世凯周围。中外反动势力，共同选择袁世凯，重新结成一个比清王朝更凶残、更狡诈的反革命统治集团，要推倒它，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力不胜任的。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得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上去找。毛主席指出：“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② 软弱性，是民族资产阶级从娘肚子里带出来的老毛病。

由于这个老毛病，资产阶级革命派一直害怕触动帝国主义。以南京临时政府对外宣言为例，不但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有效”，而且幻想帝国主义各国，能对革命政权恩赐“友谊”、表示“亲爱”。

由于这个老毛病，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封建也是不彻底的。他们把推翻清王朝当作奋斗的主要目标，认为只要把清朝皇帝赶跑，革命就成功了，而不去推翻整个封建制度，特别是地

① 《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五二八页。

②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三三页。

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所谓“平均地权”，对广大贫苦农民来说，完全成了一句空洞的口号。

由于这个老毛病，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仅不敢发动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群众，反而对广大农民自发的反封建斗争横加压抑。一个得不到广大工农群众支持的资产阶级政权，怎么能对付得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呢？“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①

归根结蒂，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②

①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六页。

②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四一页。

第十章 北洋军阀的 黑暗统治

一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

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北洋军阀集团虽然控制了中央和地方许多省分的政权，但南方还有七、八省地盘和十几万军队，仍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手中。由于辛亥革命的胜利与《临时约法》的颁布而激起的民主政治要求，在国内还很有影响。因此，袁世凯不敢公然撕毁约法，暴露他君主独裁的野心，而是荫蔽在民主共和的幌子下，一步一步地施展阴谋诡计。在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这个家伙极端虚伪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xiá huì 霞惠），谨守宪法”。接着，任命新加入同盟会的唐绍仪为国务总理，重申“忠于共和”、“忠于约法”之类的甜言蜜语。

一九一二年四月，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代行国会职权。围绕所谓议会斗争，资产阶级各派政治势力发生了重要的分化组合。原来的同盟会和新成立的共和党，成了那时主要的

两个政治团体。

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后，由秘密转为公开，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纷纷参加进来，力量更加涣散。同盟会很多领导人沉醉于议会政治的幻想，企图利用《临时约法》和实行“责任内阁”，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甚至企图在拥护袁世凯“完成行政统一”的前提下，“促进地方自治”，保存自己在南方一些省分的实力和地位。孙中山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宣布要以在野身分，发展实业，对同盟会的活动很少过问。黄兴在临时政府北迁后，任南京留守，六月，自动撤销南京留守府，遣散临时政府的军队，对袁世凯表示诚心拥护。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迷信议会，他喊着“朝野合作”、“新旧势力合作”的口号，力图在妥协中，分取袁世凯一部分权力。

一九一二年五月建立的共和党，是以君主立宪派为中心，吸收章太炎等由同盟会分化出来的一些人和其他几个小政党，组合而成的政客集团。主要人物有张謇、汤化龙等，推黎元洪为理事长。共和党拥护袁世凯集中权力、统一全国，反对同盟会责任内阁和地方自治的主张，自称“政府与党”，甘心充当袁世凯的附庸，乞求一杯残羹。

为了摧毁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建立军阀独裁统治，袁世凯首先向《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开刀。六月，公然破坏《临时约法》中关于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内阁同意副署方始有效的规定，迫使唐绍仪和同盟会的几个阁员辞职。这样，第一届内阁成立不过三个月，就垮台了。九月底，袁世凯干脆任命他的忠实爪牙、特务头子赵秉钧为国务总理。从此，内阁完全成了他的御用工具。所谓“责任内阁制”，名存而实亡。

然而，这并没有引起同盟会的警惕，它还在做民主政治

的美梦。几经奔走游说，宋教仁拉拢四个小党，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建立了一个由同盟会、立宪派和旧官僚混合组成的国民党，发布五条政纲：促成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和平。在这里，“平均地权”不见了，“力图国际平等”不提了，“男女平权”的主张取消了。就是说，同盟会公开时期仅有的一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棱角也被磨光了，妥协成了国民党的最大特色。表面上它声势烜(xuǎn 选)赫，成为参议院中第一大党；实际上，已蜕变为充满投机官僚的政客集团。这个党，名义上仍以孙中山为理事长，实权却在妥协派首领宋教仁手中。

狡猾的袁世凯，竭力利用国民党的妥协，来加强自身的统治地位。八、九月间，袁世凯邀请孙中山、黄兴相继赴京商谈国事。在北京，袁世凯对孙、黄极尽阿谀(yú 余)逢承之能事，给予盛大欢迎，尊称“革命元勋”，一个月内会见十三次。对孙中山的一切主张，无不赞同，甚至连“耕者有其田”，也答称“事所当然”。孙中山被袁世凯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妥协势力的包围下，竟认为：“欲治民国，非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于是，接受袁世凯“特授”的“筹画全国铁路全权”，准备在十年内建造二十万里铁路去了。孙中山忙于实业救国，宋教仁醉心责任内阁，以袁世凯为政治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却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为建立独裁统治而磨刀霍霍。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举行的第一次国会选举，国民党取得了压倒多数。宋教仁踌躇(chóu chū 愁厨)满志，准备以多数党资格组织责任内阁，将袁世凯放到空头元首的位置上去。他以未来的国务总理自居，遍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

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阐述政见，倾动一时。对此，袁世凯当然不能容忍。一场政治暗杀的阴谋，已经布置就绪。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日，正当宋教仁准备载誉进京时，在上海车站被凶手暗杀了。这个议会迷，竟然至死还期望袁世凯能“保障民权”、“确立宪法”。

宋教仁被刺，袁世凯故作惊讶，命令江苏都督程德全，“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穷究”的结果，真相大白，原来主使暗杀的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和他手下的特务头子、现任内阁总理赵秉钧。全国舆论哗然，袁世凯本想以“贼喊捉贼”的伎俩，掩人耳目。结果适得其反，更加暴露了他奸诈凶狠的丑恶嘴脸。袁世凯一面让赵秉钧自请辞职，一面派陆军总长段祺瑞代任总理，准备以武力对付国民党。

骇人听闻的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从日本赶回上海。血的教训擦亮了孙中山的眼睛，他认识到：“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决计兴兵倒袁，举行“二次革命”。但是，黄兴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法律倒袁”。国民党在南方掌实权的几个都督，除江西李烈钧外，广东胡汉民、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或忙于争夺地盘，或企图保存实力，对武力讨袁，都抱观望、犹豫态度。在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只想保住自己的一官半职，更主张“法律倒袁”。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南方各省都督同床异梦。结果，“法律倒袁”占了上风，不仅丧失了“二次革命”的有利政治形势，而且造成后来军事斗争的着着被动。

在这场斗争中，帝国主义完全站在袁世凯一边。为了支持袁世凯扼杀共和、实现“统一”，帝国主义源源不绝地输送贷款；从一九一二年一月开始的一年半时间里，平均每月贷款两笔。特别在一九一三年四月，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以

中国的盐税收入为抵押，给予袁世凯一笔二千五百万镑的“善后大借款”；与此同时，美国宣布承认袁世凯政府。贷款转化为军械，袁世凯将刺刀提上了议事日程。列宁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①“并与那个野心家、卖国贼、反动势力的朋友袁世凯联合起来扼杀‘落后’亚洲的共和制度”^②



袁世凯亲往德国使馆的丑态

①② 《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选集》第二卷，第四五〇页。

由于帝国主义撑腰，袁世凯杀气腾腾地叫嚣：“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袁世凯一面指使共和党与另外一些党派，联合组成以梁启超为魁首的进步党，与国民党对抗，一面先发制人，派兵大举南下。六月，借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曾通电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下令撤职。本来袁世凯是应受讨伐的乱党逆首，现在却将“乱党”、“逆首”的帽子，加在孙中山、黄兴头上，公然发动内战。

袁世凯弓张弦满，国民党被迫应战。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首先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成讨袁军，发布檄文，声讨袁贼“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biàn máo 变矛)约法”、“擅借巨款”，号召国民“亟(jí 吉)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接着，黄兴在南京宣布讨袁。随后，广东、安徽、上海、福建、湖南、重庆等地，也先后宣布独立，举兵讨袁。“二次革命”算是登上了日程。

讨袁各省中，只有江西、江苏实力较强，因此，袁世凯将用兵矛头，直指这两省。段芝贵、李纯率军进逼江西，冯国璋、张勋领兵攻打南京。庞杂涣散的国民党，这时已完全脱离人民，独立各省在军事上又缺乏统一指挥，袁世凯的兵力，却大大超过国民党，因此战局急剧恶化。不久，李烈钧从湖口败退，南昌失陷；黄兴在困难面前逃跑，南京失守。其他各省或受袁世凯收买而叛变，或见风转舵，取消独立。从七月十二日湖口举兵，到九月一日南京失守，前后不满两个月，讨袁军相继土崩瓦解，长江流域各省，尽入北洋军阀魔掌。孙中山、黄兴被通缉，再次逃亡日本。“二次革命”烟消云散。

事后，孙中山痛心指出：“二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

兵力之强，实因党人涣散所致”。而资产阶级政党所以涣散，根源又在于它脱离人民和自身的软弱性。国民党一心想同袁世凯“和平”地分享政权，袁世凯却以兵刃相见作为报偿。

“二次革命”被镇压后，袁世凯没有马上取消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这是因为，他需要利用国会作表决机器，选自己作正式大总统，为专制独裁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这个独夫民贼，盘算着先拉拢进步党，搞垮国民党，然后再转过身来，将进步党一脚踢开。九月，以进步党人熊希龄为总理的内阁受命登台，梁启超、张謇等入阁，这个自封的“第一流人材内阁”，要害部门全被袁的死党掌握，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等几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给进步党，恰好被袁世凯当作民主政治的破布，为他抹去屠刀上的血迹。

为了早日爬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指使党徒，在国会中提议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进步党极力捧场，国民党也随声附和。十月六日，国会进行选举，袁世凯作贼心虚，派出便衣军警、流氓等数千人，打着所谓“公民团”的旗号，将国会围个水泄不通，大叫：“非将公民所属望之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议员们忍饥挨饿，连续投票三次，最后勉强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封建军阀，都离不开帝国主义的支持。总统选举前夕，英、法、德、日、俄等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先后承认民国，为袁世凯就任总统，投下了“信任票”。但这些“信任票”，是袁世凯以出卖主权换来的。

辛亥革命后，围绕着所谓承认民国问题，帝国主义大肆讹诈，沙俄、英国更对蒙古、新疆和西藏，进行疯狂的侵略。

沙俄乘辛亥革命时清廷混乱之机，策动外蒙古于一九一一年十二月“独立”；第二年一月，又强占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八月，在内蒙古东部勾结反动王公叛乱。在西北，沙俄不断蚕食新疆，一九一二年夏，出兵占领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地区。沙俄原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这时公然在《俄中问题》一书中叫嚷：“最适当的俄、中国境，是从(新疆)汗腾格里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划一直线。”“而在这条直线以北的所有地方，都要变成俄国的直接领土，或者成为俄国的势力范围。”沙俄的扩张野心，跃然纸上。

英国则利用辛亥革命这个时机，以印度为基地，加紧猎取中国西藏，企图用承认中国对西藏的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一九一二年，英国派侵略军将早已叛国的达赖十三世护送回拉萨，组织傀儡政权，悍然破坏中国的统一。英国绘制“西藏地图”，将西藏、西康、青海全部，以及云南、四川、新疆、甘肃部分地区，划入西藏范围，擅自分为“外藏”与“内藏”，妄想使“外藏独立”，“内藏自治”，吞下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

窃国大盗袁世凯，继承清王朝对外投降卖国的反动衣钵(bō 波)，一上台就向外国主子讨好，表示要“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一九一三年五月，在与沙俄磋(cuō 搓)商中俄协定条款时，袁世凯以承认外蒙古“自治”，换来十月七日沙俄政府的“承认”。十一月，《中俄声明》签订后，外蒙古实际上沦为沙俄控制的殖民地。袁世凯还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壓力，同意在一九一三年十月，派代表出席破坏中国对西藏主权的所谓西姆拉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地方举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会外，英国代表麦克马洪，背着中国中

央政府的代表，在印度德里用秘密换文方式，和西藏地方代表划了一条规定中、印东段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将中国西藏东南部一块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擅自划归英属印度。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承认过，因此它们是非法的、根本无效的。

帝国主义对北洋军阀政府财政上的贷款，军火上的接济，特别是政治上的“承认”，使袁世凯贼胆益壮。一九一三年十月十日，他在就任正式大总统后，进一步向国会开刀。十一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并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没法开会；一九一四年一月，正式解散国会。在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进步党内阁起了帮凶的作用，解散国民党和解散国会的命令，都有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然而，走狗失去作用时，主子决不豢（huàn 患）养。二月，被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进步党内阁，终于也被丢弃一旁。五月，《临时约法》废除，袁记“约法”公布，大总统拥有实际上的皇帝权力。接着，袁世凯又抛出一个“修正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无限期连任，并有权推荐总统继承人。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还可使总统由袁家世袭下去。

通过解散国会、废除约法，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已被袁世凯破坏无遗。资产阶级革命派，虽然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过斗争，甚至发动“二次革命”，举兵对抗，但因自身的软弱性和脱离人民，稍一交锋，便迅速败下阵来。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独裁统治，被袁世凯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所谓“民国”，就只剩下了一块空招牌！

二 帝制丑剧与护国运动

袁世凯虽然做了终身总统,但并不满足,他想进一步当皇帝,传之万世;被推翻了的清王朝,则妄图恢复已经失去的“天堂”。因此,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有两股复辟势力在蠢动:一股是以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一股是以张勋、康有为为代表的,由王公贵族、遗老旧臣和封建余孽(niè 聂)组成的清王朝复辟势力。两股复辟势力,在捧袁世凯还是捧溥仪(即宣统)作皇帝这一点上虽有争斗,但尊孔复古,借助于孔丘的亡灵搞反革命复辟,则完全一致。

早在一九一二年,康有为就攻击辛亥革命是“暴民之祸”,咒骂民主共和是“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在他们看来,“中国不可一日无君”,为此,他们奔走呼号,竭力煽动尊孔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康有为把孔丘打扮成参天地、通鬼神的教主,宣扬“孔子之道,本于天”,公然提出:要“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上帝”。北京成立孔教会,各地广设支会。一九一三年,康有为发出祭天祀(sì 四)孔的反动倡议,叫嚷对天和圣(孔丘)必须行跪拜礼,狂呼:“中国民不拜天,又不拜孔子,留此膝何为乎?”被鲁迅先生“永定为复辟的祖师爷”的康有为,一面提倡尊孔,一面鼓吹复辟。他胡说“中国帝制行已数千年,不可骤变”,“共和政体不能行于中国”,只有清帝复辟,才能“弭乱息争”。

就在康有为等人制造复辟舆论的时候,袁世凯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一九一三年六月,他向全国发布了一个《通令尊

崇孔圣文》，狂热吹捧“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大骂辛亥革命后“波(pì 辟)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叫嚷要用“礼义廉耻之防”，来“遏横流”、“正人心”。一九一四年二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同年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率领百官，穿着古怪的祭服，举行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声势赫赫的祀孔盛典。各地文庙也由地方长官主祭。教育部更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一以孔子之言为旨归”。一时，“尊孔祀圣”，群魔乱舞，“读经存文”，逆流滚滚。



袁世凯(中)穿着古怪的祭服,举行祀孔典礼

这股尊孔逆流的形成，与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也是分不开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孔教会成立不久，美帝传教士李佳白之流，就到会演讲，公然喧

嚷“君主民主，不过名目之分，无关宏旨”，“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竭力鼓吹孔教与耶稣教“互相和合”、“互相辅助”，以防止“社会之骚动兴起”。俄国人盖沙令，辛亥革命后也在中国鼓吹“孔教”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狂叫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

伴随着尊孔复古的紧锣密鼓，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以孔丘作“敲门砖”，演了一出“皇帝梦”的复辟丑剧。

毛主席指出：“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①

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势必要从帝国主义老板那里寻求支持；帝国主义各国，为了进一步侵略和奴役中国，也愿意支持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派大儿子袁克定，去德国向德皇威廉二世求援时，德皇曾以密信覆袁，答应“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俄、法公使私下表示赞成帝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说什么：“君主立宪近于中国人理想”。美国驻华公使芮（ruì 锐）恩施，极力怂恿袁世凯称帝，“亟盼它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日本帝国主义则纵横捭阖（bǎi hé 百何），一面支持袁世凯称帝，借以换取更多的侵略权益，一面又与各派反袁势力密切联系，以便箝（qián 前）制袁世凯，并在必要时换马。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和美国趁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本

^①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七三二页。

更妄图一举独吞中国。九月，日本借口对德作战，派兵强占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宣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一九一五年一月，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在递交“二十一条”时，对袁世凯说：“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日本首相大隈重信还对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说：“改共和为帝制，是中国内政问题，袁大总统可以放心进行。”露骨地表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主要内容是：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

二、要求在东北的南半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期限，都延长到九十九年。

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

四、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

五、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

日本的野心，是要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把中国变为任人宰割的殖民地。经过几个月秘密谈判，除第五号“容日后协商”外，袁世凯于五月九日接受日本的全部侵略要求。一笔肮脏的卖国交易，就这样拍板成交。

一切反动派，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袁世凯有帝

国主义撑腰，复辟气焰更加嚣张。八月，袁世凯授意美国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一文，污蔑中国人“民智低下”，“绝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太急，“难望有良好之结果”，大肆叫嚷：“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否则外人之监督，恐将不免”。古德诺的文章出笼不久，袁世凯的爪牙便呼拥而上，以杨度为首的几个清末立宪党人和同盟会叛徒，组成筹安会，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经费，打着“学术团体”的幌子，公开为帝制丑剧摇旗呐喊。筹安会将古德诺的文章奉为经典，大量印发，交各省支部讨论。杨度还在《君宪救国论》这篇文章中，对袁世凯歌功颂德，散布中国没有君主就要亡国的谬论，拚命鼓吹恢复帝制。

九月一日，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参政院开会，各省官吏在筹安会鼓动下，纷纷派代表进京请愿，实行帝制。袁世凯急于称帝，又想盗用民意，于是装模作样地说：“变更国体”，应取决于“国民之公意”。一瞬间，全国竟冒出许多请愿团体，什么“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了如此“民意”，袁世凯嫡系官僚梁士诒(yí 仪)，又进一步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十月，参政院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是否改行君主政体。在袁世凯指挥下，各省当即选出“国民代表”，开始“国体投票”。十二月十一日，参政院汇总“全国民意”，结果：各省“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的，也是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更妙的是，各省“推戴书”的文字都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

袁世凯这个大独裁者，离开说假话、搞阴谋，就不能过日子。十二日，当参政院上书“劝进”时，他假惺惺地表示“谦让”，说什么：“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参政院当天再度“劝

进”，袁世凯立即受位，还恬不知耻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之所以当皇帝，完全是出于“爱国”！十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大封爵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一九一六年为“洪宪元年”，并定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极大典。

但是，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①

袁世凯的种种倒行逆施，驱使人民走上反对袁世凯黑暗统治的道路。爬上皇帝宝座，是袁世凯反革命权力的顶点，也是他临近死亡的深渊。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对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个政权一建立，就连续颁布《暂行新刑律》，以及《戒严法》《治安警察法》《出版法》《报纸条例》等，不准人民藏有武器，禁止罢工及一切革命活动，剥夺《临时约法》纸面上规定的人民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特务组织遍布各地，全国一片白色恐怖。在农村，大量土地被军阀兼并。仅袁世凯一家，就在河南彰德霸占了全县三分之一的土地。各种苛捐杂税，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据统计：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六年，印花税增加八倍，烟税增加三倍，统捐统税竟增加了六十倍。此外，还有大量的赔款和外债，压在人民头上。

有压迫，有剥削，就有反抗，有斗争。从袁世凯政权建立之日起，各地农民的反抗斗争就此伏彼起。其中，规模最大的

①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六页。

是白朗起义。一九一二年，白朗起义在河南中部爆发。第二年春，提出“打富济贫”、“建立完美之政府”的口号，一举攻克禹县。此后，转战河南、湖北、安徽、甘肃、陕西五省，队伍由几百人扩展为几万人，并于一九一四年改称“公民讨袁军”，以“逐走袁世凯”为战斗目标。袁世凯惊慌失措，派二十万大军进行“围剿”，甚至雇帝国主义分子驾驶飞机，跟踪追击。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虽然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失败了，但狠狠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加速了这个军阀政权的崩溃。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传出后，人民愤怒地将“五·九”定为“国耻纪念日”，掀起大规模的反日爱国运动。各地日资企业工人，不顾封建军阀的镇压，奋起罢工。北京、汉口等地人民，上街游行示威。斗争从通都大邑，发展到穷乡僻壤，海外华侨也纷纷谴责卖国政府。中国人民



不畏军阀大刀，中国人民誓死反对“二十一条”

的英勇斗争，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使得“二十一条”从一开始就未能生效。

正当反袁怒火在全国越烧越旺之时，袁世凯却火上加油，悍然称帝。各地人民“极力主张保持共和”，痛斥袁世凯称帝为“叛逆”，提出要斩筹安会诸人和梁士诒的头，“悬之国门，以谢天下”。陕西哥老会提出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口号，发表讨袁檄文，集结十八股有快枪马炮的队伍，转战渭河流域。河南人民继白朗之后，又一次起兵讨袁。山东各县人民在革命党配合下，纷纷暴动。上海、湖南等地工人举行罢工，投入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各省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对袁世凯称帝也“愤激异常”。

在全国反袁怒潮蓬勃高涨的基础上，“护国运动”应运而生。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就是袁皇帝“登极”前一个星期，云南省宣布独立，蔡锷(è 厄)组成“护国军”，点燃了护国战争的火把。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一九一四年七月，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号召党员“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这个党，虽然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先后在江苏、浙江等地组织暴动，并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在上海发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上海制造局。但因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脱离人民和重复单纯军事冒险的错误，一再归于失败。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批国民党人，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另组“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活动，有些人参加了“护国运动”，但在群众中影响极小。因此，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并没能取得全国反袁斗争的领导权。

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进步党，是袁世凯的帮凶和附

庸。投机政客梁启超之流，本来希望袁世凯能“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待到条件成熟，再“复返于帝政”。这时，看到全国反袁斗争风起云涌，袁的败亡已不可免，决定抢先一步发动倒袁，将护国运动的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以便日后夺取政权。蔡锷是梁启超的学生，辛亥革命时期曾任云南都督，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在梁启超秘密策划下，蔡锷潜回云南，联合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反袁的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组成“护国军”，宣布独立，并于一九一六年一月，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讨伐袁世凯。

反袁斗争的浩大声势，迫使帝国主义重新考虑对袁世凯称帝的态度。

袁世凯攀上儿皇帝宝座时，曾对帝国主义老板大言不惭地吹嘘：如人民反抗，“中国政府自信无论何时，均有完全对付之力。”云南独立后，袁世凯向外国公使保证：“该省兵力有限，六个月内当可敕(mi米)平。”然而，时局的发展，和袁的预料完全相反。一月二十七日，贵州宣布独立。三月十五日，广西宣布独立。三省联成一气，加上广东军阀龙济光，于五月合组“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为抚军长，与袁世凯政权对抗。袁世凯色厉内荏，一面派北洋军在各地加紧“戡乱”，一面向后台老板求援，想以出卖更多的国家主权，乞取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但是，忙于大战的欧洲帝国主义，救不了袁世凯的命。狡猾的日本帝国主义，眼见袁世凯政权朝不保夕，决定将他一脚踢开，另在反袁势力和北洋军阀中，扶植新的统治工具。“太上皇”脸色变了，走狗立刻自寻退路。二月间，袁世凯宣布缓办帝制，撤消“登极”大典筹备处。

这时，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

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原来都以总统继承人自居，希望有朝一日能接袁世凯的班。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再唯袁之命是从，不愿为帝制卖力。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关节，并和江西将军李纯等，联名要袁世凯取消帝制、交出权力。

“无可奈何花落去”。袁世凯陷入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既失去了主子的信任，又失去了亲信的支持，惴惴自危，不得不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被迫取消帝制，总共当了八十二天短命皇帝。

帝制是取消了，但袁世凯死皮赖脸，仍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人民当然不答应，一致要把袁世凯赶下台。“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全国各地发出通电，要求审判袁世凯“背叛共和，谋窃帝制”的滔天罪行。袁世凯的心腹，见大势已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相继宣布独立。五月底，连袁世凯的忠实鹰犬四川将军陈宦(yí 夷)、湖南将军汤芑(xiāng 乡)铭，也通电宣布独立。袁世凯众叛亲离，形影相吊，真正成了一个“孤家寡人”。他手里拿着这份电文，“汗流浹(jiā 加)背，目眩头晕”，从此一病不起。

毛主席说：“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①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凯这个篡权窃国的大阴谋家、大卖国贼、北洋军阀总头目，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进了棺材，结束了自己丑恶的一生。

^① 《新民主主义的宪政》，《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九五页。

三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hé盒)”

袁世凯垮台后,帝国主义失去了共同的走狗,于是各自寻找和扶植一部分军阀,充当自己的代理人;北洋军阀以及地方军阀,则分别投靠各个帝国主义,自成派系,拥兵割据。“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①促使中国陷入军阀割据的混战局面。

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个派系。以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为首的皖系,势力最大,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不仅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而且掌握了安徽、陕西、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直隶河间人)为首的直系,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们盘踞江苏、江西、湖北、直隶等省,与皖系军阀相对抗。

以张作霖(奉天海城人)为首的奉系军阀,利用护国运动,驱逐袁世凯在奉天(今辽宁)的势力,接着又逐渐控制吉林、黑龙江,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割据东北,成为介于直、皖两系之间举足轻重的势力。

此外,还有以阎锡山为头子的山西军阀集团,割据徐州一带的张勋“辫子军”。

西南地区的军阀,主要是滇、桂两系。以唐继尧为头子的滇系军阀,控制了云南、贵州,并向四川扩充地盘;以陆荣廷为头子的桂系军阀,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等省。为了维护自己的割据地位,滇、桂两系都投靠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较接

^①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九页。

近，而与皖系军阀对峙。

当时，全国除南方六省外，几乎都处在北洋军阀控制之下。大大小小的军阀，或割据一省称“督军”，或割据一省的某一地区称“镇守使”，凭借自己拥有的武力，争夺地盘，残民祸国。各派军阀与城乡买办豪绅阶级狼狈为奸，搜括民脂民膏。如段祺瑞，除占有大量土地外，又是龙烟煤矿公司和八个机器煤矿的大股东；冯国璋在苏北与张謇合办盐垦公司，占地七十五万亩，在直隶另有金矿三处。这些财富和土地，都是从人民头上刮来的，每个铜板、每寸土地，都印有劳动人民的血汗。

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南北暂时在表面上又归于“统一”。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在日本帝国主义卵翼下，段祺瑞独揽政府大权，视总统黎元洪为签字、盖章的傀儡，还在国会中拉拢研究系政客（即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代表的进步党人组成的“宪法研究会”议员），不断向黎元洪施加压力。黎元洪和非皖系军阀，则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拉拢商榷（què 却）系政客（即以张继、吴景濂（lián 连）为代表的旧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宪政商榷会”），对抗段祺瑞。这样，就形成了所谓“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毛主席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①“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②“府院之争”，形式上是中国内部

①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九四页。

②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七页。

两个政客集团、两派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际上却反映着美、英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个斗争，在中国要不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上，爆发出来。

一九一七年二月，德国实行“无限制潜艇战”，击沉了几艘美国商船。美国宣布对德绝交，要求中国和它采取一致行动。三月，中国也宣布对德绝交。当时，日、美两国都想操纵中国参战，以加强对中国的控制。日本立即派人与段祺瑞秘密接洽。段祺瑞打算借机取得日本贷款，进一步扩充皖系势力，因而积极主张参战。美国见势不妙，便改变主意，唆(suō 梭)使副总统冯国璋拒绝参战。四月，段祺瑞在北京召集各省督军开会，组成以皖系军阀为主干的“督军团”，胁迫国会和黎元洪同意参战；黎元洪则利用国会反对段祺瑞，拒绝参战。“府院之争”，闹得不可开交。

五月，众议院讨论参战案。段祺瑞重演袁世凯故伎，指使军警两三千人，凑成所谓“公民请愿团”、“五族请愿团”，包围议院，殴辱议员，威胁他们立即通过参战案。议员们感到愤慨，决定暂缓讨论。段祺瑞恼羞成怒，唆使“督军团”呈请黎元洪解散国会。恰在这时，段祺瑞向日本借款一亿日元的卖国丑行被揭露，全国人民群起反对。黎元洪感到既有舆论支持，又有直系军阀赞助，下令免段祺瑞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职。

段祺瑞不甘心放弃中央政权，授意皖系、奉系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并于六月初在天津设“独立各省总参谋处”，剑拔弩张，准备向北京进军。黎元洪一筹莫展，求救于自成一派的安徽督军张勋，要他领“辫子军”来北京调停。梁启超向段祺瑞献计，要他先利用张勋赶走黎元洪，解散国会，许其复辟；然后借“反复辟”名义，打倒张勋，再握大权。这样，张勋和段祺

瑞，便各怀鬼胎，演了一幕“清帝复辟”和“再造民国”的双簧戏。

被辛亥革命推翻了的清朝皇室，在北京故宫还保存着一个小朝廷。就象苍蝇叮着臭肉一般，在这个小朝廷周围，喻集着以张勋为头目的一群复辟丑类。张勋是清王朝的孤臣孽子，辛亥革命前夜被任命为江南提督，不久升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清帝垮台后，张勋蓄意推翻共和，他和他所统带的“定武军”，脑后顽固地拖着一条辫子，以示效忠清廷。人们因此称这支怪模怪样的军队为“辫子军”，叫这个复辟头目为“辫帅”。

一九一七年六月七日，张勋以十三省“盟主”身份，利用“调停”名义，带领五千名“辫子军”，自徐州北上。到天津时，通电威胁黎元洪解散国会。十四日到达北京后，又逼黎元洪去职。这时，复辟势力纷纷麇集北京，康有为也带着为复辟起草的十几道伪诏，从上海匆匆赶到北京。被复辟丑类尊为“武圣”的张勋，和“文圣”康有为一唱一和，经过一番紧张的策划，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拥十二岁的清帝溥仪在紫禁城“登极”，演了民国以来第二场帝制复辟的丑剧。当天，张勋宣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各省督军改为巡抚，一切恢复清末旧制。成群的遗老遗少，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北京戏班子和估衣铺里的清朝袍褂，被还了魂的政治僵尸们抢购一空；在做戏装道具的商店里，遗老们纷纷央求用马尾给他们做假发辫。

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群众的无比愤怒，“全国民情，莫不反对复辟”。段祺瑞眼见利用张勋驱逐黎元洪、解散国会的诡计，已经得逞，舆论又一致反对复辟，便立即在日本支持下，组成“讨逆军”，自任总司令。七月五日誓师马厂，

带兵五万余人，向北京进军，讨伐张勋。“辫子军”一触即溃，狼奔豕突。十二日，张勋由两个德国人保护，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其他丑类纷纷作鸟兽散。复辟丑剧仅上演十二天，就在万人唾骂声中，彻底溃灭。

段祺瑞轰走张勋后，以“再造民国”的元勋自居，又一次充任国务总理。黎元洪辞职，冯国璋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大权在握，更加为所欲为，废弃《临时约法》，抛掉旧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建专制独裁的军阀统治。八月，段祺瑞政府在日本怂恿下，正式对德、奥宣战。实际上，段祺瑞对外是“宣而不战”，对内却“战而不宣”。他是借“参战”为名，扩充皖系实力，以达到“屠戮异己”、“武力统一”的罪恶目的。从一九一六至一九一八年，段祺瑞派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人，向日本帝国主义大借外债。仅西原龟三经手的对华借款，就多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为了取得借款，把军火搞到手，段祺瑞无所不用其极，从铁路、轮船、工厂、矿山、银行、各种税收，乃至一个城市、一个商场的收入，都被他拿来作为借款的担保或抵押，简直到了“当尽押绝”的地步。甚至一九一八年日本提出霸占山东各项权利的要求，段祺瑞政府也无耻地表示“欣然同意”。这一切，用卖国贼段祺瑞自己的话来说，就叫做“不必枝枝节节，遇事麻烦”。致使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也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上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全国人民强烈反对段祺瑞破坏民主、出卖主权的罪恶行径。孙中山也明确认识到：北洋军阀段祺瑞之流的统治，是“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他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立场，抱着恢复约法和国会的目的，举起了“护法”旗

帜，强调与北洋政权的斗争，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斗”。西南军阀政客想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借“护法”之名，对抗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因此表示愿意和孙中山“合作”。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到达广州。海军也发表“拥护约法，恢复国会”的宣言，起航南下。八月，在广州召开由南下议员组成的非常国会。九月，组织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建立与段祺瑞对峙的南方政权。随即出师北伐，进行护法战争。

护法战争打响后不久，南北双方内部都出现了矛盾和分裂。十月，段祺瑞对西南各省用兵，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陆荣廷的桂系军队，也开进湖南对抗。段祺瑞阴谋消耗直系和桂系双方兵力，坐收渔人之利。鉴于此，冯国璋提出“和平统一”的口号，指示进入湖南的直系军队，消极息战，拆皖系“武力统一”的台。十一月，直系军队在湖南自动退兵，发表宣言，要求停战。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直系督军，又联合通电，主张与护法军政府和平解决。

盘踞南方的滇、桂军阀和反动政客，打起“护法”旗号，原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于今则和直系军阀互相勾结，共同排斥坚持护法的孙中山。一九一八年五月，他们操纵非常国会，改组护法军政府，废大元帅制为总裁合议制，推孙中山、陆荣廷、唐继尧等七人为总裁；后又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而由陆荣廷把持实权。孙中山孑然一身，于五月二十日愤而离开广州，转往上海。从此，护法军政府，变成滇、桂军阀与政学系（从商榷系议员中分化出来的右翼政客）共同组成的亲英、美政权，它与直系军阀同流合污，护法运动仅有的一点进步性，也丧失殆尽。

段祺瑞为了阻止直系军阀与西南各省合作，先是联络奉

系军阀张作霖，胁迫冯国璋同意对西南作战，让曹錕(kūn 昆)、吴佩孚打头阵，由皖系军阀吃现成。但“武力统一”的如意算盘，始终没能打成。接着，就收买大批政客，组成“安福系”，操纵国会选举，在一九一八年九月四日，选出老官僚徐世昌为大总统，将直系头目冯国璋逐出中央。此后，直、皖两系军阀，以及直、奉之间，粤、桂之间，激烈火并，在各自的帝国主义后台老板支持下，混战不息。

民国以来各派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反映了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争夺。毛主席指出：“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政治代表孙中山，在护法战争失败后，心情十分沉痛。为了反对帝制复辟，反对军阀的罪恶统治，孙中山曾经发动“二次革命”，领导护法运动，但每次都归于失败。在护法军政府中，孙中山“艰难支撑一年之久”，结果，“孑然无助，徒为亲厚所痛，仇雠所快，终至于解职以去”。错误和挫折使孙中山认识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不管是西南军阀或者北洋军阀，都是国家的“大患”，革命的敌人。

孙中山把民国元年确立的《临时约法》和国会，看成是民主共和国的象征。但是，列宁早就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②几年来，孙中山

①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七—四八页。

② 《杜马的解散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列宁全集》第一卷，第九八页。

百折不挠，在坚持民主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斗争中，败而不馁、踏(b6勃)而复起。但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提不出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组织不起又能团结群众又能进行战斗的革命政党，也找不到一条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正确道路。

在帝国主义时代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单纯的农民革命和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这个重担，已经历史地落在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①

四 新时代的曙光

辛亥革命以后，民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群众性反帝爱国斗争以及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使中国出现了一个新的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对中国的经济压迫暂时放松（以一九一三年的指数为一〇〇，英国对华商品输出在一九一八年降为五一·五，法国降为二九·六，德国货完全停止进口），在客观上又为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间隙。

由于这些因素，从一九一二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多达四百七十余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这八

^①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八页。

年间新增的资本,至少达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过去五十年投资的总和。以纺织业为例,纱锭数由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万枚,增加到一九二二年的一百五十万枚;面粉厂则由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余家,增加到一九一九年的一百二十余家,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地。

但是,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和美国也乘机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日、美双方,又争夺,又勾结。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美国国务卿蓝辛与日本全权大使石井,订立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有“特殊利益”,日本再次承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豺狼之间暂时取得了妥协。从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九年,日本在中国的企业投资,由三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加到八亿八千多万日元。同时期,美国在中国的企业,也由一百三十余家,增加到三百余家。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日、美在华企业的扩张,作为它们的对立物——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迅速地壮大起来。产业工人人数,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的二百万人。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一千二百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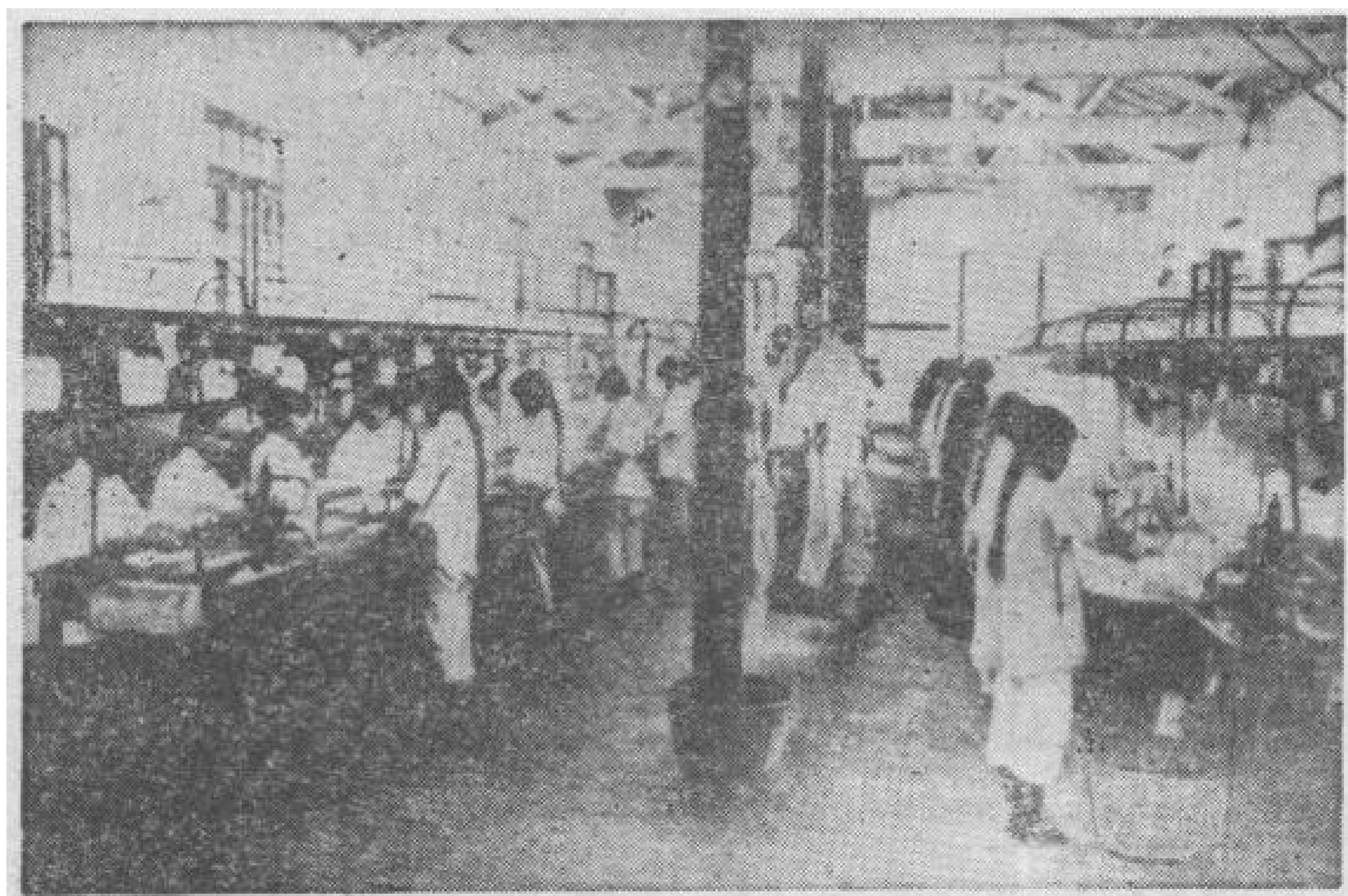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①中国无产阶级,除了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富于组织性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以外,还由于他们集中,经济地位低下,所以特别能战斗。

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就地区来说,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

^①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八页。

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广州、香港等十几个大城市。就行业来说，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造船、航运等部门的大中型企业。以上海为例，集中了三、四十万产业工人，其中在五百人以上的工厂作工的，又占总数百分之五十七。这种高度集中的情况，十分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战斗。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利益。劳动时间一般长达十二小时，有的甚至长达十五、六小时。一九一六年六月，《妇女时报》在一篇上海丝厂女工生活的调查中说：“日未出而作，日既没而息，终日劳动于巨厂之炉火机釜(ǒu 辅)之间，不许其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丝厂女工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中国工人的工资又特别低，每天只有两角到四角，即使如此菲薄的工资，还要受到中外资本家和军阀政府的克扣，还要被不断上涨的



上海怡和丝厂工人劳动状况

物价吞吃。工矿企业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事故层出不穷。例如，日本经营的抚顺煤矿，一九一三至一九一七年间，发生事故一万六千八百多次，平均每天九次；一九一七年一月十一日的一次大爆炸，竟有九百多名工人惨死。中外资本家就是这样只顾拚命剥削，不管工人死活，用无数工人的生命、鲜血，填满自己贪得无厌的欲壑。

中国工人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帝国主义在租界设置一整套暴力机构，工人一举手、一投足，就会触到法网。在厂里，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资本家马上就密报巡捕房，前来捉拿。北洋军阀颁布的《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干脆将“同盟罢工”，定为骚扰“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的犯罪行为，公开宣布要“采用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杀人如麻的封建军阀，惯于直接用屠刀，来镇压工人的一切反抗。



军阀野蛮地屠杀和镇压人民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①

压迫愈大，反抗愈大。正因为中国工人受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所以在革命斗争中，他们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和彻底。

据统计：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九年五月，全国共发生罢工斗争一〇八次，相当于一八七〇到一九一一年罢工次数的总和。其中，一九一六年为十七次，一九一七年为二十三次，一九一八年为三十次，一九一九年头五个月就有十九次。罢工的规模，参加的人数，工人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斗争的水平，比以往都大有提高。

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除进行自发的经济斗争，并取得局部胜利外，更将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一九一五年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最坚决的一支力量。上海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不顾失业威胁，首先举行罢工，“纷纷议决抵制洋货”，“遍发传单，不准与日商作工”；全国各地日资企业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抵制日货运动，也以工人实行得最坚决最彻底。一九一六年十月，法国侵略者为扩大天津租界，强占老西开地方，军阀政府奴颜婢膝地承认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天津各界人民则奋起反抗。十一月十四日，在天津法租界作工的中国工人，全体举行罢工，“法租界内之电灯全部熄灭，忽然化为黑暗世界”，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〇七页。

法商企业“也不得已而至于休业”。罢工工人组织“工团”，成立“工团事务所”，统一指挥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粉碎了法帝国主义的分化破坏活动。这次斗争，坚持了五、六个月，迫使法帝国主义对老西开不得不由阴谋霸占改为“中、法共管”。

毛主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就开始以自觉的姿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而斗争。”^①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伟大战斗力量，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斗争的高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的阶级基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则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飞跃的舆论准备。

辛亥革命失败后，“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②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继续为寻找救国救民真理而摸索前进。适应新政治和新经济的发展，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应时而起。

新文化运动开始于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的创办。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③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民主”，是指法兰西

① 《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九八二页。

②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五九页。

③ 《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六六〇页。



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科学”，是指资产阶级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激进民主主义者认为，辛亥革命并没有在中国建立起真正的民主政治，人民仍然“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而且士、农、工、商、医，都“不知科学”。因此，他们反对专制，提倡民主，反对迷信，提倡科学，要求进行一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

在这场新旧思潮大激战中，激进民主主义者举起“打倒孔家店”的大旗，将斗争矛头直指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学，猛

攻封建文化的顽固堡垒——孔家店。

李大钊(一八八八——一九二七年),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早年留学日本。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果实后,李大钊在日本秘密进行反袁活动。一九一五年,极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二十一条”,号召人民奋起自救。袁世凯称帝时,李大钊奔走呼号,猛烈抨击。一九一六年回国,任北京《晨报》主任编辑,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

一九一七年一月起,李大钊先后发表《孔子与宪法》《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等文,激烈反对尊孔。针对当时宪法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李大钊尖锐地指出:孔丘是“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荒陵古墓中之宪法”;痛斥孔丘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其宪法将为“专制之宪法”、“专制复活之先声”。他认为:伦理道德观念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为了推倒历代君主雕塑的孔丘这尊“偶像”,“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

当时,袁世凯称帝,张勋、康有为闹复辟,其他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都是请出孔丘的亡灵,打着孔家店的旗号进行的。因此,批判两千多年前的孔丘,打倒孔家店,也就是向现实的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发动总攻击。在这个总攻击中,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是最伟大、最英勇的旗手。

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年),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一九〇二年留学日本学医,后认为文艺最能改变国民精神,改治文学。辛亥革命后,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极为痛恨。

一九一八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狂人日记》，是“五四”反封建文化革命的一声春雷。它宣判了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礼教的统治，是一部吃人的历史，对封建旧道德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鞭挞。鲁迅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愤怒地撕下封建统治者和圣人之徒的伪善面具，告诉人们，这伙满嘴“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实际上是一批“唇边还抹着人油”，“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的魔鬼。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封建统治和封建道德所进行的最深刻的批判。

针对嚣张一时的尊孔逆流，激进民主主义者，从政治上揭露了尊孔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联系，尖锐地指出：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鲁迅不仅以锋利的笔触，剖露那些专从皇帝脚底下学本领的“经验家”和“新人物”，是把民主共和的理想，“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规”；而且猛烈抨击了“保存国粹”的复古倒退叫嚣，指出必须把“国粹”当瘤和疮一样割掉，用进步的知识、道德、品格、思想代替它。

与此同时，《新青年》又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反对那种以雕琢晦涩的文言文，来宣扬陈腐思想的旧文学，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鲜思想的新文学。鲁迅当时发表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以及其他一系列杂文，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完美地结合，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①的作用，树立了新文学的光辉典

范。

鲁迅勇猛地战斗，痛斥那些复辟势力“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它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冲击，使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圣先师”孔丘威风扫地。它对启发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作用，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思想解放潮流。新文化运动，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五四”前新文化运动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前，提不出实际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方案。他们手里的思想武器，是从帝国主义的老窝，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找来的；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又只限于知识分子，而没有工人、农民。因此，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的新文化运动，不能不带有很大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毛主席曾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②因而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也就缺乏正确的评价。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八一八页。

② 《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八八——七八九页。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① 鲁迅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赞颂俄国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夺取了革命胜利。从十月革命的“刀光火色”中，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热情洋溢地宣传：“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在中国，正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亿万工农，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三六〇页。

②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一五页。

附录

大事年表*

-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 葡萄牙霸占中国澳门。
- 1624年(明天启四年) 荷兰侵占中国台湾。
- 1637年(明崇祯十年) 英船初抵广东,强求通商,炮击虎门。
- 1643年 沙俄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
- 1662年(清康熙元年) 郑成功驱逐荷兰侵略者,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 1685年 清政府开海禁,设江、浙、闽、粤四海关。
- 1689年9月7日 中、俄订立《尼布楚条约》,明确规定中、俄东段边界。
- 1729年(雍正七年) 清政府开始禁止鸦片。
-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 清政府封禁江、浙、闽三海关,限广州一口对外通商。
- 1773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独占专卖和制造鸦片的特权。
- 1796年(清嘉庆元年) 清政府下令禁止吸食和输入鸦片。
- 1805年 美国从土耳其、波斯向中国贩运鸦片。
- 1807年 英国牧师马礼逊到广州传教,基督教初入中国。
- 1838年(清道光十八年) 本年度英、美输入中国鸦片四万零二百箱(每箱一百二十斤)。
- 6月 清朝官员黄爵滋上奏,请以死刑严禁吸食鸦片。
- 10月 湖广总督林则徐,奏请严禁吸食鸦片以杜弊源。

* 本年表内中国纪年,仅将每个朝代第一次出现的年号和纪年列出,其余可类推,就不再列出。如1662年,注明是清康熙元年,1685年可推算出是清康熙二十四年。

- 12月 广州万余群众示威,抗议英、美贩卖鸦片,侵犯中国主权。
- 1839年3月10日 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严令禁烟。
- 6月3日 虎门销烟。
- 10月1日 英国内阁会议决定发动侵华战争。
- 1840年6月下旬 英军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 7月5日 英军侵占浙江定海。
- 8月 英国舰队驶抵天津大沽口,提出侵略要求。
- 10月 林则徐、邓廷桢被革职。
- 1841年1月25日 琦善和义律秘密签订《穿鼻草约》。
- 2月26日 英军攻占虎门炮台,关天培殉难。
- 5月30—31日 三元里人民严惩英国侵略军。
- 8月 英国新任全权公使璞鼎查,率侵略军到达中国。
- 1842年春 浙江镇海、宁波人民组织黑水党,多次奇袭英军。
- 6月 英军攻陷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牺牲。
- 8月29日 清政府被迫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
- 12月 广州人民焚烧英、荷商馆,严惩侵略者。
- 1843年6月 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砸毁孔丘牌位。
- 11月17日 上海开埠。
- 1844年7月3日 中、美《望厦条约》签订。
- 10月24日 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 1845年11月29日 英领事迫订《上海租地章程》,是为“租界”开端。
- 是年 洪秀全作《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
- 1846年1月 广州人民取得反入城斗争第一次胜利。
- 是年 洪秀全作《原道觉世训》。
- 1847年4月 广州人民武装示威,取得反入城斗争第二次胜利。
- 9月 沙俄任命穆拉维约夫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将侵略魔爪伸进中国黑龙江地区。
- 1848年1月17日 冯云山被捕。不久,洪秀全赴广州营救。

4月6日 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号令拜上帝会会众。

1849年4月 广州社学群众十万人,守卫珠江两岸,取得反入城斗争第三次胜利。

19世纪40年代 中国无产阶级诞生。

1850年7月 洪秀全发布“团营”令,准备武装起义。

8月 沙俄强占中国黑龙江口庙街,改名“尼古拉也夫斯克”。

1851年(太平天国辛开元年,清咸丰元年)

1月11日 拜上帝会在金田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3月23日 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

9月 太平军攻克永安州。

12月17日 洪秀全在永安封王。

1852年6月 太平军克全州,南王冯云山牺牲。

9月 太平军攻长沙,西王萧朝贵战死。

1853年1月 太平军克武昌。

2月 太平军顺江东下。

咸丰帝命令有关各省组织反革命团练武装。曾国藩在湖南筹办湘军。

3月19日 太平军占领南京,改名天京。

是年 颁布《天朝田亩制度》。

4月 英使文翰“访问”天京。其后,法、美公使接踵而至。太平天国严拒外国的侵略要求。

5月 太平天国北伐军自扬州出发,西征军自天京出发。

福建小刀会起义,占领漳州、同安、厦门。

6月14日 马克思发表论述太平天国革命的著名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9月7日 上海小刀会起义。

10月底 太平天国北伐军攻占静海,逼近天津。

是年 太平天国宣布孔孟之书为“妖书”,严禁买卖藏读。

1854年2月 曾国藩打起尊孔黑旗,发布《讨粤匪檄》,率湘军自衡州

出犯。

4月 太平军大败湘军于靖港。

1855年2月 太平军大败湘军于九江。

上海小刀会起义被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刘丽川战死。

3月 太平天国北伐军主将林凤祥就义。

6月 李开芳牺牲,太平军北伐结束。

7月 各路捻军于安徽亳州雒河集会盟,推张洛行为盟主。

1856年4月 太平军第一次破清军江北大营。

6月 太平军第一次破清军江南大营。

9月2日 韦昌辉在天京发动反革命暴乱,杨秀清被杀,两万多名太平军将士被害。

10月23日 英国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11月 洪秀全诛韦昌辉。

石达开回京辅政。

12月15日 广州人民火烧英国侵略军盘踞的十三行洋楼。

1857年6月 石达开离京出走,带走十多万太平军。

12月29日 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是年 沙俄乘英法联军侵华之机,在中国东北边境集结军队两万多名。

1858年5月19日 湘军攻陷九江,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等战死。

5月20日 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

5月28日 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璦琿条约》,割去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

6月 清政府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

9月 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北大营。

11月15日 三河大捷,陈玉成率太平军歼湘军精锐六千余人,斩湘军悍将李续宾。

是年 沙俄霸占中国乌苏里江口伯力,改名“哈巴罗夫斯克”。

香港工人罢工,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

1859年4月 洪仁玕到达天京。下月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本年,提出《资政新篇》。

6月25日 大沽激战,英舰败逃上海。

6月 陈玉成晋封为太平天国英王。

1860年5月 太平军再破清军江南大营,解天京之围。

6月2日 美国军事流氓华尔,在上海组成“洋枪队”。

6月26日 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国对华宣战。

6月 沙俄强占中国重要港口海参崴,改名“符拉迪沃斯托克”。

8月 太平军第一次进军上海。

10月 英法联军劫掠并火烧北京圆明园。

北京西郊谢庄人民武装自卫,打死侵略军一百余人。

10月24—25日 清政府被迫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

11月14日 沙俄趁火打劫,迫订《北京条约》,夺取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中国领土,约四十万平方公里。

1861年1月 天津开埠。清政府设总理衙门,经办“洋务”。天津、上海分设北洋、南洋通商大臣。

3月25日 外国公使开始驻节北京。

6月30日 英人赫德代办总税务司,把持中国海关。

9月5日 湘军攻陷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来等一万余名殉国。

11月2日 清咸丰帝于8月病死热河。西太后本日发动宫廷政变(史称“祺祥政变”),同治帝即位,西太后垂帘听政。

是年 曾国藩办安庆内军械所,洋务运动开场。

贵州各地发生反洋教斗争。

1862年(清同治元年)

1月 太平军第二次进军上海。下月,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

3月 湖南湘潭、衡阳、清泉,江西南昌、进贤等地,爆发反洋教斗争。

4月8日 李鸿章率淮军自安庆乘英轮抵上海,勾结英、法侵略军,共同绞杀太平天国革命。

5月 太平军第三次进军上海。

6月4日 英王陈玉成在河南延津就义。

7月 清政府设京师同文馆。

9月22日 太平军在浙江慈溪击毙华尔。

1863年5月 石达开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向清军乞降,全军覆没。6月,在成都被杀。

9月21日 上海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

12月4日 慕王谭绍光被叛徒刺杀,苏州失守。

1864年6月1日 天王洪秀全病逝。

7月19日 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

7月22日 李秀成被俘后屈膝求降,8月7日在南京被杀。

10月7日 沙俄迫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吞并中国西部领土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

10月9日 洪仁玕在江西广昌被俘,11月23日在南昌殉国。

11月 捻军和西北太平军结合,推遵王赖文光为领袖。

是年 新疆回族、维吾尔族人民,在天山南北起兵反清。

1865年5月18日 赖文光率新捻军在山东曹州高楼寨设伏,毙僧格林沁亲王,歼其全军。

9月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

是年 中亚浩罕汗国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俄支持下侵入新疆。

1866年6月 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局。

10月 新捻军分为东、西两支,由赖文光、张宗禹率领,坚持战斗。

1867年6月13日 美国派军舰侵入中国台湾,被台湾人民击退。

1868年1月 东捻军败,赖文光在扬州就义。

8月 张宗禹率领的西捻军,败于山东茌平。

- 1869年1月 四川酉阳爆发反洋教斗争。
- 1870年6月 天津爆发大规模反洋教斗争。史称“天津教案”。
- 1871年7月4日 沙俄派兵侵占新疆伊犁。
- 1872年8月 容闳带领第一批学生赴美留学。
- 是年 广东南海侨商陈启源创办继昌隆缫丝厂。
- 李鸿章奏请试办上海轮船招商局。
- 1874年5月8日 日军在美国支持下从琅峤登陆，妄图侵占台湾，被高山族人民击败。
- 1875年(清光绪元年)
- 5月3日 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 1876年9月13日 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
- 1877年 中国军队收复南疆八城，阿古柏败逃自杀。
- 1879年4月4日 日本正式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 7月 上海英商耶松船厂工人罢工。
- 9月 上海英商祥生船厂工人罢工。
- 1881年2月24日 清政府被迫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沙俄通过该约及以后几个勘界议定书，又侵占中国领土七万多平方公里。
- 1882年8月 开平煤矿工人罢工。
- 1883年12月11日 中法战争爆发。
- 1884年5月11日 中、法《简明条约》订立，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 6月23日 法军制造谅山事变，重新挑起侵略战争。
- 8月5日 法舰炮击基隆，中法战争开始在越南和中国两个战场进行。
- 8月23日 法国舰队突然袭击福建水师，轰击马尾船厂，扩大侵略战争。
- 8月26日 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
- 9—10月 香港工人举行反帝大罢工。广东、福建、浙江、贵州、云南等地人民，焚毁天主教堂，驱逐法国教士。旅美、旅日侨胞，

捐款支援抗法斗争。

1885年3月下旬 冯子材率领中国军队,与越南义军并肩作战,大败法国侵略军。刘永福黑旗军在临洮打败法军。法国茹费理内阁倒台。

6月9日 中、法《越南条约》签订,中法战争结束。

1887年 外国传教士在上海成立同文学会(1893年改名广学会),加紧文化侵略活动。

1888年12月 清政府建立北洋舰队。

1889年3月4日 西太后“归政”,光绪帝载湉“亲政”。

1890年3月17日 英国逼清政府订立《藏印条约》,1893年续订《藏印条款》,将侵略魔爪伸向中国西藏。

8月 四川大足县余栋臣起义。

9月5日 江南制造局两千多名工人举行罢工。

是年 张之洞在湖北汉阳设炼铁厂。

1891年8月 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刊行。

是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人罢工。开平煤矿工人罢工。长江中下游掀起反洋教怒潮。热河朝阳金丹道发动反洋教武装起义。

1892年8月 沙俄出兵帕米尔地区,违约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领土两万多平方公里。

1894年6月2日 日本内阁决定出兵朝鲜。5日,成立大本营。

7月25日 日本侵略军在朝鲜半岛海面,偷袭北洋海军舰只,击沉运兵英轮“高陞”号;同日,袭击牙山中国军队。甲午战争爆发。

7月28—29日 日军大队猛攻牙山成欢驿清军。

8月1日 中、日同时宣战。

9月15日 日军进攻平壤,清军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

9月17日 北洋舰队与日本侵华舰队在黄海激战,史称“甲午海战”。

10月24日 日军渡过鸭绿江,侵犯中国九连城、安东(今丹

东),又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进犯旅大。

11月22日 日军侵占旅顺。

11月 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组织兴中会。

1895年1月15日 日军侵犯辽阳,人民奋起抵抗。28日,日军大败而逃。

2月12日 日军攻陷威海卫,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洋务运动彻底破产。

2月21日 孙中山设兴中会总部于香港,筹划武装起义。

3月4—8日 日军相继侵占牛庄、营口、田庄台,清军全面溃败,逃入山海关内。

3月20日 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开始“议和”谈判。

3月26日 辽东人民打败日军,收复宽甸。30日,收复长甸。

4月17日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

4月23日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5月2日 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

6月3日 日军侵占基隆;7日,陷台北。台湾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

8月 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组织强学会,宣传维新变法。

10月21日 台南陷落,日军侵占全台。

10月26日 兴中会谋在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逃亡国外。

1896年6月3日 李鸿章在俄京订立《中俄密约》。

1897年10月26日 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宣传变法图强。12月,又办《国闻汇编》(旬刊),从第二期起刊登《天演论》部分内容。

11月14日 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胶州湾。

12月15日 沙俄舰队侵入旅顺湾,强占旅顺、大连。

12月 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刊行。

1898年2月11日 英国迫清政府声明，不以长江流域各省割让或租与他国。

2月21日 谭嗣同等设南学会于长沙，宣传维新变法。

3月6日 德国迫清政府订立《胶澳租借条约》。

3月27日 沙俄迫清政府订立《旅大租地条约》。

4月10日 法国强租广州湾，迫清政府宣布两广、云南不割让给他国。

4月12日 康有为等在北京成立保国会。

4月24日 日本迫清政府声明，不将福建割让他国。

5月 严复译述《天演论》雕版完成。

6月9日 英国强租九龙半岛深圳河以南地区。

6月11日 光绪帝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百日维新”开始。

7月1日 英国迫清政府订立《订租威海卫专条》。

9月21日 西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陆续取消全部“新政”。戊戌变法烟消云散。

9月28日 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被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12月23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

是年 四川大足人民举行武装起义。湖北、贵州、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群众，发动反洋教斗争。

山东冠县义和拳起义，日照、莒州、沂州、兰山、沂水、濮州发生反洋教暴动。

1899年9月6日 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门户开放”照会。

10月9日 山东义和团朱红灯部，大败清军于森罗殿；15日，再败清军袁世敦部。

12月6日 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

12月24日 朱红灯、本明和尚（杨照顾）被捕牺牲。

是年 直隶南部各州县义和团运动日趋高涨。

1900年春 山东部分义和团主力转入直隶境内。

5月22日 义和团涑水大捷。

夏 义和团进入北京、天津。

6月10—11日 英、法、日、俄、德、美、意、奥八国侵略联军，自天津向北京进犯。

6月11—18日 义和团在落堡、廊坊、杨村大败侵略联军。

6月17日 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

6月21日 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

6月26日 两广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授权上海道台，与各国驻沪领事商定《东南保护约款》。

7月16—17日 沙俄侵略军先后制造屠杀中国人民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血案。

7月 沙俄出动十七万侵略军，分六路入侵中国东北。

8月4日 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大举进犯，义和团奋勇迎战。

8月7日 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加紧求降。

8月14日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挟光绪帝离京西逃。

9月7日 清政府发布上谕，叫嚷“痛剿”义和团。

10月8日 兴中会郑士良等在惠州三洲田起义。

11月8日 沙俄侵略军迫盛京将军增祺，签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

12月 列宁发表《中国的战争》，强烈谴责沙俄及其他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1901年1月 清政府授权驻俄公使杨儒，谈判俄军撤出中国东北问题。

3月，中、俄谈判破裂。

1月29日 西太后在西安发布“变法”上谕，搞假维新。

7月24日 清政府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派庆亲王奕劻总理事务。

9月7日 《辛丑条约》签订。

11月7日 李鸿章死去，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1902年2月8日 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

4月8日 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

4月23日 直隶广宗、巨鹿人民在景廷宾领导下，举行起义。

1903年4月 沙俄拒不履约撤兵，妄图永久霸占中国东北。上海、北京掀起拒俄运动。

5月 邹容《革命军》在上海出版。

6月 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29日，上海《苏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摘要刊载此文。“苏报案”发生。

12月10日 英军大举进犯西藏。

1904年初 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成立光复会。

2月10日 日俄战争爆发。

2月 黄兴、陈天华等在湖南长沙成立华兴会。

4—6月 西藏人民在江孜抗击英军侵略。

1905年5月 上海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反对美国迫害华工，各地纷纷响应。

8月20日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11月26日 《民报》在东京出版。革命派与改良派展开激烈论战。

1906年9月1日 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假立宪开锣。

12月4日 萍、浏、醴起义。

1907年5月 潮州、黄冈起义。

6月 惠州七女湖起义。

7月 光复会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同盟会女革命家秋瑾在绍兴准备响应，事泄被捕牺牲。

8月 焦达峰、孙武等在日本东京成立共进会。

9月 钦州、廉州起义。

12月 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

1908年4月 云南河口起义。

8月27日 清政府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1月14日 清光绪帝载湉死。15日，西太后死。溥仪继位为宣统帝。

11月19日 熊成基安庆起义。

1909年(清宣统元年)

10月中 各省谘议局相继成立；次年，派代表请愿，要求速开国会。

1910年2月 黄兴策动广州新军起义。

4月 长沙爆发大规模抢米风潮。

5—7月 山东莱阳农民抗捐起义。

1911年1月30日 蒋翊武等在武昌成立文学社。

4月27日 黄花岗起义。

5月8日 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

5月9日 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

5月16日 湖南长沙—株洲铁路工人，抗议清政府卖国的铁路政策，倡议罢市、罢课，全省抗租、抗粮。此后，保路运动日趋高涨，遍及湘、鄂、川、粤各省。

5月20日 清政府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订立《粤汉川汉铁路借款合同》。

6月17日 成都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

7月31日 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

8月24日 成都召开保路大会。

8月下旬 武昌文学社、共进会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

9月8日 四川“保路同志军”举行武装起义，包围成都。全省人民响应，与清军激战。

9月24日 武昌文学社、共进会决定总动员计划。

10月10日 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史称“辛亥革命”。

10月11日 湖北军政府成立。

11月1日 清政府被迫取消“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

理大臣。

11月30日 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汉口举行会议，后迁南京继续进行。

12月1日 沙俄分裂中国领土，策动外蒙古反动王公、上层喇嘛宣布“独立”。

12月18日 “南北议和”在上海举行。

12月25日 孙中山从海外回国，到达上海。

12月29日 各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民国元年)

1月1日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1—2月 沙俄强占黑龙江省呼伦贝尔地区。

2月12日 清帝溥仪退位。

2月14日 孙中山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袁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3月10日 袁世凯在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北洋军阀统治开始。

3月11日 孙中山公布《临时约法》。

4月 临时政府北迁，资产阶级共和国夭折。

夏 河南中部爆发白朗起义。

沙俄蚕食新疆，出兵占领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地区。

8月19日 沙俄在内蒙古东部策动反动王公叛乱。

8月 同盟会联合部分立宪派和旧官僚，组成国民党。

10月7日 陈焕章等在上海拼凑“孔教会”。

1913年2月15日 康有为把在日本创刊的《不忍》杂志迁至上海，鼓吹尊孔保皇，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

3月20日 袁世凯派人在上海刺杀宋教仁。

4月27日 英、法、俄、日、德五国银行团，给予袁世凯二千五百万英镑“善后大借款”。

5月2日 美国“承认”民国，以支持袁世凯。

- 6月22日 袁世凯向全国发布《通令尊崇孔圣文》。
- 7月 革命党人兴兵讨袁,举行“二次革命”;9月失败。
- 10月7日 英、俄、法、日等十三国,以袁世凯公开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为条件,“承认”民国。
- 10月10日 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
- 10月13日 英帝策划的西姆拉会议开始。
- 11月5日 袁世凯与沙俄签订《中俄声明》,承认外蒙古“自治权”,及沙俄在外蒙古的一切侵略特权。
- 1914年5月1日 袁世凯废除《临时约法》,公布袁记“约法”。
- 7月8日 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
- 8月1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6日,袁世凯政府宣告对欧战中立。
- 8月 白朗起义失败。
- 9月2日 日本借口对德作战,派兵在中国山东半岛龙口登陆。
- 9月28日 袁世凯通令全国恢复祭孔,并亲率百官拜孔。
- 1915年1月18日 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 5月9日 袁世凯接受日本的侵略要求。全国人民愤怒声讨袁世凯卖国罪行。
- 9月15日 《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
- 12月12日 袁世凯复辟帝制,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明年为“洪宪”元年。
- 12月25日 云南宣布独立,反对袁世凯称帝。护国运动开始。
- 1916年3月22日 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6月6日死去。
- 10月 法国强占天津老西开为租界。天津人民坚持斗争五、六个月,迫使法国将老西开划为“中、法共管”。
- 1917年7月1日 张勋拥溥仪复辟。历时十二天溃灭。
- 7月 孙中山到达广州,号召“护法”。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为大元帅。
- 8月14日 北京段祺瑞政府对德、奥宣战。

11月2日 美、日订立侵略中国的《蓝辛—石井协定》。

11月7日 俄国发生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是年一次年9月 日本对段祺瑞政府提供“西原借款”。

1918年4月 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宗旨，在湖南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5月 孙中山通电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职。

5月15日 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猛烈抨击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11月 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1919年1月18日 巴黎和会开幕。

5月 《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六卷五号)。

5月4日 五四运动爆发。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国近代简史

作者 =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编著

页数 = 3 6 6

S S 号 =

D X 号 =

出版日期 = 1 9 7 5 . 0 5

出版社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第一章	鸦片战争
	一 罪恶的鸦片贸易
	二 虎门销烟和广州之战
	三 三元里的怒吼
	四 炮口下的条约
第二章	太平天国革命
	一 洪秀全与金田起义
	二 暴风雨般的胜利进军
	三 群众性的反孔斗争
	四 《天朝田亩制度》
	五 维护民族尊严的外交
第三章	英法联军的侵略
	一 “亚罗”号事件
	二 大沽失陷与《天津条约》
	三 圆明园浩劫
	四 沙皇俄国趁火打劫
第四章	太平天国后期的英勇斗争
	一 天京上空的乌云
	二 巩固天京的战斗
	三 痛打外国侵略者
	四 扑不灭的革命烈火
第五章	洋务“新政”与边疆危机
	一 如此洋务“新政”
	二 边疆烽火
	三 中法战争
	四 反洋教斗争
	五 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新阶级出现
第六章	甲午中日战争
	一 日本的对外扩张
	二 日军侵入朝鲜和中国
	三 《马关条约》
	四 台湾人民的英勇抗战
第七章	戊戌维新
	一 瓜分狂潮
	二 改良主义思潮的形成
	三 “公车上书”
	四 维新与守旧的斗争

	五 走不通的道路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
	一 反帝风暴席卷全国
	二 八国联军的进攻
	三 奋勇抗击侵略者
	四 反对沙俄强占东北
	五 屈辱的《辛丑条约》
	六 义和团的历史功勋
第九章	辛亥革命
	一 孙中山与兴中会
	二 民主革命潮流的奔腾
	三 同盟会的成立
	四 从两条战线上出击
	五 抵制革命的假立宪
	六 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
	七 武昌起义，各省响应
	八 胜利果实被窃取
第十章	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
	一 袁世凯独裁统治的建立
	二 帝制丑剧与护国运动
	三 “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四 新时代的曙光
附录	
	大事年表
附录页	